

非神化

马德民 著

思想者文库

—— 卷之三 ——



非神化

邵燕祥 著

思想者文库

花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神化/邵燕祥著.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9
(思想者文库)

ISBN 7-5360-3049-5

I. 非… II. 邵…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9026 号

非 神 化

邵燕祥 著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1 插页 250,000 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6,000—11,000 册

ISBN 7-5360-3049-5

I 2578 定价: 15.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 者 的 话

我们在策划这一部丛书的时候，向一些作者发出了一封约稿信，其中说：

“我们这部丛书回避了‘思想家’这个提法，而用‘思想者’，还不单是为了谦逊。我们不要求我们的作者都如同思想史上的那些思想家一样，都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原创性的思想。我们自负的是，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在不断地思考历史和现实，传统与未来，中国与世界，社会与文化等等这些题目。他们的作品，也是在引导和启发读者思考这些题目的。编印这样一部丛书的意图，想必可以得到您的赞同吧。”

“我们从平日阅读的印象中，觉得您是一位在深思着的作者，所以冒昧相邀，如蒙俯允，不胜荣幸。”

“我们想每册字数二十万至二十五万，基本上从已发表的作品中选录，最好是发表之后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者。不论是否已编入文集，均可选录。只要围绕着‘思想者’这根主轴，论文、笔记、随笔、杂文均可入选。倘有未发表过的合适的新作亦可编入，但不作为一项要求。”

这丛书的编辑意图和编辑办法就是这些。

每一个人的思想都应该是独特的，既然号称思想者，就不会与别人雷同。丛书的每一位作者，他思考的范围、题目，他思想的倾向，都各各不同。因此，每一位作者只对他自己的这一本书负责，不对丛书中其他作者的书负责。每人发表的都是自己的意见，并不表示这些意见全是编者和出版社赞同的。

第一批推出六种。假如读书界愿意接受这丛书，我们想接着再编印若干种。我们看见，在这世纪之交，在思考着这些题目的，并不是只有少数人。

朱正 秦颖

1999年3月18日

目 录

序	朱 正 (1)
有 感	(1)
论不宜巴望“好皇帝”	(4)
代自传	(10)
读《丁香花下》札记	(13)
读《白色花》	(20)
关于史诗性作品问题	
——答《文艺报》记者问	(32)
幸存者，但不是苟活者	
——张贤亮《绿化树》读后	(35)
《岁月与酒》自序	(43)
“娘打儿子”论	(47)
何物“大辩论”？	(50)
然然长大后怎么样？	(53)
觉慧会不会变成高老太爷	(55)
建立“文革学”刍议	(57)
论“七八年再来一次”	(60)
五月话“双百”	(63)
百草有用论	(65)
不安全因素	(68)

无可羡慕

——漫谈孔子和儒学的“走运”

与古今读书人的“不走运” (75)

一样情思 两副笔墨

——漫谈新诗和诗词并行发展的双轨制 (83)

一个悄悄的预言 (89)

国将不国 (91)

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 (94)

为谭嗣同一辩 (100)

关于错译 (103)

《河殤》现象断想

——从思想参与说到文化启蒙 (106)

避席畏闻篇

——读书札记：关于文字狱的传统 (112)

好在哪里？ (126)

趣味逻辑 (129)

中国还需要皇帝吗？ (133)

喜读《王力病中答客问》 (137)

久违了，王力先生 (140)

读布哈林遗嘱 (143)

批判精神与杂文的命运

——关于杂文史和当代杂文研究的一些思考 (153)

关于《武大郎开店》 (167)

性格斗争 (169)

结论式思维 (171)

接近真实的斯特朗 (172)

纪念俞平伯老人 (175)

我代表我自己 (178)

下海与挨骂.....	(180)
如果太平天国不失败.....	(183)
评“电线杆情结”.....	(186)
论“只剩一个人”.....	(188)
桃花与血.....	(192)
画蔷小集.....	(195)
读《我与胡风》随记.....	(203)
1957: 中国的梦魇.....	(216)
我们将亡于教育吗?.....	(240)
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斗争	
——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序.....	(245)
由一个案件引起的思考	
——夜读抄.....	(251)
卡廷纪念碑.....	(254)
中国人全都堕落了么?.....	(256)
史外说史.....	(261)
评“红”长简	
——读《残缺的窗栏板》后与李辉书.....	(266)
闲话孔夫子效益.....	(282)
疑是“语言奴役的创伤”.....	(287)
只因他的思想变成铅字	
——《顾准文集》读后断想.....	(292)
同情高检.....	(297)
论“真正的共产党人”.....	(300)
我读“胡说”.....	(305)
《人生败笔》序.....	(309)
读几首当代讽刺诗.....	(316)

总结一百年.....	(320)
夜读抄	
——读《陈伯达传》.....	(323)
《党内有个李锐》序.....	(330)
说“神化”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	(334)

序

花城出版社秦颖先生来谈，说他们想出一部思想者文库，先出五家或者六家，一人一本，逐步扩大。我以为这是个不坏的主意，表示赞成。于是他就要我跟他一起来操办这事了。秦颖原先跟我同事，老关系了，不好推辞，就答应下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确定要约哪些作者的书稿。我们从平日阅读中印象较深的作者们中挑选，不论原先熟识的或者不熟识的。这时，我就想起了燕祥。我写信去，他回信也赞许这个倡议，不过，他又说：“至于我，‘思想者’谈不上，‘议论者’耳。于议论者有时贩卖些从思想者处覓来的现货，却少原创性见解。”这里他是用思想史上思想家的标准来做衡量的尺度。

燕祥在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时候，是诗人。当他过了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再见于文坛的时候，就不仅是诗人，而且又是杂文家了。说到杂文，就要说到鲁迅传统。鲁迅往矣，不可再得。也是杂文高手的夏衍说：鲁迅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当推绀弩为第一人。绀弩往矣，不可再得，我凭着对杂文的甘苦也略知一二，要说：绀弩以后杂文写得最好的，当推燕祥为第一人。鲁迅也好，绀弩也好，燕祥也好，他们的杂文好在什么地方？首先，最根本的，好就好在有思想。议论风生之中，时见思想的闪光。思想是杂文的灵魂。没有思想还成什么杂文呢。即使写的是新基调杂文，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却不能没有上级的思想呀。

燕祥不止一次引用过帕斯卡尔的一段名言：

人只是一根芦苇，是所有生物中最脆弱的生物，但这是会思想的芦苇。一滴水可致他死命。但是即使整个宇宙来反对他，他仍然高于自己所有的凶手，因为他能够认识死亡，而盲目的力量是没有意识的。

所以我们的全部优点就在于我们能够思想。

在《大题小做集》的自序中，燕祥对这段引文作了这样的发挥：

人之贵有思想，乃因思想是独立的、自由的；独立思想来自独立的而不是依附的扭曲的人格，自由思想来自自由的而不是禁锢的奴役的精神。为了能够思想，哪怕会像芦苇一样折断，也应是在所不惜。思想会使人的如芦苇一样的生命变得有力，面对“凶手”而高于“凶手”，面对死亡而超越死亡。

我想，即使不能成为帕斯卡尔所指意义上的“会思想的芦苇”，至少我也该做一根会唱歌的芦苇，在晚秋时节唱出心底的悲欢和身历的沧桑，做一根发议论的芦苇，在阵阵疾风中倾吐出肺腑之言的真话吧。

诗人邵燕祥，是一根会唱歌的芦苇；杂文家邵燕祥，是一根发议论的芦苇；而作为本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邵燕祥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样说，是有他的全部著作作证的。打开他的书，就可以看到他在为苦恼着他的那许许多多问题思考，他也把这些问题提到读者面前，强迫读者同他一起思考。

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个思想者的任务，是提出问题重要呢，还是提出结论重要呢？对此，燕祥在《疑难问题》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回答：

作为后人，如果不能越先人思想的雷池一步，那就叫作没有出息。先人的结论再好，是就当时当地而作；后人哪怕还只是发现和提出问题，尚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但出发和归宿于此时此地的实际，也远胜于停步在先人的结论和答案。

即使还不能提出结论来，能把问题提出来，也就很好了。在思想史上，超级巨星如卡尔·马克思者，他在提出问题方面的贡献，就比提出结论方面的贡献大得多。燕祥的许多文章，只是把

问题提了出来，却没有同时贡献出一个“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也许这正是作为思想者的他的一大优点吧。

最后讲一下这本书编选的事。目录是我初步选定的。作者要我提出个初选目录，当然不无道理，因为作为操办者，应该对丛书的要求有较多的考虑，这在我，当然又是责无旁贷。我一面读他的书，一面把目录抄下来。抄完把字数一算，大约超过了一倍。删了一次，还是太多，再删一次，字数才符合丛书的体例。“割爱”一词，通常是客套话，倒是很确切的表出了今天我做的事情。沧海遗珠，不能无恨。只好请有兴趣的读者另外去找他的集子来读了。

朱正

1998 年 11 月 22 日

有 感

读了报刊上登的张志新烈士的材料，百感交集。惭愧、钦佩、悲痛、愤懑……纷至沓来。

写不成诗，写不成文，只有一些没头没尾的、凌乱不成章的杂感。

面对着张志新同志的遗照，那似曾相识的面影模糊了，我却清清楚楚地看到：张志新的笔被夺去了，因为她正在奋笔疾书，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满怀对党和国家命运的忧思，光明磊落地向党陈述自己的观点，披肝沥胆地向毛泽东同志提出自己的意见。然而她的笔被夺去了。

我又清清楚楚地看到，张志新的喉管被割断了，她被剥夺了就义前最后一次发言的权利，她被剥夺了一个共产党员在刑场上高唱《国际歌》的权利，她被剥夺了一个公民向党和祖国、向同志和亲人告别的权利。

我们的笔还在我们手里，我们的喉管并没有被割断，我们还能够书写，我们还能够发声，我们应该怎样运用这属于我们的珍贵的权利呢？

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有一条几千年来一以贯之的原则，叫作“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讳者，隐瞒也。

张志新被割断喉管，则是我们这个文明古国里一项带现代色彩的凌迟手术。我不知道当时有人对此提过异议没有，而到要公

布这一点的时候，阻力却来了。

对凌迟和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如果遮盖而不揭露，这究竟是为哪一家讳莫如深呢？

当我听到红领巾以稚嫩的童音表示要向张志新烈士学习的时候，跟我听到他们说向雷锋学习、向江姐学习时的感受很不一样。我震惊，我悚然，我感到说不出的不是滋味，我心里反复地翻腾着两句话，看来似乎矛盾的希望：

我希望有更多的更多的像张志新一样的同志，

我希望不再有像张志新一样的烈士，一个也不能再有！

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一个忠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任何一个正直的爱国者，因为履行一个党员、一个公民的义务和行使其合法的权利，因为追求真理，因为关心国家大事，因为对党和政府的各级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而被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投入监牢，而被法院判决，党委批准，公开地或秘密地处死，即使死后平反昭雪，即使追认为革命烈士，即使受到表彰和纪念！

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有“五不怕”的革命精神。为了维护人民利益，为了坚持革命原则，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这诚然是可歌可泣的。然而，如果想方设法不让我们的同志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度里因追求真理、坚持原则而坐牢和被杀，不是更好吗？

是的，假如张志新同志能够借助于民主与法制的庇护而不被杀害，不是更好吗？

我想，假如张志新同志还活着，今天一定会和我们一起思考：不止是号召人们为真理而斗争时要不死，而且探索怎样在党的领导下，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消除横亘在征途上的“死地”，使一切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不再成为“自蹈死地”的牺牲。在粉碎了“四人帮”，进一步为实现四化开辟道路的今天，有条件也有迫切的必要来消除这些“死地”了。

鲁迅先生在受到攻击构陷时，曾经满怀激愤地说，他犯的是“可恶”罪。

张志新犯了什么罪？无非也是“可恶”罪。

林彪、“四人帮”不就是常以“可恶”罪杀人吗？

林彪、“四人帮”已经垮台了。正是因此，我们今天才得以以为张志新烈士平反昭雪，公开表示我们的哀悼。

问题是，以“可恶”罪被杀或虽未被杀而已在可杀之列的，岂仅一个张志新？

以“可恶”罪杀人或陷人于可杀之列的，是否只有林彪、“四人帮”呢？

不是有人因为正确地批评了某省、某市、某地区以至某县、某公社的领导人，就身陷囹圄，迟迟不得翻身吗？批评对了的尚且如此，批评错了更无论矣。本来，共产党人对于党内和人民内部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尚且要团结，对于反对自己反对对了的难道不更该团结吗？何况批评与反对并不是等同的一回事情。但是，在党的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遭到无情践踏的时候和地方，某些当权者破坏党内外民主生活、破坏党纪国法的所做所为，与这些原则真是南辕北辙！

这些，有的已成为过去，要作为历史经验来总结；有的还是现实问题，应当加以现实的解决。

张志新同志不是徒有其名的共产党员，她如果还活着，我相信她关心的决不是个人的平反昭雪，而是健全党内生活的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改进党风特别是领导作风。她如果死而有知，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好，她也会死不瞑目的。

1979年6月21日

论不宜巴望“好皇帝”

读者看了这个题目，也许会感到奇怪：时至今天，上距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已经整整 70 年，袁世凯称帝的丑剧和张勋复辟的风波，也已经过去 60 多年，难道还值得像煞有介事地就此立论吗？

其实这个标题是简化了的，求全应作：论不宜巴望皇帝，即使是“好皇帝”。

事出有因：是我写了一篇千字小文，登在《北京晚报》的“百家言”栏，略谓：我们要健全和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首要的是向几千年封建残余影响作斗争，而不能以“清官”和“好皇帝”的标准，取代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无产阶级领导人的要求。在提到唐太宗李世民“再开明也还是皇帝”以后，我说：“何况，草芥小民尽管巴望的是唐太宗，可难保来的不是宋徽宗吧。”^①

于是，有人针锋相对地指出：“既然唐太宗能使国家富强，百姓安生，我们‘巴望’有一个现代的‘唐太宗’有什么不可呢？”^②

吃惊之余，期期以为不可。

关于唐太宗李世民的评价，本来是历史家的事情，我所知很少，没什么发言权。但是事关我们要不要“巴望”以至拥戴一个现代的“唐太宗”出来，我却要珍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

① 《一首宋代的讽刺诗》，《北京晚报》1980年6月14日。

② 《不能否定好皇帝》，《北京晚报》1980年7月10日。

来之不易的一票的权利，一思，再思，三思，以至“十思”。

唐太宗并不那么可爱， 魏征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我不知道现代的“唐太宗”该是什么样儿的，只知道论者“用发展的、现实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历史”的结果，是“假如拉一位唐太宗时代的人到今天来问，他也会说唐太宗好”。但当时全国有 300 多万户，一二千万人，上有朱门，下有蓬户，也不知道他想拉一位什么人来。

就以魏征来说，这位大家津津乐道的犯颜直谏的良臣，其实是“伴君如伴虎”，日子并不那么好过。李世民当上皇帝不久，就先打了招呼：“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我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触之则杀人。人主亦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岂虑有危亡哉！”翻译一下就是，你们可以提意见，但是得有点不怕死的精神。魏征还真有点披龙鳞、不怕死的精神，史有明文；然而，唐太宗听了谏议，退朝发脾气，或酒后吐真言，不满于魏征，甚至想把魏征干掉，也是史有明文的。不过这位“稍逊风骚”的皇帝，倒并不乏权术，且又深通怀柔之道，所以也能大笑解嘲：“人言魏征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一下子遮掩过去了。有个十几岁的“太常乐人”，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受到太子宠幸，起名叫作“称心”；这个称心何罪？“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还株连杀死数人；一桩公案，几条人命，就没听说魏征谏阻，可见这位一生陈谏数百事、包括《谏太宗十思疏》的良臣，有时也还不得不看皇帝脸色的。

原来，早在唐太宗即位的贞观元年，就有人打魏征的小报告，说他“阿党亲戚”，审查了一阵，“查无实据”，搁了下来；贞观十七年，魏征刚死，因为出了另一起案件，唐太宗又怀疑魏征生前

搞小集团。后来又发现魏征把前后“谏诤言词往复”的记录抄给史官，有整“黑材料”之嫌，唐太宗更加不高兴，一怒撤销了把衡山公主下嫁魏征长子的婚约，又把亲笔给魏征作文书写的墓碑推倒。假如魏征不死于贞观十七年，到了贞观十八年会怎么样，就难说了。

如今倘起魏征于地下，征询他对唐太宗的看法，在有日益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的保障下，他会不会简单地“说唐太宗好”，我看也难说。

魏征如此，遑论其他？

这些宫廷旧事，琐屑不下于家长里短。但足以提醒我们，唐太宗同魏征的关系尚且并不那么甜蜜，他对千百万士农工商竟会是可爱可亲的吗？

再好的皇帝，我们也不要

然而，唐太宗在中国历史上毕竟还是个“好皇帝”。

皇帝，无论中外，也确实可有好坏之分的。

拿破仑废黜以后，在厄尔巴岛不甘寂寞，1815年3月1日登陆，20日重返巴黎。他只带了千名士兵，而所到之处，受到农民“箪食瓢饮”的欢迎。那是因为法国农民把自己从第一次革命里获得的全部利益错误地归功于他的缘故。自然，相对地说，比起波旁王朝路易十六、路易十八，拿破仑未始不能算作“好皇帝”的。

论者引用“公私仓廪俱丰实……男耕女桑不相失”，证明唐太宗因“举贤纳谏”而使“国家富强，百姓安生”，证明他是个“好皇帝”。

“贞观之治”是大家公认的，李世民与有功焉。然而是否能归功于他一个人，还是可以讨论的。

唐太宗的“举贤纳谏”，在历代皇帝中比较突出，也是难得的。

《旧唐书》说他“听断不惑，从善如流，千载可称，一人而已”。既然千载一人，现代还能不能有幸碰上，把握实在不大。

不过，即使再有这样的“好皇帝”降临，我想，今天的中国人民，决不会像上个世纪法国农民欢迎拿破仑复辟那样去顶礼膜拜了。

我们的人民已经成熟，已经懂得：姑且不说你巴望的是唐太宗，而来的也许是宋徽宗，就算我们以“乐游原上望昭陵”的LL忠心，迎来了百分之百的“唐太宗”，那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百分之百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经济体制、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名教纲常；什么终身职、世袭制、等级特权、人身依附、分封割据、山头行帮，以至“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家长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风，一应俱全，不可避免要顺理成章地完全合法化了。试看，皇帝蟒袍玉带，三品以上衣紫，五品以上衣绯，六品七品衣绿，八品九品衣青，衣饰服色倒不像今天这样单调了；然而认定唐太宗因能“举贤纳谏”而不是“一言堂”的论者，不知能够穿上什么服色去登堂进言，也不知道如果进言请废“家天下”，会落个什么下场。我想大抵是，没有叩帝阍而拜冕旒，已先受制于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即使侥幸得免于灭门，子子孙孙也还要享受李唐王朝的余荫，从开元全盛到“安史之乱”——“丧乱死多门”，这就是封建社会臣民的命运。

因此，我不想回到唐太宗的治下去，我想人们也不会同意把唐太宗引进当代来。

不是在好坏皇帝之间选择，是在 社会主义、封建主义之间选择

一句话：不要皇帝，哪怕是“好皇帝”，白给也不要。岂止不巴望现代的“唐太宗”，也不巴望现代的“宋江”、“李逵”。李逵

算得农民起义干将，他要宋大哥“杀到东京，夺了鸟位”，那还不又是一代皇帝？说李逵比宋江更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但那手持板斧排头砍去，不分青红皂白的劲头，也实在“左”得可以吧，却并无损于封建主义制度的基础。

什么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而不是封建时代的臣民。因此，我们不是要在“好皇帝”和“坏皇帝”之间作选择，我们是要在社会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在民主与专制、科学与蒙昧之间，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之间作选择。

实现民主化是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民主，在我们这里，首先意味着政权掌握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手中，人民要做国家的主人，这是国体的问题。由于我们的政治制度有某些环节不够健全，或者出了毛病，影响所及，在党内党外的政治生活中，民主集中制长期遭到破坏，民主空气长期受到窒息。这些问题，必须通过一系列政治上、组织上的民主化措施，以及恢复党的联系群众、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作风，来逐步加以解决。

在这时候，有人提出“巴望”有一个现代的“唐太宗”，很值得深长思之。

不是寄希望于人民自己，而是寄希望于“救世主”式的个别人物，不是寄希望于法治，而是寄希望于人治，不是寄希望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是“巴望”出现唐太宗式的“好皇帝”：这是被十年浩劫扭曲了的一种可悲而又可怕的心理。

谓其可悲，因为这种心理接近于封建时代暂时还没有做稳奴隶的人们对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人们的歆羡；忘记了今天的中国人民有权力也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国家的主人。

谓其可怕，在于我们的领导干部如果从而认为“好皇帝”或“清官”就是群众对自己要求的标准，那就不会努力去做社会的公

仆、人民的勤务员，官僚主义和特权、特殊化就不会受到限制，反而会滋长发展；同时难免会有自称为“好皇帝”的野心家，在据说是人们的“巴望”中应运而生；历来做上皇帝或想做皇帝的人，几乎没有不自封为“好皇帝”的。那样任其下去，恐怕最终会导致封建主义的复辟。而这将是我们的对“好皇帝”一味肯定，以至达到“巴望”现代的“唐太宗”的论者始料所不及的。

这是危言耸听吗？居安思危，古有明训；进此危言，正是为了真正的向前看。

1980年7月13日

代 自 传

我原籍浙江，1933年生于北平。我从青少年起尝试写作，多年来主要是写些短诗。曾出版诗集《歌唱北京城》（1951），《到远方去》（1955），《给同志们》（1956），《献给历史的情歌》（1980），《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1981）；即将出版的诗集有《在远方》（花城出版社），《为青春作证》（云南人民出版社），《如花怒放》（上海文艺出版社）。

写完这几行简历，不禁哑然失笑：不是有点像书刊广告吗？

不过，我一向认为：作者是应该用作品来发言的，读者也是要通过作品来认识作者的。

编辑部来信说：请写一份自传，三千字左右。

我想：为了自我介绍，有上面这个简历也就够了。剩下些篇幅，正好借来同读者谈谈心。

因为考虑“自传”这个题目怎样交卷，想到前几年在奉命填写什么履历表之后，写过一首白话的“打油诗”，原来不打算发表的，扔到了故纸与新纸堆中，现在找出来抄在下面——姑题为《别名佚话》：

人一生要填多少次表格？

我的笔在“曾用名”一栏踌躇；

记得我曾经被称为“邵贼”，

在六十年代快完结的时候。

标语上叫“邵贼”认罪低头，
我没有窃国，也没有窃钩！
谁在厉声指责着“衣冠禽兽”？
却原来是弹冠相庆的沐猴！

后来林彪被称为“林贼”，
我就从“邵贼”降级为“邵某”，
虽说仍然是罪不容诛，
“半点名”是一种宽大的照顾！

多少好同志一朝都成囚徒，
人与人到底该怎样互相称呼？
工农老师照样拍着我的肩头，
亲热地唤一声：邵师傅……

有时候为了讥嘲那些“左”派，
笑谈间把“邵某”叫成“少正卯”。
惹恼了批孔批儒的能人：
“他是少正卯，难道我们是反动的孔丘？”

为什么如果我是少正卯，
你们就一定是杀他的孔丘？
记得你们一再要让我相信，
打是疼，骂是爱，不是诛杀是挽救！

可悲的喜剧，还是可笑的悲剧？
这是真实的生活，不是噱头！
近来常听唱“你怎能忘旧日朋友……”
想忘记昨天，又怎么能够！

我不能忘记“昨天”，不是锱铢于睚眦之怨，而是因为“昨天”中有对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宝贵的历史教训。

比方说，谈到 20 多年前的“反右斗争扩大化”，难道能够只是戚戚于个人的遭遇，而不扪心自问：对于当时已肇其端的，不仅给首当其冲的几十万“右派分子”，而且给五百万知识分子、亿万劳动群众、整个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深重的痛苦与危害的左倾灾难，作为 1957 年以前入党的共产党员，我就没有一分应该承担的责任吗？

谈到延续十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尽管那时我已经不是党员，而是辗转在专政“铁拳”之下，但我既然以革命者自诩，我的表现是否像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呢？今天回首往事时，我能够仅以曾受迫害而毫无愧怍吗？

我近几年来，就是在所谓右派问题平反，恢复了党籍以后，经常叩问自己的良心：我有没有勇气承认——虽然我宣称自己是共产党人，但还远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真理并不是一个宝器，一块笏板，一张招牌，只消牢牢抓在手中，抱在怀里，就算坚持它而万事大吉了。真理只存身于你不辞为之赴死的追求之中。

话扯远了，但总算是几句肺腑之言，聊以代自传。

1982 年 1 月 3 日灯下

读《丁香花下》札记

一

尽管我知道，第一人称并不都是自叙本事，散文也并不排除虚构；尽管我对黄秋耘同志，只是心折于他的文字，个人接触很少；然而读过《丁香花下》这本散文集，我认定其中的篇章都是作者的亲历亲经，连同那自称老王的在内。

我想我能够理解作者写这些回忆文章时的心情。对于一个正直地走过自己人生道路的人来说，回忆是他的财富，特别是那些美好纯洁的回忆，他愿意与人分享。“灰飞烟灭”为期不远，就是属于个人的秘密，似乎也无须珍藏了。

人世几回伤往事，有永志难忘的，也有不堪回首的。原来这个“性格孤僻而心境寂寞的老年人”，却有永远不能忘记的爱与友情。“在斑白的头发底下还保持着一个 20 岁小伙子般强烈的感情，这样的人是不会幸福的”，这是朋友出于戏谑、感慨、同情而发的谏语，但不幸的人早已不顾自己的不幸，他期望的是，“但愿人们都能得到正当的幸福！”

作者所难忘的，也使读者读后难忘。

在全书中，那些占主要篇幅的怀人之作最为动人。作者说他是噙泪写成的，我读时也噙着泪水。每一篇都有两个主角：除了被怀念者以外，还有怀人的作者自己。而他们都使读者如对故人。

在我读过的不多的现代散文名篇中，使我能像这样掩卷仍然沉浸其中，长久不能去怀的，只有鲁迅的《风筝》，朱自清的《背影》。

二

“怀旧每兴闻笛叹”，黄秋耘同志的这句诗可以作他这些散文的注解。

我是从一个朋友处读到这写来不为发表的七律的。公开发表的诗文跟不为发表的篇什写得一样率真，这是秋耘散文的一个重要的特色。

我们不是见过写家书都要从报纸上抄套话的文化人么？我们不是见过借追念故人以炫耀自己的耆老么？我们不是见过不在少数的为文造情之作——写爱而并无深爱甚至并不真爱，写恨而并无深恨甚至并不真恨，“我是多么激动呀”，其实未尝激动的前例，难道还少么？

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作者披肝沥胆，才能得到读者的信任。

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文学同样不容作伪。

没有感情就没有文学。而没有真挚的感情的文学则是伪文学。

文学的真实性离不开感情的真挚性。

文学的可信性也离不开感情的真挚性。

可信：读者要相信作品中的生活是真实的，作者的感情是真挚的，才能入乎其中，被感动，被说服；这样的作品才有艺术说服力。

矫揉造作，虚张声势，无论是故作情语，还是故作壮语，都会丧失可信性；或能迷惑天真幼稚的读者于一时，而终将丧失读者的信任。在生活当中，人们不能容忍虚情假意；在文艺作品当

中，人们同样唾弃装腔作势，“为赋新词强说愁”。

情动于中，而又以诚相见：这在朋友中才是真朋友，在诗中方为真诗。

三

秋耘的散文，抒情叙事，间有议论，但发自肺腑，因此不觉讨厌。

《中秋节的晚餐》写了战争年代一个连队怎样酹酒悼念刚刚为大家而牺牲的女卫生员，作者在文末有一段议论：

我想，也许在这艰苦的战争年月里，为共同目标而战斗的人们更能够这样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永远不会遗忘每一个活着的和倒下了的战友，永远以亲逾骨肉的情谊来悼念每一个献出了生命的伙伴罢！正是这种如兄如弟的阶级感情，能够叫我们减除痛楚，增添勇气。这种深沉而真挚的革命情谊，难道会随着战场的硝烟而消逝了么？

作者呼唤这种朋友之间、同志之间患难与共、信守不渝的阶级友爱、革命情谊，他说“缺少了这个，我们是生活不下去的”。《难忘的眼神和泪光》中，那个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青年女教师卢达华，在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的绝大痛苦里，说的是同样意思的一句话：“人活着，不仅需要吃饭，还需要一点同情和温暖啊！”

人和人之间的同情、温暖、爱与友谊，也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骨肉之恩、朋友之义、师生之谊、道义之交，不仅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也应该视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的。

早年读过萧红《回忆鲁迅先生》，那一片赤子之心，使我深感“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句名言，不仅是知己难求的慨叹，也确是幸获知己的欣慰。在经过十年内乱，人间的道义、情谊惨遭亵渎、践踏之后，幸存的我，有幸读到巴金怀念萧珊、陶斯亮怀念陶铸、李锐怀念周小舟的血泪文章，还有黄秋耘这一组“死别已吞声，生

离常惻惻”的文字，我为人间还郁勃着人情称幸，也为人们笔下终得以重新流荡着人情称幸。

四

如果说在《丁香花下》里，我读到的是紫丁香花的香味，想着四十年前那消逝在丁香花丛中的身影和离去时轻轻的脚步声，不免撩起一缕也像紫丁香的花香一样的“淡淡的哀愁”；那么，在《难忘的眼神和泪光》、《古怪的猫的自白》和《重返三堡村》中，我读到的却是痛苦的自责了。这种由衷的诚恳的自责，我记得还只在巴金、楼适夷、韦君宜的散文中读到过。

《难忘的眼神和泪光》，写的是在 1957 年冬天，一个处于人生的困境以至绝境中的不相识的女同志，曾经希望能到作者家里去作保姆，“您和您的爱人……总不会像鲁四老爷和四太太赶走祥林嫂那样的把我赶出大门吧”，她大概是读过作者写的《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这篇文章的。然而当时作者正在接受批判，由于怕受株连，婉言拒绝了她的请求。那个不想“连累好人”的女同志，痛苦地离去了。而作者“只好闭上眼睛，只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因此愈来愈陷入难以排解的痛苦之中：

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因为我辜负了一个人的信任，我伤害了一个人的心，甚至可以说，我杀害了一个人。我本来应当答应她的请求，可是我竟然为了害怕受牵连而断然拒绝了。难道不正是我，间接逼她去找寻最后的“归宿地”吗？我的良心不可能不受到最严厉的谴责，直到 20 多年后的今天。我一次又一次地忏悔而流泪，然而这一切都是徒然的了。

也许作者的形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强者，但是作者的良心却能与每一个读者的良心相通。

在《重返三堡村》里，作者记叙 1960 年农村陷入悲惨的境地，

老房东说：“老黄，听说你也是个不小的干部，当官受禄的，可真要给我们老百姓想想办法啊！你回到北京，可真要叨念叨念我们老百姓的苦楚，好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啊！”作者接着写道：

我过去从来不曾感到过自己有愧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庄严称号。可是就在这一夜里，我痛苦地感到，我是有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庄严称号的，我是有愧于像彭老总那样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我不敢“为民请命”，我的利害之心重于是非之心。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我只不过是一个“全躯保妻子之臣”！

我们从古以来有“知耻近乎勇”的说法，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者不失为一个勇者的形象。一个共产党人对自己良心的一声叩问，胜过了多少篇敷衍的所谓自我批评！

文如其人。诚挚的感情，率真的倾谈，以至由衷的自我批评，是那样打动我的心。而撼动我的心的，从根本上说，则是作品所表现的作者的人格。

五

除了写景状物论事诸篇以外，全书以五万来字、十几篇文章的有限篇幅，大约勾画出十六七个人物，而每篇还都有一个作者自己在。基本上是真人真事的追怀，当然不同于广征博采的艺术典型的塑造，然而毕竟也是一个小小的人物画廊了。

例如关于老舍先生二三事，我认为寥寥数笔见精神：

还有一天，老舍先生去逛隆福寺的旧货摊……兴高采烈地抱着一轴国画回来，一进门就说：“今天可买到一件难得的宝贝！”他打开画卷给我看，原来是一个老画家画的一幅山水画，送给吴祖光同志的。吴祖光同志自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之后，就被遣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老舍先生无限感慨地说：“唉，这可是祖光心爱之物啊！他下去之后，家里恐怕有点像曹雪芹晚年那种‘绳床瓦灶’的景况了。要不然，不会把人家送给他的画都拿出来变卖换钱的。将来有朝一日，要是祖光

能够活着回来，我把这幅画还给他，该有多好！……”老舍先生说得有点凄凉，感情激动，连眼眶都微微发红了。突然，他觉得话说得太多，恐怕有点“失言”，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为了使 he 放心，就坦率地说：“请您老人家放心，我在您家里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我都不会对别人透露一星半点的！”他这才恢复了平日的幽默感，自我揶揄地说：“对！对！这不足为外人道也！”

还有，像写到邵荃麟同志讲怎样对待一位画家私生活的问题，苛刻地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啊”那一段话；郭小川同志和作者在广州二沙头大树下的一夕谈……都不仅写了一言一事，而且是以点睛之笔浮雕出老舍、邵荃麟、郭小川的性格——人格。

为什么在许多以塑造典型性格、典型人物为主要任务的小说里，层层铺垫，精心刻画，倒见不着这样好似信手拈来、偶然得之的片断呢？

秋耘同志在这里写的是他所熟悉的，他首先感动了，他烂熟于心的，在他往事的回忆中反复研磨过无数遍的“这一个”。秋耘怀人散文中的人物尽管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典型，却都是各有个性的，读来音容宛在目前。

六

黄秋耘同志在《风雨年华》前记中引用了法国大百科全书学派的一句名言：“欲语惟真，非真不语，非全真不语。”他说：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我应当服膺这句名言。在我写下的文字中，我不敢保证每一个细节都完全符合真实，但尽可能要保持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对“尊者”、“贤者”和“亲者”，也包括对自己，都应当不例外。

我们现在有纪实的散文，有报告文学，有传记文学，也许还有私家治史（包括回忆录）的吧，恐怕应该共同服膺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的原则。

在历史面前人人平等。秋耘不吝于为名不见经传的朋友写文志哀，“让‘阿雪’这个名字在人世间留下一点痕迹，一点使某些人感到不大痛快的痕迹”，记录了阿雪这个夭折的无名作家“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的气质和良心”，也表现了作者自己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的气质和良心。

而忠实于生活、忠实于历史，总是会使某些人感到不大痛快的。因此，即使在今天，作家也仍然需要勇气。

七

秋耘同志说自己这十多篇散文，“大都是以叙事为‘画龙’，而以抒情为‘点睛’”，“如实描绘，直抒胸臆”，“通过往事抒写出自己的感情，而力求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读者的心”。这概括了写作上的特点。

还应该补充的是，作者始终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读者，推心置腹，肝胆照人，即使发议论时，也平易可亲，不作说教。

我在这里看到的，不是“一个性情孤僻而心境寂寞的老年人”在回首前尘，而是——血泪文章，战士心。

1982年2月6日

读《白色花》

一

重读 20 人集《白色花》，发现这些当时的年轻歌者曾经频繁地接触到受伤、流血、牺牲一类题材和主题。然而，与鲁迅叹为“呜呼，头痛极了”的“先前是‘花呀’‘爱呀’的诗，现在是‘血呀’‘死呀’的诗”迥然不同，这是出于身经战斗者的倾诉，所表现的是爱国者、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生死观。

如阿垅《再生的日子》：

当有血的时候是没有眼泪的
一个兵是没有一滴眼泪的
一滴朝露那样小小的也没有啊，
流血的人不是流泪的人。

习惯把战场上负伤叫作“挂彩”、“戴花”，于是作者写：

我戴的是战斗的花，和战斗一样鲜红的花，
正义的花，和正义一样鲜红的花，
我几时再戴胜利的花呢，那和胜利一样鲜红的花呢？

面对淋漓的鲜血，鲁藜以坦然且近于天真的诗情给他的诗赋予理想色彩。他写在冬天的战斗里暂时用雪掩埋一个战死的同志：“雪堆成一座坟/血液渲染着它的周围/血和雪拥抱/辉照成虹彩的花朵/太阳光里，花朵消溶了/有种子掉在大地里”（《红的雪花》）；

他写下这样箴言式的诗句：“一个勇敢的人/勇敢的战死/就是最大的快乐”（《夜葬》）。

同样，孙铤一边对一个“死过去又活了”的伤员说：“你应该活”（《挂彩者》）；一边又从一个坚决的民族战士之被谋害引出教训：“不要害怕死，阴谋，毒辣的杀害，/作一个永远的青年，/把自己当作一粒种子/播开去/在灾难的荒芜的原野。”

冀《今天的宣言》、《生命》、《死》诸篇也贯穿着这一条线：或者斗争以生，或者不屈而死——“我可以流血地倒下/不会流泪地跪下的”，“能够骄傲地活着最好/能够不屈地死去也好”；对于身陷敌手的战士，则“生命是你底最后的武器”，“你死了/你底希望活着/你底梦想活着”。

在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决战中，《白色花》的作者们决心“把自己的血/和敌人的血流在一起”，因为相信“奴隶们的血，总有一天要冲垮那帝王的龙庭，而且深知“生是美丽的，/为了美丽的生而死/更美丽！”（徐放《在动乱的城记》）而即使死了，也“甘心瞑目——死于追求，死于理想……”（鲁煤《默悼几位扑火者的死》）

这些诗句，连同这些作者当时和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们是忠于人民和祖国，忠于生活，也忠于自己的感情的。这些诗无心说教别人，却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生活，不应该怎样生活；这一束“白色花”，是花也是果实：是诗人的激情和革命者的理想与道德的果实，长在风霜与荆棘之中。

在《白色花》和数十年间革命的进步的诗歌运动所有的花和果实面前，那种所谓恰恰是“不革命的诗人”“在新诗艺术上贡献最大”的妄论应该感到羞愧。

《白色花》一集，除了健在的作者入选的部分近作（证明不仅那些真正的诗作的生命是不会泯灭的，而且真正的诗人的艺术生命也是扼杀不了的）以外，绝大部分诗写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从抗战初起“为祖国而歌”到为迎接新中国诞生而歌；同当时其他流派、其他诗人的许多作品一起，成为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憎情绪的真实记录。

冀 的《跃动的夜》，以粗犷的油画的笔触不止写出了1939年中国大地上踊跃投入战争勤务的“灼热的呼吸，跳动的脉搏，红黑的面孔”，更写出“活跃的身子，活跃的脸色”所包容的“活跃的复仇的心”；运送武器、弹药的工人向往着“遥远处/将有火的跳跃/血的流奔”：这种昂扬的精神状态只属于一个在敌人进攻面前崛起的民族。彭燕郊的《冬日》和《雪天》，在艾青式的“旷野”上，“让被破坏了的桥边、堤下/滚下来‘皇军’的战马、辎重/让战士们在风中大笑/在雪里射击……”在赴战者的眼中，披雪的山、树、村落、田野，“全酷似那/奔走在伤兵医院里的/年轻的……穿白衣的女郎”。这不是向壁的作者苦思出来的意象，而是“艰难地移动冻僵的双脚”，“在雪上疾走”的士兵以整个灵魂拥抱祖国时的血肉感受：“我爱祖国/这被清洁的雪所掩盖的土地”，“祖国呵/我爱你/今天的艰苦的战斗……”

为什么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从战士的血管里出来的都是战士的血）；为什么说诗歌与文学应是人民和革命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而不应是无病呻吟，孤芳自赏，锦上添花的摆设，闲情逸致的雕虫？这在诗人与整个民族、与最广大国土上最大多数人同挣扎、同抗争的时期，最容易地得到了解答。

时隔四十年，这些作品所反映的具体的斗争已经成为历史，而

当年透过诗人的心所温热过的生活画面，至今仍然透过纸面温热着我的心；只要我们的心不对自己的社会、民族、阶级及其历史漠然置之，就能不同程度地从这些作品领略到多属于崇高的、悲壮的美。如果说存在着美感矛盾二重性，即美感对社会、民族、阶级而言是功利的，理智的，对个人而言是非功利的，直觉的，那么这种矛盾二重性的秘密，正是每一个对社会、民族、阶级抱有历史责任感的诗人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

三

一个时代的生活和社会关系，决定大多数人的，也决定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的诗人的感情基调。40年代所谓“大后方”即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诗人及其诗作以悲愤为基调，是合乎逻辑的。悲愤的歌也许不是高音，却可以是强音；不论就音乐的规律或借喻的意义说，强音不必都是高音。

《白色花》一集作者中有部分同志先后前往解放区，而大半是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战斗在与反动派犬牙交错的前哨岗位上。

绿原，以诗集《童话》结束了他创作的童年。他的诗不是花园中的玫瑰，而宁肯作鹿砦上的蒺藜。他写于1944年的长诗《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旗帜鲜明地重申“不是要写诗，是要写一部革命史”。也许正由于中国的现实是非常复杂的，仅仅靠诗的热情远远不够，他政治地楔入生活，直面敌人，寓热情于严峻，化呼号为论战，把对客观世界犀利的剖析思索，同内心世界的披沥抒发融合在一起，以一系列尖新深刻的意象发人之所未发。严酷的现实产生严酷的现实主义，然而现实主义的任务正在于动摇对那该死的现实的任何一点幻想：

在中国，谁能快乐而自由？就是这些天国的选民。……然而……日历撕完了，时钟停摆了，可爱的读者，向他们挑战！

这个上流社会的挑战者，在旧中国的核心给那些“天国的选民”们唱出了末日之歌，同时以如此朴素的语言讴歌了为新世纪的黎明而斗争的战士：

虽然圣经不敢发表他们的史迹，博物馆不敢陈设他们的塑像，
甚至百科全书不敢记载他们的姓名，然而我正走向他们……

还在“我们的身份不过是——尚未亡国的‘四强之一’”的时候，诗人就严肃地声明“我并不信仰西欧的德谟克拉西，亚细亚也不需要人道主义的惠特曼”；诗人甘冒斧钺力求晓畅，而社会革命理想的表达仍然只能借助于伊索寓言式的语言。这是一首对知音者显得痛快淋漓，对另一些读者则不无艰涩之感的作品。然而明白它为什么不能明白如话的局限之后，就会对它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从总体上作出充分肯定的评价了。

集内还有绿原的另一首长诗，写于1946年的《伽利略在真理面前》，同样不是简单地表面地摹写生活现象，而是解剖生活，解剖历史，掘出沉积在生活和历史深处的真理和希望。诗人自觉地作为“四亿五千万个政治犯”（中国人民）的代言人，把伽利略这个“政治犯的老前辈”作为“人的标准”，对比思考伽利略的时代和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

你的时代同
我的时代
是相似的 不是相等的；
不光是人人相信
地球围着太阳在转动，
而且，伽利略——
让我告诉你的在天之灵吧：
在今天，将受审判的
就决不会是我们！

和绿原的长诗相似，以诗为武器同反动派肉搏，而又在运用自由诗体上达到相当纯熟境地的，还有郑思鞭挞那颠倒疯狂的世

界的长诗《秩序》。这些作品中对客观社会现实的反映和对主观思想感情的表现的统一，感情与理念的结合，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互相渗透，都可以在创作上给我们很多启发。

更重要的启发是，战斗的诗之所以为战斗的诗，并不尽在于如实地以至逼真地描绘战斗场面，战斗历程，而首先要求把作为战斗一员的作者的全部的生命和灵魂熔铸在诗里。说到人民的疾苦而没有悲哀，说到敌人和有害的事情而没有愤怒，那就是无聊、油滑和伪善。我们从《白色花》诗集中听到和感到的悲愤之情，彻底地打破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传统诗教；它们不是按照任何游离于生活、斗争、群众之外的教条写作出来，而是像左拉的《我控诉》和《白毛女》中喜儿的“我要活……”那样，把人们和诗人自己用种种痛苦遭遇从生活漩涡中换来的感受与哲理，情不自禁地发为浩歌、痛斥、挑战、抗辩，不惜因此而流于袒露，毫不含蓄婉曲。

四

《白色花》的作者们大体上经历着一个共同轨道上的生活实践。如果承认“伺候着你一千回小心中一回的不检点”不失为对“生活”的一种诠释，那么具体地说，集内多数在国民党统治区活动的向往革命的年轻诗人们（许多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同众多革命的进步的青年一样，当时是辗转在反动派的刺刀之下，随时有被捕和牺牲的危险；无论他们在城市或乡村，在某种意义上，也都是置身于火热的斗争，甚至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因此他们不能不敏感到人民的疾苦，时代的脉搏，政治气压的消长。看似单兵作战，其实确是与革命的主体，与广大群众呼吸相通的。

诗的题材是诗人艺术地把握生活的结果；不过，即便是生活环境和思想感情大致相同的诗人们，由于文化背景、艺术趣味的

差异，把握生活时角度不同，触发点和着眼点不同，类似的题材也会有不同的艺术处理。

举例来说，在激烈的斗争中，叛徒是内部分化出的危险敌人；“十二门徒中，明知犹大在”（《犹大》），阿垅是借用圣经典故来怒斥叛徒，义正辞严，掷地有声：

革命是无可出卖的，
胜利是无可出卖的，
世界是无可出卖的，
历史是无可出卖的，
人之子一个人
是无可出卖的；
出卖了的是
一个卑贱而又卑贱的灵魂
那个犹大他自己。

曾卓的《门》，则以“让她在门外哭泣，/我们的门/不为叛离者开！”的构思和警句，斩钉截铁地宣布了对一个投入反动派怀抱又来骗取友谊的“叛离者”的决绝之情。

在阿垅的《犹大》一诗中，感情是通过论断表现出来，尽管如此，打动我们的毕竟还是诗人隐在论断后面一触即发的感情。感情是诗的内容中不可或缺的。只谈思想，不问感情，只管思想正确与否，不顾感情的有无、真伪、深浅、浓淡，或索性以思想代替感情，必然导致非诗。在诗的艺术内容中，感情起着同思想同样的乃至更突出的作用。文艺作品的高下，是要从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结合上来判别的。简单地运用“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这一对通用的概念，作为分析文艺作品的范畴，模式化的程序，往往容易产生一个流弊，就是把文艺作品的内容只归结为思想倾向，把艺术只理解为形式问题，这就从作品内容中放逐了感情，也放逐了艺术。以抒情为主要特征的诗固然需要感情，其他文艺体裁的内容，倘离开感情，恐怕也不成其为艺术品的。

在诗集中可以看到，凡是优秀的诗作，它所包含的深刻的哲理都既非在构思前先验地存在，也不是在写作过程中所勉强地附加，而是从一开始就与诗人的激情和直觉的、幻觉的形象交互为用、熔冶而一的。就以多次出现的铁窗生活的题材来说，牛汉的《在牢狱》，正是通过坚强的母亲前来探监，“但母亲和我都没有哭泣”，自然地引出：“狱里，狱外/同样是狂暴的迫害，/同样有一个不屈的/敢于犯罪的意志。”曾卓的《铁栏与人》，则采用“虎在笼中旋转”的整体象征，寄托对一位被捕的同志的思念，“铁栏内/一团灿烂的斑纹，/一团火！”

深夜

它扑站在栏前，

它的凝注着悲愤的长啸

震撼着黑夜

在暗空中流过，

像光芒

流过！

这个既有普遍性的概括，又有具体的切近的社会内涵的，饱含着诗人思想感情的艺术形象，令人读来战栗。这首诗，至少对我来说，较之里尔克的名篇《豹》更觉亲切。

生活决定艺术的内容，诗的内容。我们相信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也相信可以从一个人的诗，直接地或曲折地验证他在生活中，是同什么特定的社会存在相联系，在重大的社会斗争和历史变革中，处于什么位置，采取什么态度。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总要在诗人和作家中找到他们的利益、意志和情绪的代表，找到他们在文学上、诗歌上的代表。古代就是如此，当代更是如此。虽然有些时候作为这种代表的人物是并不完全自觉的，甚至有些时候这些代表人物并不为他所属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中的多数人所承认和理解。

《白色花》作者们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却是力求同人民群众结合，同先进的社会力量结合。尽管他们受到诸多的限制，但这一点无疑是自觉的。阿垅意识到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哀乐决不少于一个巨人，但他的“无弦琴”却无心歌唱“个人底忧伤”，他说他的口号是：“人民！人民！卑贱无光的人民！”阿垅在他那篇以比兴出之的“典型的”抒情诗《孤岛》里，寄寓了对于党、阶级、群众，对于伟大的革命集体的怀念眷恋之情，是可以认为具有代表性的。

五

还有值得提到的，如同文学史上多次重复过的一种现象，就是《白色花》的作者们写出这些优秀诗作的时候，多数是“初来的”、只有 20 多岁的青年。他们在“不成熟”的年龄写出了成熟的诗。

在气势磅礴的《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结尾，绿原写道：“愿他的希望比他的回忆愉快些！”这是何等深沉、睿智、独创的诗句，出于一个只有 22 岁的诗人之手。

有一位也是很年轻时就蜚声海内的诗人，晚年曾经满怀感慨地写过：“少年哀乐过于人，吟得声声天籁真。”《白色花》的作者们也歌唱《诗与真》，但那却不是天籁而是人籁：“当真理用难题向我抽考/我轻快的翅膀忽然那么沉重”。

鲁藜的《泥土》是大家熟悉的。他的《草》和《星》几乎是一片天真地礼赞着献身精神。于是我们希望作者就是那年轻的草——发出春天的信号，年轻的星——把我们引向黎明。这样的诗同“吟花草，弄风月”是不相干的，因为其中跳动着战士的心。赤子之心对一个诗人固然可贵，更可贵的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战士的心。

可能诗最需要敏感，而青年是敏感的。更可能是在旧中国的封建秩序下，如同妇女处在最底层，因而要多受一重夫权的统制一样，处于无权地位的青年也会更深切地感到强调长幼有序的宗法制的压力，感到于已成之局则委曲求全、于新兴之事则求全责备的习惯势力的压力；他们也就更如切肤之痛地体验到整个民族和劳动人民被侵略、被压迫、被剥削的痛楚；他们在先进世界观的指引和先进社会力量的影响下，也就更具反抗性，对当时的政治、法律、社会秩序敢于喊出“不合理”；而青年中那些写诗的作者，且会更具创造性，敢于突破传统手法，从诗的题材、风格等方面开拓一个新的艺术天地。我想这样来解释——《白色花》这些作者们，为什么能在那么年轻的时候，写出了这样一些把内容和形式都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新诗。

六

对鲁迅致窦隐夫的信（1934年11月1日），人们长期津津乐道的是关于新诗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以及易记、能唱的主张，却总是忽略了“新诗直到现在，还是在交倒霉运”这一句话，而且似乎从来没有人作过什么解释。

当时，革命诗歌正同整个革命文化一道，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围剿；诗人殷夫和也是诗人的胡也频、柔石等左联五烈士牺牲已经四年；除了少数“怒向刀丛觅小诗”的作者以外，放眼文坛充斥着“不自觉地做奴才之君子”的“为文艺的文艺，还有层出不穷的夸大、装腔、撒谎，必须大打折扣的所谓文学。在国民党杀害作家、禁止刊物、压迫书店的同时，社会上还有从“五四”以来不绝于耳的对新诗的讥骂奚落，以及一般只喜欢所谓社会言情小说和公案、武侠小说的群众对艺术文学、对诗的误解和偏见；如此等等，不知道是否可以作新诗“交倒霉运”的注脚。不

管这个注脚是否确切，新诗当时与整个新文化、与整个民族同遭“倒霉运”，这当是没有疑问的事实。

也许可以说，1934年对于新诗恰恰是一个转机。这一年，臧克家的诗集《罪恶的黑手》和艾青的名篇《大堰河——我的保姆》问世，随后田间等新诗人崭露头角，他们和其他积极投身于救亡运动的诗人、歌手一起，大力推动了现实主义的诗歌潮流；进而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为契机，兴起刚健的、悲壮的诗风，为新诗在读者和听众中赢得了深广的影响。《白色花》一集所已收和未收的、以胡风为倡导者的被称为七月派的诗人，成了当时诗歌运动中一支劲旅。

与人民共命运的新诗，终于和人民一起投入摆脱“倒霉运”的斗争。在解放区出现了文艺创作的新局面；在国民党统治区，密切结合着人民生活斗争的自由体诗走入了它的成熟期。它们彻底背离了温柔敦厚的封建诗教，甚至背离了“五四”以来逐渐形成了某种狭隘的审美趣味的新诗；它在革命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包括学生、公务员、教员、店员以至工人）中传抄、朗诵，使一些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空洞贫乏、形式僵化的诗作相形失色。其中许多佳作，在当时的政治条件、文化条件和传播条件下，达到了可以叫作流行的程度。

当然，在社会文化领域，历来总有两种流行的东西：一种是确实被一个时代的广大群众所需要，所欢迎，一种是迎合了比较普遍的低级趣味；不流行的东西也有两种：一种是脱离群众的，理应束之高阁，还有一种是本该属于群众，但由于种种原因一时还不能为群众所理解，所接受。对于“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各有需要从褒贬两义出发来理解和说明的两种情况，不加分析地笼统肯定或否定，都会失于片面。《白色花》中的作品，比起风靡一时的《毛毛雨》、《何日君再来》，自然要算是“阳春白雪”，比起标榜“与抗战无关”的某些作品，却分明又是“下里巴人”了。

我对从“五四”到建国那 30 年间诗歌的历史，理性上感性上都知之不多。议论各个诗歌流派的得失，我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但我想，把《白色花》以至七月派及其代表诗人和代表诗作，放在中国新诗 60 年流变的背景上加以考察，看他们较诸前人有些什么独特的新贡献，对于后学有哪些承先启后的影响，在诗歌的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怎样丰富和发展了传统，以及在作品的思想、艺术上还有些什么不足（例如书中有些作品有些语言涩而不熟，生涩自是缺点，不熟则是优点，缺点与优点相伴随）：这样的研究，于今天新诗的创作，新诗的普及，新诗艺术的创造与革新，都将很有好处。

创作向评论呼吁公正，并且要求在文学史家的座右，镌刻如下的铭文：“可以偏爱，不可以偏废”，“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1982 年 10 月 3 日

关于史诗性作品问题 ——答《文艺报》记者问

“文化大革命”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而这块土地上生息着人类的四分之一，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文革”这段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页。这一段特殊的非常的时期，发生在中国民族中的灾难，不仅促使每个中国人进行历史的反省，更清醒地思考未来的命运，作出自己的选择，以求用社会的进步作为对社会的倒退的补偿；同时，对整个人类来说，它也提供了沉重的经验和教训。

要使社会进步成为 10 年（？）倒退的补偿，就需要把这当代中国民族灾难中千百万人的命运，包括千百万含冤死去的人的血及其所炙烤着的幸存者的激情与思考，都化为当代和后人的精神财富。

“文革”绝不仅仅是一次政治路线的失误。可以说是古老的中国的历史痼疾的一次急性发作。深入骨髓的封建病毒，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导致免疫机制的丧失，由局部的隐性的候候，发展为全身的恶性病变。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它的后遗症固然不是 10 年就能彻底消除；全身肌体和机能的恢复、调整、健康发展，更需长远的时日。

然而，这个 10 亿人口的民族，终于通过濒危的绝境。它的根基在哪里，它的生机在哪里，它的积极因素、健康力量是怎样通

过对消极因素和腐朽力量的斗争、克服而艰辛生长的——写出这些，不拘一格地写出来，这对中国读者具有认知的价值，道德的价值，审美的价值；对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读者也是有价值的。

从这一点说，就不仅仅是写作“文革”十年的题材问题，更不仅仅是局限于写伤痕，写政治迫害和社会动乱的种种（这些是应该刊诸金石的：把英雄铭志于英雄碑，把丑类和罪行绑缚于耻辱柱），而且应该在时间上突破 1966—1976 的上限和下限，有更大的广延性，在哲学深度上把历史现象和历史本质结合起来，有更深的穿透性。通过作家和诗人的独立的、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感受和思考，写出足以表现我们民族终于得以跨过巨大灾难的精神力量。

已经过去的“文革”和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对我们民族精神力量的巨大考验，也是我们民族把我们的精神世界、精神遗产的一切方面“兜底儿”显露、洗刷、调整、锻冶、升华的过程。

一切真诚的作家、诗人，必定真诚地关切有关人类进步的历史进程：物质进程和精神进程。占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的事情——“文革”前（过去革命中的光明面和阴暗面），“文革”，“文革”后（最大的事是当前的改革，即某种意义上的“第二次革命”）属于这一进程，当然应该受到首先是中国作家、诗人的关注，并在他们笔下得到表现。

这将是具有“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作品，有生活的容量，思想的容量，感情的容量；或者说，有生活的分量，思想的分量，感情的分量。

它绝不仅仅是“写‘文革’”或“写改革”这样一种以题材的划分为标志的文学，而是中国民族可以贡献给世界文学的史诗式的作品。

我们的半个多世纪的充满牺牲，历经胜利与失败、顺利与挫折及沾满千百万家血泪与悲欢的历史，为这样的文学的出现作了

准备，也付出了代价；生活和历史有理由呼唤大手笔，呼唤我们产生当代中国的《史记》、《离骚》、《红楼梦》、《神曲》、《浮士德》、《战争与和平》，通过人们的命运写出民族的命运。

史诗：不仅仅意味着体裁和篇幅，更不意味着仅仅对某些民族民间历史文化进行挖掘或重新解释，而在于它的内涵的深广和恢宏，悲壮与崇高。

当代的史诗，要求作者有历史眼光，又有现代意识；要求如实地有力地抒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折射出整个民族即四分之一人类的历史命运；要求能在文学领域代表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智慧、民族道德、民族审美能力——一句话，能指向并代表我们民族精神文明在当代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随着作家逐步摆脱自己意识到或还没意识到的各种对精神创造力的束缚，我们将逐步获得创作史诗式的作品的条件。史诗式的作品不会突然一下子就出现的，它总是有前奏，有先声，有通向高峰的台级和坡度。我们说一代作家作品的总和可以称为集体创作的史诗，我们更期待着当代文学的巨擘写出无愧为史诗之作。在这个未必很短暂的过程中，写作如实地反映历史和现实，也如实地表现创作者的内心感应的作品，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作家、诗人的权利，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作家、诗人的义务。

1982年年末

幸存者，但不是苟活者

——张贤亮《绿化树》读后

一个好的文学作品总是立体的，不同的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各自不同的感受。比方张贤亮的“系列中篇”九部中首先发表的《绿化树》（《十月》1984年第2期），对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现代史、社会学和民俗学的学者，就可以提供这样的第一手资料：在1961年底至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前后，中国西北高原一个基层农业生产单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水平，劳动状况和食物构成，遍及全国的政治运动在这里的影响，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在这一隅的实际地位，所有这一切同《共产党宣言》指明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样一个“联合体”的辉煌目标的距离，等等；对于文学家们，它可以引起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论证，关于历史感与现实感的统一，当代性与同步性的联系和区别，乃至真伪现实主义的分野的思考，还有在结构、手法方面的切磋琢磨……而对于我这个读者——由于职业关系常常不得不读一些没有激情的“抒情诗”、没有哲理的“哲理诗”、浮光掠影的所谓“生活诗”的人，它却以融合在一起的热情、思辨和生活本身的迫人力量，把我推入回忆之中。

对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们不是30岁以下的孩子，谁没从那段年月经过，谁不知道那段历史，然而经过、知道并不就是认识。在缴过昂贵的“学费”之后，真正要从使人痛苦的回忆里面学会评价历史和生活，比起“缴学费”来也不见得轻松多

少。

小说唤起我的回忆：那断断续续延续了20年的“左”的错误；在特殊际遇中结识的、不能简单以左右善恶来标记的活生生的人们；我的差堪告慰的正直与不堪回首的卑怯……不过，惭愧得很，我首先回忆起的却是——饥饿。

“生活难道是这样的吗？”只有在极端艰辛的劳动中同历史一起跋涉过的人们，只有和普通劳动者在普遍贫困的生活条件下共过忧患的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这个问题，而其中许多人已经不在世间了。今天和未来有幸无虞于温饱的青少年，倘要知道什么是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什么是饥饿，什么是当时与天灾俱来的人祸，并且探究这一切的根源，那末他们得之于不假雕饰的真正的文学作品的，恐怕远远比一般历史课本的概略叙述要具体得多，深刻得多。当代人的记忆最好由当代人在书面上保存下来，后人对前事的杜撰、附会、歪曲，我们看得太多了。我们多么需要史笔啊！

严峻的现实产生严峻的现实主义。然而如果没有逼视生活的勇气，就不可能有审视、解剖生活的魄力。人们在今天需要现实主义，是需要它捧出真相、真情和真理。张贤亮不是从上面来“下生活”，从旁边来介入生活，从外面来体验生活，而是被迫在生活的底层“清水里泡，血水里浸，碱水里煮”；反复的煎熬，使他目光投向了“不在书本本子上，不在报纸上”，而就在身边的乡亲，即作为体力劳动者的人民^①；在人民的疾苦、人民的命运面前，“个人任何巨大的痛苦都是渺小的^②”。

不毁灭过去，怎么能重新生活。所以，我要写，要写，要把过去的事写出来，为了她，为了我，为了有权利生活得好一些的人们。

① 张贤亮：《河的子孙》，《当代》1983年第1期第96页。

② 同上，第137页。

这是作者 1980 年秋写的《土牢情话》中主人公的自白^①，毋宁视为作者的自白。

唉，我们的人民！把稗子炊成主食，聊得一饱，一时竟会有陶醉的感觉……酒足饭饱而侈谈体验生活的清淡家们，可有过这样的“体验”么？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远去的白帆》等，都出色地写到过饥饿，当然不仅仅是写饥饿。而《绿化树》的作者在写到物质的贫困和生理的饥饿的同时，更以深邃的目光和犀利的笔锋写出了精神上的贫困和饥饿。

对于中国，对于中国人民，什么是精神上的财富和营养？

在那荒村的土坯小屋里，昏暗的油灯下，一个除了可怜的身份以外几乎一无所有的年轻人，每晚来到这里享受一个中国当代文学中从未出现过的女人的恩惠；她以单身和姿色的优势，狡黠的匠心和清醒的权宜之计，取得定量外的粮食，在一碗杂合饭中注入了温情和仁爱，然后一边俯身炕上做她的针线，一边让那青年在找补一顿以后，“好好地念你的书吧！”她不知道他读的是什么书。他读的是在劳改农场刑满释放那一天，从一个原来在大学教哲学的“右派分子”那里接受的馈赠——为了让他也许能从中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而“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那是《资本论》第一卷。

这是在《资本论》第一卷问世 94 年之后，在宪法上铭刻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这是在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开始雷厉风行地阉割、肢解、取消马克思主义，反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而另辟“立竿见影”的“捷径”以售其奸的时刻。这是在甚至某些负责干部的书橱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以及早年指定阅读的几部

① 张贤亮：《土牢情话》，《十月》1981年第1期第28页。

马列著作的单行本，竟还保持着出厂时的崭新状态，而什么“问答”、“解释”、“提要”、“十二讲”等小册子的某些答案上倒划着红杠杠的年头^①——此时此地，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上的奇特的一页，难道不使每一个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同志辛酸、愧汗、痛心么？

不用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活动，是马克思观察社会历史的基本出发点；仅仅记住“民以食为天”这一千古以来成为常识的格言，难道需要多深的理论修养么？《绿化树》虽然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灵魂中的扬弃和转变为主线的小说，但它首先以黄萝卜、高粱面、羊杂碎与饥肠辘辘相对照的真实画面，揭穿了一切“左”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的高论。

在 50 年代中、后期膨胀起来的左倾错误，不仅伤害了知识分子，而且紧接着使压顶之灾及于以亿万计的体力劳动者。于是，首当其冲的“大”“小”知识分子中的受害者，其中相当大量的是当时二三十岁的青年，随之在饥荒的年代、苦役式的劳动中发现：

“劳动人民”绝不是抽象的，他们就是马缨花、谢队长、海喜喜……这样的人！尽管他们和那些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劳动者的庄严高大形象相差甚远。

生活是检验现实主义文学抑或伪现实主义文学的试金石。

马缨花！她的名字是作者代取的（因为在小说描写的那片西北高原似乎绝少这种落叶乔木），这个人却绝非臆造的。她容光照人地出现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我不愿意轻率地使用最高级形容词来论定她的品格，寻索她和我们这个同时具有古老文明与古老野蛮的东方传统的精神联系；我只能说她这一形象的价值超过了一般所说的认识意义。这是使 20 世纪 60 年代一个落魄的无

^① 张贤亮：《男人的风格》，《小说家》1983年第2期第187页。

名诗人“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的又一位“五松山下荀媪”，而又确实集母性、妻性、女儿性于一身的，没有所谓文化素养却有一点暧昧的名声，不无心计却又天真未凿，自有其温良又粗犷的情义的特殊魅力的年轻女人。如同我们说好诗都不是诗人硬“做”，而是自然迸发或流露出来的一样，这个人物也不是作者张贤亮刻意构思、设计、剪裁出来的。她是从真正的生活中，从作者的心坎里自己走出来的，她身上有《土牢情话》中的乔安萍、《河的子孙》中的韩玉梅的影子；更确切地说，乔安萍、韩玉梅是她的某一个侧影或背影，她却活灵活现地站在我们面前，喊叫着，戏谑着，沉默着，轻声款语着，讥骂着，乃至用全部的灵与肉发出山盟海誓：“就是钢刀把我头割断，我血身子还陪着你哩！”……马樱花是《杨花似雪》中的杨思萍、《草青青》中的小萍的同命的姐妹，不过马樱花就是马樱花，就是她自己；她以不可替代的声音笑貌、性格和命运攫住读者，令人心折，令人惘然，令人深思。

不管今后在作者的“系列中篇”的其他各部里，这个马樱花是否还会出现，但在《绿化树》中，这个人物形象的最后一笔，已经完成在我们似乎看到了的、她留在茫茫雪原通往山根的那一串长长的脚印上了。

相对来说，作为表现一个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的第一人称，“系列中篇”的主人公“我”——章永 的形象，在这一部中当然还不可能完成；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以忏悔录式的真诚袒露出的、接受过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每一次震颤；这种震颤是他身边的人物，首先是劳动人民，更其切近的是马樱花所激发的，也是他所开始阅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激发的。

这不是天主教徒的忏悔，不是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更不是一度流行的“活学活用”和“狠斗一闪念”。这个知识分子一心想“和人类的智慧联系起来”，从而“超越自己”，以求精神上

的绝处逢生。直到最后面对着马缨花的献身爱情，他才痛切地感到：“我的心里只有我自己，即使想‘超越自己’也是为了自己。这就是我和她之间最大的差距！”

《绿化树》并不以爱情为惟一的主题，但它在这方面的抒写，不像有些趋俗之作那样，满足于重温和传达一种爱情经历中的甜蜜或辛酸的体验，而是歌颂了一种超过情欲之上的、甚至也不仅是一般的男女互相倾慕爱悦之情的、“一种纯洁的，神圣的感情”——“有限的爱情要求占有对方，无限的爱情则只要求爱的本身。”这种感情，恰恰不是萌生于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超尘脱俗的高人雅士的身上，却自然地燃烧在像马缨花这样不得不为升合之米折腰的普通劳动妇女心中！

在小说前半部分，主人公关于堕落，关于理想和生活目的，关于自己的出身教养，关于趋利避害的劣根性，关于感恩，关于对“体力劳动者”的态度，关于爱情和道德观念，以及关于知识分子对人生和生活的不切实际的自省和剖白，其诚挚是使人信服的。这些心理活动表述带着很大的纯思辨性，不过它与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具体处境丝丝入扣，因而不仅合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思维逻辑，并且折射出时代的、历史的光痕。如果没有主人公基于自己全部教养和特定历史条件的这种思想上、道德上的探索、追求，则小说后半部中他从《资本论》第一卷里有所领会和顿悟，将是不可想像的。

作者在前言中预告这个“我”将最终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这一部虽仅见其端倪，我们却已经从中感到，马克思主义诚然是这样的火种，即使在党的组织力量极其薄弱甚至瘫痪的时候和地方，它也会点亮人们的心。它使人清醒，高尚，充实，向上，呼唤人们去改造自然和社会，并在这个过程中“展开各种睡眠在他本性内的潜能”。这样朴素动人的真理胜过了连篇累牍强制改造的训诫说教。

我们多年来的文学，还没有一篇像《绿化树》这样发自内心的，富于生活底蕴的，又是有血有肉地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精神力量的颂赞。它也写出了我们是多么需要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体力劳动者，如果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相结合，就不能避免可悲的盲目性；无论是和善的，或是剽悍的，都不能摆脱蒙昧半蒙昧状态，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的每个角落，肃清曾长期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左”的货色。而如果不大力肃清“左”的流毒，那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具有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的现代化国家，是不可能建成的。

张贤亮小说的一个人物走出土牢时，曾经慨叹“多么美的阳光，多么惨淡的人生啊”；如果经过斗争，人们进一步从污染深远的“左”的流毒中解放出来，人生该多么美好，阳光将更加灿烂。在《绿化树》中美好的人、美好的向往与不美好的现实的映衬之间，已经透出作者的理想的光辉。能够震动人的心灵的强音不一定是高音；忆旧如果是为了汲取历史教训，就会赋有迥异于怀旧的召唤前瞻与前行的力量。

我虽从1957年就知道因《大风歌》罹祸的张贤亮同志，却从未谋面，仅从他部分作品中想见其人。也许真的是“人，经过炼狱和没有经过炼狱的大不一样”吧^①（恕我在与他原意略有不同的意义上引用这句话），我以为张贤亮也像许多经历类似的同志一样，得到的毕竟比失去的多，他曾经可以说输去了一切，但他赢得了生活，尽管生活——活着，并且建设新的生活——要比死去或沉沦困难得多。不止是个人的，而且是波及千百万人的患难玉成了张贤亮。我们绝不情愿再以如此沉重的代价去造就作家，由

① 张贤亮：《男人的风格》，《小说家》1983年第2期，第31页。原上下文为：“人性中的弱点——残存的原始兽性已经暴露过了，人，经过炼狱和没有经过炼狱的大不一样，从炼狱中生出的人总带有鬼魂的影子。”

此却倍加显示了幸存的作家们社会责任的沉重。然而“文章得失不由天”，多少人身经安史之乱，可是有几个杜甫和李白呢？张贤亮目前达到的和可以预期的成就，得力于他起初也许并不自觉的同人民群众在特殊条件下建立的血肉联系，得力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如饥似渴的潜心学习。没有这两者，他就没有反“左”的胆识和武器，也就没有他的小说中体现出来的严峻的现实主义。而有了上述两者，就使张贤亮的作品能够有助于我们比较深刻地认识生活，比较正确地解释生活，鼓舞我们热爱“艰辛得和美丽得都使我（们）战栗的生活”，去改造和消除生活中的阴暗面，推动历史前进。因为伪现实主义只能是来源于和服从于冒牌的马克思主义的。

“我们应该给人民做些什么？我们能够为人民做些什么？”张贤亮的近作《男人的风格》中那位志在改革的主人公同时也是作者自己这样问道。

历史是向前发展的，生活是向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向前发展的，文学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也是向前发展的。这种不可阻挡的发展是由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不可更易的规律。我们历经劫难的人民，包括我们与人民生死与共的作家，是幸存者，但不是苟活者。这就是我们所以对民族、对国家、对党，对现代化进程中方兴未艾的伟大变革，也对我们的文学事业满怀乐观的根据。

1984年4月6日

《岁月与酒》自序

这本书选入的一百零一首诗中，除了《1983年诗抄》中二十几首短诗以外，多数是没有发表过的。有些在写出的当时形格势禁，不得发表；有些因为自觉粗疏，留待斟酌；还有一些是一时抒怀遣兴、纪事怀人之作，原来并不准备公开的，现在拿来公开了，却也算不上什么秘密。

书里最早的诗，即所谓“早熟的酸果”，写于1947、1948年。那是我写诗写得最多的年月。当时我向北平等地的报刊投稿，主要是小品、散文之类习作；新诗也发表过几十首，大量的则是当作日记来写的。起初是在日历纸的背面或随手抓来的什么纸上，记下自己的情思，后来改用我从春节厂甸地摊上廉价买来的日本“昭和十二，十，东京奥谷纳”印制的复写式“通信纸”，每页20行，每本100页；至今还保存着1948年4月至年底写满的十来本。

翻检这些三十六七年前的旧稿，确实像读当年的日记一样，清楚地回想起那时候的环境和心情：《风，风啊，风》里“麦苗发指”的意象，就是我到西郊燕园、清华园参加活动时，沿着麦田逆风奔走时形成的；《给伏尔加河船夫》，一写一改，都是哼着《伏尔加船夫曲》，处于精神亢奋的状态；而《遥远的敬礼》的腹稿成于课堂上，人坐在灯市口育英中学的生物教室里，心却飞到西山之西了。

那时发表过的习作将另外结集（有几首诗曾辑入《献给历史的情歌》），这里从当时不曾发表的诗稿中选了十几首。如果今天

的读者透过不成熟的酸涩的诗行，依稀感到一个向往光明、诀别黑暗的少年的心的跳动，那是因为当时的我，只是把诗的写作当作倾吐心曲的一种形式，没有任何关于文学创作的框框套套的缘故。面对这些自己不免偏爱的少作，常常感到三十几年来长进不大，真像龚自珍所说，“诗渐凡庸人可想，侧身天地我蹉跎”。

建国以后写的诗，前前后后编过几本小册子。这里，从1953年的《生活是严峻的》到1982年《月食》，则多是从各个时期的日记本上直接辑录的，故曰：“日记诗抄”。曾经收入诗集的一般不再入选，只有三首例外，即《山阴道》、《新土》、《钱江潮》，本来已编入诗集《迟开的花》（十月文艺出版社）；这回浙江的出版社乐意为一些浙籍作家包括我出一本书，书中怎么能无一字及于故乡呢？然而我生50年来，只在1954年冬到杭州出差一周，写下收入本书的《钱塘江》、《茶山》两首单薄的小诗；再就是1982年初夏路经杭州，并到原籍萧山县下邵村一行，后来陆续成诗三首，这是仅有的关于故乡的讴歌了。当然，还有一首姚文元批判过的《忆西湖》，刊于1957年1月号《东海》月刊，那是借题发挥之作，除了“还他格律，放我歌喉”两句以外，没有什么可取。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回我“根”之所在的故乡，能写出较为像样的东西，有以奉献于故乡的父老兄弟。

1957年是十月革命40周年。这年春天我随同徐铸成同志为团长、徐晃同志为副团长的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作了为期40天、行程4万里的访问。归来写了组诗《第40个春天》，共40首，由作家出版社赶排，准备在十月革命节时出书的；我已经看过校样，终于以大家知道的原因而告流产。其中有一部分曾在报刊发表，有一部分后来辑入《献给历史的情歌》和《为青春作证》；这里选入的几首都是第一次发表。

那年访苏归来后即兴写的一首谐谑小诗《磨光的五戈比》，在巴黎第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中也提到

了，其实还从来没有发表过，仅仅是在 1958 年一篇公开批判我的文字中曾经点名。现在正式发表出来，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那以后的特殊条件下写的一些诗，跟《献给历史的情歌》中同一时期的作品一样，都属于“直是须焚未忍焚”的“待焚的诗稿”。虽然身份特殊，但诗中也不过是些常人通有的思想感情，一点小小的寂寞啦，为了排遣这种小小的寂寞而“浮想联翩”（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词汇）啦，一点自娱、自慰、自勉，如此而已，毫无惊人之笔。这也是我“诗渐凡庸”的有力证明。自然，我无法禁止别人由于作者特殊的身份而引起的联想。有一位在当时没把我视为异类的同志，看到《蜀犬谣》一诗，就曾经好心地提醒我，不要轻易示人。其实我写《蜀犬谣》，只是有感于重庆的雾大，联想到“蜀犬吠日”的自然现象以及“一犬吠影，十犬吠声”这一谚语所概括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并无深意存焉；尤其没有把整过我的人讥为“蜀犬”，从而翻案的意思。我知道“辱骂与恐吓不是战斗”；我不是年年月月日时时都在战斗的人，更没有学会辱骂与恐吓别人。那些年里偶亦有“翻案”之念，写过辩诬的材料，但也绝不是随时随地、一言一行都紧扣这个题目，每一行诗里都渗透委屈与牢骚，果真那样，还能活到今天吗？

一个人不能老是想着自己，光是想着自己。实际上这也不可能。一个人总会想到自身以外的一些什么。每人所想，各不相同。从一个人想些什么，也足以见出这个人的精神境界。读者从这里面所收的各种题材的作品中，可以多少发现我并不是成天在忧国忧民，也不是成天在“忧”自己，思路纷纭却有失于不够阔大高远，怡情悦性但并不遁避现实，这就大体接近我半是战士、半是庸人的实际了。

我就是这样，半是战士、半是庸人地活下来的。直到 70 年代，直到 80 年代。关于这一时期的杂诗，没有什么需要着重说明的了。

杂文之为杂文，一则是由于文字多写杂感，二则是可容多样

的题材，不求划一的体制。我愿意把自己的诗叫作杂诗，也取义于此；无非是把各种各样的感受，或长或短、或整或散地表达出来吧。书名标作抒情诗，从俗而已。《九章·惜诵》开头就说：“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诗天然是抒情的；多样的诗，抒多样的情。如同人的感情有多样的表达方式一样，诗也有多样的抒情方式。我认为我这些杂诗都是抒情诗，包括那些并不“作抒情状”的如讽刺诗、谐谑诗，也是抒讽刺之情、谐谑之情的。

从书首到书尾，时间跨度达 30 多年。诗风，包括抒情方式和语言形式，都必然呈现变化，甚至有杂沓之感，但我希望细心的读者于杂沓之中，看出那一点不变来。

我的故乡出老酒，一钵酒埋在地下，10 年、20 年、30 年后启封，是会越发香醇的。遗憾的是诗稿尘封 10 年、20 年、30 年，诗味却并不会与年俱增，也许由于岁月的播迁，时代的进步，它倒会像稿纸变黄一样，在历史面前失色。人与文都要接受时间的淘选。但是没有发表过的东西，以至虽未发表却已遭批判的东西，在未见天日、未见读者之前就此任其沉埋，毕竟心有未甘，所以还是决定编这么一本书了。记得在十年动乱的最后的日子里，1976 年 9 月 4 日，我写过一首律诗，有两句说：“愁到酒边新病胃，诗沉江底浪知名。”那心情是苍凉的。又是 8 年过去了。沉到江底的诗心已经重新打捞出来，我却难忘那曾经有过的“中心如醉”的岁月，虽然我近来很少喝酒了。就这样，我把这有悲歌也有欢颂、有高吟也有低唱的 101 首诗，题作《岁月与酒》。

1984 年 9 月 13 日

“娘打儿子”论

与其教人们要能够“受委屈”，何如努力健全政治生活，让广大干部群众得以少受委屈或不受委屈呢？坚持原则、坚持真理的同志能够发扬“五不怕”即不怕开除党籍、不怕撤职、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精神，固然表现出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然而若为加强党内民主、国家法制而斗争，减少以至杜绝那使我们的好同志因坚持原则、坚持真理而遭到开除党籍、撤职、老婆离婚、坐牢、杀头的冤假错案，岂不更好，更足以表现出共产党组织的浩然正气么？

持“娘打儿子”论的论者，却出来对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人们指点说：“党是我们的母亲，‘娘打儿子’就是打错了，也不该耿耿于怀呀！”

看来出于维护党的一片好心热肠，又带着“动之以情”的伦理道德的“人情味”，真也好像言之成理了。

但只要一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千百万党员根据共同的政治信仰、阶级利益，遵循一定的纲领和组织原则的自愿结合；在党员履行义务的同时，党员的权利应该受到各级党组织的切实保障，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是严重违反党纪的。

共产党这样一个政治组织，甚么时候同血缘基础上的家庭划了等号？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甚么时候变成了母子，而且是可

以“娘打儿子”直至错打的那样一种局面？

这种“娘打儿子”论，不是更像旧时代“官打民不究，父打子不究，夫打妻不究”的封建法规和奴隶道德的翻版或变种吗？还哪里有一点现代工人阶级先锋队内部关系上应有的原则精神和感情色彩呢！

徐向前同志在《历史的回顾》上卷中说：“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徐帅又说：“一场革命，人民群众的牺牲是巨大的。不仅对敌斗争要付出血的代价，在党的路线发生错误时，同样会付出血的代价。由此不难理解，坚持党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多么重要！”倘若相信了“娘打儿子”论，把错误路线当作“娘”，则如此之多的血的教训就不值得研究，而总结经验不仅多事，且有违“孝”道了。试问：这种观点和论调究竟是维护党的利益和威信，还是在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路线辩护呢？

仍举徐帅回忆录中的例子：张国焘在“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支持下，来到鄂豫皖根据地称王称霸，胡作非为，一些同志稍有异议就被扣上“立三路线”、“反中央”等大帽子，轻则批判撤职，重则逮捕杀害。尤有甚者，张国焘借口肃反，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他搞的“大肃反”，任意诬指他人为“反革命分子”，残酷杀害许多忠于革命并立有战功的好同志，不到三个月，就肃掉了两千五百余名红军指战员和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至今说起，还叫人毛骨悚然，义愤填膺。“娘打儿子”论者，敢到红四方面军含冤牺牲的死者墓前推销你们的“娘打儿子”论——娘杀儿子论么？！

当然，受到这种似是而非的论点影响的人们当中，有不少属于停留在“朴素的阶级感情”阶段而不辨不察，认识不清；也有一些是为了表示对党的感情而言不由衷。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则是此论的鼓吹者中也颇有一贯整人而并不改悔者在，所以“娘打

儿子”论的核心，乃是“整人有理”论：党是亲娘云云，拉大旗以唬人罢了。

哪怕退一步说，作为一种跛足的比喻，姑且承认党是母亲、党员是儿子，也根本不能得出冤假错案是“娘打儿子”的结论；因为制造冤假错案，破坏党内民主生活，侵犯党员政治权利以至人身自由的，并不是党，而是党内错误领导和某些个人野心家，以及有心紧跟或一般执行了整人指示与部署的党员；除去个人野心家如张国焘和后来的林彪、江青、康生一类不论外，这些不同程度整过人的，和被整的党员一样，按照上述逻辑本来同属党的“儿子”；因此，“娘打儿子”也者，不过是党的一些“儿子”整另外一些“儿子”，整人时却“以母亲的名义”而已。整得眼睛红时，还要整到党外去，那自然谈不上“娘打儿子”，而是打邻居、打朋友、打路人了。

“娘打儿子”论者，以为娘打儿子是天经地义，打错了也无妨，再进一步，就要宣扬“丁香割肉”了。即使光就幼儿教育立论，这也已是不折不扣的封建残余；借喻来讲党组织与党员的关系，那已经不仅仅是庸俗化了。

认“左”作母，其无后乎！

质之“娘打儿子”论者，以为何如？

1994年12月8日

《新观察》1985年第1期

何物“大辩论”？

何物“大辩论”？

辩论而称“大”，自有它跟一般辩论不一般的特殊含义。

一般的辩论，在辩论之前，双方见解有待论证与申明，才能判断正确与错误，或是部分正确、部分错误。而所谓“大辩论”则胜负早已前定，一方是绝对正确，天然优势，高屋建瓴；另一方绝对错误，从一开始就被抛到不容申辩的被告的席位。

一般的辩论，在进行过程中，双方都有发言权，各自陈述一定的理由，同时揭露对方的矛盾。“大辩论”则只许一方先声夺人，他说的句句是“马克思主义”，以至一开口即成结论，言出“理”随，咄咄逼人，言之不足，声势随之，权势继之，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另一方呢，只有老实听着的份儿，哪有还口的余地？

一般的辩论，其结果，可能是最后达到一致的认识，或者求同存异，使矛盾解决或部分解决。而“大辩论”则只许有一种结果，就是叫你承认我的权威，认错领罪，从宽处理，可以给你个公开检讨的机会，当然要经我审定通过；如不俯首就范，没你的好果子吃。

或问：这就叫“大辩论”吗？答曰：这就叫“大辩论”。“大辩论”的精髓就是：“辩论辩论你！”把“辩论”这个不及物动词变作及物动词，谁说不是一个创造？源出于 50 年代后期“全民社会主义大辩论”中没有文化但能“领会精神”的基层干部，比起

某些熟读、饱学而且有权之士，倒真坦率可爱得多。

标榜摆事实而不摆事实，标榜讲道理而不讲道理，标榜辩论或称讨论而并无辩论或讨论的任何余地。此所谓“大辩论”，不过是以“大批判”之实冒用辩论或讨论之名而已。谁若是执着于既称“辩论”就该由彼此双方有来有往，那至少是“书生气十足”，受了“××面前人人平等”一类的骗。而关于“自由”“平等”之为害，康生、陈伯达之流早就一再从“理论”上阐发过了。“大辩论”就是在此等“大人物”手里“大”了起来，成为大祸害的。

或问：包括“大辩论”在内的“四大”不是早已明令废除，成为历史陈迹了吗？答曰：“大辩论”并不自“文革”始，更不会简单地与“文革”而俱终；远不是一经取缔，立刻“四大皆空”的。只要存在着“左”的影响，民主与法制不健全，就会有人对不同意见甚至是正确意见滥施挞伐，驾轻就熟地组织“一边倒”、“一面理”的声讨与围攻，随意给人扣上各式各样的政治帽子；闹“争鸣”必是想放“毒草”，反批评理应“抗拒从严”……如此等等，记忆犹新，由远及近，历历如在目前。这种模式的“思想斗争”，就是“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中习以为常的“大辩论”。

“大辩论”者，就该由彼此双方有来有往，至少是因“全面专政”而流毒全国，无辩论或讨论的任何余地的。这年来，它的受害者死的死了，残的残了，社会和民族也留下创伤累累。这血的教训不应忘记，它照亮人民，更要照亮前途。

只有彻底否定谁说不是一个在进行过程中，错误理论，肃清“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全面专政”的流毒才能从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特别是思想文化战线上，消除“大辩论”这个反民主、反法制的安定、不团结的因素；也才能不仅为创作自由、评论自由和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辟道路，而且为全国人民精神

力量的大解放、大发扬，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创造必要的条件。

1985 年 2 月 4 日

2 月 14 日《人民日报》

然然长大后怎么样？

然然名叫安然，是根据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改编的影片《红衣少女》的主角，16岁的中学生。诚实，有正义感，很可爱。不过，“女大十八变”，她长大后会怎么样呢？

不能占卜，可以预测。

她的诚实和正义感，来自一颗涉世未深或者说还没步入社会的赤子之心。比起同龄的班长祝文娟，她只不过是“缺心眼儿”的“傻闷儿”，不会讨好老师，不会敷衍同学，不会赢得几张满意的“三好”选票；而是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却不懂看人脸色行事，说真话不藏锋芒，作实证不怕报复，不从自保和利己的动机去迎合别人。这在学校已经碰了小小的钉子，走出校门又将如何呢？

如果她保持着这样的诚实和正义感，赤子之心的基本素质，那末，在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没有根本好转的情况下，她难免会因独立思考而被视为桀骜不驯，因特立独行（甚至仅仅是穿红衬衫）而招来风言风语，因说真话而得罪人，因不肯拉拉扯扯、同流合污而遭到排斥打击。结果就不止是评不上“三好”、“四好”而已了。

倘若到了成人社会里的然然，吃瘪以后仍然不改初衷，义无反顾，是非之心高于利害之心，则她将在尊重、同情、怜悯的眼光下，而更多的是鄙视以至怨毒纷至沓来中走着自己漫长而艰辛的人生之路。

但是，假如一旦她的做人的准则被击溃，以致带着忏悔的心

情回首往事，把少年的种种一概叫作幼稚，自认作过“傻闷儿”，那她就会学世故，长心眼，以违心为“修养”，以拉关系为“团结群众”，成为习惯势力的奴仆，只求适应环境而不求改造环境，于是，长大了的、变“聪明”的然然可能一帆风顺，但我们所喜爱的、穿着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这个然然，也就从此消失了。

这岂不太悲观么？然而时间是如此无情：谁能保证 50 年代的林震不会变成 80 年代的刘世吾，50 年代的黄佳英不会变成 80 年代的陈立栋呢？我们不是已经习惯于这种变化了么？

那属于然然的父母一代，不去说了。就说然然的姐姐安静，也已经走上了这样一条路，不过尚未走得太远，所以还有内心矛盾的自省。足以硬化人的赤子之心，扼杀诚实和正义感的旧的思想风习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不屈从于这种力量，往往难逃幼稚之讥；而同这种力量妥协，乃有“成熟”之誉。然然无疑面临着这样的选择。假如你是然然的父母，假如你是然然的老师，你希望她过几年在长大以后，像你？像她姐姐？或者像别的什么人？怎样从幼稚走向成熟，而不以牺牲诚实和正义感为代价，阅世渐深，而仍能保持赤子之心，——你想过吗？

为了使然然们长大以后不因诚实和正义感而招致厄运，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1985 年 3 月 25 日

觉慧会不会变成高老太爷

据说，话剧《家》的反封建主题强烈震撼了当代青年。有一位青年在给上海《青年报》写的信里问：“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觉慧正在被改造成觉新？”这一问，更强烈震撼了我。

是的，在我们这个有沉重的封建遗产的国度里，“精神裹脚”依然使一些青年举步艰难，这不仅仅指包办婚姻；觉新的悲剧是半清醒地全身心就范于封建的枷锁，原来倒不限于舍梅表妹而娶瑞珏这一件事。

我看影片《红衣少女》后，担心的也是类似的危险：然然长大后会不会被改造成她的姐姐、她的妈妈，甚至祝文娟、韦婉那样？虽然后者都并不是觉新，而然然也还不是觉慧。

觉慧之被改造成觉新，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更可怕的是不仅如此，觉慧还会变成高老太爷！

我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

清末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章太炎，“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是觉慧当时所不能比的；但到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参与投壶，接受馈赠”，虽然还不算晚节不终，毕竟也是白圭之玷，只是比高老太爷的昏聩腐败略高一筹罢了。革命者堕入这步田地，终究是悲剧，不管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在一个漫长的革命过程中，经历种种艰难崎岖，于是呈现分化改组，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落荒，有的颓唐……其中有人从最初觉慧式的热血青年，终于成为高老太爷，也是不足为奇

的。

在 50 年代讨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评论家黄秋耘把这种革命意志衰退、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的现象，叫作“锈损灵魂的悲剧”。

五四运动初期的参与者，当时尚有觉慧之风的钱玄同曾开玩笑说：40 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当然未免激进得可爱，而据说他到了 40 岁后，却大发“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课”的豪言壮语了。难怪鲁迅先生写诗开他的玩笑曰：“作法不自毙，悠然过 40。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自然，钱玄同晚年也还是有成就的学者，并非高老太爷一流。

然而从觉慧变为高老太爷的悲剧，果然是因“时间无情”而造成的么？如果那样，就太简单了。我们看到众多的老人，在精神上仍永葆青春，并且能跟今天新一代的觉慧们心息相通。可是现在一些处于觉慧的年龄的青年，却未必都是今天的觉慧；而没有如觉慧那样追求理想、追求真理的热情和义无反顾的执著，那就不仅有被改造成觉新的危险，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有踏着高老太爷的脚印走去的可能。高老太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对于没有理想，安于现状的人来说，是不难适应的，或者开始略不适应，慢慢地或者很快地也就会如鱼得水的。

这不是耸人听闻的预言，而是几十年社会生活中反复发生过的现象。今天的青年如及时引起深思，则这一代的觉慧变成觉新以至高老太爷的就少了（未必一个没有）；坚持追求理想和真理，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在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不断成熟的觉慧们越多，那么在中国国土上最终肃清封建影响，改变产生高老太爷的土壤和气候，也就越有希望！

1985 年 8 月 17 日

建立“‘文革’学”刍议

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遂成名著传世。研究者争鸣互补，议论纷纷，人称“红学”。甚至旁生枝节，又繁衍出一门“曹学”来。200年后出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震惊遐迩，绵亘10年，以天地为舞台则可称一部活剧，以天地为册页则算得一本大书，浩瀚磅礴，奥邈幽深，岂可不援例建立“‘文革’学”，更岂可不趁多数身历亲经者健在，广搜博采，为长远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文革”从开始算起，已20年；从结束算起，也已10年。既非年深月久，史迹难寻，又不是身在庐山，毫无间距；不远不近，恰到好处，建立“‘文革’学”，此其时矣。

顾名思义，“‘文革’学”是以发动于中国大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对象，由于这是中国所独有，不须冠以“中国”二字。当然，在研究“文革”同中国固有的政治文化传统的继承关系的同时，也要涉及它所接受及所发生的国际影响，不排斥横向的比较研究。然而这毕竟是我们自己最有发言权也最有义务拿下来的“攻关项目”。正如中医中药学、气功学或敦煌学不该让非中国人着了先鞭，我们的“‘文革’学”……更不该让非中国人抢了行市。立即上马，义不容辞。

据悉，在海外已有有心人注意及此，开始搜集“文革”文物，从“全国山河一片红”的稀有邮票，到大像章和小语录本等等。这个信息应该加强我们的紧迫感。好在国内亦有有心人在：已见有

人初编“文革”中冤假错案案例，又听有人想编“文革用语”的词典，凡此种种努力，都是为建立“‘文革’学”所做的准备。至于各个学术领域和政治生活中对“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文学艺术中否定“文革”的大量作品，其意义自不待言。

我们拟议建立的“‘文革’学”，不言而喻，理所当然地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六中全会决议的有关精神为指针，应该把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指导思想的否定，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揭露批判，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置于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上。而诸如把姚文元襁褓中拜国民党特务为干老子作为姚文元本人罪行材料一类做法，则应为我们所不取。

“‘文革’学”必须占有和整理极其丰富的史料，但绝不可沦为史料的堆砌；它又有别于1966—1976十年间的断代史，而要上溯其源，下循其流，史、论结合，找到从党内左倾错误发展到民族灾难的来龙去脉，上升为对规律性的认识，这将大有利于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肃清“左”的影响。这就使“‘文革’学”成为囊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史哲法以至民俗、“官情”各门的跨学科的科学。

“‘文革’学”要对“文革”作多层次系列性研究、比较研究、综合研究。“文革”作为一个系统，有它的子系统，“‘文革’学”也将有它派生的从属学科，就如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必然要有关于外戚、宦官的专题一样，在“‘文革’学”中，对于具有特殊的历史作用和代表性的人物如江青，不仅应有专章立传，而且要考虑开设“江青学”，对有关重要政治现象给予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并从江青的“行状”中引出有普遍意义的教训。

以史为鉴，具体到以“文革”作为历史的镜子，有赖于把分散的偏于感性的揭发批判，在党中央否定“文革”的论断指导下，集中为有系统的科学研究，推动全党全民的历史反思，庶几不辜

负所缴的血泪的学费。

因此，“‘文革’学”之设，势在必行；并非说着玩儿，广大读者幸垂察焉。

1986 年 2 月 25 日

论“七八年再来一次”

“文革”期间，吴组缃同志因为说“听到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不禁毛骨悚然”，一句话招来一场围攻。最近，巴金同志由于重听“样板戏”，做了噩梦，梦见重入牛棚，醒来茫茫然，惴惴然，不知道今后还有没有牛棚。

巴金能够长舒一口气，表达他的担心，证明今天毕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了。然而在未来的岁月里还会有牛棚，会不会有再版的“文化大革命”，则不敢断其必有，也不敢断其必无的。

为什么？

对于“七八年再来一次”之说，在拨开它唯意志论的主观随意性以后，也可以发现它不无某些规律性的依据：不是“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而是“左”的东西七八年回潮一次。

翻开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看看：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给了党内极左的东西一次重大的冲击。而七八年后，整风运动中正在肃清王明路线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影响时，康生就跳出来，在“审干”中打击一大片，使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再来一次”。

1945年中共的“七大”肯定了整风的积极成果（包括对康生搞的极左干部路线的纠正），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然而，还不到七八年，“左”的东西就先从思想文化领域露面，接着以反胡风的案件肇其端，反右派、反右倾，把

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施之于党外和党内，伤害了许多群众和干部，并及于经济领域，那就是“大跃进”。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对一个时期的“左”的错误特别是它对国民经济的破坏有所反省。从这时到1966年“文革”全面发动，只有5年多一点；那是因为七千人大会并没有划句号，而只划了个分号（；）。同年9月北戴河会议上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既为这以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作了辩护，又为这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作了准备。

人们常常说我们这些年间的历史是在“左右摇摆”中走过来的。不对。这些年虽然打过不少“右派”、“右倾”，但是指导思想上哪里有过右的影子？如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耳闻目睹的却尽是把敌人、把朋友当作敌人的“左”的表现，何尝有过把敌人当作朋友的右倾呢？政治上的敌我如此，经济上的进退也是如此。实际上总是一会儿“左”的东西横冲直闯，一会儿对“左”的错误有所抵制和纠正，我们就是在“左”和纠“左”之间摇摆着前进的。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左”的指导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纠“左”则往往只是局部地、暂时地解决一些问题；过不了几年，“左”的思潮又以“反右”的名义，声势汹汹来对纠“左”的努力加以“纠正”；这就是所谓“七八年再来一次”。

结束“文革”以后，经过真理标准的辩论，特别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极大地缩小了极左思潮的市场，它不可能在两三年、三五年内卷土重来。但是时过七年，就不可掉以轻心了。

如果从1976年10月算起，过七年就是1983年秋，过八年就是1984年秋。如果从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过七八年则正是现在，在1985、1986年之交。我们高兴地看到，1984年秋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迈出全面开展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的一步，

1985 年秋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又通过新老领导班子的接替和“七五”计划建议的提出，显示了党的正确路线的坚定性和连续性，使我们看到开放改革和四化建设的前景。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也不该忽略左倾思潮的某种回流，尽管在党内正确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它只能在某些领域或只是某些方面冒头，还不能形成全面的反扑。然而风起于青萍之末，从例如“样板戏”的重播于管弦，重现于屏幕，不难闻见某种对“文革”、对“左”祸横流年代的留恋。什么人才这样不能忘情呢？

他们没有忘情。我们也没有忘记。巴金同志写出了他的不安。我为他的不安做了如上的注脚。让我们在纪念“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的时候，想一想“七八年再来一次”之说，想一想我们该做些什么吧。

1986 年 4 月 3 日

五月话“双百”

一般老百姓吃糠咽菜的时候，一般知识分子也不会吃到上帝特别分发的糖果。中国知识分子总是和全体人民倒霉在一起，也解放在一起。解放前如此，解放后一样如此。远的不说，十年动乱中就是一例。

物质生活质量有高低之分，精神生活、政治生活也有个质量问题。在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虽被叫作“精神贵族”，那只能导致政治上的歧视，却绝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能多享有一点什么。“当历史蒙羞，人民蒙难，祖国蒙尘，我们不期望有更好的命运”：正是这样，在人民民主遭到践踏，宪法和法律形同废纸，广大公民的合法权利甚至像人身自由这样的基本人权都失去保障时，知识分子的命运就如张春桥所说的，“不枪毙就是落实政策”了。民主之不存，“双百”云乎哉！

尽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是采用科学的、法律的用语，而是采用了如诗的语言，难免像许多诗句一样产生多义性，可以做这样那样的解释，叫人眼花缭乱；然而各家一致认定这是只“在人民内部”实行而不施之于人民以外的。然则在可以随时并且任意把一个人划归“化外”、列名“另册”的年月里，“双百”不也就势所必然地成为镜花水月了吗？

不因创作上、工作上的问题把人打成反革命，在科学文化领域同整个政治生活中一样实行“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这反映了、概括了一个相当时期内广大知识分子的几乎是最

高的愿望。不过，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战略目标看来，从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的高度看来，这岂不是一个偏低的标准——无非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遵纪守法、依法办事而已吗？

我们的认识，怕要从“不打棍子就是实行双百了”提高一步，虽然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我更不认为遵纪守法、依法办事是十分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多少违犯宪法和法律，也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原则的冤假错案，不也大都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们制造的吗？不是还有自命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宣称“实事求是”不算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吗？

从知识分子的命运可以看到全民的命运；从“双百”方针的提出，中经废弃或歪曲，直至开始在阻力中认真执行，也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大起大落——在长期遭受蹂躏后重建、恢复和发展，当然也是在阻力中前进。所以 30 年来“双百”方针的执行情况不仅是知识分子政策的温度计，更可以看作政治生活的晴雨表。从事科学文化劳动的知识分子不是生活在离开人间土壤气候而特辟的伊甸园，因此不能离开政治民主谈“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要认真切实地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和知识分子政策，也不能仅从科学文化范围内着眼。民主枯则“双百”枯矣，民主荣则“双百”荣矣，今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逐步制度化法律化（而且有法必依了），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也将有可能逐步趋向正常，全国人民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的质量也才可望进一步提高。

在一个封建残余影响严重存在，经济不发达，文盲众多，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曾经流于畸形的国度，实行现代化不会一帆风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行“双百”方针不会一帆风顺。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估计和必要的精神准备。

1986 年 5 月 17 日

百 草 有 用 论

偶然翻翻有关中草药的书，先是对古往今来冒着生命危险尝百草的先驱们——从神农氏到李时珍，从心坎里萌生敬意；接着悟到天生百草，没有无用之物，就是毒草也有用。

什么叫毒草？或是全株有毒，或是花、叶、茎、根某部位有毒。

在厦门万石岩植物园的曼陀罗花前面，我就久久陷入深思。过去总是香花与毒草对举，好像凡香花就无毒，有毒的就无花；而面前的曼陀罗盛开着漏斗似的白花，风姿绰约，我分明知道它全株有剧毒，然则它是归入香花还是归入毒草呢？

罂粟花也是这样，谁不知道它又名大烟花，是鸦片的原料呢？

吸食鸦片叫作吸毒，适量使用，鸦片也是镇痛和麻醉的药剂。曼陀罗的叶、花和种子，用作抗胆碱药，作用近似颠茄片所含的颠茄，不过服用宜慎，不能过量就是了。

有名的巴豆，谁都知道吃了大泻的。它的种子含脂肪油及毒性蛋白等成分，有大毒。如果因此就摒弃它，我们将失去一种主治寒结便秘、腹水肿胀、痰阻喉痹等症的有效药物。

北五加皮又称香加皮，含杠柳甙，有较强毒性，而恰恰这个杠柳毒甙有强心作用。常山的根，蛇床的果，藜芦的根和根茎，都有毒，但可入药。这些有毒的草药几乎一律是味辛、味苦，正合“良药苦口”之说。有毒，但是有用，是草本植物中相当数量可以入药的“毒草”的共性。

采以致用，一是慎重地控制用量，使它治病而无害；一是经过炮制：比如有毒的附子，经过盐渍、水漂、煮熟，成为“熟附块”、“制附子”，毒性减低，而回阳救逆、祛寒湿的功能不减；又如生半夏有毒，经过炮制的“制半夏”，就是中医常用来治胸闷、呕吐、咳喘的药物了。

这些草本植物，在不知它可以入药之前，人畜误食，严重的可以致命，自然视为毒草。这些毒草有的虽说开花，好看，人们对它也存戒心；有的只开些细碎小花，貌不惊人，似乎就更不值一提，只合与毒草全株同腐，不能列入香花的品目。一旦发现它作为草药的效用和价值，就会同时发现，它之所以入药，也许正是因为它含有某种有毒的成分的缘故。对这种有毒的成分，用之有方，利大于害；用之无度才会荼毒生灵的。大自然就这样以它的客观辩证法要求于人们的主观辩证法。

我不是药物学者，也不是植物学家，但我以为如说“百草有用”恐怕是不错的，即使没有药用，也还有别的用处，正如百卉千花中那些没有实用的，可供赏心悦目也不失为一用。而“百草有用论”必然包括“毒草有用论”；只知其有毒，不知其有用，是我们的知识还不完全，其过在我，不在草也。至于见无毒花卉草木而惊呼毒草，那是对自己信心不足，神经过分紧张所致吧！

大自然中，花无贵贱，草无高低，本来都是平等的。屈原赋《离骚》有云：“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其实是主观移情，托物兴讽。换一个角度，萧艾是芳草；艾叶可以入药，艾绒用于灸法，艾蒿结绳可以驱蚊，在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的旧俗中，戴艾虎悬蒲剑一样可以避邪除秽呢！

天涯何处无芳草？天涯何处无药草？百花齐放也意味着百草同生。因为万紫千红，固然有的属于木本植物，怕更多的还是草本。南园春半踏青时，看那花是否笑脸迎人，这是止于观赏的感性层次；提高一步，深入一层，无论好看不好看，问它是否有用，

如何发挥它的效益，则有待分析研究，万勿一听有毒，就退避三舍，或踏上一只脚。“鹅不食草”，鹅见而不食，是鹅的聪明，因为此草有刺激性；万物之灵的人，却可以用它来治鼻塞目翳、疮痈肿毒，自然，内服宜少量，一般多外用。

1986 年 7 月 3 日

不安全因素

从“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好像已经无须去认识社会，认识世界，几乎惟一的任務就是“认识自己”了。用文绉绉的词儿叫“静坐常思己过”，用过去习惯的说法是“反省”“检讨”，而耳边经常鼓噪的是勒令“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犯有许多滔天大罪的“罪人”。

能够与世隔离，专事“认识自己”，争取做一个“贵有自知之明”的人，有什么不好呢？不过逐步提高认识的结果，只是认识到我在社会上处于什么地位，在操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人们心目中我是个什么人。

曰：不安全因素。

这个认识不是轻易获得的。因为我性近于随遇而安，早就止于饥思食、渴思饮，逆来顺受，与世无争了。1966年8月红卫军兴，我从身体发肤痛感到的是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而绝没有想到我会成为威胁什么人——哪怕是一个人的不安全因素。我纵有缚鸡之力，但并无缚鸡之志呀！

8月25日到“政训队”报到，虽说这个单位的名字颇像国民党的机构，但分明宣布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对我实行“监督”，同时被“监督”者多是熟人：老上级、老同事、老朋友，从此上下床，同作息，集体生活，使我有了一点安全感。可是听到楼窗下走过的小队伍，一路唱着其旋律有如拉锯或收紧绳套的战歌：“拿起笔来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虽在炎夏，脊背发冷，想

到希特勒时代的“党卫军”、“冲锋队”，不知将置我们于何地。

一天，通知我们准备行李铺盖，自然要轻装，过冬衣服，还有三个月的伙食费，每月15元。到何处去？不知道。不久，口耳相传，要迁洞庭湖。惭愧得很，听到洞庭湖三个字，我首先想到的竟不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是黄庭坚的“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黄庭坚是被赦之后，生入瞿塘滟关，结束了投荒万死的生涯，回乡路上，欣然登楼；而我此去将别弃一家老小，到那浊浪排空、山岳潜形的去处，却还仅是万死投荒之始。面对满目萧然，我能笑得出来么？

也许真的是全无肺肝，我竟然私心欣幸，盼望着早日成行。很想尽快离开这京畿红尘，万般纷扰。我既不能见容，打发我去洞庭烟水菰蒲中去就是了，又何必大费干戈，组织队伍，开会批斗，送政训队，像煞有介事地走过场呢？我似乎并不恋栈，并不是不甘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人，甚至早就不在舞台上了，我这样想着，一时忘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为我而发动的。

迟迟，迟迟，终至没有消息。不能像吕洞宾那般“朗吟飞过洞庭湖”。在那年月，凡我所盼望的都归于怅怅难即，连去洞庭湖边劳改的心愿都不例外。10月1日晚上，在楼窗遥望外面的烟火，我还想，按照原定计划，今夜该在洞庭湖滨了。

第二年的国庆是在“外面”，也就是在家里过的。政训队已解散。我也风闻“文革”之初，是计划把“黑帮”们都清除出首都的。中央宣传系统就托庇物色了洞庭湖滨的某几个农场。局势发展太快，这才迁延下来。

不过，像我这样的人，终究是不宜留在首善之区的北京的。我觉悟到这一点，是我长期停滞在被人叫作“小邵”的相应的自我感觉中，一旦被“革命小将”以至老将们指斥为“老右派”后的顿悟。右派不足卖老，然而老右派矣，奈何！

1968年9月，已经从属于又一朝天子办的“专政队”了，在

这一朝“臣罪当诛”的被专政对象，包括了差不多原有的“政训队”的成员，不过扩大了许多。也许因为房子不够，这回是走读了。

一声令下，驱遣到郊区农村。名义是支援“三秋”，责无旁贷，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概属“不安全因素”，在国庆期间，理当回避。

我心里笑问自己：也许怕我炮打天安门吧？

我有个同事，长期背着“炮打天安门”的黑锅，自己却不知道。1964年忽然要调到某省某市，莫名其妙，欢送会上说是正常调动，但是因为犯了胃病，没有走成，“文革”一起，也先就被送到那个“政训队”。“革命小将”们不如老将们懂“策略”，抄家揪斗，亮出底牌，原来是为了他有“炮打天安门”的嫌疑。事过多年才弄清这位出身天主教徒家庭的同事，有个在工厂的亲戚，在一次什么运动里被逼不过，承认自己参与过1951年破获的一起有外国神甫在内策划的“炮打天安门”未遂的案件，随口咬了一批亲友，开列名单，纷纷飞往各家的档案袋。时过境迁，公安部门说，那起案子早就查清结案，有关人犯早已依法处理了。但那一批检举材料却还列为悬案发挥着威慑力量。

我也很愿意到这小小路村来，免得偌大北京城万人如海，万一发生什么不测，先从我身上顺藤摸瓜——单是摸一摸也不怎么好受。远离市廛，便又产生了某种安全感。

一夜风雨后，天朗气清。谁知政治气候骤然又不对了。监管人员铁面宣布，要每人写一材料，详细交代昨天夜里干了什么，到什么地方去了，有谁证明，等等。

夜里干了什么？睡觉呗。趁着下雨天凉好睡。到什么地方去了？顶多到厕所去——而我没有起夜。起夜的人难了，半夜上厕所还找伴儿吗？真是无头公案。我们这三间东厢房里，对面两排地铺，十几二十号人，人人愁眉苦脸，不知如何交代。本来心怀坦然，“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看来也提心吊胆，怕掉到

黄河洗不清，因为你的身份已经是鬼而不是人，要查的是你昨夜到谁家去叫门了吧。

过了大半天，我才知道，在我们东厢房窗下土墙上，刷着用十块粉红有光纸写的大字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偏偏“人”和“共”“和”三个字的纸耷拉下来，一早被大队干部首先发现，在牛鬼蛇神的门外，赫然是“中华……民……国万岁！”这不是反动派贼心不死，心向台湾蒋介石的铁证么？！凹凸凹凹的土墙，哗哗啦啦的风雨，以及冥冥中惟恐天下不乱的上帝，竟同我们这批蓬首垢面的囚徒开这样危险的玩笑！

不在北京，可免“炮打天安门”之嫌矣，而仍难免心向国民党的嫌疑。因为“文化大革命”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嘛。于是我和我的“同伙”们就不仅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社会基础”，又同时成了海峡那边的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的“社会基础”，并且相继作为“刘邓陶”以及王关戚、杨余傅和萧华的“社会基础”。萧墙之内把谁“打倒”了，我们虽身在沧州，也马上被“上挂下联”一番，其实说实在的话，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从来没想过要高攀的。

秋收以后很久，从郊区回“队”继续走读。按季节该已“冬藏”，我们多数人早出晚归，不串门，不多言多语，早进入了“隐于市”的化境。没想到“你不找政治，政治也要找到你”，听说西单商场发生爆炸案件，又从我们查起。人人自危。好像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有可能去作案似的。直到队里有一個人不见了，对我们的审查才放松下来。转天发现他升格到“隔离”的档次，跟梅益、丁莱夫等六七个人一起，只写材料，不再劳动了。不知他都交代了什么，实际上他只不过在西单商场出事那天到前门去买过一次药而已。过去说“是非只为多开口”，现在加上“是非只为多出门”，人人“非礼勿动”，一动不如一静，天下自然太平了。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事实上不会让这些“牛鬼蛇神”安

生的。林彪讲过，不能让资产阶级和“乌龟王八蛋”们睡好觉嘛。连知识青年包括大批运动初期的红卫兵都已经上山下乡了，怎么能容忍众多“戴罪之人”留在城里“养尊处优”呢？我们的机关选址办干校，有消息说要把我辈专政对象一股脑儿赶去。校址选在嫩江，我隐隐又有些像当年向往洞庭湖那样的心理，但是想到冰天雪地，想到1958年后辗转北大荒的“右派”朋友们的遭遇，就不那么急切了；不去也好吧。干校决定在嫩江兴建，敲锣打鼓为光荣走上“五七道路”的干部们送行。没有我们的份：那里是边防重地，邻近“苏修”，大约生怕我们“叛国投敌”。总之还是那句话：不安全因素。

1969年10月，建国20周年。逢五逢十，例当大庆。我们这一类人照例又当回避。“专政队”已在4月“九大”后解散，但“三秋”还是需人孔殷，于是又去郊区路村。

就在一天秋雨的晚上，紧急集合传达林彪签署的一号通令。那时候我们自然不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是在这通令下流徙开封的，但预感到留住京华的日月不多了。冷丁记起一个知识青年自嘲地说：“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住哪儿我住哪儿！”他留恋北京。不知道最后他下乡没有。

干校要迁到河南淮阳了。中原大地，远离“帝修反”，不需边防通行证，黄泛区一马平川，也没有山沟沟的“三线”工程。万一迷路走失，可无越境潜逃的嫌疑或涉足禁区的危险，真是使从“专政对象”到“专案对象”的我们产生安全感的理想地带。也大概正是为了收容这批不配称为“干部”的等外人员，才要替通用的“干校”“正名”为“五七劳动学校”吧。

果然来到淮阳，春种和秋收，学习与批判，时光过得很快。河边建楼，说是什么车间，为了“就地消化”，实行“给出路”的政策。一些正牌“五七战士”自然不甘于在这里落户安家，“自食其力”，纷纷地自找出路。我们连探亲假都无限期地延长，“帽子拿

在群众（？）手里”，无话可说，只是拭目以待。不过我有时暗想，与其“就地消化”，不如“遣返回乡”，我生于北京，长于北京，故乡自然算是北京，回乡就是回北京了。又想倘能回到北京，“重新做人”，自然要总结这些年来是是非非，经验教训，连同在“五七劳动学校”的心得，如绝不帮厨，以免“放毒”之嫌，不涉机要（可推而广之，不看文件不开会），保无泄密之虞；这岂不明哲保身，优哉游哉！不管身份是人民，是公民，是国民，是什么，住在北京，蜗居斗室，即使国家领导心血来潮，决定迁都，所有公职干部潮涌而去，我有遣返回乡证明，做北京人，名正言顺，那时北京从首都又成为故都，人口减少，空气新鲜，物价或许略降，文物依旧斐然，只要一口气还在，不死，真可以乐此天年了，云云。这些都是心中暗想，从来没向任何人说过，自知一旦说出，阿Q相毕露，会被雅俗所共笑，致貽痴人说梦、庸人说梦之讥事小，说不定又会归结为“人还在，心不死”呢！

所以平常还是充当陪斗角色、反面教材以及上面各种被清除的头面人物的“社会基础”，吃饭，睡觉，干活以及据说是以“能吃、能睡、能劳动”来对抗改造的典型，如是而已。

到了1971年10月17日晚，忽被通知，明天一早可以离校回京探亲。离校以后，这才知道林彪已死了一个多月。这回我居然幸而没有被指为林彪的“社会基础”。回到北京，我特意到天安门广场走走，心想某虽不才，毕竟是不会“炮打天安门”的；不安全因素，其实在萧墙之内。

这话当然还是跟谁也没有说。此后又经过几番风雨。我真的体会到，“树欲静而风不止”，但我是树而不是风；我无力制止风的狂刮横扫，我无法改变自己被视为不安全因素的处境。

可悲的是这样的“不安全因素”远远不止我一个人。从古至今，在为了国家社稷长治久安的名义下，因神经过敏，神经衰弱，疑心生暗鬼，错抓错杀，以至“有错抓的，没错放的”，不知酿成

多少冤狱。自然，在古时候还没有“不安全因素”一说；口实不同，事实一也。

附带交代一句，那个准备做厂房的小楼盖成了，工厂没有办起来，因为那条河里的水，根本不能做工业用水。

1986 年 7 月 12 日

无可羡慕

——漫谈孔子和儒学的“走运” 与古今读书人的“不走运”

不但教师要成为社会上“使人羡慕的职业”看来近于画饼，而且就一般意义来说的知识分子要摆脱不值得羡慕的处境，也不是近期能达到的目标。

羡慕，可以有多种解释。通常总是指人们乐意景从之吧？然而目前不是出现了冰心短篇近作的标题：《万般皆上品》——继教师有许多不愿做教师之后，学生也有许多不愿升学继续做学生么？

并非今不如昔。自古以来在中国，读书人这个行当就无可羡慕；一入士林，十之八九是倒霉的。

读书人的祖师爷，姑且算是孔子，后来被捧得不得了，其实捧的是他的牌位。在他生前，栖栖皇皇，倒是如同人们把他比作“丧家之犬”的时候居多。想要从政而不可得，他按自己的理想设计的社会政治模式，没一个当权者认真接受，尽管他真心诚意地宣传礼乐，劝行仁政。结果只落得一个空头的理想主义者。不得已才收门人，讲学传道。没处领薪水，靠学生缴来的干肉过日子，单从“生活待遇”看，也没什么值得羡慕的。不过当孔门的学生，似乎还有点自由：不打手心，不计分数，大白天睡过了头，老师顶多责为“朽木不可雕”；春季远足，下河洗澡，师生一道，连说带唱，很有点和谐的气氛。我小时候偶然动过近于羡慕的念头，那主要兴趣在公冶长，因为他懂禽言鸟语，并不在于他当了孔子的女婿。我那时却不羡慕孔子门下德行最高的弟子，如颜回，贫居

陋巷，箪食瓢饮，又不幸短命而死；如闵子骞，数九寒天，穿着后妈做的芦花棉袄，不能喊冷，还强做欢容，虽未早死，也是活受罪。

当时的诸子百家，七嘴八舌，尽管多数是为了博取诸侯采纳自己的政见和学说，毕竟还是热热闹闹争鸣了一阵子。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四百多位诵法孔子、习知礼义的儒生，本来在生活中只不过充当赞礼凑趣的配角，意外地在“焚坑事业”中成为主角，既是天下读书人的代表，又是杀鸡吓猴的牺牲。这一来，连孔子的八世孙孔鲋都跑到陈胜那儿去找出路了。

那一代读书人，包括孔子和其他诸子之后，莫不走了倒霉运。那末，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别家继续倒霉，或者“识时务”地改换门庭，而儒家这一支“知识分子队伍”的情况该有改善了吧？

孔子确实“走运”了，他成了“尧舜禹汤文武”之后存继“道统”的一个重要环节，许多喜欢到处视察的皇帝都少不了去他的家乡祭祀一番；他所开创的儒学成为指导封建制国家的思想理论基础，甚至可以说它的思想体系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体系合而为一。孔子的语录，他编定的书籍以至祖述其主张的著作成为钦定的经典。孔子受到了最高权威——皇帝的保护。孔子于是成了封建统治者手里的牌位和棍子。

有人说这不怪孔子本人，而应归咎于后来的孔学或儒学附加了大量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解释。孔子并不需要这样的辩护。他明确讲过“小人学道则易使”，君子与小人之辨压根儿是他学说的核心之一；只是“儒者，柔也”，他更适于充当封建王朝的“公关”顾问，主张以妥协和折衷来钝化矛盾，调节人际关系，修饰统治形象，使被统治的“小人”们心悦诚服地各安其位。历代标榜儒家的人们为巩固封建统治所说和所为的一切，都是由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引申出来的，是从不同侧面对孔子学说的坚持和发

展；甚至有些“外儒内法”的实践，也并非不能从孔子那里找到某种思想的渊源。孔子死后有知，似乎不必有被人歪曲而自呼倒霉的慨叹。

倒霉的还是一班读书人，虽然这时大家只读一家之书了。

头脑里有了离经叛道之想，或言行被视为有离经叛道之嫌的人，自然是异端。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孔子早就说过的。嵇康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等于恶毒攻击，其见杀也必。李贽的思想其实也并未越出雷池一步，但既有所怀疑，有所独到，打擦边球，判为越界，也就活该投入狱中，折磨至死。

除此以外，读书人也就只剩下一条拥挤的窄路，用最通俗的话来讲，“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者，既要尔曹“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

我是“选本文化”哺育的一代。少年时读一些古文和诗词的选本，由衷地赞叹民族历史长空中文化群星的灿烂，待到后来读一些别集，懂了知人论世的要紧，这才惊异于历代文化精英竟多难逃悲惨的劫运。

拿“光焰万丈长”的李杜两位敞同行来说。杜甫虽死因不明，但不死于刑戮；李白非正常死亡，但与政治无关。这该说运气不算最坏的了。然而杜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太平时献赋朝廷，乱世里奔赴行在，一辈子“每饭不忘君”，晚年还“每依北斗望京华”，可归根结蒂是在“致君尧舜上”，“自比稷与契”的空想中度过颠簸的一生，难道还不可怜吗？

比起杜甫在儒家教条的桎梏下规行矩步，无妄念亦无恶声，李白没这般正统，多少超脱一些。但他的写《嘲鲁儒》，是强调经国济世，而啸傲“我辈岂是蓬蒿人”，对用世也还抱着孔子式的天真。谁知供奉翰林，止于帮闲，还难免要去写《清平调》，伺候皇帝、贵妃宴饮，这样做人也实在可怜；又只因不甘于肉麻地阿谀，据说就招致了疑忌和嫌弃，单从做官说，也够倒霉了。一代才人在

帝王心目中的身价如此，因为互为表里的儒家政治思想和封建社会秩序，只需要亦步亦趋和唯唯诺诺的奴才，或积极地起而卫道，或消极地安于现状。稍有违拗，连生存也难保。名不见经传的且不说，如作定量分析，不妨把二十四史输入电脑，计算一下有名有姓的中等以上读书人——士大夫有多少遭到贬谪、流放以至屠杀！至于未遭处分刑戮的读书人，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状态？我想也是不值得羡慕的，皓首穷经的书虫，高头讲章的俘虏，《儒林外史》等书里不无悲悯地写到过。孔孟之道不但与封建政权一起统治着庶民工商，而且作为一种精神力量首先桎梏着它的遵奉者、传播者——读圣贤书的士人。

“苟全性命于乱世”，已可悲矣。治世又怎么样？乾嘉盛世，天下太平，但文字狱接二连三；贵至近臣沈德潜，替乾隆皇帝代笔写过多少诗，死后也不得安宁。即使羡慕其官位的人，也不会羡慕他的结局吧？乾隆八次过曲阜祭孔，从一跪三叩到两跪六叩到三跪九叩，对孔子好像至矣尽矣，无比虔敬，对同样虔敬于祖师爷的孔子的徒子徒孙们，却不惜横加斧钺。暂时苟全性命的士大夫们照样对这个弘历山呼万岁。似乎不可理解，然而合乎逻辑。或者为奴，或者欲为奴而不可得：这就是儒家思想体系为读书人在封建社会中规定的位置和命运。即使高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概莫能外；更不必说那如石秀所斥的“与奴才做奴才的奴才”们了。

我们民族历史上也有抹杀不了的“中国的脊梁”，如鲁迅所说的众多埋头苦干、拚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则是一批不甘奴颜婢膝，并在这个基本点上突破了封建社会的行为规范，而闪现出人格光辉的大写的人，尽管他们都无法摆脱历史的、意识形态的某种局限，我们是不能苛责于古人的。

总之，各个朝代无不尊孔崇儒，却不知哪一个“盛世”真的实行过“仁政”。读书人比起吠亩小民来，被杀的绝对数字可能少

些，但因基数小，所占比例肯定要大得多。孔子学说发展到宋明理学，森严酷烈，以“理”杀人。但是这一套及其武装起来的国家机器，却不能阻止边疆少数民族奴隶主贵族的率部入侵，屠城血洗，以刀兵定鼎中原。先是元，后是清。然而天下一朝坐定，也就尊起孔来。元成宗铁木耳在宋封孔子“至圣文宣王”的基础上加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世祖福临（顺治）则在明封孔子“至圣先师”的基础上加号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都表示要比前朝的汉族皇帝更高地评价孔子。这就是一些史家津津乐道的华夏文化的威力——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终于被汉族以孔子为代表的文化传统所同化。

从封号看，明清小气，吝于封“王”，只肯称师。不过号称大成，集古圣贤于一身，也就把孔子捧到了九天之上。精工塑造的这尊偶像，不再是讲学杏坛或厄于陈蔡的教书先生了。我们进了大小文庙也都肃然悚然，正像陈胜当年的哥儿们和老乡，会感叹“涉之为王沈沈者”一样。

我10岁那年，接受过《四书集注》的“启蒙”。然而在几十年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孔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那样和谐的环境和心境。多少年来虽一直徘徊在孔子的门墙之外，但是苟安的、保守的、因循的，模棱两可与随遇而安、麻木自适与苦中作乐的种种文化心理，不一定非得之于书本不可，这就是文盲也可以自诩为孔子门徒的缘故，两千多年累积的儒文化已经沉淀为中原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了吧？

当然还有自觉的运用。最典型的是从“修养”到“驯服工具”的提倡。平时是沉浸于道德自我完善的虚幻追求以至掩耳盗铃的满足之中，来了政治运动，“以德报怨”和“吾日三省”的说教就直接催化了检查、认罪的“活学活用”。从封闭内省到自我做践，以奴性取代人格，这就是曾经流行于40~60年代现代中国的实用儒学的效应。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连“焚书”都不敢了，因

为那会有“销毁罪证”的嫌疑。刘少奇论“修养”，张闻天谈“恕”道，他们本人都是十分严肃的，然而他们遭到的历史的嘲弄不也是严肃而又严峻的吗？

时至今日，看了某些谈孔子、论儒家的文章，深感我还要接受第二次的儒学启蒙才能登堂入室。但我又想，如果来第二次的话，难道我不是更需要承续“五四”的科学民主的启蒙么？

我的出身，不是“世代簪缨”，也不是“书香门第”，四壁萧然，从来没有过什么传家之宝。但就是有传家宝的人家，想来也不过剩些值钱或不太值钱的古董文物，当作纪念物是可以的，送博物馆陈列或供少数专家学者研究也是一途，怕不能成为利于今天生存和发展的“护符”和“法宝”了。

儒家思想和儒家学说，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跟这种“传家宝”有甚么两样呢？中国的积弱、落后以至挨打，与长期作为统治思想代表的儒学有没有关系？是这一道统——儒家的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及其实践必然导致的结果呢，还是仅仅由于没有按孔子的真经办事？

“五四”前后，迫使为中国寻找出路的人们喊出“打倒孔家店”的那个局面，乃是作为两千多年政治实践的指导思想儒学中固有的精华和糟粕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证明，即使在本世纪最初 20 年间，它所曾有的精华也早已经无力克服它的糟粕了。

我们正在经受现代化的阵痛。回顾历史的时候，对于传统文化主体部分的儒学不能掉头不顾或视而不见；不仅应该辨别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和有利于人民的精华及与其相反的糟粕，而且应该弄清在今天的条件下哪些有利于现代化而哪些则于现代化不利。没有抽象意义上的精华；某些成分、某些材料可能只对过去或将来的某个时期产生积极价值。今天我们只能持今天的标准。

如果承认今天也还有“亡党亡国”（或如人们半玩笑式地所谓“开除球籍”）的危险，那末危险首先不在于如同上世纪中叶以后

的列强的入侵，而在于延宕、迟滞现代化的进程，错过实现现代化的最后机遇，在于受到包括儒学在内的封建主义影响下的社会政治体制和文化心理机制对现代化的排拒。

我们的民族，要跻身于富强、文明、民主的现代国家之林，如果没有群众首先是知识分子在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自觉，是不可能的，怎么能够设想背负着“精神奴役的创伤”，没能摆脱传统的依附心理，只是作为不同程度的“驯服工具”，而不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人”，能够在现代化事业中真正发挥积极主动的创造精神，并具有长期创业长期建设的坚韧意志呢？

在中国，做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首先要把儒学作为一个思想体系从整体上否定，否则根本谈不到用全部人类文化成果武装自己的头脑。因为它长期作为历史上同封建统治体系共存共荣的孪生物，连同它所造成的封闭保守僵化的文化心理，不但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抵制过科学与民主，抵制过马克思主义，至今还在抵制改革、开放和一切革命的、进步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甚至显示出意想不到的能量，彰明较著地或潜移默化地对原属于革命的、进步的力量加以征服、改造，使之向对立方面转化。这一点，鲁迅早就不止一次地揭示和警告过。这个过程，在敏感地代表一个时代文化较量的知识界，体现得最明显。这也许是知识分子最不可羡慕的命运了，除去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这个层次的问题以外。

突破儒学的束缚，从人类全部文化成果的高度，对于包括孔子在内的文化传统、文化遗产进行总结，才会使我们最终高于孔子，而不是低于孔子。

这起码要求我们要从“五四”前进，而绝不可从“五四”后退。不意识到这一点并为此而斗争，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就不配有更好的命运——也还是：无可羡慕。

此文为迎接五四运动 69 周年而作。中国有逢五逢十纪念的惯

例；但有些逢五逢十的历史事件未必值得纪念，或虽值得纪念而未必纪念，而有些历史事件，如“五四”虽不逢五逢十，也未必不可纪念吧？

1988 年 3 月 28 日

一样情思 两副笔墨

——漫谈新诗和诗词并行发展的双轨制

我是一个新诗作者。只是在某一个时期开始写些诗词体裁的东西，是一种机缘的凑合。现在也还偶有所作，多半因为某种题材自己觉得借用诗词的体裁比较合适，甚至不期然而然，也就没有必要把它翻译成新诗了。

虽然为了使古典诗歌为更多感到语言障碍的读者所了解，有人在致力于今译，并且做出成绩，如《唐诗今译集》中部分篇什仍能不失原作的韵味，但是，我认为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新诗和建立在古代汉语基础上的诗词，分属两个不同的审美体系。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在“五四”运动前后新诗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五四”后 70 年的今天诗词也还有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对于当前的读者和作者来说，则诗词不能取代新诗，新诗也不能取代诗词。

从“五四”至今已经有了 70 年历史的中国新诗，不是由两千多年的诗歌传统直接发展或派生出来的；也不是清末“诗界革命”的嫡系传人。正如词、曲在它们初创的年代都属新诗，与当时的诗（唐五代诗、宋诗、元明清诗）不是子母关系一样，现代新诗更是“新”诗，与古典诗歌不是子母关系，而别成一家。

“五四”时期第一批新诗作者，如胡适、康白情、俞平伯、刘半农、周氏兄弟和郭沫若，都于古典浸润很深，但他们在写新诗时都竭力避免诗词的腔调，在这方面鲁迅和周作人表现得最为彻

底，胡适的《尝试集》却因为没能脱尽诗词的痕迹，而被认为是未成熟的果实。他们努力建设的是以现代汉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为基础的新诗，基本上是自由体，即使创为格律也是自由地创设的新格律；为此他们力求摆脱古典诗歌体裁和格律的影响。他们的实践既是基于当时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自觉，也是基于对文学语言、文体和审美体系的自觉的。

后来有些人不无盲目地接受了“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这一命题，在其政治上的背景，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少像“五四”时期新诗先驱们那样的文化素养，因而混淆了不同的文学语言、文体和审美体系的区别。在这样的理论原则指导下的创作，难免浪费一些作者的才华和精力。例如诗联中极富形式美的对仗，在律诗中成为加强语言张力的重要艺术手段；但它在现代汉语中已经很难重复，某些新诗作者简单地套用对偶句，不可避免地犯了“合掌”之忌，不但不能加强修辞的表现力，而且造成了嗦和拖沓。

新诗的发展要走另外一条路，非格律的自由化——散文化的路，尽管不排除新诗中吸收古汉语的词汇和句法，以至创制一些新格律。这是一条广阔的道路，有广阔的天地，广阔的前途。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把一切新诗叫作自由诗。它不是从古典诗歌那里发源，也不必纳入古典诗歌以至当代诗词的语言和格律的河道。

这不是说，新诗不应该建立对有 2000 多年传统的古典诗歌的继承关系。有所继承比无所继承好；然而任何继承都贯穿着模仿和反模仿的矛盾，新诗对古典诗歌的继承，应该在比此路不通的模仿更高的水平上实现，那就是着眼于接受它的一切健康的合理的积极的精神，特别是它不断发展变化、蔚成新风和熔铸新篇的精神，同时也注意从各个局部选择那些对我们发展和提高诗的感受力和诗的表现力有益的成分，直到具体的语言材料。

因此，与其说“在古典诗歌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我以为不如说“在古典诗歌和（古代与当代）民歌基础上发展（当代）诗词”。

当代诗词的写作，远桃唐宋也罢，取法明清也罢，一空依傍、自我做古也罢，从整体来说，也是要发展的，但这种发展有它自己的轨道。它不会发展成我们所说的新诗，也不会同新诗合流，而只能是与新诗并行发展，这就是我所谓“双轨制”：“让‘五四’以来作为新文化运动一个组成部分并有了60年发展历史与经验的自由诗或称新诗……和沿袭古典诗歌的、基本上是格律化的传统、以五七言古近体及长短句为主的诗词曲等旧体，并存争荣，百花齐放。”（《〈宿莽集〉序》，1985年）

本来，古典诗歌中的歌行和杂言谣谚也可以叫作自由诗。然而歌行谣谚也是叶韵的，相对于篇无定句、句无定字且可无韵的新诗来，也还有其体裁上的限制，属于格律化的范围。诗词和新诗，在形式上区别的关键，一是语言，一是格律，格律又同语言有关。今天的诗词作者，比起新诗的作者来，显然面临着更多有形的限制。

诗词的各种体裁以及近体格律，千百年来虽有发展变化，但已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这是在古代汉语的基础上形成的。今人写诗词，要创新，要有所发展，难免要引进一些现代汉语的词汇和句法，但必须在原有格律和现代汉语之间调整适应。诗词作者对于古典诗歌遗产的继承，要能“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才能避免因功力不逮，“望之不像”，也才能避免太似古人，而缺少时代特色。

当然，当代诗词的发展，跟当代新诗的发展一样，须从创作实践着手，首先要写出大量好作品来。

继往是为了开来，不开来便谈不到继往。今人写诗词自然不完全同于古人写诗词。发展无疑是必要的。但是不可借口发展、借

口创新而对诗词的既有格律采取轻率的态度。各种诗体、各种格律，都有其形成的合理性；至若近体诗格律的完备精严，把古代汉语的潜力几乎发挥到极致，不容漠视，更不容亵渎，所以我说过近于极端的话：要写新诗就写自由体；要写格律诗就回到诗词去！

诗词的格律仍然有生命力，可以容纳当代人的艺术思维；使新鲜有生气的当代生活和当代人的思想感情，以及某种程度的当代汉语的韵味，同诗词格律谐调，又可赋予诗词形式以新的生机，这就是诗词的发展，是今天诗词作者应该意识到的历史责任。

也不妨设想有一种完全用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写作的诗词，首先是绝句和词曲，类似竹枝词、打油诗；而很难设想完全是现代汉语的歌行和五七言律诗。近体诗特别是律诗，因为在句法和章法上距离散文的表达，口语的习惯，比古体诗更远，它对现代汉语的容纳也就更难。在广义的古代诗词中，也包含历代民歌以及文人和市民的仿作，但它只是诗词的一支。今后，有人用现代汉语写诗词，可能写出很好的作品，但也不可能用这种风调去统一各体。

在今人写诗词时，特别是在使诗词普及的努力当中，无论如何不能降低诗词形式作为高层次文化结晶所固有的文化素质。要新，即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化，甚至加上一定程度上通俗的要求也无妨；但是仍要注意“俗不伤雅”，这个“雅”不是指士大夫的癖好，而是指高层次的文化素质。齐白石的诗不错，但他早年之作却曾被王绶缙讥为“薛蟠派”，从内容、形式两方面加以否定；这不该简单看作精神贵族的偏见，而是表现了对诗的鉴赏水平，也维护了诗所应有的品格。

就以新诗来说，它的出现，是适应“五四”时期思想解放、文学解放的要求，也是适应文化普及、诗歌普及的要求，然而诗——即使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明白晓畅的新诗，也总是与一定的

文化层次相对应；不能用口头的民间歌谣顶替新诗，也不能指望新诗不受限制地扩大覆盖面。我在1981年《人间要好诗》一文中说过：

说我们的读者是人民，太笼统了。

十亿人民，其中还有成亿学龄前的幼儿，即使成人也不可能人人读诗。诗主要是写给能够阅读的读者的。然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不一定人人读诗。不可能作这样不切实际的要求。

诗只能是供一部分有相当文化水平，有一定阅读能力的，有文艺爱好特别是对诗的爱好的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阅读的。

不同的题材、风格、形式又可能只拥有一部分相应的读者。读者的兴趣是不能勉强的

新诗如此，诗词更是如此，普及是有限度的，都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的普及。

一句话，加强诗词的时代色彩，但不降低对诗词的艺术要求，是我们求诗词在当代的发展和创新时所坚持的原则，这对我们今天的诗词作者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顾炎武《日知录》21条，把诗体的代变视为不得不然的“势”：

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

就一个诗人说是如此，就一代诗人说也是如此。相对于2000多年的古典诗歌，“五四”新诗宁肯被人目为“失其所以为诗”，也不“失其所以为我”，不肯蹈袭千百年的陈言旧律，自己走出一条路来，这是新诗之所以为新诗。当代诗词如果没有发展、没有创新，不能在反映当代上显示出新的风格，那又何贵乎有当代诗词之作呢？在这个意义上，当代诗词也应该是“新”诗词。

姜夔《白石诗·自叙之二》中说：

作者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求与古人异，不若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

这应该是个别作者与整个传统的继承关系的最佳状态，也是从总体说来当代诗词与 **2000** 多年诗歌传统的关系的最佳状态。

新诗作者不必都会写诗词，诗词作者不必都会写新诗，但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最好是写新诗是真正的新诗，写诗词是真正的诗词（写歌行像歌行，写律绝像律绝）：首先是诗，而又是今天的诗，今天的我之诗，有新意，有个性，那就不仅是对当前读者的贡献，也是对绵绵不断发展过来并将发展下去的民族诗歌传统的贡献。

1988 年 4 月 20 日

一个悄悄的预言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是能有清醒的自我认识：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是能客观地认识和评价自己的历史，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

从天安门广场上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的斯大林像前经过时，我禁不住这样想，并且自问：我们该怎样看待苏联历史学界和整个社会重新认识历史、重新深入评价斯大林的事件呢？

随着苏联更多历史档案的公开，若干冤假错案的平反，在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我们至少应该采取审慎的分析的态度，不能再像过去某个时期那样感情用事，不顾事实，一味地为斯大林辩护，对他的错误和罪行给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国际工人运动造成的危害也视若无睹了。

在全世界已经很少有几个国家首都的中心广场在节日推出斯大林的画像，就在斯大林执政多年的莫斯科，五一节和十月革命节的阅兵和游行中也不再高举斯大林的画像了，难道是偶然的或毫无根据的或错误的吗？

我们在外交上是独立自主的，在一切重大原则上强调独立不倚，绝不俯仰随人，这是应该坚持的。然而在树立画像这样不算大也不算小的事情上，是不是不自觉地陷入某种思维和行为定势呢？

我自己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1957年春我在红场参观过列宁陵墓，当时斯大林的遗体还没从那里迁出。对于这个当时已有争

议的历史人物，我写过一句褒扬的诗：“透过千秋功过，闪耀着一颗丹心。”我还是把他看作列宁最亲密的战友和学生的，尽管已经知道列宁遗嘱中对掌握了极大的权力的斯大林“不能肯定他能不能够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

后来了解了更多的历史真相，我断定斯大林远远不是不能十分谨慎地用权的问题，而是令人不能容忍地滥用权力了。触目惊心的是，列宁生前流亡国外时期、十月革命中和苏维埃政权初期共患难的老布尔什维克们，从杰出的领导人到普通的党员、赤卫队员，在列宁死后开始的几次大清洗中，极少幸免地遭到处决、暗杀、流放、劳改和贬谪。斯大林的手上沾满了千千万万共产党人和普通公民的鲜血，摧残了列宁开始的事业的有生力量，严重地损害了布尔什维克和社会主义的声誉，玷污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由于年代的久远和情况的复杂，也许对斯大林作出全面的结论还须有待。在这方面我们作为外国人，应该更加尊重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发言权。

不过，无可置疑的是，把斯大林这样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张挂画像，等于号召人们纪念和学习，显然是不妥的了。

我们一向看重政治影响。那末是让斯大林画像继续引起人们的狐疑和困惑好呢，还是尊重历史，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并尊重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不再让斯大林的名字和画像占据不适当的位置好呢？

我敢预言，斯大林的画像，终究会顺乎民心、顺乎舆情、顺乎历史潮流而以某种方式从节日的天安门广场撤销。预言实现之前，暂且作为一个建议；无须大事张扬，故题作《一个悄悄的预言》。

1988年5月21日

国将不国

读书无用论不好，那末读书有用论的文章，今天该怎么做？过去的世代里是做过的，只是君侯卿相大夫士农工商各有各的做法；学以致用，各有各的读书的用处。上有提倡，“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下有响应，苦读寒窗，到头来有的用在科场上，混得一官半职，这是最早的“读书做官论”；至于科场失利，就落得牛衣对应，“文章误我，我误卿卿”了，这是最早的“读书无用论”。

我们大举批判过读书做官论，其实是多此一举的。“做官不必读书”的实践本身就是最有力的批判。我们拥有中国有史以来绝对数字最大的“公务人员”队伍，就以其中县级以上主要行政长官的知识构成为例，假如跟辛亥革命前相比，就显出“马上得天下”的本色。而从1957年起我们又取消了保送工农出身的干部到速成中学进修的做法，大概认为没有必要——或者读书无用吧，因此到了80年代，一位省委宣传部长大讲“淡黄子孙”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这样的领导人治下，读书有什么用？读书人又有什么用？

所幸我们的领导人不都是这种水平的。因此我们才有1956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才有轰动一时且影响深远的“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可以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揭橥的读书有用论，是把知识、知识分子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谈的。

不幸的是，从1957年的反右斗争到1966年的“文革”，我们一记重过一记地自己打自己的耳光。70年代初期泛滥一时的读书

无用论，乃是倡言“读书越多越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也就是“读书有害论”，并对知识界及其代表人物大肆诛杀的结果。如果在充分利用政治手段摧毁文化、打击知识分子形成“红色恐怖”之后，一般群众中竟不产生“读书无用论”一类效应，避之惟恐不及的话，那倒是孔乙己式的麻木了。

那末，80年代后期的读书无用论又是怎么泛滥起来的呢？

对比一下，50~60年代的知识——文化危机，是有意以政治手段为之：当前的知识——文化危机，似乎是经济杠杆的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然而且慢！“文化大革命”用政治手段未能完全摧残、毁灭的民族文化命脉，今天在我们前进的路上竟面临被经济力量毁于一旦的危险，能够如此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吗？

上一次读书无用论反映了人们在知识分子安全不得保障这一现实前的趋避心态；这一次读书无用论反映了人们在知识分子经济收入——物质生活质量——社会地位（包括工作条件）相对低下这一现实前的困惑。

知识分子“掉价”不自今日始。早在反右斗争告一段落之时，数10万右派分子分别降级减薪或改发个人维持生活费；而从1958年起，大学毕业从一定级就降下一级。高级知识分子中现在所称的高级工程师、编审、译审、高级编辑和记者等在长期冻结后评定职称，联系工资，月收勉强可“靠”到160至170元，相当于行政职级的正处长，或副司局级最低一档。但一般说来，业务职称与行政职级的“含金量”颇有不同；这不全是题外的话，虽不必多说，但不可不说。

还有既不创造价值，又无益于商品流通，“卖批条”、“倒指标”，买空卖空，以权营私的“活钱”与“外快”，就更不是区区读书人所能望其项背的了。

于是读书无用论风行矣。自然也有用功读书的，那是来自乡

村的想转城市户口，家住城市的想到国外留学，读书似多少还有点用处。再放眼望去，学龄儿童做童工，研究生报考的不如招生名额多，师范学校招不满，中小学老师步废学孩子之后尘在校园内外做生意，原来读过一点书的也不能安心教学与研究，有的大学教师实行两部制，有“能耐”的去经商，没“能耐”的顶班上课……我不是耻于言利的轻商主义者，也不是反对“勤工俭学”、“第二职业”的“斯文扫地”论者，但我认为：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社会中所未曾见的“全民从商”见之于中国，使知识、文化、科学、教育甩到千百万人所不屑为的地位，说穿了，乃是从上到下把权宜之计误认为改革措施，竭泽而渔、杀鸡取卵一类的短期行为，取代了对于百年树人的根本大计的高瞻远瞩！

长此以往，国将不国！文化教育危机将导致民族生存危机。套一句林则徐的话，那就是，大错一旦铸成，我们不但将没有人在文化高层次上做学问的人，而且将没有能在现代化设备前称职的值班操作工了。一个文盲众多的国家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吗？何况报应不在数十年后，即在目前；“文革”造成的文化教育断层，已经横在脚下了！难道我们这一代人非但不能提高我国的民族文化素质，还要亲手扼断民族文化的命脉吗？

1988年6月21日

有感于胡风案件的平反

一

继 1980 年、1985 年从政治、历史方面为胡风平反之后，1988 年 6 月，有关部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几个问题进行复查后，又进一步予以平反。至此，如报纸标题所说，33 年前的一大错案得到彻底纠正。

旧的冤假错案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冤假错案呢？

我以为现在会有，将来还会有。

这样说，是否意味着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投不信任票呢？

不。这样的认识恰恰符合三中全会以来恢复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这样认识，才能使我们自觉地实事求是地去纠正晚近发生的错误，并且尽量避免犯更多的新错误。

毛泽东在 1962 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就说过不但在错误的路线下，而且在正确的路线下也会发生对人的错误处理这种情况。他着重指出其认识论上的根源。

此外还有实践上的根源：法制还不健全；法律以外的权威有可能干预法律的执行，乃至取代法律；以及旧的意识形态工作领导体制没有经过根本改革；等等。

关于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胡风曾经说某些文艺工作干部的

领导权只是建立在“内部文件”的基础上，实际是批评从决策到执行过程中不必要地造成的某种神秘性；正如不久前一位政治学家指出的目前依然严重存在的“简报政治”现象一样，这都使领导部门不能全面地客观地了解实际，也不能全面地客观地体察群众的意愿和情绪，不但来自基层群众的呼声和不同意见无由上达，而且即使领导层内有对错误决策的不同意见也不起作用。这就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循环受到破坏。

这就是错误决策和对错误决策的执行的由来，也是相当一部分冤假错案的由来。

自然，一切历史遗留的错案终归都要平反的；但是动辄三五十年，损失实在太太。

二

我认为，胡风是一位长期不被承认为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被诬指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党外马克思主义者；胡风早在 30 年代提出的若干文艺观点属于左翼文艺活动内部的不同意见；后来，他的文艺思想进一步形成自己的体系。

胡风案件的彻底平反是向科学和民主的回归；我们可以依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并且承认认识伴随着一个实践过程了。

这个历史事件启示我们：马克思主义内部可以有不同的学派，而且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学派。

只有积极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克服外部大量存在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包括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也才能克服内部的教条主义表现以及其他形形色色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恩格斯 1891 年 5 月一二日致倍倍尔的信中说：“（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在

德国党和德国社会主义科学之间哪怕是有一点不协调，都是莫大的不幸和耻辱”。

一旦马克思主义者得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自由，那是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莫大的不幸和耻辱”啊！

而如果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要的学术自由和批评自由，不能形成鼓励而不是压制一切科学探索的气氛和环境，则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值得怀疑的——借助于恩格斯所批评的“普鲁士作风”和强制手段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是虚假的权威。

没有良好的文化气氛和民主的舆论环境，也就没有我们日夜期望的真正的团结——党与学术界、思想文化界的团结，学术界、思想文化界人们之间的团结。

这不是已被历史多次证明了的吗？！

三

我们要重新认识、提倡并且认真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批评和自我批评，作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所以长期不振，是因为我们自50年代中后期起从整体上败坏了它的名声：我们声言批评和自我批评，但在许多情况下，却是只许我批评你，不许你批评我；只要别人作自我批评，自己从来不作自我批评；少数人是专事批评——批判以至整人的，多数人是专事“自我批评”亦即挨整的；号召批评成为“引蛇出洞”，责令“自我批评”则是“指供”、“诱供”，凡此种种，过来人都很熟悉。胡风就是以批评建议始，以被迫“自我批评”直至受到惩罚终，大家对此也记忆犹新。

可以说，30多年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变质，就标志着党风不正的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拨乱反正中清理、反思历

史旧案，纠正错误，是自觉恢复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也是端正党风的努力。

目前党内不正之风的猖獗，一方面由于法制不健全，党组织不纯，另一方面也由于在政治上、道德上没有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原则贯彻到底，许多地方和部门整党走了过场，党员素质降低，不少党员不是在干好事而是在干坏事上起了“带头作用”。

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万灵药方，但它表示一个郑重的党的自信和有力，有助于联系人民群众，加强内外团结，改善政治形象和恢复政治信用。

四

胡风错案的彻底纠正，再一次证明党能够自己改正错误，这当然包括了能够认真听取党外的批评，也能够克服自己内部的错误意见。

但是，胡风错案经过 35 年并经过三步才得彻底平反，也证明对“党能够自己改正错误”应有必要的信心，但不应持绝对化的态度，导致狭隘的理解；如果早有更健全的社会舆论机制，法律机制，群众民主监督机制，也许能更及时地彻底改正错误，或防止错误于未然了。1957 年鸣放中不是就有从法制和民主的角度对胡风问题的不同意见吗？结果这些鸣放者通通被划为右派了。

我们为违反法制、违反民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仅经过“开庭审理”等法律程序并不意味着依法办事，正如仅仅实行划圈投票并不意味着民主一样，——即使不把从胡风到共和国主席在内的个人代价计算在内，单是迟滞了国家发展、窒息了社会生机的后果已是惨痛的了，尚堪告慰的是我们终于由此认识到历史上的错误并且加以改正。

对目前的以至将来的工作，如何吸引和依靠人民群众，建立

社会监督，随时检查、甄别，及时纠正在各项工作中已经出现的或刚刚冒头的错误，不使它扩大和恶性发展呢？

谁该享有民主，谁该受到专政；保护什么人，打击什么人；这个敌我友的界线，万万不可混淆，不可颠倒。

法制与民主，这是关系到党与人民的关系，因而是关系到人心向背的大事，是关系到人民的命运，并且也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五

从胡风案件可以接受的另一个教训，就是需要在改革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的同时，改善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干部的素质。

参与对胡风案件错误处理的干部，大概无一例外都是“知识化”、“专业化”的（“革命化”当然更无可置疑），这没能改变胡风案件反文明、反文化的性质，整个案件的过程表现了深度的野蛮和蒙昧，并示范鼓励了后来的野蛮和蒙昧。

由此可见，干部知识化、专业化，不能代替干部文化化或文明化。

我们对普通公民提出的“四有”要求之一是“有文化”，我们对干部提出“文化化”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要求市民订出公约来做“文明市民”，难道不应该首先要求市长做“文明市长”吗？

广义的文化不仅包括知识和专业，而且包括理想和道德，更重要的是包括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

因此，干部文化化必然包括：一、决策和执行的科学化——科学而不蒙昧，保持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实事求是；二、决策和执行的民主化——民主而不专制，不搞个人专断、长

官意志，集思广益，接受监督。

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支柱。没有科学和民主，越是“革命化”越有损害人民利益、损害革命事业的危险。

过去对干部的文化要求，通常是从识字到有一定学历的文凭而已，这如同谈到党风的关键是官风，从而强调“不贪污不受贿”一样，只能说是对干部的最低要求。然而，对于领导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干部，以至一切工作的干部的素质，今天是提出文化化的要求的时候了。不然，我们虽有逐步健全的法制与民主的制约，也将无法杜绝中世纪野蛮、蒙昧的悲剧的重演。

1988年7月8日

为谭嗣同一辩

谭嗣同，以 1898 年中秋前二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

我是常常从菜市口走过的。每经西鹤龄堂药铺，行人扰攘之间，总不免想到 90 年前旧刑场上喋血的一幕，想到百日维新，戊戌政变，想起 33 岁就死于非命的谭嗣同，上世纪末中国政治史、思想史的长空上一闪而过的这颗彗星。

也想起去年读后久久不能释然的一篇杂文：《倘若谭嗣同出走……》（1987 年 6 月 25 日《解放日报》）。

倘若谭嗣同出走，得以保全首领，在他的老师康有为沦入保皇立场，与革命党人为敌以后，他也许会再度表示“有不敢苟同者”；他的激进早有对法国大革命的赞扬为证。历史是不承认“倘若”的，我们只有惋惜了。

然而论者之惋惜，却在谭嗣同“有意不跑”，结果被杀。言下之意，这自然不符合“保存自己”以“消灭敌人”的原则，不足为训。

所谓“有意不跑”，所据大约就是谭嗣同对劝他出走日本的人所说那段有名的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这段话，在谭嗣同遇害当天的《国闻报》就有记载，后来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传》又郑重笔之于书，大同小异，意思不差，证诸谭嗣同一贯的性格言论，应该是出之于他口的。

然则谭嗣同就真是为流血而流血，“有意不跑”的了么？

我却以为未必。上引两处文字其实已经作了交代。他是旧历八月初十被捕的，而据说初七、八、九三天，他一直纠合“侠士”数十人，要救光绪帝出瀛台，“事未成而被逮”。

谭嗣同打发梁启超快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他知道为救皇上要冒风险，为此他必须留下来，并有赴死的决心。他的“不走”，显然是为“谋大举”，而不是坐候捕者，束手待毙。

在给谭嗣同最后的行为作鉴定时，当然可以指出他虽在《仁学》中抨击君主专制，决意“冲决网罗”，但陷于对光绪帝的幻想不能自拔；他对“圣主”的孤忠，也许该同他轻信袁世凯而终被出卖一样看，都是这一代人杰身上的可以原谅的弱点。但先是说谭嗣同“有意不跑”，再以轻薄的口吻说“这样的不凡，才够了革命党的尺寸”，却使我这个读者，在谭嗣同死后 90 年，仍然感到寒心，寒透脊背。

论者也许有借题发挥的弦外之音，是我们局外人揣摩不透的；但若为了宣传“已为实践所反复证实”的“强者易折”的真理，为了“特破”“各种各样的虚荣心”，以“对中国人的革命观”“作点修改”，何苦借谭嗣同身首异处的尸体充当这个题目呢？

说什么“一部近现代史，又岂止写着‘我自横刀’四字？”哪一部近现代史只写着传为谭嗣同绝命诗中的“我自横刀”四个字了呢？然而谭嗣同为什么不能写入近现代史的一页呢？假如谭嗣同的事迹使后人“竟以为‘革命党’只是‘不跑’”，那真使“大凡中国真正的革命党”和“大凡中国有眼光的哲学家”都齿冷而爱莫能助了，只是请问，百年来牺牲的数以百万计的民族英烈，有几个是“有意不跑”，以血肉去膏敌人锋刃的？

引起论者如此讥汕的“我自横刀”云云（“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据台湾学者黄彰健考证，并非出自谭嗣同手笔，而是梁启超作了重大篡改的。谭嗣同《狱中题壁》原诗则是：

“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毆刀仰天笑，留将功罪后人论。”毆刀也是刑刀，这一句不甚了了，但反正不是“我自横刀”了，后一句意思却清楚得很。人说谭嗣同一生“不避艰险，不畏谤议”，他自谓“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他如听到对他“有意不跑”的指责和奚落——似乎是自己等死以至找死的“傻瓜”，也许会连眼珠都不转过去。但我却没有这样的豁达，忍不住为已经不能自辩者一辩。读者会认为我多事么？

1988年7月12日

关于错译

我不是翻译工作者，忽然发生了关于翻译的一点感想，是缘于《蛇口通讯报》记者章文的一则报道：题为《“公有制”是一错译，社会所有制才是应有之义》。正在我们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的今天，所有制问题是个热门话题。为免摘引错漏，照录全文如下：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资本主义有两个发展，一个是从自由资本向垄断资本的发展，一个是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发展。前一个大家都熟悉，后一个好像没有什么人注意。《资本论》第三卷第 27 章写的清清楚楚，恩格斯的文章登在马克思全集第 22 卷。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资本的提法，值得我们重视。”这是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前不久出席本报座谈会时提出的一个问题。

于光远说，我看这种提法是对的，今天应予发挥和发展。他指出，恩格斯讲资本主义是个发展阶段，而私人资本是一种形式。股份公司就是对私人资本的一个扬弃。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提法，于光远认为，应当是社会所有制，叫公有制是翻译错了，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译，原始社会才是公有制嘛。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点也不含糊的。由于我们对“社会”缺乏研究，因而对于资本主义从私有资本到社会资本的这一进步没有注意。于光远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国家的进步，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进步，而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的进步，是整个社会化的发展，包括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社会分配方式的进步，马克思叫它社会资本主义。我们的共产主义应当是社会共产主义。

于光远强调指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的再认

识，涉及到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所以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一批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对当代中国之命运关系极大。

于光远同志在这里提出的问题，应该由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家们探讨和论证；关于“公有制”的“一名之立”，或许翻译界也会有不同意见。但作为读者，我却因于光远的提醒，联想到我们的社会科学的翻译。

我们的政治生活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外来的，接受它要通过翻译。马恩所说的分配原则“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先前曾长期译作“各取所需”和“各得所值”等等，列宁名篇长期传诵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近年发现原是《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之误：这些出入，不仅影响到理论认识，而且影响到方针、政策的制定，关系不可谓不大。

造成这种出入的原因很多，总不出对原文的理解和译文的选词造句。譬如原文词语有多义，译时采取了与作者不同的一义，或是原文词语只有确定的一义，译时却采取了容易产生歧义的某个多义词。于光远所说的“社会所有制”之译为“公有制”，是不是就属于后一情况；按我们对仗称引的习惯，以个人为私，便以社会为公；而描述原始社会所有制的“公有制”与所谓“社会所有制”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况且，在汉语传统用法里，“公”既有公共的、公众的、群体的一种涵义，还有政府的、官方的一层意思，这就难免引出种种误解了。

现代的事物和现代的观念，许多是我们原有词汇所未包容的；别国的名物，更有许多是我国所没有的。形诸我们的语言文字，就要不惮创造新词，包括引进外来语。在千年前佛经翻译中就已经不失明智地这样做了。

让国外的东西勉强就中国语词之范，也许翻译家们并不是为了省力，而是煞费苦心，以适应我国读者的习惯。译外国女士名，必挖空心思找“女”旁、“草”头的字，就属于这一类，“恰帕耶

夫”也因而成了“夏伯阳”，好像是夏仲阳、夏叔阳昆仲的令兄似的了。常见译文中的洋人说中国的成语——有些成语是同中国古代特有的故实相联系的，就更可怪，然而译者其实是很费了一番心思，但我以为不如把洋人口中的成语或洋典故直接展示出来，哪怕加个注，倒能拓宽我们读者的眼界。

不过这些还无关宏旨。而在重要的社会科学著作的翻译中，我以为应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翻译一样，宁取鲁迅所倡导的“硬译”。少一些“变通”，少一些牵洋就中、牵今就古。这里恐怕还要打破一个潜意识，即以为天下万国万事万物，没有不能用我国现成的词汇语法来表达的，就如同以为当代世界上所有的，从科学技术到文学艺术，都能在我们千百年前历史上找到渊源一样。

1988年7月31日

《河殤》现象断想

——从思想参与说到文化启蒙

一

政治民主化需要公民的参与。政治参与总是伴随着思想参与或以思想参与为先导。

电视片编导跟观众一起，或者说观众跟编导一起，思考着历史也思考着现实，思考文化的遗留也思考社会的走向，这就是“《河殤》现象”。

常说的忧国忧民，就是一种思想参与；至于那些关心爱护共产党的人，还要加上忧党。我们的国家是由共产党执政的，治国与治党不可分。今天人们作为话题的“开除球籍”，就是历史上多次用来警惕人们的所谓“亡党亡国的危险”，归根结底，是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如何使落后了数百年的华夏古国，把全面近代化和全面现代化这两重历史任务“毕其功于一役”，而不致从人口素质、综合国力到物质的、精神的、政治的生活质量都下降到“第四世界”。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呼唤着改革。不久前访华的苏联文艺报刊代表团曾介绍，目前苏联读书界除了开禁的文学作品外，最受欢迎的样式是特写和政论。这同我们的情况有类似之处。目前拥有最多读者的是介于文学和新闻之间的体裁，如报告文学、纪

实性文字以及杂文。电视片《河殤》如同其主要撰稿人苏晓康的若干全景式性报告文学一样，以它的思辨性和政论性实现着编导和观众一体的思想参与，看来这可能是所有正在改革进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共有的现象。

二

“《河殤》现象”在今日中国的出现，有它的社会历史背景；它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出现也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电视工作者长期大量的努力为此作了准备。

人们容易想起《话说长江》，以为这是《河殤》的滥觞。其实，早在几年前，电视台就开辟了试图干预生活的专栏《观察与思考》，虽然只是群众来信一样的浅层次的就事论事，但也似乎难以以为继。电视剧《秋白之死》和《严凤英》（最后部分）力求多少揭示历史的真相；《新闻启示录》和《新星》分别以关注改革者命运和谴责不正之风的切近生活而吸引观众；《历史告诉未来》则初步显示了站在历史高度所拥有的广阔视野。

电视作为传播媒介具有当代最迅速、最广泛、最富感染力的强大传播功效（它的消极影响也立即得到反馈），如何使它深入人心，是对电视工作者素质和胆识的考验。

中国当代生活中有许多一时蔚然成风的“热”。除了“经商热”、“从政热”、“出国热”之类以外，还有诸如“气功热”、“老年迪斯科热”、“台球热”等现象。而《河殤》选取了讨论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关系的“文化热”作为话题，把哲学家的思考和历史学家的讨论展示给观众，但并不是提供惟一的答案；由于切合了广大观众的自发思考而没有端绪，即“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这一个热点、敏感区，启发人们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思考，作出自己的结论；这也许在无意中符合了我们长期向往而

不易实现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

三

我们面对的文化现状，不仅是有两亿文盲和半文盲，而且有植根深厚的种种愚昧、保守、落后心理，包括我们自己，也常常陷于许多既不符合实际又不适应建立和发展新秩序需要的现成结论和思维定势。

因此，文化启蒙势在必行，并且将是长期而艰巨的。

照我的理解，文化启蒙，首先是教人思想，教人更新过时的观念，教人从旧的思维方式转移到新的思维方式的轨道上来。

我们的传播媒介，我们称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几乎全部机制，却似乎重在教人行动，教人“响应号召，行动起来”，甚至推到极端成为“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忠不忠，看行动”。因为沿袭战争时期的格局，发动群众运动式的政治参与，总是以一定的政治口号或政策，半强迫、半动员，而所谓动员工作的“思想先行”、“典型引路”，也带有强迫的色彩，是形成一种精神压力来达到统一表态、统一行动的目的。我们的报纸、刊物、广播、电视，作为党的喉舌，曾经迷恋于自己的一呼百应，如1958年到处召开的广播大会，就是“大造声势”、“先声夺人”、“以势压人”的例子。政治运动派生出宣传活动，必然造成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专制主义。

从文化专制到文化启蒙的转轨，不但首先要求主体的根本改变，而且要求完全不同的环境和气氛。如《河殤》播出的意义，就不在于仅仅灌输一些历史知识并要求观众接受其中每一个论断，而是提供必要的资料和信息，以启发观众的思想参与。对于历史文化的探讨如此，对于其他问题的探讨也莫不应该如此。思想参与以思想自由为前提，以政治民主为保障，这样才会有不同意见

的对话和争论，才会有“真理愈辩愈明”。没有群众的思想参与，就不会有群众性的政治参与。我们自然是期望着积极的政治参与，而不希望发生消极的政治参与。但如果因噎废食，取消或限制正常的政治参与，那末积极的健康的政治参与——广大群众的同心同德，共度难关——也就无由实现了。

我们的民族在改朝换代、循环不已、以暴易暴、战乱频仍而社会发展长期停滞中，已经逐渐把理论思辨的能力蜕落了。共产党领导的现代革命，一方面以外来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指导，一方面，无可讳言，理论准备是不充分的。以致现在连文化启蒙的启蒙者在内，都需要重新学会思辨，学会独立思考。

饥饿的结果，可能使人饥不择食，也可能使人丧失进食的能力。文化启蒙的作用之一，就是唤起人们思想的饥渴，然后帮助人们恢复和增长思考的愿望、思辨的机能——从知识者到一般民众。《河殇》在这方面作了一次小小的成功的尝试。

在文盲众多的国度里显然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不能建成现代化，在充斥着“民可使由之”的被动之民，拥有太多缺少思维能力因而缺少主动性、创造性的人口的国度里，也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无法建成现代化的。

四

我注意到来自台湾的学者陈鼓应先生谈论《河殇》时的几句话：“由于它（《河殇》）有自我批评精神，对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影视界以及中共的形象都会是很好的。”话说得很中肯。尽管不仅仅是形象问题，而是实质问题，形象归根到底也离不开实质问题。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盛衰是一个党风问题。可以说，党风的败坏，追本溯源是从 50 年

代中后期开始的——“让人批评”堕落为引蛇出洞的对敌斗争策略，然后迫使敢于批评的人在“自我批评”的名义下做“检讨”和“认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名声于是一落千丈。近 10 年来，处理若干历史遗留问题时有了实事求是或比较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这是力求端正思想路线的标志，也是力求端正党风的标志。

从更广阔的视角着眼，真正郑重的自我批评也就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识，它不仅为少数执政者所必需，也是全社会的需要。前几年有人提出“全民族的忏悔”，就有人说“我有什么可忏悔的！”那末不说忏悔，叫做全民族的反省，应该无违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原则的，这实际上是文化启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深刻的反思，就没有坚实的起步和进发。针对昨天的文化批判，正是为了今天和明天的文化建设。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有社会政治层面上的舆论监督、群众监督，党内外各种渠道的民意反馈，而且有历史文化层面的反省、探讨和批判。在这里，《河殇》找到了它自己的位置，它的用武之地，它同人民群众和改革开放大局的联结点。

“《河殇》现象”对整个电视文化的启发，不仅在于可以通过电视的媒体，把最新的科学文化研究成果，通告给尽可能广大的各文化层次的观众，把理论思维的兴趣和权利还给普通人，而且，从精神实质上说，电视文化应该是一种启蒙文化，承担起文化启蒙的作用。

五

电视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论是从电视应该办得更“有文化”，因而要求不断提高电视工作者的文化素质来说，从电视节目要在不断调整提高与普及的关系中改善自己的质量来说，或是从

电视几乎要同时面向不同档次的观众来说，都不容把电视文化简单地定义为“通俗文化”或“俗文化”，尤其因为对“通俗文化”或“俗文化”也还没有公认的界说。

然而，如果承认电视文化是一种启蒙文化，那末在指导思想上，我以为应该把科学和民主作为建设电视文化的出发点和归宿。

仍然以《河殤》为例。

《河殤》无疑是通过人文科学成果的展示，提供一种包括从怀疑、探索到依照本来面目认识世界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这当然属于高层次。然而即使最初级的破除迷信的宣传，也是通过普及科学常识来发扬科学精神，这方面同样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像围绕着龙年宣传龙文化崇拜诱发出长春、太原等地所谓过第二次年可以消弭灾祸、“平安逃离”（以苹果、鹌鹑蛋、桃、梨抢购一空）种种迷信性谣言，电视工作者本来可以不必熟视无睹，而作出收效良好的反应的。

《河殤》在广大观众中引起的思想参与，如同过去某些电视节目发生过的正面效应一样，使我们联想并认识到电视绝不仅仅是一个单向的传播渠道。

目前，电视同报纸、刊物、广播一起纳入新闻工作序列的。我相信，随着不可避免的新闻改革的开始和深入，中国的电视文化将开始逐步走上自觉的健康发展的道路，为促进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更为重建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发挥应有的效用。

1988 年夏

避席畏闻篇

——读书札记：关于文字狱的传统

一

17 世纪法国大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只是一根芦苇，是所有生物中最脆弱的生物，但这是会思想的芦苇。”虽然思想可以长存，芦苇却随时会遭折断。这样的人手里用来书写思想的笔，不论是苇秆还是竹管，如果不是更加脆弱，也是同样脆弱；笔杆子撞在刀口上，殆矣。有因人及笔的，有因笔及人的，“一滴水可致他死命”则一，这就是文字狱。

上海书店重印了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于 1931 至 1934 年编的《清代文字狱档》九辑。翻翻看，触目惊心。然而“避席畏闻”并不自清代始。康熙、雍正、乾隆不免抄袭旧制，于文字狱的传统发扬而光大之。“文革”结束至今的 12 年间，先后有张友鸾、刘夜烽的长文和黄裳的专书《笔祸史谈丛》多所论列。可惜只谈古不说今，对“文革”或不置一词，或轻轻带过。自然不怪这些作者：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为什么不“能”？为什么对“文革”中的文字狱讳莫如深？也许是怕涉及 1949 至 1966 这 17 年中的文祸、诗祸。17 年中错误的大批判和各种批判包括在国际上批判所谓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辩论”中的错误观点和方法，在“文革”中有了恶性发展和集中展

示。我以为如修《文革史》，绝不能回避大兴文字狱的史实和渊源。这个渊源远在千年以上了，那是中国传统政治、传统文化或传统政治文化的血腥遗产。

有人把“文革”中的“破四旧”同“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相提并论，那是轻信了林彪之类的鬼话。林彪在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大会上说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是深化并强化宗法血统、人身依附、权力崇拜、领袖迷信等封建文化观念，并且在“全国山河一片红”和“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的口号下复辟了封建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统治。哪里是“与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恰恰使封建幽灵在新的形式下甚至原封不动地借尸还魂，文字狱就是其中之一。

十年“文革”，实际上是以文字狱始（1965年批判《海瑞罢官》和1966年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以文字狱终（追查天安门诗词，逮捕作者和传抄者），中间还穿插若干大小文字狱案件。历代文字狱无非禁书与刑人，略读过一些稗史的在“文革”中都有似曾相识之感；即使加上新时代特有的群众运动式的口诛笔伐，也并不陌生，不但因为这在“文革”后已司空见惯，而且，从“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纷纷表态，到认罪示众、一体周知的人格侮辱和杀鸡吓猴，不正是雍正朝针对曾静颁行《大义觉迷录》，针对钱名世颁行《名教罪人》的旧事重演么？

“文革”中的文字狱，有殃及“集团”的，如一开始就声讨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姚文元的檄文中所谓不管“是三家村或四家村”，意在沛公，呼之欲出，直取“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了。也有殃及个人的，即一些高层政治家和学术名人，甚至有不知其所以然的普通人，也误罹文网。这都是古已有之的。

还有古所无之的，例如一位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从小喜欢诗词，

有一些写得不错的，被传抄出去：按照当时的通见，似乎惟江青一人懂得戏剧，而诗词也只有毛泽东独家擅长，于是在迷狂的群众中把陈明远的作品当作“毛主席诗词”传诵和引用，终于使陈明远不能逃脱“伪造毛主席诗词”的罪名。这样的案例中国过去没有，不知道外国可曾有过。

更离谱的，是把文网张到古人身上。批《水浒》，骂宋江。不过金圣叹早已被杀，施耐庵版权未定，大概矛头也并不是指向他们。“文革”中受过训练的读者倒也不大惊小怪，因为饱读大批判文章的早已知道，1967年初即周扬被关押半年之后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同年8月即陶铸被关押半年之后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更有“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意思了。这种指桑骂槐的手法，古代的皇帝或老吏在制造文字狱的时候好像都还没有用过，是古人干坏事更加理直气壮，无所避忌呢，还是当代政治情况更加复杂，各派力量互相牵掣，致使多用曲笔，闪烁其词呢？

总之，这已经是政治斗争通过文字的表现，远不是“文字狱”所能范围的了。

二

在泛政治的倾向下，政治生活以外，经济、文化以至日常生活中，一事一物，一言一行，也莫不带上或深或浅的政治色彩，可以纳入一定的尺度加以衡量，这种尺度又是可以伸缩的，因时而异，有宽有严，以严为主，在据说时起时伏、高一阵低一阵的阶级斗争的高峰时期，就达到酷烈的“无限上纲”的程度。何况“文化大革命”已被申明即是“政治大革命”。作为它的序幕，对《海瑞罢官》之“评”，显然不是“评”一个新编历史剧，“评”一个文人吴晗，甚至“评”的也不是作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选

中吴晗作“突破口”，毋宁说是看准他和某些人的关系。

在这个战役发动之前的1965年9月，毛泽东就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诘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在姚文元的批判文章发表之后的1966年2月8日，毛泽东听取彭真等的汇报时，又两次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里就有大文章。针对彭真，从近处看，是因为要砸烂作为“独立王国”的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打倒“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往远里看，则是顺藤摸瓜，根据30年来的老关系，由彭真而直指刘少奇。

在“文革”中得与毛泽东会晤并获准在中国出版他访问毛泽东的记录，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可说是惟一的一人。据他披露，早在1965年1月25日，即主持拟订关于“四清”运动的“二十三条”时，毛泽东已决定：刘少奇必须下台。

费那么多手脚，兜那么大圈子，目标原来在此。指责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配合“单干风”、“平反风”，为彭德怀翻案；其实吴晗与彭德怀并无任何政治上的关系，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所以这样做，恰恰是要翻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的案，翻那次会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案。印证以后来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来龙去脉就很清楚了。

先要打倒什么人，为此去找他的或与他有关的人的文字材料。吴晗不幸成为这样的由头，邓拓也是如此。如果邓拓不是先后于晋察冀边区和北京市在彭真领导下工作，主持北京市委的宣传工作并在北京市委的报刊上发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等，那末他的这些文字虽然也会遭到横扫，但是未必会“首当其冲”的。

这是文字狱中因人而及文的一种。从历史上看，直接由最高权力者发动的多属之；为的是对付政敌，翦其党羽，当然也用来儆示士人，并藉以树立凛不可犯的权威。如乾隆发起的《坚磨生诗钞》一案，作者胡中藻只是个翰林学士，诗不好甚至不通，但

看不出什么悖逆来，只因为他是已死的满族权臣、乾隆所深恶的鄂尔泰的门生，这就犯了“可恶”罪，他的吟风弄月以至歌功颂德之词，在并非不通文墨的乾隆的判断下，竟成为“狺狺犬吠”了。胡中藻诗狱之后，乾隆还不放心，下谕严密访拿。访到退休在家的大学士梁诗正，据打小报告的说，几次“面试其心”，都一无所获。原来这个做过兵部尚书（也就是国防部长）的老文官极其世故，“从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正是“岂有言谈惊四座，不留文字在人间”。十几年前“反黑线回潮”中的上海报纸曾批判杯弓蛇影的老知识分子取这种态度，可见整人者是多么情急地汇集各种文字、言论材料，好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上报。邓拓也罢，吴晗也罢，明于知古，昧于知今；虽然在党和政府内任高级官员，毕竟还是如美国学者齐慕实所封的“高干知识分子”，白纸黑字，授人以柄，一言以蔽之，书生气而已矣。与官僚比较，书生既失于轻信，又失于执著，常常得一迂字，置身政治的漩涡或派系的夹缝，每不免于做牺牲的。

这就说到一个“冤”字，吴晗写《论海瑞》、《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最初动机，原是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因为毛泽东曾经提倡共产党员要有海瑞那样抬着棺材进谏的精神。吴晗一片天真的热情使他忘记了历史教训的冷峻：有哪个认真进谏的官僚有好下场的！又有哪个皇帝的诏书上不堂皇地表示纳谏的！“文死谏”，其死必矣。

自然，邓拓以及吴晗、廖沫沙的杂文，都包含某些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其他在“文革”期间受到批判的知识分子，他们的著作中也有一些独到之见，然而，可以说他们全部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维护共产党的领导，维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的。受迫害的知名人士中没有一个人像张志新那样触及个人崇拜问题，形成对毛泽东的权威的挑战。他们遭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谴责，其实是“忠而见疑”。

这跟有清一代的文字狱还不大一样。雍正时候，已故的明遗民吕留良和他活着的学生们，的确有过对清统治者说来是对抗性的言论，他的崇拜者曾静又有策反陕西总督的实际行动，自然会被认定是对政权的威胁。

这样的事情，即以推翻政权为目的，从“文革”前宣判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和“利用小说反党”、为“推翻一个政权”“造成舆论”的《刘志丹》作者及有关人员，到“文革”中一系列文字狱的当事者，事实证明一个也没有。张志新也只是从目击的现实出发，提出了某些质疑，属于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包括共产党员应有的权利。

因鲁迅所说的“隔膜”而产生误会的，固然是百分之百的无辜；不满于某些极左的政策及其后果，有所表示，也只是从极左的角度看来才是“有罪”的，因为它不利于继续大规模推行极左路线。这在“文革”前已肇其端，在“文革”中愈演愈烈。

邓拓的某些杂文，赵树理的从1964年批判“中间人物论”时就开始被批判的写于“大跃进”至60年代初期的小说，还有黄秋耘写于困难时期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等，都寄托着作者对人民疾苦的同情和关注，一概被指为攻击“三面红旗”。这不仅是对理性和良知的打击与摧残，而且是以新的错误去掩盖旧的错误。

苏东坡《寄刘孝叔》诗，有“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裙踏筵舞”之句，反映的是新法靠腐朽的官僚制度去推行而生的流弊，也成了“乌台诗案”中的罪状；如果说这还“事出有因”，则王曾的“庭草无人随意绿”，薛道衡的“空梁落燕泥”都被指控为讽刺朝政就荒，简直是神经衰弱，疑神疑鬼，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荒凉既不许写，荒淫更不许说了。这已是一千多年前的故事。

三

在“文革”前的17年间，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不断，总是伴随着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或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准备——如电影《武训传》批判之于抗美援朝中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爱国主义宣传运动，而对胡风的批判则直接引发了内部肃反运动。因此，这些批判尽管开始时一般以处理文艺、学术问题的形式出现，却总是很快转为政治问题来作结论。因为发动和领导这些批判的人们，是出于政治需要、当做政治问题来抓的。不是利用文艺、学术问题发动一场政治运动，就是用搞政治运动的方式处理文艺、学术问题。有些文艺、学术领域的中层和基层干部领悟不到这一点，自然会显得工作不力，火力不足，或在事后表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而被认为书生气或右倾是当然的。

曾有人在谈到1949年建国后执政者以政治的和行政的手段处理文艺、学术问题时，指为斯大林—日丹诺夫模式。以为全属外来，未免看得简单。如1948年以东北局名义就萧军作出决定一案，分明是直接从联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决议翻版，但那语言和具体的罗织构陷术还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土产。早在延安40年代整风运动中由对王实味的杂文《野百合花》的批判开始的一场文字狱，不排除从20年代苏联清除反对派的斗争有所借鉴（那时候只有斯大林，还没有日丹诺夫），但也更具中国传统的特色：在封建统治者的传统和革命运动之间，以文字狱为契机，起了承前启后的恶劣作用。

直到1958年，又把延安时期批判过的丁玲、萧军、罗烽、艾青的一些作品，作为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同样性质的“毒草”，重新发表，进行再批判时，据说出自毛泽东手笔的按语，指出“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这些作者是“以革命的姿态写反

革命的文章”。

这样一句话，后来成为口诛笔伐中无坚不摧、弹无虚发、杀伤力极大的武器；只要想打倒你，尽管你的文章俱在，无懈可击，也只须说你是“以革命的姿态”就够了，正像说“打着红旗反红旗”一样。

建国以后声势最大、株连最广的文艺批判、学术批判，几乎都是最高权力者发动或过问的，其中有的演为残酷的文字狱。开始时，除了像对《清宫秘史》是点到为止、引而不发，要等到十几年后才见其针对政治对手的端倪以外，首先多是针对党外，即解决一般所谓阶级斗争问题而主要不是用于党内路线斗争的。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适、胡风、梁漱溟的批判都是如此。

在刘少奇的“修养”体系中，是把“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作为应予克服的个人主义思想意识的。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体系中，据说就是要打击别人例如资产阶级，以抬高无产阶级自己。从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来考察，这一类声讨式、宣判式、打扫战场式的批判和斗争，是为了树立和加强“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进行领导的权威，树立和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本人在包括思想学术文化领域在内的全面的权威。

纪晓岚在乾隆一朝，可以说是个宠幸备至的文臣了，但有一次不识相，遭到皇帝的痛斥：“汝何敢妄谈国事！”胡风上三十万言书，倒了楣；杨献珍、孙冶方和秦兆阳因立论贾祸；全都带有“妄谈国事”的性质。“合二而一”云云算不上国事，但在“一分为二”的“圣断”之外妄生邪说，其罪便不可免了。胡风是党外人士，杨献珍等是党内老干部，但他们都是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认为知识分子是异己力量的成见，很深也很广，形成一种政治气氛和无形压力。“文革”前夕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得再明确不过了，他说，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知识分子掌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们的反党反社

会主义面目。吴晗和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云云。干脆利落，一锤定音。

这个思想自然不是一朝一夕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多年来特别是建国以后在知识界不断开展政治运动的实践中逐渐成熟的。如对胡风的定性从文艺思想问题而小宗派而反革命集团的升级，也可以说是自己“树立对立面”的工作方法的典型吧。

在对文艺界、学术界以至教育界等知识分子状况的估价严重倾斜的情况下，对于某些多少反对官僚主义或触及困难时期世情心态的文艺作品，突破公式主义而略显创作个性或流露某些人情味的作品，通通指控为不满现实或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毒草，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50年代后期、60年代中期的文艺批判多是这样“上纲”的，反右派斗争初期的围剿《草木篇》便已作了一次示范。1958年对巴金等的批判以至重写《中国文学史》，则是“文革”所谓打倒“封资修、名洋古”的滥觞。

六十年代初期，当文艺界一些老将和小卒还在惶惑不解，何以一首小诗、几篇短文，甚至是响应号召之作，竟罹文网，万劫不复的时候，在文艺、学术的战场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部署早已越过牺牲的虫沙，向纵深进展，并且显示了更鲜明的政治指向。

1962年9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开始的把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一案，不是文艺现象，而有深刻的政治背景，也不限于“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而发展成株连成万人的案件；至于毛泽东就此所说的那一段名言，其影响更远在一书一案之上了。据批示：“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这一案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将来的当代政治史也不能缺少相应的章节。小说《刘志丹》歌颂了革命先烈刘志丹，也

描写了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生活。“按照康生等个人崇拜的逻辑，对十年内战的历史，只能歌颂江西革命根据地，不能歌颂陕北革命根据地，只能写瑞金，不能写照金，只能写井冈山，不能写永宁山，否则，就是与毛主席创建的井冈山分庭抗礼，就是宣扬‘陕北救中央’。甚至，说刘志丹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也被指责为抬高刘志丹，剽窃毛泽东思想。”（《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朱寨主编，本章范际燕执笔）这是当代无信史的注脚，也是李建彤获罪的根由。

清雍正时广西举人陆生楠著《通鉴论》17篇，其中有一篇《论封建》，大讲“封建”的利益，雍正认为是有意为诸王夺权制造舆论。“陆以论史获罪，自此以后，一般文人不但不敢论时事，‘即陈古经世之书，亦不敢谈矣。此真历代文字狱所未尝有也’（《清鉴》）。”（岳成：《皇权的斗争和文人的悲剧》，《书林》1988年第五期）以前没有以后有，不但吴晗的海瑞诸篇，连田汉的剧本《谢瑶环》，孟超的剧本《李慧娘》，邓拓等人的某些杂文，也都涉嫌借古讽今而遭挞伐。历史成为禁区，因为借古讽今正是习用之术，评李秀成的自述正所以影射瞿秋白，可收一箭双雕或一石三鸟之效。历史是旧时的时事，时事是将来的历史，以妄谈历史为忌与不许妄谈时事是一致的，何况历史与现实之间，不仅可能有虚的讽喻关系，而且实际存在着实的传承关系。古今文字狱都着眼于此。所不同者，清初的“庄氏史案”是为了刻印明史，眼前的“《刘志丹》案”，是因为写了中央苏区以外的一个根据地及其领导人而已。

当然，田汉、孟超的剧本和阳翰笙、夏衍等编剧或插手的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作为典型集中批判，也已夹杂着打击“30年代文艺黑线”和所谓“四条汉子”的因素，因文废人与因人废文密不可分地结合起来了。据黄秋耘《风雨年华》透露，1964年对邵荃麟“中间人物论”的批判，不也跟邵荃麟反对柯庆施、张

春桥“大写 17 年”的主张有关吗？对于某些政治上的掌权者的任何冒犯，即或只是稍拂其意，都会招致杀身之祸的。

自然，也有因“颂圣”而获罪的。周立波的散文《欢乐的节日》如实地记录了毛泽东返故乡韶山给他的父母亲扫墓的情景。这怎么会成为“诽谤伟大领袖”的“特大毒草”呢？全是因为如鲁迅所说的“隔膜”。类似的例子，《清代文字狱档》中也有，又是古已有之的。

四

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乃至上溯到根据地时期，以文艺形式出现的、公开发表的抗议性文字，是一直到 1976 年“天安门事件”才有的。在这以前的所有文字狱中，不说完全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冤假错案；即使“事出有因”的，也顶多有点“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式的情绪罢了。“诗可以怨”，孔夫子在理论上还是这样主张的，后来的皇帝们却不许“怨”，不许腹诽；否则是大不敬，大逆不道。司马迁的外孙杨惲，在私人书信中发点被贬的牢骚，说“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其实也就是后来苏东坡所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做岭南人”之类；但语涉“圣人”，使皇上多心以至不快，就是非圣无法，而犯上者必作乱，该死。

皇帝虽是天纵之圣，毕竟也不是千手千眼，能够一一查阅人们的书信或手稿吗？乾隆时御史曹一士曾上疏指出，在文字狱的风气中，“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转引自牧惠杂文集《湖滨拾翠》）。任你凌云健笔，遇到刀笔的诛求，断章取义，索隐发微，移花接木，也会锻炼成罪，就是撞在刀口上，笔折人亡。

当代的文字狱以自上而下的权威动员自下而上的群众参与，更使得文网森严，无孔不入。造成只许歌颂的政治气氛，一片怀疑猜忌的心理，调动人性中最阴暗的感情，推广深文比附、栽赃诬陷以至逼供信的手法，把文字狱扩大到文字之外。“文革”前说有一期《中国青年》封面画的笔触中隐着反动标语，“文革”中说黄永玉画的猫头鹰眼开眼闭是发泄对社会主义的仇恨，捕风捉影，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然而这种神经过敏的表现，成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标志，它一开始就受到鼓励，从对思想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的错误估计出发，又制造敌情来充实和加深这种错误估计。至“文革”而达到极端。

宋舒 攻击苏东坡的札子，就是抓所谓“有诋毁本朝之语”。清康熙每以汉人为难统治，处处留心，都是在维护“当朝”为第一要务的前提下，把“弦”绷得紧紧的，臣子要向皇帝告密举发，皇帝要“中外臣民咸知警惕”（乾隆二十年三月上谕），于是就上下呼应，到处发现讽刺、诽谤、讥汕、怨诽、怨谤、诋谤、狂妄悖谬、谤汕 张、离经叛道、大逆不道，不兴文字狱镇压他一下，不是就有亡国之虞了吗？

假如把“文革”中各种所谓定案材料（不限于文字案件）收集在一起，就会发现制造冤假错案的技法都来自古代制造冤狱的刀笔吏的伎俩，偶或翻新；而古代文字狱的以莫须有置人于死地，或寻章摘句，穿凿周纳，实在是一切冤狱手段的集萃。当代文字狱的案例，比起《清代文字狱档》来是绝不逊色的。

从“文革”前到“文革”中，在文艺、学术领域的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文字狱，必然导致了鸦雀无声的肃杀局面。毛泽东在“文革”后期说“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时就看到了这一点。有了大大小小屈死鬼的前车之鉴，不禁自禁。用不着像南宋毁《江湖集》版后“诏禁士大夫作诗”，或像乾隆传谕八旗“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作，哆口吟咏，自蹈嚣凌恶习者，朕必重治其罪”（转引自

岳成：《再谈乾隆的文网》，《书林》1988年第4期），也用不着像明洪武十二年公然宣布“军民一切利弊，并不许生员建言”那样，而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实现了舆论一律，实现了在思想文化和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专政。

在中国，传统政治与传统文化不可分，文化传统与政治传统也是不可分的。有大一统的政治统治，乃有大一统的文化统治，文化领域的专制。文字狱就是这种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的表现形式。有专制政治就有文字狱，不必件件都经过御批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学随术变，很难说文字狱的专利属于儒家还是法家。总之，它是过去的剥削阶级统治者惯用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统治的手段，目的是钳制言论，控制思想，使民不敢言，亦不敢思。在封建主义的最高统治者眼里，读书人是要使用的，但又是讨厌的，可恶的，以至危险的；这些读书的人本来同其他臣民一样应该是甘受驾驭的犬马，但他们中偏偏有一些自以为人，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甚至还要发为议论，刊为文字，“蛊惑人心”，“动摇国本”。为了防止形成朋党，成批地处置较为快捷，并且足以杀一儆百，使一般不读书的愚氓也放老实些。这样就有了文字狱，形成了文字狱的源远流长的传统。

这个文字狱传统在当代有了恶性的发展，要害在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对知识分子的宏观估计。无论作为社会良知代表的菁英或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当他们沦为仅仅是改造的对象的时候，就已经预示着他们是代表着敌对力量的嫌疑犯了；当他们被告知要“夹着尾巴做人”的时候，就已经预示着等待他们的是非人的处境了。呜呼！不出文字狱倒是不合逻辑的。

或曰：文字狱的造成，还有法制等方面的原因。然而，若没有广大知识分子作为人、作为公民、作为先进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难道能够指望法制的发育和完善吗？

文字狱传统就是这样一种“国粹”。在有些知识分子为所谓传

统的文化精神招魂的今天，它的带有血腥味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不止是知识分子的千百万人的记忆。重温这一记忆是为了摆脱这一阴影的威胁，这不仅仅关系到知识分子的命运，也不仅仅是知识界的事情，更不是仅仅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所能解决的。

1988 年 9 月 25 日

好 在 哪 里？

中国的老百姓好吗？好。

中国的知识分子好吗？好。

好在哪儿？据说好在听话。

我偶然看到文艺界一位我所尊重的老同志的谈话记录，他在讲到人的文化素质时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全世界最好的老百姓，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全世界最听话的、最正派的、最肯自我牺牲的知识分子。”

在我们的语言习惯里，正派就是好的同义语；被认为正派的，大约也就是“听话的”和“最肯自我牺牲的”，而“最肯自我牺牲的”，大约也正是最“听话的”，因为要中国的老百姓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听的，也以叫他们去“自我牺牲”的话为多。1925年北京教育界有名林 者，针对教员教书要薪水、要饭吃，在一封公开信里发出高论：“身当教员之人，果有几人真肯为教育牺牲？……教育为最神圣最清高之事业，教育家应有十分牺牲精神……不能长久枵腹教书，则亦惟有洁身引退，以让之可以牺牲之人。”这是后来诸多“牺牲”论的范本，鲁迅为此作《牺牲谟》（见《华盖集》），可以参看，这里不再多说。

而中国的老百姓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好”，因为“正派”，因为“听话”，他们作出的“牺牲”，并不限于薪水和吃饭问题上，难道还要一一举例么？

几十年来，有一些主事者提出“尊重群众”和“尊重知识，尊

重知识分子”一类主张，尽管因时因势而异，且在层层执行之中不免要打折扣，甚至走了样，但那初衷仍是不乏明智的，以尊重酬听话，也是一种调节关系的契约。

但是当我看到知识分子中有人发言、著文要求尊重的时候，就感到某种关系的失衡。首先，要求尊重这件事本身，表明要求者就不那么“听话”——不那么“肯自我牺牲”了，因为“自我牺牲”是该包含牺牲被尊重的权利、牺牲人格独立性的。艾青 40 年代杂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之在当时受批判和在 1958 年受“再批判”，其可悲的死结就在这里：尊重是可以乞求的吗？

有人主张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应该敢想敢说，既做决策者的待命战士，又做决策者的智慧参谋。并不是单单要什么“尊重”，而是祖露出一片用世之心，愿意像俗话说的那样，“献计献策”，为决策者前驱；这一点跟两千年来许多积极入世的传统知识分子倒很相近。不过会不会因为“敢想敢说”，不免被认为不“听话”呢？

但是如果不“敢想敢说”，还成其为知识分子吗？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思考，这样的“知识分子”，即使“尊重”起来，“尊重”下去，于社会于人民于科学文化又有多少实际的用处呢？

又要“有用”，又要“听话”——至少不是“不听话”，——这就是在“使用”知识分子时的两难处境，比“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物质生活待遇问题更高一个层次，也更难在既有的观念范围内解决。

几十年来知识分子也就是在这样一对矛盾之间喘息，略尽绵薄，人毕竟不能摆脱历史的局限，尽管是精神超越了历史的少数哲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所尊敬的另两位知识分子在一部有名的电视系列片的第三集结尾，也竟写下一笔：“但愿历史不再捉弄中国的知识分子。”请注意这个“但愿”，连慷慨悲歌者也难掩饰无可奈何的情绪的流露。

我们不是宿命论者。好就好在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并且把它同中国人民的命运和历史地位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考虑了。

1988 年 9 月 28 日

趣味逻辑

记得六七年前，我写一篇小文的时候，苦于弄不清“不是杂文时代”的杂文和“不要鲁迅笔法”的杂文笔法是甚么样的，虽没有上下而求索，但始终存着个疑问。

最近偶然间找到了一个——可能算是答案，那就是所谓“新基调杂文”。

这是同一作者在两本书里提出的（《新基调杂文创作谈》，《新基调杂文浅探》，作者刘甲，分别由长征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作者为了“指导和推动杂文创作”，号召“创造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基调的杂文”。

我们遵循过一个半古典的提法，说文学是时代的镜子。准此，把文学现象放到一定历史范围内，同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是顺理成章的。“新基调杂文”的论者从时代立论，如果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那将具有普遍的意义，而不限于杂文。既然“警惕和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就足以“创造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基调的杂文”，则推而广之，警惕和克服“鲁迅式”小说、散文诗、新诗、旧体诗“基调的‘积习’”，不是同样可以“创造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基调的”小说、散文诗、新诗、旧体诗了吗？那末，我们反掌间就取得一个“指导和推动”整个文学创作的理论体系了。

只是，什么样的杂文够得上“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基调的杂文”，我还是不甚了了。两书作者告诉我们“新基调杂文”是“人

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时代的产物”，而“人民大众的当权，由根据地开始，是波浪式的推向全国的”，所以“新基调杂文”只能产生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加上1942年至1949年的根据地（根据地早在1942年以前就有，大概1942年以前根据地没有杂文吧）；然而在这限定的时间和地域产生的杂文，是否都是“新基调杂文”呢？如果都是，就无可讨论了。问题总归是因为在这只宜生长“新基调杂文”的土壤上，错生出了非“新基调杂文”的缘故。

这种非“新基调杂文”，作为“新基调杂文”的对立物，在两书作者那里，确指的是“鲁迅式杂文”。什么是“鲁迅式杂文”呢？“鲁迅式杂文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产物”，这是说得大体不错的；鲁迅没有活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年份，两书作者所说“1942年至1949年之间”，“鲁迅式杂文”和“新基调杂文”“有7年时间的交错并存”，显然指的已经是鲁迅以后也有别人在写“鲁迅式杂文”吧，这样的人是专在国民党统治区，还是包括陕北在内的各根据地——解放区里也有，两书作者没有说。不过说到根据地——解放区以外的半壁中国，当然不是“新基调杂文”摇篮，然而那里所有被称为“杂文”文体的作品，就扫数都是“鲁迅式”的吗？

这里涉及什么叫作杂文的问题。如果取广义，把反对鲁迅的乃至反抗日、团结、进步的短论、随笔、小品、专栏文字也都叫作杂文，“鲁迅式杂文”只是杂文界中的一支，则前者乃是“鲁迅式杂文”的论敌；如果取狭义，认为杂文特指以鲁迅的“战斗的阜利通”为代表的杂感文字，则杂文非“鲁迅式”莫属，岂但《中央日报》无杂文，连所谓“新基调杂文”也只能另成一家，不必声称在否定“鲁迅式杂文”的“过时”的“基调”的同时还要有所学习和继承云云了。

鲁迅的杂文，有几种版本的全集在，篇篇自是鲁迅笔法；连

收入全集的几篇瞿秋白以鲁迅笔名发表的杂文也属同调。无论志在学习或者旨在“克服”，榜样或靶子都是清清楚楚地树在那里。

说到“鲁迅式杂文”，论者没有列举篇目，疑似之间，难于把握。好在两书特别是《浅探》中也还多少为我们作了一些解说。

如说，“确切地说，鲁迅式杂文才是不民主的产物，而新基调杂文则是民主的产物。”

如说“鲁迅式杂文是从官民绝对对立的立场出发，站在‘民’的一方反对官方的杂文，它‘匡正时弊’的出发点是要推翻反动统治。而新基调杂文则是从官民一致的原则立场出发，反对和清除官僚主义习气改革弊政，它‘匡正时弊’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那末，在今天，理应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时代的产物”的“新基调杂文”完全取代“鲁迅式杂文”之际，竟然还有尚未完全被取代的“鲁迅式杂文”问世，岂不是理所当然地该任两书作者把它通通划为反对“官方”亦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毒草”了吗？但是且慢！要做这样的结论，须以“它‘匡正时弊’出发点是要推翻反动统治”为前提，请问：你认为今日中国执政的党及其领导的政权是“反动统治”吗？

如果说，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时代，惟一地只能允许“新基调杂文”存在，因为它是“时代的产物”，是一扫“鲁迅式杂文的‘积习’”的，而“鲁迅式杂文”连一席并存之地都不配，只有被“警惕和克服”的份儿，因为它只有在并非“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之处才能产生；那末，面对着“鲁迅式杂文”似乎仍然远未绝迹的现状——远的不说，1949年建国以来杂文创作几起几落、几落几起之中，大概就有“鲁迅式杂文”和“新基调杂文”的交互消长吧？我们将得出什么样的逻辑结论呢？

要么，如两书作者所说，派定“鲁迅式杂文”是逆“时代基调”而动的、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悖时的、缺理的、落伍的、

无力的货色，然而无法解释，这几乎完全可以不打自倒的“鲁迅式杂文”，何劳如此费劲地努力取消，但历时数十年打而不倒？

要么，承认某些被称为“鲁迅式杂文”的废物还有生命力和存在价值，是因为它讲的有道理，合乎实际，符合人民和时代的需要，然而就无法解释，难道这证明我们至今还没有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吗？

两书作者原来要把他所深恶痛绝的“鲁迅式杂文”及其“时代基调”谥为应予否定的“过时”的东西，但是由于这些“鲁迅式杂文”的存在，却导致他把我们所处的时代指为“不民主”、不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结果。

逻辑力量在这里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这也许是两书作者始料所不及的。

将来再有人增订《趣味逻辑》时，似不妨加上这一例。

1988年10月26日，上海

中国还需要皇帝吗？

假如今天在中国的知识界，有谁宣称中国需要皇帝，大家可能不屑一顾，或者怀疑他神经系统出了什么问题；可是如果换个说法，也许就成为一种时髦的理论。

按照这种理论，中国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就要树立一个“新权威”，周围有一群“知识精英”作智囊，众星捧月，许下的愿也挺迷人，以某几个后起的工业发展速度快的国家和地区为证，说那里没有多少民主，经济照样起飞了，可见没有民主也能实现现代化云云。

试想，一个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完全置民主于不顾的“权威”，不是不叫皇权的皇权、不叫皇帝的皇帝，又是什么？

谁说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和民主呢？不是已经有此类不要民主的言论又在自由传播了吗？不过，暂时还是羞羞答答的，很可能再酝酿一段时间，就会把源出于大洋彼岸的这套主义或主意公开引进，那可透明得多，也系统得多。有几位海外学者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国情不适于民主，只适于专制，而且只要专制者是“明智”的，即使不仁慈也在所不惜。他们没有说这专制者必有皇帝的称号，但鼓吹的却分明是皇权，说不定还是暴君。

这真是“药虽呈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看着这张新开的老药方，想起一页历史。

1915年8月14日的筹安会宣言，引用美国政治学家古德诺的理论，宣称“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

不用君主政体”。这个据说以“筹一国之安”为宗旨的组织，其实是为袁世凯做皇帝造舆论的，所以袁世凯批示要“开放言论”，说如果不让他们“自由研究”，就“足以撼摇国体”了。

发起筹安会的“六君子”中，有个严复曾经是维新派，但他在1897年即戊戌变法“六君子”喋血的前一年，就已经开始倒退。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夫君权之重轻，与民智之浅深为比例……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效泰西君民并王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他在90年前倡言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理由，与今天的“精英”之见大抵相同，无非是民智未开，素质太差，谈民主为时尚早。他也是一心求“治”求“安”，生怕民主引向大乱，殊不知不要民主，“与其你专制，不如我专制”，“彼可取而代之”早就是长期致乱之由。当时另一个从维新派倒退回去的梁启超，他不满意袁世凯的，似乎只在于袁世凯当了终身大总统这个实际上的皇帝，还一定要在名义上也成为皇帝；梁启超则主张“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暂行专制”，这倒跟今天的“精英”们所呼唤的“新权威”相去不远。像严复、梁启超以至刘师培，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在知识界的影响，还的确有点“知识精英”的样子。

可惜到了同年12月11日，所谓全国总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二次推戴书向袁世凯呼吁道：“我皇帝（指袁世凯）功崇德茂，威信素服，中国一人，责无旁贷。昊苍眷佑，亿兆归心，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为主。”在三呼“皇帝万岁”声中，热心推戴袁世凯这个“老权威”的臣僚包括“知识精英”们，一下子毫不掩饰地亮出了自己的身价。

倘如今天的“新权威”论者所说，专制的铁腕可以实现现代化，那末袁世凯的朝代里至少就该为现代化奠基了。其所以没做到这一点，固然是因为袁世凯只知唱什么“厚利民生，振兴国势”、“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的老调，还不知现代化为何物，更可能是因为讨袁的势力的“捣乱”，没让袁世凯坐稳龙廷，救国救

民吧？

蒋介石在统治大陆的 22 年间，权威足够权威了，手腕不算不“铁”了，怎么也没能实现现代化呢？除了日本的入侵以外，莫不是要归咎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引向“大乱之道”吗？

1964~1965 年之交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第一次公开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在随后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专制达到当时可能达到的极限。经济上的指令性控制及于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鸡笼，应该说已经排除了任何一点民主的“干扰”，结果呢？不是排除了民主也排除了现代化吗？不是走到了现代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导致生产凋敝，经济濒于崩溃吗？

作为对若干年前惟政治与泛政治倾向的反拨，在现代化问题上逐渐形成一种惟经济与泛经济观点，以为民主可有可无，生产上去就行，无视或忽视民主是现代化的政治内容。现代化离不开民主，政治民主化是发展生产力的共时性任务。人是生产力中主导的最活跃的因素，社会的人是社会生产的主体，如果不是扩大而是缩小民主政治建设，用专制或准专制的手段，即使加上物质刺激，也不可能激发生产者持久的积极性，不可能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没有广大公民的民主参与，想要依靠从上而下令行禁止的办法，更不可能对高度集权的体制进行真正的改革。总之，如果没有民主，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很难设想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社会的。如果采取所谓“新权威”的集权专制的构想，势必激化社会矛盾；不是使我们走出而是进一步陷入困境，甚至触发恶性事变。

中国有长期封建大一统的历史，有经济文化落后以致适宜专制和皇权滋生的土壤。在这里，民主需要呼唤，甚至“千呼万唤

始出来”，且难免付出很大代价，而一切反民主的、专制政治的幽灵和怪胎却往往不召自来，不期而遇。

前几年在云贵边界上出过一个自称“天统皇帝”的人，“登基”时居然有人罗拜欢呼，颂歌填词说什么：“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天统皇帝！”别处也有类似情况，与所有反动会道门一起，不难取缔。那个“天统皇帝”成不了气候，没有形成“新权威”；他的“皇后”负责起草文件，是个回乡知青，也还不够“知识精英”的份儿。这些人的影响有限。

而宣扬从刚起步的民主化路上回到专制去的主义或主意，一旦经过“知识精英”们的一番理论化之后，在正为走出“低谷”殚精竭虑的人们那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难说了。“有病不求药”不好，“病急乱投医”同样危险。“杀人何必学剑？”——据说学医即可，那是指乱开方乱下药足以致命。古时候的中国人不失其幽默。幽默标志着清醒，只是不知今天的中国人，对于我们是否还需要专制——高度集权——皇权、皇帝或变相皇帝的问题，会作出怎样的幽默或不幽默的回答？

1988 年 12 月 10 日

喜读《王力病中答客问》

遥想当年，“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天安门前，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万岁连声；语录歌起，口诛与笔伐齐施，忠字舞歇，长矛和硝烟并举；红地毯上，觥筹交错，武斗声中，血肉横飞；真是倒海翻江，翻天覆地。曾几何时，仿佛顿成过眼云烟，今天的小学生，据说已不知“文革”为何事。少写少说，以至不写不说，除了像巴金之倡议设立“文革”博物馆，有那么几个不知趣的人说了几句不知趣的话，真的是“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告别昨天，可说告别得干脆！于是海内外都有人扼腕叹息：这是一个健忘的民族！

中国人就是这般健忘吗？十亿中国人都忘了“文革”十年吗？怎样治这个健忘症？用不着翻检邓拓介绍的用狗血浇头的药方，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的王力来给大家上课了！

上海《联合时报》1988年12月23日发表了长篇专访《王力病中答客问》，冠以一个含情脉脉的标题：“越是多磨情越长”。据说这篇经王力“审阅、补充、改定”，“以澄清、纠正关于他的种种讹传”的谈话，“是20多年来第一篇关于他的准确的正式报道”。

对这件事，学者于光远评论说：王力是“文革”中的一名重要人物，关于他的作为与评价能不能以他本人的讲话为准来澄清？如果请江青来研究江青，王力来评价王力，还有什么公理可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那本文革十年史的遭遇大家都知道。但

这样的“文章”居然在报上整整占了一个版！

于光远的愤慨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要说：于公此言差矣！诚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出版后被禁止发行，1988年有关部门还曾经制止“文革”词典的编纂；但是，《王力病中答客问》在1988年12月问世后，没有听说下达不许转载一类禁令和正式的批评性的意见，我以为未必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问题不在于王力如何评价自己，包括自称“思想境界远远超出屈原、贾谊之上”的“第三种忠诚”，在这方面应该相信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王力“为了澄清社会上流传的流言蜚语以及某些回忆和书刊中不符合事实的报道”而写的材料，以及他预告要写的回忆录，我是乐于见其发表的；岂但王力，就是开辟专栏《“中央文革”成员忆“文革”》，又有什么不好呢？只有提高透明度，直至公开档案，私家治史，并通过不可避免的争鸣，才有助于真正澄清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然则不但当事人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企图不能得逞，而且历史的碑文上一切虚矫、伪饰和捏造也都将大白于天下。

王力说中央一领导人给他出题目，他从1982年开始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如何发展了马列主义》。我对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兴趣，远不及对他的回忆录的期待。因为这是有史料价值的。史料并不是信史。但只有掌握各个方面的“文革”当事人提供的史料，去伪存真，弄清事实，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使“否定文革”落到实处。对“文革”这一段历史，如对所有历史问题一样，个人恩怨宜粗不宜细，总结经验宜细不宜粗，要总结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离开具体事实材料的尽可能完备和全面的发掘是不可能进行的。

这篇专访的作者说：“‘文革’是中国最为错综复杂的一段历史时期，实事求是地弄清、分析、评论王力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在事隔20年后的今日，是该进行了。”如果只围绕王力进

行未免所见者小，对整个“文革”的历史，包括对有关人物、事件逐个作专题研究，岂不是早该进行了吗？如果只“弄清、分析、评论”王力问题而不及其他，或是只发表王力自己的“辨正”而不听别人的发言，那就奇怪了。我们近年也仍然见过不少怪事，但愿这类怪事今后虽不能杜绝使之全不发生，也以尽量少发生为好。

我欣赏王力说的“王力本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争取到了从他的观点来“澄清事实”的言论和出版自由。所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自然也都应享有同样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公民权利。王力言论的公开发表和不受干涉，意味着有关“文革”要少讲或不讲的禁令取消。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是不会独厚于曾是“中央文革”成员的王力，而薄于其他身受“文革”之害的公民的吧。难道还会重复“文豪则可，吾辈则不可”的公式，而闹出“王力则可，尔辈则不可”的笑话么？

“喜读”之“喜”，喜的是由此看到言论开放和有关“文革”历史的研究和争鸣迈出了小小的一步。

1989年1月16日

久违了，王力先生

睽隔 20 多年的王力，不久以前以“病中答客问”的形式，在上海《联合时报》上同读者见面。

王力何许人也？今天的青少年会这样问。

我们自然是知道的，而且知道这王力不是那王力，不会把他混同于前年病逝的王力（了一）教授。当这个王力在 1966 年～1967 年繁忙于“文革”活动，特别是在武汉“七·二〇”事件血雨腥风的武斗中亲临前线，又仆仆风尘于京汉之间的时候，王力（了一）教授还在北京大学打扫校园，其地位有云泥之别。而语言学家王力精研诗词格律，其龙虫并雕斋诗抄，又远非这个王力的“赋诗《衷情寄给党》”所能同日而语的了。

但细想起来，我们对这个王力，其实知之甚少。还要感谢那位记者根据王力本人审定，告诉我们“他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主持下，起草过不少文件”，是不少文件的版权持有者之一。不过我们作为各种文件的学习者的普通人，是从不过问高层版权，更不涉足机密的。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王力，也就主要限于“文革”初期他的广为传播的大量讲话、表态的录音和抄本。他的诸多官衔之中，最熟悉的则正是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成员了（“中央文革”虽称小组，但当时却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合签署重要文电）。

这一点，显然不是讹传，也绝非流言蜚语。“对于那场 史无

前例的民族大灾难，”记者洒脱地说：“王力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员，是负有一定历史责任的。”可惜在长达七八千言的“专访”中，王力没有表达一点歉疚之情，只有一片委屈之感。

为什么？据说，“他既不属于林彪集团，也不属于‘四人帮’一派，因为这两个集团都是在王力被打倒若干年后才逐渐形成的，而且王力正是被江青、康生打倒的——王力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据《文摘报》透露：王力是在组织人马到外交部“夺权”、揪斗陈毅之后，由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下令逮捕的。——《经济学周报》编者）

我不知道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应该算是哪一天正式开张的。但在1967年8月王力下台之前，“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却是判然两家，不知王力究竟谁属？

不管怎么说，还要感谢《联合时报》披露这一专访，至少有了一点透明度，使我澄清了多年的“误会”，原来一直把王力之被抛出当作反革命集团内部的“狗咬狗”，现在才悟出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如这篇专访所显示，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

于是疑团迎刃而解。王力所谓“中央一位主要领导同志要我研究”，研究的题目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如何发展了马列主义”云云，自然也是用其一向“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主持下，起草了不少文件”之所长了；何等的富有人情味！何等的知人善任！这难道不正是在为王力“落实政策”么？

王力力陈自己从来没有被判刑，没有被起诉，“本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这个法律界限是要紧的。尽管被起诉、被判刑者也有申诉的权利，而大张旗鼓地“答客问”之类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无疑是法定只属公民才有的权利；尽管这一权利实际上并未在所有公民包括曾受“文革”迫害和为反对“中央文革”而

受害的人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使人不解的是，听说“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也发表文章了，在东北某家中共党委理论刊物上，对党的现行农村政策提出批评。他自然用的是化名。如果属实，我猜是出于倾听不同意见乃至反对意见的“闻过则喜”之心，对陈伯达解了“政治问题不许讨论”之禁。但是，陈伯达毕竟还在服刑期间，依法剥夺政治权利尚未期满，这样急于为之“落实”什么“政策”，未免“超前”——“超”于国法之“前”，以致“超”于国法之外了吧？

1989年1月17日

读布哈林遗嘱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布哈林（1888～1938）在他被捕的前夕，写了《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的信，由他的妻子、当时还很年轻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拉林娜背下来。直到若干年后，历经比传奇更加惊心惨目的现实的炼狱，这封信才得以公开。比起在公审的特殊条件下所作的最后陈述来，这封信可以更确切地认定为布哈林的遗嘱。

“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迈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布哈林以他的鲜血和生命，呼吁“未来一代”，要解决那些“窒息着党的生命”的问题，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思考。这是他，18岁就入了党，终生“为工人阶级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奋斗”的布哈林，在意识到的“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的呼吁啊！

现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拨开历史上“有组织的谰言”的乌云，我们发现在苏联本来存在着一个完全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可能的选择。

斯大林模式，是在1929年布哈林遭到决定性失败，新经济政策精神彻底结束以后的七八年中，经由斯大林以“非常措施”的过火行动强行剥夺农民的农业集体化，以践踏法制的专横残暴实施的一系列大清洗，而宣告最后完成的。

在这之前，布哈林从他所认识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出发，谴责过苏联生活中已经出现的“军事封建剥削”，他把这些现象概括为“一句话，人民为官吏，而不是官吏为人民”，他担心这种现象毁掉国家，毁掉党。

后来的事变证明布哈林的担心绝不是多余的。在斯大林模式下，权力的高度集中及其向个人独裁的转化（最后表现为党的、政府的、军队的最高权力由斯大林一人大权独揽），使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蜕变为党的少数领袖直至一个领袖的专政，党和庞大的国家机器从而沦为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中的专政工具。这一专政以无产阶级的名义，把它的镇压职能施之于农民，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乃至其领导集团的内部。

布哈林坚持正统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认为“对待敌人严酷是有道理的”，例如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契卡“捍卫国家不受任何反革命的危害”。但他怀疑他当时面对的国家机器的无产阶级性质：“我低下我的头，但在无产阶级的斧钺面前，因为它必定是无情的，但也是纯洁的。面对着一部凶恶的国家机器，我感到无能为力。”

如果说布哈林在审讯的供词中出于保护年轻妻子和幼小儿子的考虑而不得不使用了曲笔的话，这封由他的妻子默记在心里的信，应该是他直言不讳的心声。他说：“我没有干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他把对他的指控和迫害，似乎一直只认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迎合斯大林因争夺地位和名誉而产生的病态的狐疑心理”，并且注明“我这么说并不为过”；这是从列宁评价斯大林时仅仅认为“不能肯定他能不能够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权力”和仅仅认为属于“太粗暴”的作风问题（却又说是“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又复经过十几年充满激烈的党内斗争的岁月以后，布哈林稍稍前进的一小步。这也许表明布哈林不仅善良而且天真吧？或者，这不恰恰是列宁在称他为“党的最杰

出和最宝贵的理论家”、“全党所喜欢的人物”时批评过他的，不善掌握辩证法的最致命的表现吗？

在《致未来一代党的领导人》中，布哈林还极其诚恳地说：“如果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问题上，我曾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那就让后人对我作出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样严厉的评判吧。我们是第一次沿着一条尚未开辟出来的道路走向一个单一的目标。”“《真理报》也曾开辟过一个讨论版，让人人都来进行辩论，探求道路和方法，争论一番，得出决定，然后一起前进。”布哈林正是这样看待他同斯大林的争论，认为这是迈向建设社会主义共同目标的方法上的不同，他在做的是为了“一起前进”的同志式的批评和争辩。在决定布哈林政治命运的1929年4月中央全会上，他的发言的重点也仍然是围绕新经济政策的一些关键问题阐明自己的主张。他信守着同年1月他写的《列宁的政治遗嘱》文中的话：“同某些人的想法相反，良心并没有从政治中取消。”可悲的书生气十足的布哈林的良心，大概完全没想到等着他的是彻底非同志式的待遇，指斥他“反党”的政治局秘密决议竟会被中央全会所通过，全会还接受了斯大林关于布哈林早在1918年就密谋策划“逮捕列宁并举行反苏维埃政变”的暗示，这就为1938年公审定了调子。这是我们成语所说的“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哪里有书本上所说的党内解决政策和路线的分歧的正常程序和准则的影子呢？而到了1937~1938年的时候，在苏联社会和联共党内权力结构的条件下，谁掌握实际政治权力，谁就是“正确路线”，谁就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谁就垄断了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至对历史的解释权；布哈林也就从“非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布尔什维克”、“反党”、“富农代理人”等等，升格为“叛徒”、“间谍”、“暗害者”、“卖国贼余孽”、“匪帮”和“人类蠹贼”；这不是布哈林个人的悲剧，这是联共（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悲剧，这也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

剧。

布哈林的悲剧之所以为悲剧，在于他置身当时当地和有关当事人之间，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我们的悲剧则在于，在各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同程度上甚至不止一次地重复了这一类型的悲剧之后，时至今日还必须探讨这样的悲剧今后是否可以完全避免的课题，而这样的探讨又并不是经常受到鼓励的。

布哈林无疑是列宁的挚友和学生。布哈林对列宁的如下这一论断也从来没有表示过异议：“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这通常被视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关系的列宁主义原则。

列宁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是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确立的。那次大会因对党章问题的争论发生分裂，随后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以列宁为代表的火星派获得多数选票，反对列宁而拥护马尔托夫的一派获得少数选票，从此而有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多数派和少数派）之称。列宁在世期间，虽然也不断出现过重大政见上的分歧和斗争，但领导集团保持了相对稳定；除了十月革命前的布拉格会议采取了开除孟什维克出党的组织措施以外，以列宁为首的领导集团没有重大改组，即使在党执政以后，也没有对党内持不同意见的领导成员动用极端的手段。但这一明智的平衡未必是通过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法规来保证，毋宁说更多是依靠列宁在党内和领导集团内的政治权威来实现的。

列宁逝世以后，党内“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由于出现了权力真空，而倾斜，而动荡，

越来越不那么稳定了。

这种不稳定和它所产生的党内倾轧的后果，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斯大林个人滥用权力。正是当时党内生活的一般状况、党内斗争（路线斗争必然涉及领导权问题，因此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在客观上无法截然分开）的习以为常的传统，给像斯大林这样作风和品质的人提供了滥用权力的土壤和气候。

十月革命的一举成功，使布尔什维克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取得了绝对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地位。从夺取政权的秘密工作转向巩固政权的国内战争，总之处于非常时期，党的决策过程也带上非常时期的军事色彩，不仅充满了火药味，而且表现为一种机关政治、党内政治。党的领导成员和一般党员，都认为所有有关国家和人民的大事，重大的路线和方针，只应该首先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内部“统一思想”；在党内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内部“统一思想”之前，无需甚至不应向全党更不用说党外人民群众公开，认为这是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权的必要纪律，因而不必要也不可能就党的领导机关内部的分歧和争论倾听全党的意见，就党内在重大方针、政策上的不同认识倾听党外群众的呼声，认为如果这样做就会使党堕落为“争论不休的俱乐部”，使党失去区别于社会组织和一般群众的先进性，又使党涣散，失去战斗力。党的政治利益和组织原则，似乎只要求全党执行领导机关的决议，全民“跟着党走”。这是党内政治生活完全被指令性的等级服从所取代的主要原因。

正如我们在人类历史上大量看到的，法律只是守法者的法律一样，布尔什维克的纪律也只是遵纪者的纪律。党内斗争秘密化的纪律，对布哈林形成组织上的约束，应该说这也是他这个全心全意把维护党当作维护工人阶级整体利益者自觉自愿接受的。然而与此同时，斯大林却在他认为需要的时候，轻易地把党内矛盾和斗争公开，例如在几乎剥夺了布哈林的答辩权的情况下，从

1929年8月下旬起，利用舆论工具在党外发动了长达四个月的大规模的政治诽谤。

全体人民的命运和前途取决于党，全党思想和行动则统一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而党的领导机关作出这样的或那样的决议，是由什么所决定，以什么为依据呢？1929年4月16日举行的四月全会，是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到会者300人以上，而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在会上只有13人。从表面上看，这一次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制打败了布哈林；实际上，是与与会者特别是政治局集团的素质决定了力量对比的悬殊——其中绝大部分人属于所谓实际政治家，即行政官僚和军事化的“非常措施”的信奉者，可能再加上斯大林在六年总书记任内提拔重用的干部，他们的一致认同，大大加强了斯大林的有利地位。布哈林成为会上的“少数派”，如后来有人所说，“不是用论据而是用党证把布哈林击败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党证击败了布尔什维克党除斯大林模式之外的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选择！在当时，紧接着召开的第十六次党代表会议上，马克思主义学者达维德·梁赞诺夫就曾评论这一事件说：“政治局现在不需要马克思主义者了。”布哈林对真理的追求让位于斯大林对真理的占有，归根结底，当时领导机关成员的思想、理论、政治素质和领导机关内的力量对比，一边倒地使斯大林占有了权力，从而也占有了真理。

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而惯会玩弄阴谋诡计的角色；布哈林却完全相反，他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家，但对实际政治中的权术尤其对阴谋诡计则一窍不通。很有点像论者所说的王安石“有申韩之心而无申韩之术”。这就注定他在面对着“蜕化成为官僚主义的组织”的肃反机构“能够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个党员干掉，把他们指为叛徒、恐怖分子、异端分子和间谍”时“感到

无能为力”，束手就缚。惟一能做的只是呼吁“下一代党的领导人”宣布他是无罪的，寄希望于年轻的新一代党领导人的正直。

布哈林早在 20 年代就从所谓“余粮征集制”等政策及其实践中看出对农民进行的“军事封建剥削”的实质，敏感地指出这是“沙皇俄国老传统”的复活。直到他作为遗嘱的信中，着重提出了“一部凶恶的国家机器”，也就是无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异化问题：“这部机器大概借助于中世纪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权力，捏造着有组织的谰言，厚颜无耻地在采取行动。”这都是中肯的，正确的，也是必要的。

然而，布哈林似乎来不及联系国内和党内政治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去重新审视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思想，他似乎较少或根本没有涉及过党的异化问题。那些“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惟其长期“稳定”，而又缺少监督，以致整个地或部分地，或者至少是其中个别的人，蜕变成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的、主宰普通党员和群众命运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而他们原有的威信、影响、经验则转化为“太岁头上不能动土”的为所欲为的独裁权力，这种从“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现象，在布哈林生命的后期，已经不是预见到的危险，而是睁眼可见的既成的事实，布哈林对此是否有投鼠忌器的顾虑呢？我们是无权来苛求于像他这样的前人的。

斯大林的暴行，他的逐步升级的专断跋扈、大权独揽，对苏联人民、对国际共运以至对全人类造成的危害和损失，是不可原谅的。苏联的党员和群众不能代他负责。然而从历史的高度来回顾这一切时，人们有责任对建党思想进行再认识。布尔什维克的建党学说是在执政以前，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时期形成的；在取得政权并巩固了执政党的地位之后，在由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条件下，是不是应该根据新情况和新问题，就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作出新的概括，新的回答，新的修正和补充呢？如果在执政初期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领导主体改革的迫切性，那末在饱经沧桑不得不面对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刻，这个任务实在是刻不容缓，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作为全国政治领导力量的执政党，党内民主化的程度是什么样，社会上各阶层人民共同享有的民主化的程度就是什么样；一个在党内关系上——领导成员特别是不同政见的领导成员之间、领导机关和普通党员之间——缺少健康正常的民主生活的党，不可能领导群众建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没有同民主化程度相应的党内开放，没有普通党员和党的下级组织对领导机关的有效监督，没有对重大形势、任务和方针、政策问题的开诚布公的讨论，尽管也许党组织不致成为“争论的俱乐部”，但在封闭、僵化的表层下却掩盖着对抗的危险；党的领导集团或领袖可能甚至必定成为掌握党权的统治集团或统治者，党组织沦为少数人对多数人（包括为夺取和巩固自己的权力时的党内对手）的法庭，这是布哈林及其同时代人的命运所告诫我们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内和党外的民主是互相影响、互相检验的。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党派都没有反对人民的权利，而人民群众却有在不同党派中间采取或拥护、或批评、或反对、或中立的选择的权利；即使在不存在多党制而由共产党独立充当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外一般人民群众中间也只存在社会行为上是否违法的问题，而不应该存在政治态度上、思想意识上是否“反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本来不成其为问题，但是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始，几十年间，在一系列国家内，不知有千百万公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党外的公民中寻找“反党”分子加以打击的党，必然在党内寻找更多的“反党”分子当作打击对象，这不是推论，而是概莫能外的经验了。

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国家学说和建党理论，党是无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代表，从而也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因此在执行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方面，党成了全权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作为从“被统治者”转变为“统治者”，实行“阶级统治”的惟一实体，而党“通常是由……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集团来主持的”，党的领导集团也就成了国家的实际统治者的集团；在缺少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两重体制保障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则从整体说来成为抽象的存在，名义上的“统治者”，在一定时期千百万公民沦为党（由“领袖……集团”主持）所领导的国家的实实在在的“被统治者”。在布哈林案件前后的苏联大清洗中，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分子、无产阶级先锋队成员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人即其政治代表人物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的怪圈。

斯大林体制是封建性很强的官僚体制。在斯大林体制下，党的领导机关及其大权独揽的领袖，通过高度集中的党的权力的垄断性的国家权力，包括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精神权力和物质权力，对整个社会生活实行全面干预，不可避免地要采取极端政策、强制措施和高压手段，结果形成渗透全部官僚体制的两大特点，一是专制化，自上而下逐级的长官意志和自下而上逐级的绝对服从相结合；二是寄生化，在各级领导层中，“合法”的特权和非法的特权相结合；这样就滋生出一大批利用手中权力实行压迫和剥削的官僚，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处在这权力金字塔的最底层，竟不得不经常震慑于镇压的威力，失去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苏联，幸存的老一代人记忆犹新；在近年兴起的“历史热”中曝光和澄清的许多真相，促使更多的人包括青年一代像正视现实、正视未来一样正视历史。

历史的前进是不可阻挡的，同时历史的发展又是不能割断的。

历史的旧账如不加清理总结，今天就不知道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就不能校正被歪曲、被篡改了的历史所派生的被歪曲、被篡改了的思想；就不能辨别过去和现在的真理和谬误；就没能恢复马克思主义本来蕴含的人道精神和理性精神，恢复社会主义实践应有的声誉，在改革中不断前进。

重读布哈林遗嘱，重温布哈林案件的历史，深感其中的严重教训，对我们也有振聋发聩、催人思考的意义。一个共产党员对此如果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不仅愧对千百万死者，也愧对共产党人的良知和党性。

1989年2月15日

〔附记〕

这篇札记写于1989年初。当时认为苏联共产党应该汲取以无数忠实真诚的党员和正直无辜的公民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历史教训，重新审视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自身的改革。谁知此文未及发表，而狂飙起于天末，斯党斯邦，一时有斜阳烟柳之叹。翻检篋底，重读一遍，辙迹犹新，前车不远，来自历史者归于历史，姑作为历史的纪念吧。

1993年4月15日

批判精神与杂文的命运

——关于杂文史和当代杂文研究的一些思考

中国大陆在新时期即 70 年代末以来重新有了杂文。1975 年毛泽东曾经慨叹“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但并无一语及于杂文，实际上从 1942 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结论部分涉及杂文以后，杂文这一文体就处于尴尬的境地。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鲁迅，主要是把鲁迅的杂文作为对敌作战的形式看待的；他认为在新的条件下如果“还要鲁迅笔法”，使杂文形式还“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就是“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从这开始，先是在部分地区后来在整个大陆上，杂文和杂文作者都经历了一条坎坷的道路。

直到 80 年代以来，在杂文领域还有人鼓吹“警惕和克服鲁迅式杂文基调的‘积习’”，要“清洗”“鲁迅式杂文基调的残痕”之论，正是对遥远年代的圣谕的“为我所用”的回声。

但是，鲁迅杂文和“鲁迅式杂文”的“残痕”是清洗不掉的，因写杂文而获罪罹难的如王实味、邓拓以至吴晗、萧军、徐懋庸等的血痕泪痕也是冲淡不了的。

我原想只论及新时期杂文和几次有关杂文的论争，但枝蔓所及，看来不得不多少上溯到 1949 年以来，以至 1942 年前后的岁月。

人们在描述新时期杂文的时候，指出作品数量的繁多，作品质量的提高和作者阵容的扩大，在当代大陆都是空前的；我认为更应该指出：最可贵的是批判精神的复活和高扬。

1978年3月，秦牧发表《鬣狗的风格》，这篇“讲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的文字，是新时期杂文最初引起广泛影响的力作之一。它从传说中鬣狗抢吃猛兽吃剩的残肉碎骨，说到“人吃人”的社会种种世相，揭出文革中某些“看到气候差不多的时候就奔上前来咬点骨头”，事后又“会立刻装成个文明人、没事人的样儿”的现象；这里所针砭既有“四人帮的亲信和死党”，也有“到头来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人们，着眼于批判凶残又怯懦、卑鄙而猥琐的心理、性格与恶德，其笔法是很难用“对付敌人”、“对付同盟者”、“对付自己队伍”的简单标准来区分的。

从70年代末以来，杂文的锋芒主要是针对文革的。谈论现状，不忘文革的流毒；反思历史，也每从文革入手。这是因为十年动乱，血渍斑斑，而长期箝口，若鲠在喉；蓄之既久，其发必烈，一时于诗歌短篇小说之外，杂文勃然而兴。巴金的《随想录》，或怀旧，或悼亡，或说文，或议政，中心则是“十年一梦”，记忆犹新，呼吁人们一定不要忘记“文革”，不要让“文革”的悲剧重演。严秀的《二世而亡乎，一世而亡乎？》以旅行记感的形式，从秦始皇一生尤其是晚期的严刑峻法、穷奢极欲、以严重的徭役赋税糟蹋人力物力，以及自我封锁等倒行逆施，论证了“秦不是二世而亡，而是一世而亡，就亡在秦始皇手里”，驳斥了曾有过的美化秦始皇的荒唐论调，又指出对秦人“哀之”而复“鉴之”，要取得历史的教训，首先须尊重历史的真实。吕剑的《论古人未必迷信而今人未必不迷信》，批判了“披了名为‘马列主义’的华裳”，提倡迷

信，提倡盲从，推行“愚民政策”的法术。这在当时以至今天都有益于我们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揭橥科学与民主。

文革期间以至文革以前政治运动中从帮闲到帮忙到帮凶的文士们，一方面自己大搞“阴谋文学”，影射攻击，如批李秀成《自述》，是为讨伐瞿秋白，批“宋江架空晁盖”是针对周恩来等；一方面又以所谓“借古讽今”，入人以罪，这些伎俩是人们所熟知的。黄裳的《谈禁书》（后来他写了一本《笔祸史谈丛》），蓝翎的《谈历史上的冤案》，牧惠的《文字狱古今谈》等文，则是光明正大的谈古论今，使人明文字狱之古，更知文字狱之今，看出至文革而登峰造极的文化专制实在是两千多年来政治和文化专制的一次回光反照，而文字冤案是它的一个集中表现而已。牧惠文中说：

鲁迅曾经讲过：“中国历史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愿鲁迅说的这些现象，随着林彪、江青的被推上审判台而告结束，就如鲁迅所讲，“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给叭儿狗文艺家承受罢。”值得担心的是还有人舍不得。

这个担心不是多余的。因此后来如《批判“大批判”》、《何物“大辩论”》（邵燕祥）诸文，就是对死抱住“大批判开路”的老例不放的人，直截了当地给以批判了。

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大量表层的消极现象，从官风腐败到教育滑坡，既是一般公众的热门话题，理所当然地也是杂文作者们议论和抨击的对象。而还有些“风起于青萍之末”未引起充分注意的事态，也是杂文作者的殷忧所系。如1982年林放根据有些在十年动乱中犯有刑事罪行的人居然被选作“接班人”的事实，为文提出《江东子弟今犹在》的命题；1988年在有关方面禁阻写文革书籍出版的同时，文革风云人物王力自我辩护的《答客问》竟得以公开发表，一批杂文及时对这一现象做出多方面的剖析：便

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据我记忆，新时期杂文中颇有一些篇章在发表后引起余波。如乐秀良写的两篇《日记何罪》，其轰动效应不在于收到大量来信，而在于导致至少几十件因日记被查抄而被判“反革命”罪的案件的平反。还有一些在作者和读者间互相“商榷”的事，情况却各有不同：王蒙写《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重新思考，也可以看做是对胡靖《论“费厄泼赖”尚不能完全实行》（1981）的一个补充，这是完全正常的。而冯英子的《要一点移山精神》，不过就一篇小说，说起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像山一样挡住进路，要拿一点移山精神铲掉；接着来了一篇《也要移一移》，说冯文没有提到近三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一时疏忽？是根本遗忘？是认为……不值得一提？”因为，“今天的‘山’不能与30年代的‘山’相提并论”，再要移山，就是想让“文革”“过几年又来一次”了云云；然后归结到所谓“站在一旁长吁短叹，或说说风凉话这类旧文人的旧习气”，根据毛泽东所说“要把立足点移过来”的论点，“也要移一移”。这样的论战手法和思路，杂文的作者和读者们都不陌生。在被舒展杂文命名为“起哄”的文坛风波中也不仅见。而像章明的名文《吃运动饭》一发，就因干犯“众怒”，据说迅即转到版面以外，责令作者和编者去检讨了。

在过去的年代里，杂文作者很少没有为自己的杂文作品，甚至只为自己写作杂文这种体裁而作“检讨”的；那时的所谓“触及灵魂”的要求，无非要歪曲良知，铄精神自由之羽，就“驯服工具”之范。而在新时期的杂文中，特别是在像《随想录》中那些自责的、自省的忏悔文字中，我们看到巴金也在解剖社会、解剖历史、解剖别人的同时，不留情面地解剖自己，从而超越自己。新时期杂文所体现的批判精神，不仅在于驱散社会上的毒气和鬼气，而且在于“驱除（我们自己的）灵魂中的毒气和鬼气”，反省

我们心理和性格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劣根性。

这样的杂文，我想就是某些论者充满贬义地目为“鲁迅式杂文基调”的作品。它们不一定篇篇袭用“鲁迅笔法”，但无疑赋有鲁迅精神。

二

说到鲁迅的杂文，其做为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杂文之高峰和代表的价值与地位，是不须多所论列的。在同一营垒中，鲁迅的知己瞿秋白化名何凝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开其端，随后冯雪峰、聂绀弩、李何林、巴人、王瑶、唐 ，乃至晚近的李泽厚、刘再复、朱正、彭定安诸家，都对鲁迅从早期到晚期、从杂文到其他创作和整个社会实践中一贯的人格精神作了深入的分析 and 概括。我认为鲁迅精神的核心就是批判精神。

批判精神弥漫在鲁迅全部作品中。最足以表现他“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的精神，并且表明他何以为文、何以为杂文的，举一段话就够了：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自下而上，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 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六》，1925，《华盖集》）

这段话丝毫不因鲁迅当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减其锋芒和气魄，而且鲁迅至死也不改其初衷。那种囿于“鲁迅后期的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的一家定见，而轻率地看待鲁迅的前期杂文的学风，也该重新估定一下了。

自然，正如不能否认鲁迅的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一样，鲁迅

的杂文创作也有一个发展过程。^① 鲁迅杂文的锋芒所向，同是前期，在《热风》中的“随想录”还是对于扶乩、打拳、“保存国粹”等的批判；而到《华盖集》及其续编，便介入三一八惨案、五卅运动，直面惨淡的人生与淋漓的鲜血，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军阀和他们的爪牙了。鲁迅后半生大多数时候是在“四面作战”的情况下，用杂文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有些论敌以低劣的杂文攻击鲁迅，甚至“恨屋及乌”地攻击杂文，鲁迅则在论战中磨砺着自己的杂文；有投向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的匕首和投枪，或对“许多事情都败在他们手里”的“自己营垒中的蛀虫”的揭露；而更多的是揭示社会的和思想的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鲁迅的批判精神，基于他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革的热忱，也基于他独到的、切实的洞察，独立的、深刻的思考。

当我强调批判和批判精神的时候，意识到由于历次政治运动中以“批判”之名行斗争之实造成的概念混乱，必须加以廓清。早在 60 年代初邓拓《燕山夜话》一集中就做过这方面的努力。

那是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和尔后的“拔白旗”等运动中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学术观点肆行粗暴的“批判”以后，大家闻“批判”而色变；邓拓的《“批判”正解》企图改变这一印象，他正本清源，推崇马克思“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的精神，指出马克思“一直用批判的方法进行他的理论研究”，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邓拓由此通俗地论证，所谓批判也者，应是为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更好地接受遗产，发展文化；而决不是以“打击”或“否定”一切为目的。他

^① 这一段取意于彭定安《鲁迅杂文学概论》（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31、19 页。

正确地断言，主观武断是批判的对立面，是科学之敌。

可惜邓拓的“正解”全是徒劳的。了解了批判的正确意义又如何，能够抵制或改变主观武断的“批判”于万一吗？邓拓的近**200**篇杂文，从整体来说，也都是批判精神的产物。但结果遭到的不仅是主观武断，并且是同权力、暴力相结合的“大批判”。

鲁迅说过：“文章的战斗，大家用笔，始有胜负可分，倘一面另用阴谋，即不成为战斗，而况专持粪帚乎？”（《致黎烈文》，1933年7月14日）借助于真理、事实、逻辑之外的力量，无论是阴谋、粪帚或别的甚么，今名“大批判”，也就离文字狱不远了。说邓拓死于“大批判”是不为过的。

邓拓之受“大批判”，有其政治上、组织上的原因；而在思想上，也无非杂文中曲折流露的批判精神。“大批判”是对理性批判精神的非理性批判。扼杀邓拓的并不是姚文元《评〈三家村〉》一篇杀气腾腾的文章，而是它所代表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大批判精神”。“大批判精神”是打击、扼杀批判精神的真正刽子手。杂文，在批判精神和“大批判精神”的消长中前进着。它往往受到打击、摧残与扼杀，就因为它经常是批判精神的载体的缘故。

三

“大批判”之名，我没有详细考据，大约起始于“文革”中各级成立“大批判组”之际，比**50**年代后期已肇其端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得要晚；但“大批判”之实，却是早已就有的老资格。**1942**年在延安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以及丁玲、艾青、萧军和当时一些青年写的杂文，曾经导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关杂文问题的著名结论；而在**1958**年重新发表其中若干篇作靶子时，标题已作《再批判》。可悲的是，王实味先此十年就遭到了“武器的批判”，戴着强加的

罪名。

成为祸根的杂文《野百合花》，错在哪里？或者问，王实味写杂文《野百合花》，罪在哪里呢？就在于他身居延安而表现出批判精神，因为那时候已开始形成这样的逻辑，“似乎生活中存在的阴暗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它写了出来^①；据说当时聂绀弩在大后方发表的文字中曾经说到延安有虱子，就招致一些延安人士的不满，那末王实味人在延安而有所指摘，自然就有“资敌”的嫌疑了。

对此王实味有自己的看法，他为被批评为“牢骚满腹”的青年辩护，也是夫子自道吧：

青年是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的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也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中，去探求那些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的本质，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见得总是“盲目叫嚣”）消除这些现象的根源。……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野百合花之二·〈碰壁〉》）

在这里王实味好像也在为他自己的杂文以至后来众多具有批判精神的杂文辩护；因为直到 80 年代的杂文在有些人眼里还是“牢骚”或“高级牢骚”，而“发牢骚”是天然地错误的。

罗烽也是在肯定延安是光明的前提下，清醒地指出，“经常阴湿的角落还是容易找到，而且从那里发现些垃圾之类的宝物，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因此认为还需要有杂文。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就是从李芬就义前的往事想到“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批评延安“歌啭玉堂春、

① 牧惠《新基调杂文与拨乱反正》未刊稿。

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以及特殊化、首长架子和青年们所不满的“丑恶和冷淡”，都同这一现实不和谐，同“延安可能而且必须更好一点”的要求有距离。

然而，正在反对王明为代表的“党八股”的“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反对王明路线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同时，王实味及其杂文也遭到不容置辩的毁灭性“批判”，直至若干年后“再批判”时还被谥为“以革命者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开所谓“利用小说反党”这一罪状的先河。可以说，从1942年起，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除了服务于当时对敌斗争需要的杂文以外，杂文已成禁区。在或则“歌颂光明”、或则“刻划黑暗”，“二者必居其一”的理论压力及理论背后的政治压力下，人们身上的批判精神萎缩了，消失了。

1949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指导文学艺术工作和创作的文件。讽刺诗和漫画领域，只有反美反蒋题材的一枝独秀；与讽刺诗、漫画相邻的杂文的冷落，自在意中。1950年，杂文作家黄裳著文呼唤“杂文复兴”，说要运用杂文“热情的讥讽”来“纠正过失，改善工作”。对这个不合时宜的书生之论的批评中，正式出现了“鲁迅式的杂文已经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而杂文只能用来讽刺敌人，“对于人民内部只会有害”的观点。冯雪峰结论性文章《谈谈杂文》，根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陕甘宁边区和各敌后根据地“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说法，加以发挥，说“因为政权已经拿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一切民主的进步的革命的论说家、诗人和著作家，都已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因此在人民民主专政时代应该有‘新的革命的杂文’来代替鲁迅式杂文了。也就是说，不应该再有像鲁迅杂文那样高扬着批判精神的杂文了。后来冯雪峰自己被粗暴地判为反党集团、右派分子以至文革中郁郁而死的经历，从根本上否定了他这个观点

的论据。

只是到了1956年，顺应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问题后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内部报告，随后思想文化方面实行有限的开放政策。《人民日报》改版，提供了杂文园地，于是从1956年7月到1957年6月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人们称为建国后第一次杂文创作高潮的态势。徐懋庸（回春）的《不要怕民主》、《不要怕不民主》，巴人的《况钟的笔》，严秀的《九斤老太论》，黄秋耘的《刺在哪里？》、《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就是这一时期留传的名篇。

如同黄裳之呼唤“杂文复兴”，徐懋庸为文提出“小品文的新危机”。一方面，他指陈现在还有巧伪人的干部、专横的官僚、重“官”轻民的风气，甚至以“理论”为刑具的刽子手这类“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认定这证明鲁迅式杂文继续存在和繁荣的必要；另外他又提出小品文即杂文面临的矛盾将引向小品文消亡的危机，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在他之前已有人提出、在他身后仍有人反复重申的“鲁迅式的杂文是不民主的时代的产物”和“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时代”的两个前提，徐懋庸的“小品文的新危机”之论，就是在这大小前提下的不祥的预感。

不幸而言中。在1957年6月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中，把杂文与反党联系起来，等同起来，许多有批判精神的杂文作者，甚或还没有自觉的批判意识，不过爱好杂文这一兼有讽刺与幽默的文体的作者、读者，也纷纷落入文网。

1962年，《人民日报》上昙花一现的“长短录”专栏（作者夏衍、吴晗、廖沫沙、唐 、孟超），一共发表了37篇杂文，却也赢得“说资本主义之长，道社会主义之短”的指责。至于邓拓《燕山夜话》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札记》，以及这些作者在文革中的遭遇，已经是人所共知。

因此，我们在1980年初看到严秀还在《略谈杂文的功过》文

中苦苦辩解，“杂文在 60 多年来是对革命有点功的”，“杂文不是反党工具”，“杂文在今后可以写，应当写”的时候，不仅理解，而且感到辛酸。

我们在长长一页杂文史上看到的，是杂文被压抑、被扼杀的悲剧，也是批判精神被扭曲、被窒息的悲剧。

四

具有批判精神的杂文所遇到的克星，是“大批判”：口诛笔伐，辱骂恐吓，政治手段以至暴力的动用。

在这同时，却还有另一种杂文自居“正宗”，并且咄咄逼人。那就是严秀在《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 杂文集·导言》中说的那种“‘大批判’中的‘小批判’”。蓝翎在《杂文研究资料逻辑·序》中指出这一路杂文“那种棍子式的粗暴蛮横，语言的干瘪无味，写法的八股格式，始于‘反右’，且影响后来”，是不错的。如姚文元 1957 年投石问路的杂文《录以备考》，就是反右派斗争序幕中的一支插曲。后来姚文元出版的论文集和杂文集，就都在此类“大批判”、“小批判”之间。等而下之，则有葛德等从反右派时批“右派”徐懋庸、冯雪峰、丁玲等的杂文，到大跃进和反右倾时批所谓“观潮派”、“秋后算账派”和“同路人”的杂文；至文革后期“批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有一篇题为《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 Q 小 D 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的杂文体檄文，已使这一路“小批判”杂文与“大批判”沆瀣难分，只不过篇幅略显短小，不若姚文元、张春桥等署名“大批判”文章那样动辄万言罢了。

因此，应就严秀所指“‘大批判’中的‘小批判’”补充说，“小批判”从内容看是“大批判精神”的杂文化，从篇幅看是“大批判”的具体而微。它同有批判精神的杂文或称鲁迅式杂文的最

大区别，在于它所立论，是“代圣贤立言”，为首长前驱；它的作者无持操，无独立见解，奉命或顺风以行，有时是官办写作班子；文风从党八股变出，狐假虎威，面目可憎；在手法上则有歪曲鲁迅的批判精神、任意剪裁鲁迅语录这一条，如从反右派到文革，就不厌其烦地引用鲁迅“打落水狗”的话，为在阶级斗争扩大化中迫害无辜制造舆论。

虽然有个别曾经自命为鲁迅的学生者也曾经坠入过上述杂文作者之列，但这类杂文没有出现过艺术上可取之作。不过我始终认为，这类“小批判”也像“大批判”一样，保留一个代表作的选本，可以成为杂文“不应该这样写”的教材，也多少填补杂文史上几段时期的空白。

五

现在说到新时期杂文发展中的三次论争。这三次论争都未能广泛地充分地展开，但都是围绕着批判精神的是非进行的。

第一次论争。李剑发表题为《“歌德”与“缺德”》的一篇杂文，用强词夺理的口吻，宣传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任务就在“歌德”，不同意的就是“缺德派”；进而用什么“只应到历史垃圾堆上的修正主义大师们的腐尸中充当虫蛆”，“善于在阴湿的血污中闻腥的动物”这样的词语，谩骂刚刚从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下和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的文艺工作者们。从南到北的杂文家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纷纷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这篇毫无理论的文字给予批驳，迎接了“大批判精神”的一次挑战，维护了文学艺术应有的批判精神。《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杂文集》除了选有李剑一文外，同时选了王若望、廖沫沙、章明、严秀的有关文章，可以看作这次论争的大致的记录。

第二次论争。严秀、牧惠、弘征为湘版柏杨著《丑陋的中国

人》写了一篇编后记；一些人发表文章对《丑陋的中国人》和这篇编后记提出批评，其中以梁超然的两篇文章较有分量，即《鲁迅、柏杨异同论》和《再论鲁迅与柏杨》；然后是三位编者的反批评《护短与爱国——评对〈丑陋的中国人〉的若干批评》；当然还有些读者发表各有臧否的意见。这些已统统收入《〈丑陋的中国人〉风波》（1989）一书里。事情就是这样简单，远没有像《“歌德”与“缺德”》之争那么掀动了整个文艺界的注意。然而十几篇批评文章恰恰配合对这本书的查禁，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一是我们又看到“那种先有结论后去拼凑材料胡乱上纲的大批判作风，今天就并未绝迹”，仍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老调重弹”；二是从对《丑陋的中国人》的争议出发，涉及甚么叫爱国和怎样看待民族文化心理的阴暗面等原则问题，我们看到了“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力与虚骄、护短之间”的界限不清。争论的是对台湾杂文家柏杨一本书的评价，触动的还是杂文、文学、作家以至每个中国人应该不应该有批判精神的这一根敏感的弦。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答案。因此，这个论争还远远没有结束。

第三次论争。关于所谓“新基调杂文”之争，也就是刘甲的《新基调杂文创作谈》（1985）、《新基调杂文浅探》（1986）两书中的主张和与之不同的意见之争。刘甲的理论有许多概念混乱、逻辑不清、自相矛盾之处，但基本脉络是清楚的：“1957年的夏季形势突变。一位负责管理报纸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严厉批评‘大鸣大放’时期的副刊杂文‘基调不对’……并提出《我们时代的杂文》这样一个题目”，由此有了“我们时代的杂文”即“新基调杂文”的命名；而“从1957年6月至1959年底……又有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这样三个小段落”，“这是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成长中的一个新阶段——由鲁迅式杂文变成了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可见鲁迅式杂文即指1957年6月以前“大鸣大放”时期“基调不对”的杂文，那末“新基调杂文”是些

甚么样子呢？“这个阶段的杂文，则是已经完全过渡到了我们时代新基调的杂文”，“洗净了前一阶段杂文中的某些鲁迅式杂文基调的残痕”，原来这么好的杂文就是从1957年6月到1959年底又分成三个小段落产生的反右派杂文、大跃进杂文、反右倾机会主义杂文！论者在喋喋力争“新基调杂文”的历史地位，却缺少能够拿得出手的范文；然而这无碍于论者厕身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荫蔽下，随时准备给论争对手以“反毛泽东思想”的杀伤。这教大家还有甚么可说呢？我对这次论争的预测是，如果没有权力者介入的话，将会不了了之；越来越多的作者和读者将在实践中找到自己的理论，自去走自己的路。

迭更斯在《双城记》开篇有一段不断被人征引的精彩的话：

这是最好的年头，这是最坏的年头；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年代，这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在我们前面万物俱全，在我们前面一无所有；我们全都直上天堂，我们全都直下地狱……

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土上，万象纷呈，新旧递嬗，充满矛盾，多么需要批判精神，需要充沛着批判精神的清醒而坚定的人啊！

杂文呼唤着批判精神。

批判精神呼唤着杂文。

杂文将与改革者、建设者结伴而行。

1989年4月11日

关于《武大郎开店》

方成名作以《武大郎开店》为题的漫画问世不久，就作为新典流传了，于兹十年，似一直没见阐发的文字，也许因为一看就懂，无须词费了吧。

今见大连出版社《十年杂谈集》，选收的都是1979~1989年间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杂谈”中的稿子，多有很好的杂文。其中早在1980年10月18日播出的一篇《由漫画〈武大郎开店〉引起的思索》（作者张弛），就是一篇跌宕生姿之作。且听他说：

……虽然比喻总是蹩脚的，但总也觉得如此钩画，对武大郎也未免太冤枉。武大郎若真的扔了烧饼挑子去开酒店，而他的打虎兄弟武松并不能在经济上格外给他什么帮助的话，那末酒店经营好坏便同武大郎的身家性命息息相关了。在用人问题上，他虽然不一定让潘金莲当炉沽酒，抛头露面地去招徕顾客，却也断然不能为了个人尊严，不顾买卖得失，专门选用一些矮子来当伙计的。

武大郎要做到“凡是比他高的都不用”，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他不用担心买卖亏本，亏了本不用从自己腰包里掏一文钱，自有地方给补贴；二是买卖尽管亏赔，他手里捧着“铁饭碗”一只，不愁没饭吃，而且照样能当他的掌柜；三是独家买卖，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没有竞争，不怕倒闭……

可是武大郎早生了800多年，这三个条件，他一个也没有。其实他是开不成这样的酒店的。然而，当今却有了开这种酒店的条件，在用人问题上也确实有凡是比他“高”的都不用的“掌柜”。因而《武大郎开店》这幅画就产生了针砭时弊、发人深省的社会效果。

漫画所画，意其必无；知其必无，而故作认真，这在诗词中叫作“痴语”，在杂文中就形成谐趣。杂文这种议论体裁，贵在讲道理，于晓之以理、据理力争、理直气壮、顺理成章、以理服人的同时，不乏一点情趣，就使人不仅点头称是，且可会心微笑了。

1990 年 4 月 30 日

性 格 斗 争

郑超麟在他的回忆录里，用性格类型的冲突来解释某些斗争。过去只见过性格悲剧之说，而对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矛盾斗争持此说者，则不多见。

郑超麟，早年曾是中共党员，1929年完全转入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至今（1990年）在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

他于1923年到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他在分析校内中国学生间的斗争时说：

（“东大”有30几个中国学生）这是经过几次淘汰之后剩下的中国学生。最初，东大有几个中国学生呢？我不知道，但一定很多，至少比那时多二倍。他们恐怕从中国出发起就在不间断的内部斗争之中。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自然是斗争的对象。但斗争并不以此为限。思想的异同夹杂着个人的恩怨，公开的斗争夹杂着阴谋和诡计。从混乱中生秩序，从平等中分出领袖和群众，出令者和受命者。我们来到时，这个斗争已经结束了，失败者被排挤出去，他们回国后就退出了运动，胜利者也有回国的，但大部分留下来。我们只能从胜利者方面知道一点斗争情况，从他们谈话语气中又知道斗争的激烈程度。我不认识那些失败者，但从胜利者方面观察，从斗争逻辑推论，以及根据其他斗争经验，可以给我们来到莫斯科以前东大中国学生中间的斗争一个判断。这个斗争，从整个方面来看，并非全属私人无聊的斗争，也不是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斗争，而是当时学生中两种类型的斗争。一种类型是

敏感的，活泼的，聪明的，多方面的，好高骛远的，爱自由的，反抗威权的，但不坚定，性格柔弱，倾向于空谈。另一种类型则是顽强的，沉着的，果敢的，但迟钝，狭窄，知识短浅，崇拜威权，容易屈服于威权。在那时俄国场地上，这种斗争中前一类型人物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若以为这是一种阶级斗争，也未免过于夸大了，因为两种类型人物出身的社会阶级大体是一样的，虽然胜利者方面确有人从牧童或校役出身。论文化程度，失败者要比胜利者更高些。

没有纯粹的政治路线斗争；即主要是围绕政治是非之争，也必混杂着各种具体的人事、情绪、性格以至偶然的因素。更没有纯粹的性格的斗争，性格的形成不能离开出身、教养和社会地位诸文化背景，而在政治角逐中往往由中等文化程度获胜这个相当普遍于中外的现象是耐人寻味的。

郑超麟的分析未必妥帖，但提供了一个思路。物以类聚，而在胜利者一方中，有一个特点，是“崇拜威权”，个人或成为令行禁止的领袖，或成为绝对服从的受命者，这怕也是“在那时俄国场地上”特定的政治体制、思想氛围所决定的选择。

1990年5月15日

结 论 式 思 维

听说一位文学编辑评论《红楼梦》说：“归根到底，就是才子佳人嘛！”从论断说，没有脱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论的窠臼；而其思路使我想到了“文革”初期翻出的一句未收入选集的“最高指示”：“世界上的事情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那位编辑当时是个全心全意的红卫兵，对此自然铭刻在心，学会了由繁返简的概括。

孔子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具有同样的概括的力量。

从千头万绪的世事中，从三百篇长短作品中，抽象出四个字以至三个字的结论，是大家以至圣人的功夫。

精炼固好，简约亦佳，但结论只是前人思维的终点（或一个思维阶段的终点）；后人若不问这个结论是怎样产生的，不问它所根据的材料，就把这个终点当做自己的起点，那末由繁入简的“简”，就会导致简单化的。习惯于归纳，易倾向于封闭式的思维。若再进而习惯于简单地接受归纳的结论，往往会倾向于排斥生活原初状态的多样性，也就流于僵化了。

一切结论都具有局限性。“归根到底”和“一言以蔽之”的结论更是如此。

1990年7月23日

接近真实的斯特朗

30多年来，每当我想到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想到那次会上揭露的斯大林的暴行，我都要记起安娜·路易丝·斯特朗1956年写的《斯大林时代》。她旁听过莫斯科审判，是30年代她所谓“大疯狂”的见证人。她对血腥清洗的判断是：“他们很可能找到问题的关键是在于纳粹第五纵队确实广泛地钻进了保卫局机构，在于确实有许多暗杀阴谋，以及在于这些事情对一个疑心很重的人（按：指斯大林）所发生的影响，这个人看到了有人在计划暗杀自己，并相信他是用激烈清洗的办法来挽救革命。”

安娜·路易丝认为“这些行动不是清醒的，但是有许多人参加了，并且还没有认识清楚”。她的丈夫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死于斯大林的集中营里，她本人也在后来以间谍罪名被捕并驱逐，我几乎不能理解她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那种明显地倾向于为斯大林个人开脱的语气，我努力去理解这一点，不禁为她的不计个人恩怨的风格所折服。

直到最近读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采访回忆录——原书名《选择的时代》，中国对外翻译公司中译本改题《天下风云一报人》——我才了解了更多的情形，仿佛对安娜·路易丝也更多理解了。

索尔兹伯里不无同情地指出，安娜·路易丝是个“大块头小姑娘”，藏在她那身高六英尺以上、体格健壮、宽肩厚胸、雄赳赳气昂昂甚至大喊大叫的外表后面的，是“一个脆弱的小女孩”，但

“生活在巨人的世界里。她的幼稚无知几乎毁了她自己，恐怕还几乎毁了许多朋友和熟人，包括她忠心耿耿的老友密友米哈依·鲍罗廷”。

安娜·路易丝 1927 年在中国革命失败后，同鲍罗廷一起取道蒙古到了莫斯科。她留下来，跟鲍罗廷一起创办《莫斯科新闻》。在所写的书里和每年回美国讲学当中，她鼓吹共产主义，“但对她的朋友们在斯大林清洗中相继消失的事却绝口不提，（很可能）只顾自己咬紧牙关活下去”；她的书里提到的许多人，其中不少是她的朋友，后来一一在斯大林的清洗中死去，“安娜·路易丝对于这一切，不可能不知道”。

安娜·路易丝 1946 年到延安访问毛泽东，记录了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论述，写成《毛泽东思想》一书，畅销全球包括东欧，但是莫斯科不予出版。她没有注意到这意味着什么，在 1948 年 10 月又去莫斯科，想从那儿去北京亲眼看中国共产党接管政权，结果拿不到去中国的出境签证。她还是对莫斯科当时紧张的政治气氛毫无察觉，不但议论斯大林该跟铁托讲和，还说拿中国共产党人和俄国人相比，她更喜欢前者。老朋友怕招惹是非，不敢见她，只有鲍罗廷劝她不要介入禁区，她什么都不听。

当时，安娜·路易丝认为不给她出境签证，阻挠她去中国，是某些小官僚擅作主张，她声称要找斯大林告状。1949 年 2 月 7 日她被克格勃逮捕，2 月 19 日驱逐出境。她在公开场合仍然反复说她被驱逐是下边的事，斯大林并不知道。这种情形就如同斯大林精心策划的 30 年代大清洗期间，一些老布尔什维克临刑前还在喊：“要是斯大林知道就好了！”直到 1954 年——索尔兹伯里发表连载文章，披露有关鲍罗廷（已在 1951 年死于劳改营）、《莫斯科新闻》和安娜·路易丝本人的种种，1955 年——《真理报》宣布对她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1956 年——索尔兹伯里给她写长信介绍了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的罪行，这时候，安娜·路易丝还想说，

“我的遭遇”是“下级官员的诽谤造成的”，但她也承认，倘若斯大林支持这么做，无疑是因为她赞扬了毛，使全世界都知道了毛，“而斯大林当时还没有承认毛，也没有开绿灯”。她回忆起1948~1949年之际的一些迹象，她承认鲍罗廷当时对苏联官员的态度的担心，本来就该使她警惕起来的。

安娜·路易丝好像看清了过去发生的一切。她在1958年9月22日兴致勃勃地来到了中国。“安娜·路易丝在中国找到了自己的天堂，从此不再理睬美国。她在1949年就不理睬俄国了。她有了中国，她满足了，快活了，情绪高了。她全心全意投入中国事务，不停地写，写，写”。到了1966年，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安娜·路易丝并不理解，但她投身进去，“天真得像个见习生。她甚至佩戴红卫兵袖章出现在天安门城楼”。

中国在文革狂潮中发生的事情，对安娜·路易丝的最后打击是太沉重了。据索尔兹伯里叙述，这恍如“天堂的倒塌”，她尝到苦果以后，茫然若失。她想回美国，来不及了。她于1969年3月28日逝世。

老报人索尔兹伯里这样评价安娜·路易丝，说她“是美国一种宗教色彩很浓、理想主义色彩很浓的信仰的产物。她认定那是一场改善人类命运的伟大道义斗争，便豁出去以生命相许。她失败了，那并不是因为她缺乏热情；她在许多方面显得愚蠢，但至少她的目的在于要使后人生活的世界变得比她当日的世界更美好。”

关于安娜·路易丝·斯特朗，还能说些什么呢？我们还是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自白献给她吧：

“你最能原谅的一种缺点是什么？——轻信。”

1990年9月24日

纪念俞平伯老人

91岁的俞平伯先生，悄然撒手尘寰，撒下似了未了的公案。他的《读〈红楼梦〉随笔》十余万言，就是1954年从元旦至4月23日连载于香港《大公报》的。那些读过这一连载，并且关心过随后轰轰烈烈开展的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香港读者，该都已垂垂老矣，甚至不在了。正是“月到旧时明处，与谁同倚阑干”？

这使人不禁想起李希凡先生，他是最初向俞平伯文章“开火”的两个“小人物”之一，今天已不是“小人物”了。偶然读到他一篇长文，其中回顾了“建国后十七年的一切文艺思想斗争”：

当然，把文艺思想斗争搞成政治批判运动，这种做法是错误的……然而，我又以为，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却不能连文艺思想上的矛盾和斗争也搞平反昭雪，否则，那就等于在文艺界通过百家争鸣的方式开展思想斗争，也是不被允许的了。这样的“和平共处”，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坛，也是不存在的。我们的某些社会科学部门的领导人，热衷于给‘向资产阶级唯心论投降’的旧案平反昭雪，结果是在他们所管辖的领域，却自动解除武装，纵容、包庇了一大批‘精英’的猖狂活动，不折不扣地显示了向资产阶级自由化投降的严重恶果。（《“文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当代文坛》1990年第3期）

李文最后所指，多半与1986年初举行的庆贺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的集会有关。查一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先生在会上讲话中有这样一段：

早在 20 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来是正常的事情。但是 1954 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应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的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 40 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我们党坚持四项原则，按照四项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1954 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接受这一类历史教训，我们要在学术界认真实行双百方针，提倡在正常的气氛下进行各种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和辩论，团结一切爱国的、努力从事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的学术工作者，共同前进，共同追求真理。在纪念俞平伯先生从事学术活动 65 周年的时候，我想，说一下这个问题是必要的。（《文学评论》1986 年第 2 期）

这番话无甚胜义，却不失为通情达理的持平之论。现在看来，我的朋友李希凡是不同意的。四年以后的上文所云，自亦是一家之言；然其同仇敌忾之情，灭此朝食之概，则非仅针对俞平伯先生，且针对“某些社会科学部门的领导者”，又涉及对“一大批‘精英’的猖狂活动”的包庇、纵容，就更加非同小可。李文发表的三月份，俞平伯已中风，即使不中风，也未必看到；而老人遗嘱不开追悼会等等，真可以说是世事洞明，解脱了有关人士的尴尬，也得以抽身局外，“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洒脱得很了。

俞平伯先生将近一个世纪的生涯，倘说也有过春风得意，当只是“五四”以后出手清新的诗和散文向旧文学营垒挑战，并开始《红楼梦》研究，参与“新红学”奠基的短暂时期。而终其一生，似乎多也不像是作为资产阶级代表高坐“受降城”上的霸主，

而更像一个误泊狂涛的失败者，尤其是从他后半生的遭遇来看。

说起失败者，记得鲁迅 1927 年秋由广州经香港去上海时写过：“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革命文学》，《而已集》）

此文发表于 1927 年 10 月，沧海桑田，鲁迅当时所指的“最痛快而安全”的“革命文学家”，被他们“革命”的失败者，还有那时的强暴者一起，都已息影舞台了吧。连 1927 年 12 月出生的李希凡先生，都已将届六四高龄，接近 1964 年俞平伯老人写作最后一篇评《红》文章时的年纪了。——逝者如斯夫！

1990 年 10 月 29 日

我代表我自己

据说一位首都的服务人员自豪地说：“在外地人面前我代表北京，在外国人面前我代表中国。”她的仪表和服务态度都符合训练标准。乍听她对记者说的这番话，仿佛听到五六十年代“红领巾”在学雷锋时天真热情地自律；再一想，这样的豪言壮语，我是说不出，更做不到的。

真是惭愧得很。作为北京人，我不能代表北京；作为中国人，我也不能代表中国。

北京市的市长，则不但有权代表北京赠送熊猫给外国城市，而且可以在接待外国一些城市的代表团时，声称自己代表北京市民，也就是一千几百万人；确是大言了，但可以不懈，他有“法理”根据，他是经由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的。不管人们对选举程序看法怎样，至少没有人对这位市长的合法性正式表示过怀疑，也还没有人提出弹劾或罢免。

同理，中国的政府首脑，只要没有下台，就有权声明自己代表中国人民——从八九亿到十亿到十一亿几千万的中国人民。既代表中国人民去同外国打交道，又代表中国人民领导中国人民。中国政府首脑同时总是中国共产党的首脑，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一切实行领导是写入宪法的。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按照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提法，工人阶级是“通过共产党”进行领导的。所以，工人阶级代表着中国人民长远的和整体的利益，通过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国人民。这样，当

中国的党政领导人说自己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如何如何的时候，不是完全合乎逻辑顺理成章的吗？难道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吗？

而我代表不了一千几百万北京人，我代表不了十一亿几千万中国人，我更代表不了上千万公务人员构成的中国各级政府，代表不了五千万党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

我只代表我自己。

谁又能代表我呢？声称代表全中国人民的人，代表的只是包括我在内的十一亿几千万中国人吧，怎么能代表得了作为中国人民十一亿几千万分之我的七情六欲，我的意志和愿望，我的非和爱憎呢？具体的我，何尝想过给这个国家元首打贺电、给那个政府首脑打唁电呢？那个成天被代表着的，包括在全中国人民中的我，其实是个抽象的我；而那个成天被代表着的包括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想来也是人民的抽象吧？

我以为，我只代表我自己，而且，只有我代表我自己。自己的代表权，是没有人能替代的。

至于有时候据说我不属于人民的一员了，那末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民中不包括我，声称代表全中国人民者也就自然不负代表我的劳什子责任了；此时，自然是我自己代表我自己来接受各种惩罚，消化各类惩罚的“果子”。也往往在这时，我又总是被指为“代表”国内外反动势力，对于这种虚名儿，如同对别的好人好事的代表权一样，我都只能说：不敢当！

少年时代，的确想要代表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思想和感情，做人民的代言人。几十年过去，我想老老实实承认，我只代表我自己，我只能说我自己的话。如果有人因我的话有所共鸣，引为同调，那是由于我们同生在这片土地，并操着共同的语言的缘故，然则亿万人中，我还不算“个别”的角色，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1991年1月6日

下海与挨骂

戏剧界的话，把从“玩票”到以登台演出为业，叫作“下海”。过去把头面人物“附逆”——当汉奸也叫下海，大概是区别于“落水”之或属无意失足，而表明那是一个脚印一个脚印地主动到海滩到水里的吧？

汉奸也有各种档次，地痞流氓穿上“皇协军”的制服，“白面客”向日本宪兵队告密，这一档的大约不值得花费时间精力去研究。但像周作人这样有学问有思想，也有影响有声名，乃至曾经博得一代人尊敬的文化人，下海当了汉奸，人们唾骂之余，自不能不问：这是怎么搞的？

倪墨炎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周作人的评传，也探讨了导致周作人屈膝事故的思想危机：他是一个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历史循环论者（他相信“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由历史的虚无感走向人生的虚空），一个丧失民族自信力的人（他说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丧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和希望”），一个中日对抗中的“必败论”者（他认为中日两国力量悬殊，对日作战是不可能的），一个对现实从不感到逃避最后正经地宣布“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1939年元旦遇刺未死但失去行动自由后，不到半个月就出任第一个伪职，并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事实上不能不当。”接着很快地陷了下去。

评传作者对周作人思想的剖析比较切实，来龙去脉是分明的。从这本书里，我还读到一些从未收入周作人各种文集的东西，即

他担任伪职期间的讲话一类引文。例如 1942 年 12 月 8 日他在“新民青少年团”成立大会上的长篇演说，解释所谓《新国民运动实施纲要》，关于“重道义”，他说：“就是崇尚东方传统的文化精神，肃清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功利思想，灭私奉公，谋求全体的幸福，更须明礼义知廉耻，培养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我感兴趣的，是他这样侃侃而谈时的心态：以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洞察，他不知道在这里不是一般地说套话空话废话，而是在扮演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角色吗？以他对人情世态的常是深入的透视，他不会不知道自己的汉奸身份，竟能不因此感到羞耻吗？

在惩治汉奸的时候，量刑轻重自然应该根据罪恶的大小，也就是干的坏事的多少，有所区别。然而在全民族抗日战争中，当汉奸是头等的坏事，一成汉奸，便是坏人，这用不着多少学问，凭常识可知。因此汉奸不可当，连小孩子也懂，周作人能不懂吗？

明知是浑水还是要，这是明明白白深思熟虑下了决心昧着良心做的选择。这种现象不光发生在周作人身上，就如不论什么社会制度，都公认贪污受贿是坏事，而那些过江之鲫似的贪官污吏难道是胡里糊涂上的贼船吗？

明知是坏事还是要干，这是自觉的坏人的特点。至于怎么干，当然各有巧妙不同。有不少要把自己干的坏事粉饰为大大的好事，为国为民的，而一切批评指责乃出于误会，或不明事理，甚至是蓄意攻讦。大家看看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的日记，就充满了自欺欺人的“救国救民”梦呓。周作人侈谈什么“个人捐弃其心身以至身命，为众生谋利益”，自然是往脸上贴金，而在此之前，多次为古之秦桧翻案的文章，更是聊以自解了吧。

拜读秦牧先生一篇近作（2月5日《今晚报》）。他引用了戏曲中一个奸臣的“定场诗”：“别人笑我做奸臣，我做奸臣笑别人。我须死后才能骂，别人生前早亡身！”这是好诗，比“笑骂由人笑骂，

好官我自为之”更上一层楼了。论者举康生为例，此人的确是直到“死后才挨骂”的，而被他陷害的人，却是一批一批“生前早亡身”了。

康生，压根儿是坏人抑或后来堕落的，不大清楚。周作人现象总还该说是好人变坏之例。周作人不如康生之侥幸，因为他没有及时死去，他是生前就挨过许多骂了。今天追寻其“下海”和堕落的足迹，不是为了斥骂和“鞭尸”，而是探讨他在哪里失足，哪些弱点造成他的千古恨，可以使我们了解黑格尔所谓的“这一个”——共性寓于个性的典型。周作人没有留下塑造人物形象的小说一类叙事作品，但他以一生经历把自己塑造为中国动荡期的一种典型人物，也算是个贡献吧。

1991年2月7日

如果太平天国不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从 **1851** 年开始,这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的农民大革命,经胜利进军,定都天京,内讧分裂,直至天京失陷,历 **14** 年而失败。今年适逢其金田村起义 **140** 周年,据说要纪念,自然有许多文章可做。我想的却是,如果太平天国不失败,又当如何?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苦战两年,破武昌,入江宁(南京),改称天京。那时西王、南王已经战死,除了天王洪秀全外,还只有五个王(东王、北王、翼王,加上新封的燕王、豫王)。王不算多,但每个王都有千人以上的僚属和侍从;衣食住不说,行也已很排场,天王的轿夫 **64** 人,东王的轿夫 **48** 人,依此类推,官员出行,军民回避,好不威风凛凛。从天王称“万岁”,天王长子称“幼主万岁”,天王长女称“王长金”,到各王及丞相下至两司马,连同他们的子女,都规定了等级森严的不同称谓,许多名目是过去朝廷所没有的创造发明。

半壁江山坐了三年,就在 **1856** 年多事之秋,发生了北王韦昌辉的叛乱、东王杨秀清的被杀、翼王石达开的出走三件大事,搅在一起,内讧连绵,元气大伤。洪秀全觉得满朝皆不可信,随即陆续把他认为可靠的两个哥哥和 **10** 个侄儿都封了王,后来又封陈玉成、李秀成等异姓王,实在是因为人心不服,用来堵嘴。

这时候的太平天国,尽管面对着压境的清兵,而天京朝内,一锅粥的争权夺利,谋官求爵,“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未

足”，然而哪有那么多金交椅呢？只得为神造庙，设立了六等封爵，叫“义、安、福、燕、豫、侯”，犹如公侯伯子男；又添设了仅次于王爵的“天将、朝将、神将”等名份。加官晋爵，成了太平天国领导人用来凝聚内部、平衡矛盾的仅有的办法。到1861年，天王已封了100多个王，而到1864年天京沦陷时，已经有2700多王！

这样，太平天国成了不折不扣的太平“天国”、太平“官国”。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像太平天国这样进城不久就从上面开始蜕变腐化，倾轧火并，分崩离析，行政则贪污受贿、庸碌无能以至胡作非为，军队则纪律废弛、劫夺掳掠以至滥杀无辜，且不说军力能否与敌抗衡，单是大失民心，又怎么能不失败呢？

但我们还是假设一下：假如没有太平天国的失败，假如太平天国能突破国内外反革命势力的联合围剿，甚至奇迹般地胜利攻克北京，统一全国，又怎么样呢？那不过在二十五史之下增加一个新王朝，是取大清帝国而代之以太平天国，换一套王公贵族官僚班子，依然是封建王朝国家机器的统治君临天下，也就是毛泽东所说“被地主和贵族利用去了，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罢了；然则，太平天国即使胜利了，也只是太平“王国”、太平“官国”的胜利，曾经参与或拥护起义的普通农民劳动者无与焉。

刘邦、朱元璋都是靠农民起义起家，然而我们不纪念他们，因为起义队伍胜利了，把他们捧上了皇帝宝座，而农民实实在在失败了。太平天国失败了，我们才来纪念它：“天国春秋”，一场悲剧。悲剧中的角色却各不相同。前后20年中恪守誓言、流血牺牲的起义农民是一种人，是悲剧的主角；直接间接因而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人民群众自然也是悲剧人物；至于从洪秀全以次一些人，各有功过，他们的有些过失可以归之于阶级的局限性和历史的局限性，另有一些做为，便是不能以“阶级局限”和“历史局限”自解的罪行了。

本文列举的史料，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自是经过著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筛选过的，不同于过去“反动学术权威”们有诬蔑农民起义之嫌的著作之所云了。

1991年2月9日

评“电线杆情结”

也见过慷慨激昂，也听过豪言壮语，但只有这一句，“哪怕有一天被吊在电线杆上”，听了不免愕然。

问君何出此不吉之言？

相形之下，前人的“革命何须怕断头”，“头颅掷处血斑斑”，虽也悲壮，却因斩首之刑早废，似只是一种修辞方式；电线杆云云，指称具体，因电线杆到处可见，即景生情，真仿佛随时随地准备牺牲。

然而所谓“吊在电线杆上”又是典从何来呢？

中国久不见这类事情。20年代古城北平捉到侵犯梅兰芳宅的抢匪，明正典刑后曾枭首在电线杆上示众，就在前门外西河沿地方。但那不是吊人，只是挂的首级。

“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把中国抗日军民吊在树上的事不少，多在农村，那时的农村还很少电线杆。

从电影中看，纳粹德国军队所到之处，把法国的、奥地利的、东欧和苏联各地的爱国者和抵抗战士，吊在电线杆上，或非刑拷打，或处死悬尸，至今令人发指。

但指天誓日，甘冒“吊在电线杆上”之罪的，不是对于法西斯卷土重来、大举入侵的精神准备；我想，那是取例于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

那次匈牙利事件当时和事后，最耸人听闻的莫过于据说有人把共产党人吊在电线杆上了。

1956年波匈事件，是战后社会主义阵营首次遭到的最大挫

折，也是战后国际共运中除有些党竞选失利外遭到的最大挑战。

30 多年过去，留下最深刻的印象，除了“吊在电线杆上”的图景以外，就是对有关文件的学习和讨论。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扩大）讨论写定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总结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是由于民主既没有搞好，专政也没有搞好，换句话说，民主搞的不像民主，专政搞的不像专政。我理解这就包括对人民实行专政的错误做法在内。

时刻警惕着，做好应变的准备，这是连每个机关工厂的值班看门人都应有的心理态势，不可目为自相惊扰。但是把国内形势估计为四面楚歌，一触即发，且时时处处有被吊在电线杆上的危险，这不是散布一种失败主义情绪么？

试问：在您当众倾诉“哪怕有一天被吊在电线杆上”也要如何如何的时候，不是表明对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失去信心么？不是表明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失去信心么？否则为什么自居于穷途末路、众叛亲离、势单力孤，难免于“被吊在电线杆上”的位置和命运呢？

这可以称之为“电线杆情结”。表层是对风云变幻的惊慌失措，深层是对事业和前途的沮丧与失望，而不过以慷慨赴死的姿态出之。

这种“电线杆情结”不利于心理健康，也不利于生理健康。但不是一般的心理谘询所能解决的。治之之道，是要正视自己豪言壮语后面的内心真实；看看无畏是不是夹杂了畏惧，坚定是不是孱进了迷茫，堂皇理想是不是掩盖着私心？否则，看不清自己，也就更难看清身外的世界，看清历史和未来了。

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不能越俎代庖，也不能“以意逆志”。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除“电线杆情结”，还得靠有这种情结的人自己。

1992 年 1 月 16 日

论“只剩下一个人”

1952年纪念包括维克多·雨果在内的四位世界文化名人，人民文学出版社赶着出版了闻家骅先生译的《雨果诗选》。篇幅不大，其中就有《最后的话》，读后不忘。最近通读了沈宝基先生译的《雨果诗选》（诗苑译林之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收诗百首，这首诗题译为《我最后的话》，注云：1852年12月，帝国正式成立后，拿破仑第三同意流亡者归国，但必须悔过，并保证日后不作危害政权的举动。对此，雨果写下这首著名的诗，表示自己决不妥协的决心。

1851年，拿破仑第三发动政变，在血泊中建立第二帝国。雨果是在同社会民主派一起反抗失败后被迫去国，成为“伟大的流囚”的，当时他已50岁。1853年12月2日写于大西洋中英属泽西岛的《我最后的话》，共16节，最后两节是这样说的：

哪怕没有尽期，我将忍受艰苦的流亡，
我不想知道，也不考虑
原以为坚定的人，是否已经屈服，
许多不该走的人，是否也要离去。
如果只剩下一千人，那千人之中有我！
如果只剩下一百人，我还要继续斗争下去；
如果只剩下十个人，我就是第十个；
如果只剩下一个人，我就是那最后的一个！

雨果，这“最后一个”，直到1870年第二帝国垮台，他才重返魂牵梦萦的法兰西，回到巴黎。他被迫流亡国外19年，归来已

近 70 岁，满头霜雪了。

正如诗人晚年在全集总序中所说，一部书有它自己的生命。一首诗也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总是反映出作者的面貌。记得初读雨果这首诀绝的诗、“最后的话”时，我就为他那崇高的信念、沉着的悲愤，以及坚定的尊严铸成的人格精神所震慑了。

回顾我所经历的年代，不能不想起硝烟战火中与阵地共存亡，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战士。这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永远敬仰的。

然而我最近读到一篇文章，勉励“现在二十一二岁”的“同学们”“做好准备，像毛泽东所说的，在斗争中，不能被困难压倒，而要压倒困难；不能被敌对势力压倒，而必须把敌对势力压倒，哪怕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

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吗？真使人想起张国焘吓唬工农干部时说的，“马克思说‘无风不起浪’”。妙就妙在“哪怕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像孤臣孽子的模样了，然而这是在号召“你们要为党、为人民、为整个中华民族而奋斗”，那末，是整个中华民族、全民全党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呢，还是整个中华民族、全民和党都已先于“你们”而被“困难”和“敌对势力”压倒，只剩下“你们”了，——而“哪怕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则“你们”的“们”亦不复存在，只剩下“你”“一个人”在“坚持”了呢？

一幅多么可怕的景象！比起预言核大战发生，中国几亿人口死去三分之一或一半还要“彻底”，还要“干净”！请问，这是不是夸大“困难”和“敌对势力”的力量来吓唬我们现在还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同学们呢？

我们过去是、现在还是以民族的、人民的解放，进而以人类的解放为自己的理想，并这样勉励年轻人的。如果整个中华民族，11 亿人民，包括 5000 万共产党员“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果然，则最后“一个人”也必定会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就

是说全人类的五分之一从地球上消灭了，那还侈谈什么民族、人民以至人类的解放呢？假如整个中华民族、全民全党并没有遭到灭顶之灾，却只有“你们”在那里孤军作战，“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那究竟说明什么？是你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全民族都后知后觉？是你们为民族为人民为党献身，全民族无情无义作壁上观？还是你们在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外别有自己的利益，以致不能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呢？如果在一个 11 亿人口的大国里，能和大多数人站在一起，何至“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呢？整个中华民族，全国人民和全党党员，怎么能眼看着“敌对势力”把自己人“压倒”到“只剩下一个人”呢？这篇文字的作者还用不少篇幅谈“依靠群众”，不过从他立志“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来看，显然，没出息的“群众”也依靠不上了。

先生之言，壮且烈矣，但“现在二十一二岁”的“同学们”若轻信了这一套，恐怕就会对“人生路上还有五六十年、六七十年”的未来，发生悲观和失望，以为整个中华民族不足恃，人民不足恃，党更不足恃，“哪怕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底”，这“一个人”的“底”当然不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底”，那真不知伊于胡底了。

随笔写来，就扯远了。回到雨果的话题上来，雨果虽在特定情况下作过“我就是那最后的一个”之语，但他绝然不会同意百多年后某个人要年轻人立志“战斗到只剩下一个人”。因为雨果有信念，有理想，有对暴君的憎恨，也有对祖国和人民的愛。虽然他并不自诩为“坚定的革命者”，但他相信“尽管那些统治者在国内用暴力，在国外用威胁，什么都干得出来……为正义与真理而斗争的人，还是有办法圆满完成他的任务。”“恶行的力量虽然无比强大，到头来只是枉费心机，落得一场空。”这是雨果 1853 年在泽西岛为《惩罚集》写的初版序，此集收集了他愤怒声讨拿破

仑第三的政治诗,《我最后的话》就在里边。这是很值得大家一读,不限于“现在二十一二岁”的同学们的。

1992 年 2 月 9 日

桃花与血

去年3月过上海，住在漕溪路，就近上龙华看桃花。来早了，桃花未开。在龙华烈士们的遗照旁边，抄写着那首传诵很广的狱中题壁诗：“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在萧三编的《革命烈士诗抄》1959年4月初版本里，收入此诗，题作《龙华殉难者狱中遗诗》，说是1935年有人被囚于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从墙上看到的，作者佚名。

作者终于找到了。是30年代一度被关在那里的张恺帆。张恺帆没有死，不然就不会有1959年反右倾时的“张恺帆事件”了。

张恺帆1959年是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7月4日到无为县检查工作。他感到最突出的问题是公共食堂不能再办下去了。9日在新民公社王福大队，向队干部和群众宣布“三还原”：吃饭还原、住房还原、小块土地还原。当晚就要县委书记予以贯彻。到7月15日，全县6000多食堂就“一风吹散”了。他还叫县委对公社化前后有关劳动力、生产资料、房屋、干部作风和发病率等情况的变化进行调查。

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时候，庐山会议正开得紧张。到了8月4日，安徽省委把有关这件事的专门报告送交在庐山开会的第一书记曾希圣。曾希圣报送毛泽东。8月10日所作批语开头就点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央委员会里有……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这500多字的长批，据一位过来人说，

“极为严厉，上纲上线，惊心动魄，不仅影响山上批斗升级，对全国影响，极为深远。”

我在“文革”中传抄的材料里读到过这件批示，初知张恺帆之名。1977年在皖南皖北一带，听到许多干部群众传说张恺帆罢官以后的种种，原来他是战争时期就在当地工作的，了解真实情况，解散食堂是为群众办了好事，口碑很好，为此受过，得到广泛的同情和崇敬。

我以为张恺帆得以在30年代出狱，继续从事革命工作，这是幸事；尽管他那首题壁诗因此不再收入再版的烈士诗抄，而“墙外桃花墙里血”云云，折射着殉难者的高风，也表现了幸存者的赤诚。我们宁愿少一位被称为烈士的死者，多一名为人民说真话、办实事而同样不怕牺牲的生者。

我由张恺帆而想到许多先后在刑场、战场上为民族的人民的利益流尽最后一滴血的烈士，如果由于同志的营救、人民的援手，能够像张恺帆那样活下去，在像1959年那样的时刻，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的。

我们常常提起先烈，也许因为时间渐渐地久了，血痕渐渐地淡了，人影渐渐地远逝了，模糊了，先烈二数字化成一个抽象的概念。然而我们要说他们依然活在我们心中，那我们就得调查，这一位烈士或那一位烈士如果活到今天，他在这样那样的重大课题前，会怎么想，又怎么做？

在千千万万的先烈中，也有死于“自己人”之手的。如1932年到1934年夏，王明派往湘鄂西根据地的中央特派员夏曦，从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出发，破坏党内民主，连续发动四次大规模的“反改组派”斗争。据贺龙的《回忆红二方面军》一文追忆，仅在洪湖就错杀了一万多人。其中就有因“我失骄杨君失柳”一句而闻名于身后的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直荀；还有红三军九师师长段德昌，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颁发的“革命烈士证”（第一

号)的授予对象。

可设想起千千万万英烈包括柳直荀、段德昌等于地下，他们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左”会怎么看？自然，夏曦死在长征途中，早在延安时期也就列名于烈士之林了。他如活到今天，持什么态度，我们无从想象。不过，如夏曦者总是极少数吧。

1992年5月21日

画 薈 小 集

遮 羞 布

过去的文章常常致力于撕掉论敌的遮羞布。
现在的文章往往有意无意撕掉自己的遮羞布。

论 伪 善

伪善好不好？

伪善者，真恶也。当然不好。

恶是其实，善是其表。伪装为善，惑世欺人。

然而伪善也不无可取。

伪善之言，无用；伪善之行，可嘉。

伪善之行，胜过赤裸裸的为恶。

只要不惑于它的伪善，清醒地知道伪善下掩盖着什么，提防着继伪而来的赤裸裸的恶行。

请 君 入 瓮

读唐代故事，至“请君入瓮”而大快。

那就是把施于人者施之于施于人之人。

什 么 作 用

据调查,14所中学近千名学生中,有1.7%迷信求神问卜。一个女生算卦说几日内有灭顶之灾,吓得请假在家,不敢出门。考试前两周女生就不再换洗衣服,男生就不再理发,怕犯了禁忌考试失利。

某报报道时标题是:迷信书籍增多带来副作用。

那末,迷信书籍增多带来的正作用呢?

学 习 与 遗 传

列宁在共青团十大提出:“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口号,号召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武装自己。

工人运动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这也是经典的论断。

要掌握任何知识,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思想体系,靠学习,不靠遗传。

何况母体中并无带有马克思主义的M—3染色体。

敏 感

诗人敏感于春风秋雨。春愁秋思,风花雪月,草木虫鱼,山色有无,城郭今昔。

小说家敏感于人情世态,兴衰炎凉,宫闱秘事,市井繁华,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音乐家敏感于黄钟大吕,宫商暗换,曲终人杳,绕梁三日,如泣如诉,如怨如慕。

政治家敏感于战略战术,纵横捭阖,笼络人心,自塑形象。

金融家敏感于出盘收盘，行情变幻，银根头寸，市场风云。

官僚政客敏感于靠山后台，枕头裙带，实力消长，羽翼丰薄，耳目心腹，密折敌情。

奴才皂隶敏感于主子眼色，一瞥一咳，门包轻重，关系亲疏，盛时门庭，衰时后路。

妓女敏感于嫖客的笑谑，扒手敏感于行人的荷包。

古往今来，富贵贫贱，盖无往而非敏感人物矣。敏感是正常的，过敏是异常的，由神经过敏而神经衰弱，则属病态，或流于痴，或濒于狂，渐失清醒，幻象环生，就非一般心理咨询所能解决，须即刻就医彻底诊治了。

忧 与 扰

一个低年级小学生朗读一篇文章，迸出“扰国扰民”四个字。

“扰国扰民”值得称诵吗？

然则是把“忧国忧民”认为“扰国扰民”了？

老师怎样纠正误读？——用心是“忧”，动手为“扰”？“忧”与“扰”只有一笔之差么？

不 须 求 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稍涉文史的人都知道，这是屈原骚赋中的名句。

即使只读现代文学作品的人，也都记得这曾作为鲁迅小说集《彷徨》扉页的题词。

北京的鲁迅文学院，在 80 年代初期建院时，就把这句高悬门庭，这既是对鲁迅精神的继承，也是对民族文化遗产中优秀精神的继承。

星移物换，人事变迁，这个题词也被撤掉了。据说撤掉之前还有争论，争论之后还是撤掉。

“路漫漫其修远兮”，有什么可争论的呢？不是今人也说要进行“新的长征”吗？可见所争在“吾将上下而求索”。

求索云云，屈原则可，吾辈则不可。

屈原时代，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所以才需要求索啊。

如是我闻。

夹塞现象

在车站，抢上占座，在邮局柜台，蜂拥钻挤，在菜市场，排队夹塞……可以统名之为夹塞现象。

不守秩序，不按步就班，不讲先来后到，是对“论资排辈”论的反驳，还是有你无我的争夺？

这种现象，在强调竞争，强调个人奋斗的资本主义社会倒是少见的，大约不姓“资”。那末，难道就姓“社”么？

在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的三四十年间，并不是一贯普遍如此的。

我想，成为社会风气的道德文明面貌，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姓资姓社；它反映的是社会文化素质的一般，而归根结底，日常生活中的的人际关系，也是由社会结构中的利益关系决定，并通过人们的心理表现于行为的。

从签名到不落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在老解放区和进城初期，有一个传统：给一个同志作民主鉴定，开完会写成定稿，大家是一一

签名的。

也许当时大家都天真单纯，容易取得一致，也许当时大家习惯于不持异议，容易放弃个人的意见。总之，签名表示负责。

后来不同了，只有笼统的“全体一致通过”或只是“通过”，却不见落下姓名。即使付诸表决，也不写明谁投赞成票，谁投反对票。时间久了，档案虽存，已成无头公案。嗣后，到处可见的集体负责——集体不负责，便是这样逐渐演化出来的。至于划圈，则是以含糊的态度表示明确的无态度，干脆不负责任。

主义和主意

一个好主义，也许敌不过几个坏主意。

为了打倒一个坏主义，需要多少好主意？

智 与 愚

大智若愚：有没有大愚若智？

语言和面目

语言乏味、面目可憎常常并提。

加西莫多面目丑陋，心地善良使他并不可憎。

可见面目的可憎不决定于五官的搭配。

语言乏味则可使面目减色。

语言比面目更具影响力，比面目更直接地表现人的气质、智力、思想、感情。

语言虚假使面目失真，甚至可恶。

禁 与 不 禁

客：人一吸毒，就什么羞耻心都没有了，什么人格都不顾了。

主：有人不吸毒，也没了羞耻心，也不顾人格的。

客：那是另一种吸毒的结果吧。

主：但那好像不在必禁必戒之列。

婊子与牌坊

石头比肉体更为永久。于是有人“又要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殊不知肉体化作泥、化作灰、化作干尸以后，假如没有牌坊，也许人们会渐渐忘记其生前“当婊子”的行状；而有牌坊在，时时提醒人们，曾有过“又要……又想……”的那样的入；人们不会只诵读牌坊上的“贞洁”字样。

中国式的贞洁牌坊，于是变成西洋式的耻辱柱。自以为得计者其实大失算——如意算盘往往是不如意的。

暴 发 户

在一篇什么文章里，柏杨说台湾是充满了经济暴发户、政治暴发户、文化暴发户的地方。

暴发户之说，若干年前就有了，多指忽发横财的人家，固然为贫苦的或仅能维持生计乃至处在破落中的人们所侧目，也为原先殷实的富户所歧视的。

政治暴发户，是引申而来。应是指夤缘时会忽上青云的新贵，大约海峡两岸取义相同；我们这边在“文革”中不是有所谓“乘直升飞机”的说法么？

至于文化暴发户，则不甚了了。一是因为台湾的文化情况多年隔膜，再就是不好拿我们这边的情况去比附、去坐实。利用“文化”而发财的，如大卖黄书的书商，现在不少，似应归入经济暴发户；利用“文化”而升官的，如大家熟悉的姚文元，似应归入政治暴发户。然则，文化暴发户是指在短期内突然从“没文化”进入“有文化”状态的人吗？有这种“文化速成”吗？

志以存疑，待向高明请教。

没有最后

最后：这是很诗意的。

戛然而止，惊心动魄。水落石出，一切大白于天下。这就是结论，更无下文了。囊括世界。结束历史。

余音绕梁，令人低回久之。然而余音也在这“最后”之内。余音之后再无余音：最后的余音。

这是最后的斗争。斗争的胜利则是最后的胜利。

谁笑在最后，谁笑得最好。最后的笑是无可更改的，永远的笑。

然而，事实打破了这诗意。

没有最后。

无始无终。

如有永远，便是永远的未竟之业，永远的未完成的杰作。

“最后一幕”，并不是最后一幕。

“最后的笑”，并不是最后的笑。

“最后的斗争”，并不是最后的斗争。

“最后的胜利”，并不是最后的胜利。

正如同没有终极真理，没有最后的结论。

说什么“最后的贵族”，之后又出来新的贵族。

然而，但丁被称为旧时代最后一个歌者，同时又成为新时代第一个歌者。

时间没有最后。历史没有最后。

一切都是过程，一切都是过渡，一切都只是一瞬。

无数的一瞬，无止无休，即是永恒。

1991 年—1992 年

读《我与胡风》随记

一

1955年6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编辑、由人民出版社作急件出版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第一次印刷即达70万册。随后在反右派运动期间编入《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阅读文件汇编》（作了若干删节）。这本书的序言和按语，在后来“文革”中并曾由一些群众组织单独印行散发。这本书成了指导政治运动的方向、战术和策略的“干部必读”乃至“群众必读”，对一代文风和政风发生过深刻的影响。^①

在第二批材料中有一段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定性的按语是当时家喻户晓的：

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① 1977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收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部分按语，广大读者始知出于毛泽东的手笔。

而从 1980 至 1988 年间中共中央三次为胡风案件平反的文件表明，胡风和被定为胡风分子的 78 人中，没有一个是具有严重问题的，没有一个特务，没有一个托派分子，没有一个反动军官，没有一个叛徒，也没有一个汉奸。最后，并撤销了加在胡风头上的关于“五把刀子”、“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等错误论断。

当年发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批、两批至于第三批，加按加注，是为了教育读者，因为“这一切，成千上万的善良人是不知道的”。现在彻底平反了，然而错案是怎样铸成的，成千上万的善良人也还是不知道。

《我与胡风》收入了 37 位作者的回忆文章，从受害者的角度多少回答了这一问题。除了吴奚如、楼适夷两位老人外，作者们大多数曾被那本叫作“材料”的书点名；自然，他们不是被点名者的全部，因为如阿垅、吕荧、冯大海、张中晓、彭柏山、方然、伍禾都没能活到可以自由呼吸的一天。从这些作者或激动、或冷静地陈述他们卷入胡风一案的来龙去脉和嗣后的痛苦遭遇中，可以了解胡风其人，他的工作实践，他的政治立场和艺术见解，他与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他与各种类型的作家、与富有艺术潜力的青年作者们的关系；在这些社会关系中表现出他特立独行的品质以及某些性格上的弱点。有人不无深意地说胡风“怀着复杂的思想感情进入新社会”，而我们恰恰看到他在运交华盖的许多年里一直保持着的单纯和天真；用“书生气十足”来形容他该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所谓“集团”中的其他人也一样，如果不是更加单纯和天真的话。

读了《我与胡风》，才能基本上读懂《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中摘引、剪裁和由注解、按语点染的那些“胡风分子”们在不同时期来往的信件。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也不失为对那本书的不可少的补充读物。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1988年6月18日所发的第六号(1988)文件中说,“对于胡风同志的文艺思想和主张,应按照宪法关于学术自由、批评自由的规定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这个多年来反复申述的原则由于第一次声明同样适用于多年来被排除在“革命人民”之外的胡风,仍然引起某种新鲜的感觉。

有感于此,王戎在《往事非烟》中问道:“有些人说,如果胡风不写三十万言书,冤案是不会发生的。然而,如果解放以后,能够出版胡风的全部著作,对他的批判能够公开进行,同时胡风能够有向广大读者公开答辩的权利和机会,他会写三十万言么?”

我以为,即使胡风不在1954年向中共中央送达有名的但至今广大读者仍未能见其全貌的“三十万言书”(题为《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一场针对胡风和长期所谓“胡风派”的政治批判也是难以避免的,不过时间迟早而已。

从1955年3月间印发大家学习的一份有关“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文件材料来看,基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了”的政治形势分析,开展“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是既定方针:这是继1951年10月所发动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后的进一步深入。于是长期“在各个学术和文化领域中消除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任务”,落实为“从1954年10月开始的对胡适、俞平伯和胡风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在这里,胡风以其“文艺思想和主张”,曾经在30年代中期以来左翼文艺运动内部意见分歧背景上,引起过

1948年他同在香港的某些党员评论家的论战。到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后以迄1952年~1953年“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他被迫写了一篇没有被通过的检讨，因此没能“解决问题”，而他在文艺界和读书界仍然有广泛的影响，这样，此时此刻胡风被选作受批判的“代表人物”，几乎是顺理成章，无可替代的。后来，对胡风的批判掩过了对胡适、俞平伯的批判，致使原定同时开展的对梁漱溟、梁思成的公开点名批判暂停，可能出于领导方面“集中优势兵力”的考虑，也可能由于胡风所涉及的现代文学比其他几位从事的专业，在进行批判时更便于向广大群众宣传。上述文件就曾要求省市以上的党委和国家机关、群众团体的党组“必须注意领导和开展这种思想斗争，并且用各种方法使它的影响首先扩大到党内外广大知识分子中，然后普及到广大群众中。这种工作做得愈好，愈加能与实际工作联系起来，愈加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就对实际工作的帮助愈大。”几乎就是从有关材料发表的1955年6月起，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时，由各地各部门纷纷揭露出各种“小集团”，随后就进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肃反运动——思想斗争促进了实际工作。

而从绿原和其他几位与胡风过从较密的朋友的回忆看，胡风对于事态的这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其实是精神准备不足的。他只是“忠心耿耿”地寄希望于中共中央，期望中央领导倾听他的申诉后，出面做出公正的裁决，澄清一些事实，纠正一些偏颇，以至采纳一些他的建议。他以为这不仅是为了平抚自己和朋友们如阿垅、路翎所受粗暴批评的委屈，也是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人民的文艺事业的。

绿原转引胡风1952年致路翎一封信中提到的，彭柏山对胡风说过：“人家当家，要错也错下去，发现了以后再来改，不要别人插嘴的。所以有人说你杞人忧天。”彭柏山从军队转业地方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有政

治经验而且清醒。绿原也从实际生活中观察和体会到，“‘思不出其位’，不是谁都可以批评的，要批评得由领导自己或更上级领导出面。稍一不慎，‘越俎代谋’，抢在领导前面批评了什么，这本身就是‘态度’成问题，就是‘反领导’，也就是‘反党’——解放以前双方在平等地位上进行过的学术争辩，解放以后由于彼此地位发生变化，可能随之一变而成政治立场的分歧。过去可以平等对垒的论敌，一变而成代表党的领导的文艺界负责人，或者直接主宰你的政治命运的上级，除了邵荃麟之于胡风，似乎很少人不受成见的干扰”。

胡风在政治上是拥护共产党的。他早年曾经加入日共。据 30 年代一度在上海做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的吴奚如回忆，胡风有一段时期承担过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络。据绿原回忆，他曾为阿垅带过国民党的军事资料给胡风，由胡交廖梦醒转送延安。直到 1948 年阿垅取得了几批国民党的军事情报，还是经由胡风通过罗飞（后来也被划为胡风骨干分子）转交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据 1987 年 3 月 2 日《人民日报》刊发的荒煤《告慰丽尼》一文中也曾谈到胡风为丽尼向上海地下党转交过蒋军整个作战计划，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致电奖励。）建国后，胡风对中共中央一直保持着信赖的感情。因此他对于自己被党组织视为对立面的尴尬处境，可能有所感觉而没有十分清醒地意识到。曾经有人“劝胡风要少说话少写文章，找个闲差事做做”（绿原转引自梅志《往事如烟》）；沈从文是这样做的，但那是由于他历来不被纳入“进步文艺界”，而且 1948 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斥反动文艺》已经谥之为反动文人。正是胡风参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使他不甘于自己走入“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的行列，也不甘于以“全部、彻底、干净地否定自己”的方式实现思想改造，而还要坚持他认为在新时代仍然应该坚持的文学上的一些根本观点，自然会被目为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

识分子“总要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而胡风有关创作论方面的一些原则性命题，恰恰是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权威阐释者的论述有出入的，或有所补充有所突破的。胡风自己认为这是学术上的问题，在学术论争中他执著地坚信自己的正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使他很容易就陷入孤立的地位。

上述 1955 年 3 月印发的学习材料规定：“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首先，应当分清思想上的敌友我三方。对于在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当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使他在思想上孤立，肃清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

当时围绕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所作的战略部署，无疑都是遵循和执行这一规定的。在当时的中国，思想上孤立必然导致政治上孤立，而“思想上的敌人”与“政治上的敌人”实在只有一纸之隔。一旦认定“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不但“反党集团”升格为“反革命集团”进行批判，而且可以诉诸刑法了。胡风一人长期面对整个国家和几乎整个社会而不自知，现在，动员了全党全民的舆论压力和国家机器的威力，一举把他抛到了被告席上。

一些在政治上同样追随、信赖中国共产党而在文艺思想上与胡风相通或相近的青年，亲身经历了胡风和自己的“反革命”化，他们把这种骤来的剧变看作晴天霹雳。尘埃落定以后，绿原在《胡风和我》中有一段平实的分析，他说实际上胡风“解放以来一直在期待、在准备通过真诚负责的检讨，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使过去受过他的影响的青年作者们得到顺利的发展；但他始终不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应当从什么地方着手；为此宁愿把一切个人问题（如性格偏激，态度不好等）承担下来，但决不能为了个人利害而牺牲属于众人的真理（即不能按照当时的普遍要求，在

理论上全部否定自己)”。问题的要害就在这里，胡风的悲剧也就在这里。胡风相信自己的理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是有利于人民也有利于文学的发展的，这同认为他是反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亦即反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文艺的领导的论断尖锐地对立。如果胡风以放弃自己的观点求妥协，胡风就不是胡风了。历史不容假设，胡风怀着自己的原则和信念，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入为他设置的文字狱中。

三

牵连入胡风一案而坐牢的人里，有些人曾经坐过国民党的牢，如彭柏山、方然、贾植芳、胡征等（正就是为了营救贾植芳夫妇出狱，胡风给阿垅的三封信，在“第三批材料”开头被列入“胡风和胡风集团分子同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就有密切关系”的罪证）；还有些人则是被国民党通缉的对象。这真是历史的一次嘲弄，为“革命吞噬着自己的儿子”作了残酷的注脚。

不过，我们实事求是地说，坐过国民党的牢的人，革命者，乃至英雄，也不排除在革命胜利后会有蜕变以至犯罪的可能。惟有所听凭法律的庄严裁决。

而历史的嘲弄，更在于以法律的名义从1955年6月起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所施行的一切，大大地褻渎了、玷污了、贬损了法律应有的尊严；这个与“潘（汉年）扬（帆）案件”几乎先后发生的两大错案，恰恰铸成在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54年9月通过颁布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这本书的作者中许多人被逮捕了，他们记述了被逮捕、关押、审讯等过程，从中可以了解到我国50年代到60年代的法治和人权水平。有些没有被逮捕的人，或在被捕以前，先由所在机关或团体进行“隔离审查”，即限制行动自由包括解手必须请假，切断

与外界包括家人的联系，由人看管送饭，勒令“交代问题”。事隔多年之后，生于1911年的何剑薰教授不无调侃地写道：

这叫什么？拘禁？软禁？禁闭？禁锢？拘留？拘羁？待字闺中？……好像都不是。将我头脑中所知道的这类术语全部都搬了出来，似乎随便哪个，都不合用。

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当然，我的交代就不能清楚。

这种“隔离审查”方式，从胡风案发之前到“文革”期间人们习以为常，这种法庭外的法庭、监狱外的监狱，即使在“文革”结束，《刑法》、《民法》相继公布以后，在某些中小城镇和乡村还时有所闻。在这种似乎“非官方拘禁”的场合，被拘禁者不但失去自我辩护的权利，就连人身不受侵犯的权利也失去任何可靠的保障。

然而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也不能对执法部门寄托不切实际的奢望。就以吕荧为例，他因在文联党组扩大会上力排众议，说了一句“胡风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的话，被判定为“就是胡风集团里面的人”，这且不说；吕荧神经系统已受到严重摧残，健康状况恶化，而“文革”开始后，仍被押送到劳改农场收容强制劳动，备受凌辱、批斗等非人待遇，终于在1969年3月5日，于冻饿中含冤逝世。即使吕荧不是当代有数的美学家，甚至只是一个依法服刑的货真价实的罪犯，难道这种情况不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吗？

诗人胡征，也许因为他的长诗《大进军》曾得刘伯承逐字逐句审阅并亲笔题词，不能从党和革命的歌手们的自我感觉中摆脱出来，在他发现自己身卧西安的囚牢时，绝对不能适应：“这个牢狱与北京上海那些文明城市的牢狱不同，那些牢狱如同学校，可读书，可学外语，可研究学问。出狱后，有的精通几国语言，有的

成为某学科专家。这里，想劳动而不准，想读书报而不可得，想学外语、学数学、学京戏、学气功、学医、学拳、学书、学剑，都不可能。人家说叫你坐牢就是坐牢，你不老老实实牢牢地坐着，你还想咋？”由于政治身份意外地转化造成的心理失衡，加上对监狱生活质量期望得过高造成的失望，“牢骚太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对于收监在押人员，特别是胡风一案的当事者来说，也许更重要的还不是物质待遇和管理水平，而是围绕审讯的一系列法律程序的实质性问题。

梅志在纪念张中晓的《青春祭》一文中，记录了审讯员对她进行过的一番“开导”：

他问我：“你们反对周扬吧？”

我说：“那是的。”

“你们应当知道周扬是代表党的。”

“知道。”

“那么，你们反周扬不就是反党吗？”

我不敢吱声了。

“反党不就是反革命吗？”

原来如此！经他的推理法这么一推，才使我恍然大悟！所谓反革命只是对某位党内领导人的反对……

到了其后不久的反右派运动中，有不少人只是因为对基层党员干部如一个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甚至只对一个普通党员有意见，不满意，提出了批评，或有某种表示，就会在这种逻辑之下“上纲”到反对党，一言丧身。

因此，党内最高领导人的指示之被称为“最高指示”，虽是“文革”期间才有的事，实际上却早就这样看待了。

1955年6月，上海市肃反委员会五人小组组长去北京出席全国肃反会议，会后，毛泽东召见他，问，“上海为什么搞不出彭柏山？你们太秀才气了……”

在这以前，彭柏山已经在 5 月 19 日被捕，经审查，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反革命言行，依法本应释放，却仍然实行“隔离审查”。五人小组组长回上海传达了毛泽东的话，于是决定再次逮捕彭柏山。这时候，“彭柏山专案组”经过两个月调查，已形成初步结论：彭柏山在 30 年代参加上海“左联”时期，和胡风发生关系，是一般的社会关系；抗战期间，有九年多未通音讯；解放后，两人关系密切，但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非组织活动，不能定为“胡风分子”。会上引起争议，有三人不同意逮捕彭柏山。“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经钦定，改变也难，谁有那么大的胆敢于逆天行事呢？”（见彭柏山的妻子朱微明的回忆文章）

绿原的所谓“特务”问题也是这样。1944 年绿原在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读书，曾经和其他学生一起，由校方统一征召，为来华参战美军充任译员，受训期间被当局认为“有思想问题”，分配时便被通知由“航委会”改调“中美合作所”。绿原不胜惶恐，未去报到。这时从复旦大学教授、作家章靳以处获悉，国民党当局因他未去“中美合作所”报到，正在暗令通缉，通缉令已下达校方。于是胡风写信给何剑薰，由何介绍绿原化名到川北岳池县教书。

事情就是如此简单。而“第三批材料”在 1944 年 5 月 13 日绿原给胡风信（“我已被调至中美合作所工作，地点在磁器口，15 号到差；航委会不去了”）后面，编者按语说：“特务机关能够‘调谁去‘工作’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了。”轻轻一笔，重可千钧。此事同按语指称阿垅为“国民党的军官”，胡风“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一样，到 1955 年下半年，就已经由公安部查明了真相。但是为了维护按语的权威性，维护按语作者的威信，仍不得不把这项诬枉继续坚持下去，“直到 25 年之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以恢复，两个‘凡是’论被推翻，这些谣诼才悄然偃息下来”。（见绿原《胡风和我》）

鉴于五十、六十年代法制极不健全，严重的“以权代法”、“以权干法”发展到“文革”中“无法无天”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强调健全法制。1982年开始施行现行宪法，随后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虽然距离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还有相当遥远的里程，但总算初步做到了大事情有法可依。现在回顾1965年让绿原、牛汉、林希等在分别公布审理胡风、阿垅案件时出庭作证的一幕，林希在回忆文章中称之为“法律的戏弄”，我以为是可使一切关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人感到怵惕的。

据说，当时将要公开处理拖延10年之久的胡风一案；内定除胡风、阿垅外，所有“胡风分子”一律免予起诉。胡风如果服从判决，也可“从宽处理，监外执行”，“胡风本人也同意这样办”，即服从判决，不上诉，准备回家。果然一切按照事前的布置和协议进行，胡风被判徒刑14年，在押一天算一天，尚余徒刑4年准予监外执行。胡风“为了维护党的威信”，也为了回家和妻儿团聚，他不但不上诉，甚至不作任何辩解。1966年2月，宣判对已关押了10年半的阿垅处以12年徒刑以后，阿垅的表示也是：“我放弃上诉。”林希在回忆文章中说，一不能宣判无罪，二不能立即释放，“法律戏弄的最大极限，就是宣告当年把这些人投入大狱的作法是对的，而且是刑满释放”。阿垅没有等到刑满释放，他在距离刑满两个月前的1967年3月15日，瘐死狱中。

林希详细回叙了他被检察院工作人员通知出庭作证的经过。先是说：“自然了，出庭作证是自愿的，我们不强迫，不动员。我们想既然你已经和胡风集团割断了联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你就有义务和人民站在一起对颠覆国家的反革命行为提供证明，当然你可以拒绝，你拒绝出庭作证，不等于事实不存在，所以国家也可以对你拒绝出庭作证采取相应措施。”林希——当时只有21岁的文学青年侯红鹅——在威吓下表示同意作证以后，被告知：“思想言论是不能判刑的，当年的思想批判都不能成

立为罪行，罪行就是颠覆国家、进行反革命煽动和宣传”，“要我在法庭上证明的，就是阿垅拉拢我从事颠覆活动”。接着进行极周密的安排，根据检察院的指示准备的不到 1000 字、不超过 5 分钟的“证词”，每隔 10 天半月有关工作人员就来帮助林希修改一次，前后修改十几次才定稿。但“出庭作证不得带文字稿，为避免作伪证之嫌，必须是只凭口述”于是证人不得不苦苦背诵，并且在工作人员面前演习出庭的种种过程。林希痛心于这一次表演，他说：“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我竟要以一个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阿垅有罪，我深感这是这场运动对我的最大侮辱，是对我最粗野的摧残与扭曲，是对我最可怕的戏弄。”

这岂止是对林希和其他被迫作证的人的戏弄呢？从根本上说，这是对法律的戏弄。人民寄希望于法律，把法庭和执法者视为公正和庄严的化身，一切使这种持有朴素感情的人感到幻灭的作为，不就是对人民的戏弄吗？

四

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会有不同的记载，同一个历史事件的当事者会因不同的利益攸关而有不同的认识或解释，而历史的真实，不管它涉及多少纷繁复杂的因果和侧面，却只有一个，就是确实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存在和进行的那惟一的过程。

我不是把《我与胡风》看作一本申辩的书，而是如实地看作一本从切身经历披露事实真相的史料。它是现代文艺思想史和文艺运动史的史料，它是中共党史学（涉及政治运动史，涉及统一战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以至党内和革命文化运动内部斗争）的史料，它也是社会学的史料，有助于对人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历史思考。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编者按语中有一句名言：“假

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我以为具有抽象地继承的价值。把用文字以至法律的符号加工过的假的胡风推翻以后，一个真的胡风就站到我们面前了。

当然，要认识胡风，主要要从他各个时期的创作、理论以及体现在信件、所编书刊等工作实践着眼。而曾经接近他的一些亲人和朋友的回忆录，无疑可以补充那些文字以外的胡风的形象。从《我与胡风》一书给我的印象来看，胡风自然不是一个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兼具阴谋和野心的政客，也不是一个头上戴着光圈以救世为己任的圣者，尽管他不自觉地背负着信念的十字架；而归根结底他是一个普通的勤奋热情、真诚求实、执著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如果说有什么比较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不肯对一些权威的理论随声附和，不肯对一些名家的作品违心地赞美”（罗洛），这一份耿直或者就是他身上致命的傲骨——以致被世俗目为“反骨”了。

虽然胡风接受过五四运动前后的资产阶级文化影响，并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虽然他曾经被批判为“民族虚无主义”；然而我从他为人处世中更多看到一个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某些性格特点。他 1955 年后大部分在狱中的生活遭遇使我想到李贽，以及“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杨继盛，他 80 年代出狱以后的表现使我想到司马迁。自然，我也想到了伽利略。人类有史以来一些优秀的人物，灵魂中总有些相通的东西。不过，比附是没有必要的，胡风就是胡风。

为了不使胡风案件在不同规模上重演，胡风和他的同案者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与胡风》这本书就是证明。整个中国，至少两三代人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怎样使这些代价不是徒然的付出呢，怎样使无法计数的时间、精力、才华、鲜血以至生命不是白白的牺牲呢？

1992 年 12 月 8 日

1957：中国的梦魇

人生往事有一些如梦如谜。人类历史有时也仿佛一段噩梦，留下一个哑谜。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距今已经有35年。35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瞬，而对多数人则是半生。许多当事人也已经不在了，无论是斗争的领导者或当时斗争的对象。今天五六十岁以上的人偶然忆起那场政治风浪，大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意味。

记得一些人的遭际，记得一些人的嘴脸，记得几句社论，几声口号，记得一种气氛，一些镜头和细节……他们不是历史学家。

至于这一反右派斗争是怎么“爆发”的？从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开始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人们响应号召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到6月8日党内发布指示“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42天中这样的剧变，是突如其来的吗？是偶然发生的吗？是像有些人说的某些尖锐意见唐突了最高领导人，以致“一怒安天下”？或是像有人说的重演了封建时代的“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乱道……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①或者既不突然，也不偶然，而有深远的背景和根源？

① 《词林纪事》：“徽宗即位，下诏求直言，时上书与廷试直言者俱得罪，京师有谶词云云。‘当初亲下求言诏，引得都来乱道。人人招是骆宾王，并洛阳年少。自讼监官及岳庙，都一时闲了。误人多是误人多，误了人多少。’”

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这方面的历史专著。然而，应该感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者，使我们能从已入选的1949年9月到1957年的重要著作中，了解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就是反右派斗争以前和反右派斗争期间的思路，了解他关注的主要方面，以及他一直坚持到晚年的一些论断形成的根据和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留下的一份证词，也是我们索解反右派斗争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何以在此时而不在彼时、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一把钥匙。

一

人们熟知，毛泽东是把“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当作“革命的首要问题”的。^①作为一个政治实践家，他就是在对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的 analysis 的基础上，做出敌我友的基本判断，从而建立起依靠谁、团结谁、孤立和打击谁的阶级路线，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统一战线，以及一整套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的体系。

对于作为体系的毛泽东的思想，不仅需要完整地全面地去理解，而且需要发展地即从动态中去理解它。随着党的政治实践的发展，毛泽东的言行经常突破原有的结论，这反映了他思想的活跃变化和实践的灵活性；然而在他思想中历几十年不变的，是要由共产党领导在完成以“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为标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进一步消灭资产阶级，建设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信念、理想和努力方向。

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之初，毛泽东充分估计了内外敌人的存在与活动，经

^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毛选》）第一卷，3页。

济和政治的困难，认为立足未稳，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例如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在土改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1950年3月12日^①；对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人士许诺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还在很远的未来”（1950年6月23日^②。他在1950年6月6日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阐释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思想：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

① 《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毛选》第五卷，13页，“……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② 《做一个完全的革命派》，《毛选》第五卷，27页：“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制度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①

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是在激烈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形成的，它们核心是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完成一定的任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力地孤立和打击敌人。一切包含在统一战线内的社会力量，即属于“人民”的范畴。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许诺选举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以后说：“这个统一战线是如此广大，它包含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49年6月15日^②）半个月后，他又在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重申：“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③

理解“人民”是什么，相应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什么，非常重要；因为这与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④密切相关，与毛泽东后来明确提出的“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密切相关。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毛泽东所指的人民以及相应的统一战线的内涵是有变化的；而无论在哪个阶段，毛泽东在理论上坚持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1949年组成“人民”的四个阶级并不是平列的。当时有人解释五星红旗，说一颗大星代表党的领导，得到首肯，说四颗小星分别代表四个阶级，其所以受到批驳，就是由于这样的误会。毛泽东早在1949年3月就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

① 《不要四面出击》，《毛选》第五卷，23～24页。

②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毛选》第四卷，1400页、1403页。

③④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选》第四卷，1413页。

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①，以便于孤立和打倒敌人，取得革命胜利，并在胜利后建成社会主义国家。

在这里，毛泽东所说：“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就是指当时和后来习惯所称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以及“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团结他们，是以他们“能够同我们合作”为条件的。

在这里，毛泽东把要去“团结”的“知识分子”，同与工农一起作为“基础力量”亦即党的依靠力量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加以区别的。后者即革命知识分子，一般是指直接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知识分子，是已经或正在实现“革命化”的；前者即所谓现有的知识分子，早在1945年毛泽东著名的《论联合政府》中说到“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时，就指出“应有计划地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②。这就是说，现有的知识分子只有接受党的领导，成为对党在革命斗争中和革命胜利后各项任务的“有用”之材，才能成为团结和教育的对象，从而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将格格不入，一事无成。

在统一战线内部，或者说在人民内部，在作为团结对象的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间，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了”，“多少有点可能团结”，处于团结的边缘。毛泽东对于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选》第四卷，1375页。

② 《论联合政府》，《毛选》第三卷，1031页。

政治上的敌人和对手如蒋介石，是认为看他的过去便可以知道他的现在，看他的过去和现在便可以知道他的将来的；他对曾经是敌人和对手而现在“到我们这边来了”的人们保持高度的警惕，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

二

毛泽东确实是如有人所说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结合的领导者。到1952年中，他就把确认当前国内主要矛盾的课题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他这一年6月6日在一个批语中说：

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①

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的观点，毛泽东从此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尽管在几年后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56年9月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也并未因大会通过的决议而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在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重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②如果

① 《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毛选》第五卷，65页。

②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5页。

说路线分歧的话，那末从1956年“八大”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样一个植根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不同提法的路线分歧，是确实存在的。

而在1952年，这样的路线分歧还不存在，产生这一路线分歧的前提还不存在——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但还没有基本完成，而且还远远没有开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①。而当时毛泽东在党内坚持七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说，“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②。

1953年6月至8月，毛泽东以批示形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③，把这个不同革命阶段的“暗转”公布出来，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广大群众了解当前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一般是在1953年秋冬以至1954年了；而这一过渡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对于当时没有读到过七届二中全会文件^④的许多人是大大出意外的。由于以为共和国成立以后将有一个搞“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一些领导干部被毛泽东批评为右倾的错误，“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确保私有财产”，这样三句话，被批评为不愿

①②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5页。

③ 《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选》第五卷，81页、89页。

④ 主要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3月5日），《毛选》第四卷，1362页。这一著作收入《毛选》第四卷，是1960年第四卷出版才公开的。

遵照甚至公然违反七届二中全会的原则。^① 在处于被领导地位的人里面，特别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耽于身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错觉，就会在思想和行动上发生错位。现实将纠正这一错位。他们终将在现实的教训面前，意识到自己在新的革命阶段即从1949年10月1日开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里，成为革命的对象；而这个过渡时期，毛泽东最初说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后来订正为“一个相当长的时期^②”。“三大改造”大大提前在1956年初宣告基本完成；而从1953年算起10年到15年后，正是准备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期，一切被称为资产阶级的人、物、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自然理应成为全面专政的对象。总之，这就是横在人们面前的“社会主义关”。

确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公开宣布中国早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报刊广播的宣传和公开发表的文件一般称为社会主义改造），时为1953年8月；毛泽东接着就在全中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8月），在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协全国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9月^③），意图借此“典型”，在全国开展有关总路线的“辩论”。毛泽东批判梁漱溟的讲话尤其值得注意，它同毛泽东不久以后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所写的序言和按语，以及反右派斗争中一系列的文章，影响了名为思想辩论实为政治批判的一代文风，影响了政治风气，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做了思想、舆论和政治准备。

在从事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的年代，毛泽东强调对于革命的

①②《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毛选》第五卷，81页、89页。

③《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选》第五卷，90页、107页。

领导权，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那末在建立了共和国，成为执政党以后，是否还存在领导权问题呢？毛泽东在《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中回答道：

我们是坚持无产阶级对于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工人、农民、工商业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民众团体、工业、农业、政治、军事，总之一切），又团结，又斗争。如果想摸底，选又是一个底，这是一个带根本性质的底^①

在毛泽东那里，党的领导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是坚定不移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是他的一贯主张，他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他经常担心党的绝对领导没有在一切方面巩固树立起来，加上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越是胜利，阶级斗争越是激烈的论断的影响，在中共决策层也形成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阶级斗争更为复杂和尖锐起来的共识，毛泽东以特有的敏感关注着阶级斗争的动向，或者说搜索敌情。

毛泽东作为宏韬远略的军事家，时时记住把战争的主动权操在自己手里。1955年3月，他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说：“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无非是这些坏得不得了的事：帝国主义者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蒋介石又来坐北京，高饶反党联盟一类的事件重新发生，而且不只一个，而是10个，100个。尽管有那么多，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基于这种“防患于未然”的防范性考虑，他在总结高饶事件时提出，“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②。”

这时，首先进入毛泽东视野的除了1955年4月被捕的潘汉年的案件以外，无疑就是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在1955年5月写道：“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

①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毛选》第五卷，115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153页。

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① 这与 11 年后 1966 年“五·一六《通知》”中提出的“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的思想是一贯的^②。反胡风斗争的规模虽然不能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相比，但当时确是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中头等大事，大张旗鼓，家喻户晓，并且由此引发了一场自 1955 年 7 月 1 日展开的新的肃反运动（全称是“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③），“在 1200 万人的范围内，进行肃反工作^④”。

与此同时，围绕着农村中的合作化问题和粮食问题，正进行着遍及党内党外上自领导下至群众的一场辩论。有些地方还发生死牲口等事件。毛泽东形容“1955 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⑤ 而到 1955 年 10 月 11 日毛泽东已经以胜利的姿态总结说：

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

①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毛选》第五卷，163 页。

② 在 1963—1965 年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为“四清”运动），就是从基层政权有大约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出发的。

③ 《人民日报》1957 年 7 月 18 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列举的成绩中有：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当时已经定案的有 8.1 万多名，其中现行犯有 3800 余名；同时，还有 130 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

④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选》第五卷，200 页。

⑤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选》第五卷，233 页。

的打击^①

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送走了1955年，迎来了1956年。在批判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小脚女人”以后，农业合作化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极快的速度完成，印证了毛泽东“要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积极性”的论断^②和从湖南农民运动以来对群众运动的信念。这时在“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推动下，在反对右倾保守的号召声中，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敲锣打鼓一夜完成，1956年1月15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一个12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公布了；“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提出和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1956年1月30日的发表；似乎都预示着一个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阶段将要到来。全国仿佛都在一片热浪滚滚之中。

三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提出了斯大林问题。同年4月，毛泽东先后同米高扬、同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着重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斯大林“要具体分析”，“要有全面估价”^③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讲话，对此讲得更加明朗：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

① 《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选》第五卷，199页，其中“反唯心论的斗争”，指“从《红楼梦》那个问题上开始，还批评了《文艺报》，以后又批判胡适，批判梁漱溟”。

②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毛选》第五卷，229页。

③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人民日报出版社，1963年9月。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烧到自己头上来了!①

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②

这个成绩为主、缺点错误次之的二分法,不仅指导对斯大林的评价,而且适用于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估计,它在毛泽东思想中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毛泽东在1957年1月27日指出,“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低估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③联系到毛泽东曾经指出“胡风反革命集团”“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就可以知道是非问题和敌我问题时常在对成绩与缺点错误的估计上相邻的。

毛泽东在苏共二十大后以苏联经验为鉴戒,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又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明确宣布要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治地位;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都没有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3页。

②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7页。

③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9页。

丢，“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①。特别是1956年夏秋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关注和分析国内各样社会矛盾的同时，把许多思想、舆论和基层少数人闹事的动态，都放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挫折和挑战这一背景上来认识了。他说1956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②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提法，我们现已知道毛泽东是不同意的。大会还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毛泽东在那前后的讲话或文章里没有涉及这个问题；而从70年代初他同爱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说“需要有一点个人崇拜”，这个观点恐怕也不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才产生的。

个人崇拜——后来又改译为个人迷信，加以区别——问题的提出，还是那个苏共二十大。“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分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毛泽东说，“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2页。

②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9页。

主。^①

毛泽东批评几位司局长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说：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指出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②在毛泽东看来，民主和自由的问题在中国已经解决，并且不是在1957年而是早在1945年以前，在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已经解决。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宣告：“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是彻底地实现了。”^③

毛泽东借用“大民主”这个词，提出“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概念，与“资产阶级大民主”相区别，前者泛指过去的和将来可能发生的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包括针对资产阶级的“五反”在内。“如果搞大民主，民主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至于教授“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个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这话是在1956年11月15日说的，不是已经为半年后的反右派斗争勾勒出了蓝图的轮廓吗？

毛泽东自觉地作为无产阶级的最高政治代表，紧紧抓住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这个纲，眼睛紧紧盯住了“扩大”了的资产阶级的动向。本来，在建国前夕他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④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乡下的地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4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3页。

③ 《毛选》第三卷，1019页。

④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选》第四卷，1414页。

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同时，毛泽东又指出，资产阶级，地主、富农、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他说到“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说到电影《武训传》中的一枝大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① 这话是1957年1月27日说的，前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整整一个月。

毛泽东这篇《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里，讲到定息问题时说，“资本家加上跟他们有联系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我们把这个阶级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夺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没有剥夺干净的还要剥。”一年以前，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做的报告中，曾经提出党要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信任他们，支持他们，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② 一年之后，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讲到知识分子的问题的时候，指出：“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③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3页，351页。

②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158～189页。

③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38页。

仍然是在同一次会议上的讲话里，毛泽东讲到“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后说，“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虽然没有定量分析的数据，但国内“许多人”成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总是令人惴惴不安；“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①。因此，“我看要准备出大事。”“不怕闹，有精神准备，才不致陷于被动。”^②。

毛泽东在1月27日说：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民主人士的批评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错的，一种是不错的。不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这就是后来施之于反右派斗争的掌握斗争主动权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此时已经基本形成。毛泽东随后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3月12日作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前者同年6月在反右派斗争中发表，后者直到60年代才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中公开发表，都对当时讲话作了“整理”或“补充”）。毛泽东这时真如他自己说的，“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了。

①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42页。

②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52页。

据一份大事记,后来被称为右派首领的章罗联盟的章伯钧、罗隆基,曾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1957年3月5日至21日)讲过话:

章伯钧在18日会上宣传他的反动的“两院制”思想,说政协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也将日趋完善充实,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政协这个组织可以逐渐成为中国人民民主所需要的议会制度的民主一环。罗隆基在19日会上开始攻击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工作,说领导干部从军事革命工作转到文教工作岗位上来,也应该熟悉中国士大夫阶层中成长起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性,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所期望的“礼贤下士”是有矛盾的^①

手头资料不足,不知道罗隆基有两句涉及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的话,是否也是这次讲的;毛泽东一再给予批评,显然认为是要害问题,使他印象甚深:

罗隆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怎么能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他这个话不对。他说他是小资产阶级,其实他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是要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②

现在知识分子有500万人,资本家有70万人,加在一起,共计600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300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罗隆基不是讲过吗,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就领导不了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③

归根结底,还是一个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知识分子,还是知识分子领导无产阶级?”^④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

① 《四个月的大事简记》,《1957年的春天》附录,学习杂志社1958年4月出版。

②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9页。

③ 《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毛选》第五卷,484页。

④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32页。

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右派是对抗的,中间派是半服半不服的。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发给党内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夺取中间派”,左派和右派“互争对中间派的领导权”,“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些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①毛泽东指出反右派斗争主要是政治斗争。^②而这场政治斗争的战场主要在知识界,就是这个缘故。

反右派斗争是在1957年4月末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工商联分别召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举行多次座谈会期间开始酝酿,随后在6月8日正式开始的——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题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整风运动是在头一年就决定要在1957年开展的:“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③这叫作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我们这些人总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资本,就是替人民多少做了一点事。……我们每一个同志,都有一点毛病,那有没有毛病的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总要讲错一点话,办错一点事,就是什么官僚主义之类。这些东西往往是不自觉的。”^④因此,共产党的

① 《毛选》第五卷,425页。

②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45页。

③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7页。

④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42页。

整风是整作风问题，后来各民主党派、整个社会的整风则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路线^①；更确切地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②

这一全民整风自然是涉及亿万人，一直持续到 1958 至 1959 年的大跃进中。而在反右派斗争中作为孤立和打击对象的右派，最后划为右派分子的，据有关领导部门公布的数字为 53 万人。

四

熟悉党内政治生活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提出各个阶段的任务，是以对政治形势即各个阶级的动向、态势和力量对比的估计为根据的。

且看他对 1956 年下半年形势的认识：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③

这个“去年下半年”，在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发生过什么事情呢？关于经济领域，《人民日报》6 月 20 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是由陆定一起草、刘少奇定稿的，据说此文中心是反冒进，把冒进说成是“上面逼出来的”，是公然对抗毛泽东 1955 年的几次批判，毛泽东认为形式上

①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毛选》第五卷，430 页。

②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毛选》第五卷，457 页。

③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5 页。

两面反，实为反左，有原则性错误。政治领域的大事自然首推八大，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持有异议。意识形态方面，广大知识分子受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向科学进军”口号的鼓舞，思想开始活跃，例如文学方面就出现了一些比较真实地反映现实，多少揭露了生活中的某些阴暗面，像官僚主义等等的作品。有些评论性文章开始提倡独立思考，有摆脱教条主义的迹象。这就是毛泽东后来说的，“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前者是“左”，后者是右。“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①；毛泽东的这一洞察，成为一种思维模式，同样可以适用于其他方面，并且实际被广泛地普及了，例如：有些人反对的宗派主义，实际上是党的领导，有些人反对的官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毛泽东自认为 1956 年下半年把阶级斗争“弛”了一下，放松了一下，接着便要抓紧了。

事情还远远不止是对 1956 年下半年形势的估计；更推广到对“过去七年”的估计：“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1957 年 6 月 8 日^②）怎样转为真的主动呢？“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③。

这是既定方针，这个方针不是在 1957 年 4 月末到 5 月上半月才确定的，而是经过毛泽东长期的深思熟虑，符合毛泽东从战争

①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5 页。

②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第五卷，432 页。

③ 《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选》第五卷，433 页。

时期开始就在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中习惯了思路。因为在反右派斗争前夕出现在毛泽东面前的右派，有些过去本来就是敌人，有些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成为革命对象即敌人的；“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①。

时过境迁，我们回过头来检视当年的“右派言论”，就我们的阅读范围来看，那些批评和建议绝大部分是提得对的。毛泽东在1957年5月15日也说过：“右派的批评也有一些是对的，不能一概抹杀。”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右派的特征他们的政治态度右。他们同我们有一种形式上的合作，实际上不合作。有些事合作，有些事不合作。平时合作，一遇有空子可钻，如像现在这样时机，就在实际上不想合作了。”“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②以“看得出来”判断善意和恶意，指控敌对情绪，这样做本身就带有浓重的情绪色彩，容易导致主观随意性。据此进行批判，就会离开耳熟能详的“摆事实，讲道理”愈来愈远；据此进行组织处理，就会悖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法治原则。把敌情估计得严重到几乎要天下大乱，而按照比例，当时高级知识分子中左派、中间派合计约占百分之八十^③，其余便都是落后分

① 《做革命的促进派》，《毛选》第五卷，478页。

②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6~427页。

③ 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选集》下卷，163页。他说：“关于知识分子的目的的政治情况，许多单位作了统计。这些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约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

子。——“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①在运动中的估计，不同单位右派分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可能多些，可能少些”^②，以当时知识分子为五百万人计，所公布的53万名扣上右派帽子的右派分子之数，正是百分之十许。终毛泽东一生，他不认为发生过“扩大化”的问题。

的确，当时有个别遭到严厉批判的民主人士如马寅初、张奚若，并没有被扣上右派帽子。这显然出于我们目前还不知情的某些考虑。

例如，张奚若继5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集的座谈会上讲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之后，5月15日又讲四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他最后说：当然，不是说大的都不好，过去的都好，将来的都不好，问题在于要有区别，要有适当的比例，要有配合，生活才不单调，不要脑筋简单。他说，这是文化高的人很不幸的事情，也是脑力劳动者的很大的负担。但这也不是什么难办的事情。只要虚心一点，就能够办到。

我们从当时《人民日报》摘要报道的张奚若讲四种偏差的话看来，都是一些平实之论，不知道为什么会招致毛泽东尖锐的驳斥：“我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急无产阶级之功，近劳动人民之利。难道你要我好小喜好，急错近弊？”^③

也许我们只能试作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如同对资产阶级一样，一贯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而在阶级斗争的高潮中，要迫使知识分子接受改造，着重斗争，强

①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8页。

②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6页。

③ 转引自《班禅大师》，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调斗争，甚至认为“‘整’也是治病救人^①，一斗一整，虽曰痛快，但势必把事情搞乱。

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整风中所谓“鸣放”一说，是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来。千百万人积极投入，他们的言论表明他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克服自己肌体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以便使大量开始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得以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得到解决，避免发生像在匈牙利那样的事件。毛泽东也是立足于接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希望通过整风，以和风细雨的方式解决“三大主义”的问题，摆脱因脱离群众而可能触发“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②”的危机；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的整风，则本来就是为了更紧地抓住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开展阶级斗争，完成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避免由于“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而最后形成“匈牙利事件”那样的政治危机。

反右派斗争的后果是人们已经看到的了。但是对反右派斗争的历史教训是不是充分汲取了呢？

鲁迅在《隔膜》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两文中，曾经对历史上的思想、言论、文学之祸作过一些犀利的分析：

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颂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一乱说，便是“越俎代庖”，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③

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

① 《事情正在起变化》，《毛选》第五卷，429页。

②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选》第五卷，324～325页。

③ 《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

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

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从19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①

鲁迅的概括是有普遍意义的。然而他没有能够看到中国进入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状况，我们更不能简单地以鲁迅的话来解释我们遇到的问题。反右派斗争乃至反右派斗争之前，由于在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下所处的阶级地位不同，世界观、思想方法以至文化背景不同，人们之间例如党内与党外之间、领导与群众之间、工农与知识分子之间，在思想感情、语词表达（包括对一些概念的理解）上确实存在着“隔膜”，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存在着角度、深浅和先后的不同。不过，这都是难以避免的，不是在宣布“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以后又来了一次和平时期的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即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作了预演的反右派斗争的深层原因。

我只是在重新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时，努力依照毛泽东的思路，去弄清反右派斗争甚至它的“扩大”化的必然性，不可避免性。进一步分析就非我学力所及了。

1992年12月23日

① 《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

我们将亡于教育吗？

我们将亡于教育吗？

这里说的不是“亡党亡国”之“亡”，而是“亡天下”之“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第一个讲这句话的是明末学者顾炎武，他把“亡国”和“亡天下”加以区别，“亡国”不过是政权易帜，“亡天下”却是把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世代积累的文化摧残断丧，毁于一旦，使文明社会复归于蒙昧以至野蛮，那才叫天昏地暗，万劫不复了。

半个多世纪以前，西方的纳粹德国和东方的日本军国主义，曾经有志于此，联手干了一气，他们势力所及之处，做到了“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幸亏他们被不甘于“亡天下”的世界各国人民打败了，想要继承他们衣钵的衣冠禽兽，能够驰骋的舞台有限，就人类全局来说，终于不成气候。

如我们所引以自豪的，中国拥有人类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国际社会中自有相当的影响，不说对人类做出贡献吧，至少也是在一片大陆上“担负着天下的兴亡”，不是么？

我们朝野上下毕竟都不乏明白人。在结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起门来“亡天下”的尝试之后，人们津津乐道日本在战后极其重视教育，收效不仅在经济的振兴，而且在精神的重建，谁不懂得，在文盲半文盲充斥的国度是不可能建成现代化国家和现代化社会的，如果承认“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没有文化的人民不就是蒙昧的人民吗？蒙昧是产生什么的土壤呢？

然而，怎样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靠暴力？靠阶级斗争？靠斗斗斗？都不行。有正常思维的人都知道要靠教育，学前的、初级的、中等的、高等的以至社会的教育，把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包括科学技术也包括人文观念，像传薪一样，传授给我们一代一代各年龄段的人们，作为一定的规范，更作为进一步创造的出发点。在1949年前后，人们在旧政权下无从实现的教育理想，转而寄托于新政权所倡办的“人民教育”了。

四十年功过，如过眼云烟，但又不仅是云烟过眼，它留下了陷入怪圈的教育现状。正像年年宣扬完成植树造林指标，而实际森林覆盖率日益降低一样，全国文盲数字恐怕远远超过公布的统计，新的文盲又正在不断繁生，“文革”停课闹“革命”的后果不仅反映在今天40~50岁的人才断层，其实许多要用所谓“五讲四美”、“礼貌语言”补课的，本来应在正常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解决的例如遵守交通秩序、不打人不骂人以至一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问题，随处可见；“无教养”渗透到人际关系、社会风气等多方面，直到作为远因导致刑事犯罪案件的增加！文化大革命在“教育革命”的口号下取消教育，打击教师，贬低文化，贻害学生，自然三尺冰冻非一日之寒。且不说50年代初诸如院系调整、学习苏联等影响深远的举措的得失，单是1958年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实施，在教育领域“政治挂帅”的泛政治化，后果就是多方面的：在生源上加强了唯成份论（并涉及包括“海外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政审”，阻塞了相当数量优秀生的入学；限制教师开课以至组织学生批判教师，开“文革”中反“师道尊严”的先河；从语文变成政治课，发展到取消历史、地理课，而所谓政治成为德育的核心，德育则照搬成人社会违心表态的一套，无形中培养出“说假话”的风气。与此相应的，是政工人员及其他非教学人员在各级学校编制中的膨胀，教育经费中人头费比重增大，教师经济待遇相应降

低，又影响教学质量和师资来源……时至今日，经过十几年的修修补补，反反覆覆，教师挨打的事情似乎不常听说了，但教师有时几个月、一年半载连菲薄的工资也领不到，“打白条”现象却遍及全国，与此同时，据说作为适应市场经济出现在教育界的“新生事物”，计有从校办工厂滥觞的、旨在“创收”的多种经营；学校补行政费不足并为发放教职员工福利以自救，而在教育行政部门许可下巧立各种收费名目；社会办学中出现的类似“高价学校”的所谓“贵族学校”等等，不一而足。义务教育已经不“义务”，而学校收费名目之多、之杂，已经办出了历来资本主义世界和原社会主义阵营都未曾有过的“中国特色”！

据悉，中国的教育经费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5%**，居世界第 **98** 位；不但在众多发达国家之后，并且在若干综合国力远不如我们的第三世界国家之后！

这样看来，重视教育云云，不是口惠而实不至吗？**1992** 年用于吃喝旅游的公款，听说达到一千多亿元，令人有独薄教育之叹，究竟该归咎于财政部门、教育部门，还是什么部门？抑或什么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都可不负责任呢？

说到教育经费问题，其实争的不只是教师工资、教师的待遇，而且甚至首先争的是教育的地位，青少年和学龄儿童受教育权的保障，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中华民族的前途——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可以预见的明天！

这是普通公民、学生家长都看到的，都有切肤之痛的，真正的教育家，有远见的政治家，以及一切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都应该看到，都应该有切肤之痛。只有官僚、政客昧于私利，才看不到，良知丧尽，才漠不关心。

然而，果然增加一些教育经费就行了么？拯救教育亦即拯救孩子、拯救民族未来的这样一件系天下之兴亡的大事，只须一笔或数笔财政拨款，就能起死回生，功德圆满了么？

恐怕又未必。我们说就整体而言民族文化素质的日渐降低，固然突出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钱交易，也已表现在文化领域，固然大量表现在基层，也已不可避免地表现在上层。当社会上以至有关主管部门为中小学师资的流失、教学水平的下降而惊呼、而嗟叹的同时，我们可否问问：我们还有多少堪称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学家——即懂得文化、懂得教育，并且因关怀民族未来而爱护青年、热爱教育事业，从而献身教育事业的专家，而不是既可以来管管学校，也可以去管管计划生育的“通才”在关键岗位上？以高等院校的负责人来说，我们还有蔡元培、马寅初乃至吴玉章吗？

从党政机关到社会各界，腐败之风，不能不侵入各级校园，包括最高学府。“清水衙门”虽非重点，但也并不真“清”，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真的增加一些经费，究竟用于恢复发展教育，还是喂饱厕身教育界或凌驾于教育界之上的蛀虫，也很难说。义务教育靠募捐维持，已如欠发教师工资打白条一样是“国耻”，而用于教育的专款也有挪用舞弊，也有中饱私私，则是耻中之耻了。

何况教育的危机不仅是教育经费的拮据一端。毛泽东有志于教育革命，壮志未成，教育已苦；并不等于毛泽东当年指出的现行教育制度中的弊端都不存在或全看错了。老毛病加上新问题，整个的中国教育确实面临着全面改革的艰巨任务。这个系统工程似乎既不属于经济体制改革，也不属于政治体制改革，远未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然而它确是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翼，势在必行，迫在眉睫，再事拖延，将积重难返，不但贻害千秋万代，甚至祸在眼前。说来又是关系到“天下的兴亡”，谁来承担？还是谁也不承担？

我们的教育就是困处在这样的怪圈里。教育问题既不是孤立的，它的解决也离不开全局。然而全局中教育以外的问题已经足够恼人，教育部门似乎只要学生不闹事就可松心了。然乎？不然乎？至少我们教育界外的旁观者有这样一种印象。

“亡党亡国（政权）”的话，近来不断听到有人说起，而“亡天下”的危险似乎久无人说。受重视的“当作大事来抓”的事，尚且难免虎头蛇尾，半途而废，不用说实际上位居次要的教育了。

那末，我们真的将亡于教育吗——我们将由于教育事业的混乱、衰敝，不成其为事业，以致整个民族将堕落为世人不齿的蒙昧之民、庸懦之民、说谎之民、腐败之民，文明废墟上的历史弃儿么？

那末！——我们将成为子孙的罪人，民族的罪人，也是人类的罪人。

1993 年 10 月 13 日

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斗争

——朱正著《1957年的夏季：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序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 1966 年发动到 1976 年结束，长达十年之久。其间不止一次地宣告取得了重大胜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它也确实在一定的阶段，部分地达到了某些既定的战术目的，打倒了所要打倒的政敌；然而，历史最后宣告它以总体的失败告终。

那末，先它 9 年发动的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是不是取得了如当时所说的“伟大胜利”呢？

在 1957 年下半年的运动中和 1958 年的反右“补课”中划定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字为 53 万多人，有人说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即以 53 万来说，这个占了当时估计总数 500 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的右派，作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经过批判、斗争、处分，已经赶出了历史舞台，分别到各种基层单位接受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或控制使用；他们受到政治上的孤立，在知识分子中间更不用说在工人农民面前，是“反面教员”，谈不到什么政治影响了。右派以外的广大知识分子，也都按照运动部署，向党“交心”，表白从此对党全心全意，不是半心半意，更不是“两条心”。在这个意义上，反右派斗争是胜利了。毛泽东当时就是这样估计的：“在我国，1957 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他说，“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

成的。”

在完成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剥夺了资产阶级以后，毛泽东认为必须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来巩固共产党的领导权，这是既定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一贯充分地认识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资本家们（甚至扩大到若干小业主）尽管未必情愿，但还是在锣鼓声中交出自己的资产，接受赎买政策，迎接了“公方代表”。他们一般表现得听话，守规矩。在国内，被认为还有资本同共产党较量一下的，就剩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自恃有知识，而知识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政治影响是不能像浮财和生产资料那样没收的。这样，知识界便成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战场。

反右派斗争，就是整个共产党组织并主要依靠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当然，矛头首先针对右派特别是其代表人物，但被叫作中间派的知识分子之同样成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是无庸置疑的。把中间派同右派加以某些区别，只是为了集中兵力打击主要敌人所采取的分化瓦解敌人的政策和策略。

决策者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是怎样估计的呢？

周恩来 1956 年 1 月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说：

“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知识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

周恩来在这里所说的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都是属于人民内部的范畴，不是敌我问题，其中的落后分子也还不等于反革命。

毛泽东在 1957 年春则抛弃了进步、中间、落后的概念，采用左中右的划分。三月中旬，他在中共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有一种顽固地要走资本主义路线，实际上是准备投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人，“这种人在 500 万左右的人数中间，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占五百万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到 5 月中旬他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对敌情的估计也向严重方面变化：“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不同。”

后来划定 53 万右派分子，占 500 万知识分子的十分之一，大约就是从这里来的。

毛泽东在是否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两条以外，又提出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的标准。他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这就是说，在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左派中间，除了百分之十几的人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还有百分之几的左派也许并不那么熟悉马克思主义。不过这不要紧，毛泽东在 40 年代就曾指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 100 个至 200 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了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中共八大（1956）时党员总数是七大（1945）时的 9 倍，按比例增长，有 1000 个到

两千个真正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干部就已经够用。现在 500 万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十几，也就是五六十万、六七十万以至七八十万党内外“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左派，难道还不足以掌握反右派斗争的发展，保证取得一个又一个战役的胜利吗？

正是在反右派斗争节节胜利的基础上，毛泽东以“不断革命”的思想把全党全国推向 1958 年的大跃进。他在 1958 年 3 月中央成都会议上，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已经是针对高层的不同意见的批评。而全国知识分子命运攸关的，则是他提出并在后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认可的关于“当前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的思想：两个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和资产阶级右派，另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看来资产阶级右派属于敌对势力，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属于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可以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那些侥幸没有划归右派的知识分子，也确定无疑地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从理论上说，这是不以经济地位（是否有剥削，剥削量大小）、服务对象（是否为新政权服务），而以家庭出身、教育状况和世界观（是否已改造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即是否接受并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划分阶级成份的根据，所谓世界观则要进一步落实到现实政治态度——是否无条件地拥护党的每一项具体现行政策以至每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或党员干部。

在这样的政治气氛和人际关系中，知识界除了出现少数政治贵族以外，右派固然是政治贱民，广大的一般知识分子被称为中间派的也自然成了二等公民；就连左派中的许多人，不能因缘时会、见风转舵、虚夸欺瞒的，也难免往往陷于困惑和惶恐中。

从 1958 年开始揭橥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

民公社经过一个短暂的狂热期，导致了国民经济的破坏，哀鸿遍野。应该承认这是一次危及亿万人民生存的失败。这个失败同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有没有一些因果上的关联呢？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毛泽东自己从另一个角度否定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他承认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各次政治运动都没有“解决问题”。他要解决的依然是如他所说，把政权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的问题，坚持他认定的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因此他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来说这样的文化大革命还应该七八年又来一次，不断的搞下去。有人说反右派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我以为不如说是序幕。反右派以前党与知识分子，党与政治界、工商界、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宗教界的关系中，逐渐积累了一些这样那样的矛盾，再加上国际国内许多因素（包括某些历史偶然性）的影响，引起了1957年春夏之交“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及时地不失时机地发动反击，实现了酝酿有年的“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反右派斗争是历次以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政治运动（在两次运动之间则是党的政治工作）的狂飙式的继续。毛泽东称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那就不仅仅是反右派斗争的常态的继续，而终于形成一场毁灭性的民族灾难，直接株连的受害者达到一亿人，还不说因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而影响生计的更多的人们。知识分子问题不是文化大革命惟一的内容，但从“五·一六通知”的指向，缺口的打开，“破除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倡导和实施，到实行对整个上层建筑包括文化领域的专政，在在又都是知识分子首当其冲的。

如果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失败的实验，如果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解决过去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没有解决的问题，那末，强调反右派斗争当时的胜利是没有意义的。从历史的

高度看，即使不说它如文革一样是一次一时看来似乎胜利而长远看来是事与愿违的实验，不说它给知识分子、给文化建设、给国家民族以至给中国共产党导致一系列恶果，也应该指出，后来实践证明，其发动者毛泽东也认为它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因此不能算作是胜利。

而如上所述，右派和广大知识分子肯定是反右派斗争的失败者。

然则，反右派斗争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

据说，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工作人员申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一次没有胜利者的反右派斗争的历史该由谁来写呢？

我的湖南籍朋友，在划为右派分子后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仍然坚持鲁迅研究，卓然有成，进而染指现代史研究的朱正，毅然担当了这项工程。他不以曾沦为失败者而自馁，由春及秋，日夜相继，孜孜不倦，数易其稿；广搜博览，严格依据已经公开发表的资料，事事有来历，句句有出处，力求在最大程度上让历史得以本来面目出现，这是真正史家的风格，学者的态度。

著者嘱为序，我借此机缘谈一点粗浅的体会，不成熟的看法，附随宏篇，一起请各方面读者教正。

1993年12月26日

由一个案件引起的思考

——夜读抄

《东方》杂志创刊号上，有一篇梁治平的文章——《失范中的法律》，就程春莲案件作了一些剖析。据《报刊文摘》1993年2月11日报道，黄石市石油化工协作分公司业务科副科长程春莲，为湖北浠水县购得2800多吨汽油、2400多吨柴油，解决了当地严重油荒，其本人提出每吨返利140元，经县领导指示“通融”、“破例”，同意从银行提取现金共计76.75万元，付给程作为“好处费”；程因此被判受贿罪，1992年4月3日执行死刑。这是一件旧闻了。

梁治平的文章分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先谈了法律上的争议。刑法第185条第三款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或者介绍贿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梁文说，有受贿之人，自然有行贿的一方；受贿既属犯罪行为，行贿又岂能无咎。法律于受贿条款之末，订定行贿罪名及罚则，于理甚合。正因为如此，本案判决以受贿罪处被告死刑，而对另一方的行贿行为却保持沉默，不但不能服被告之心，也使得旁观者禁不住要问：谁是行贿者？

论者认为这件离奇而又实在是平常不过的案子给法律出了道难题，这难道显然不是搬用法律条款所能解决。在梁文第二个部分即社会学上的观察里，指出法律面临的困境：按法律的逻辑，要求在惩办受贿者的同时，对行贿者也一并予以惩罚；社会现象的逻辑赞成对受贿者的处罚，但是完全无视行贿一方。法官在左右

为难之际，终于选择了一条实用主义的路线，保留了法律的这一半，而把那一半去迁就了现实。出此下策，正有其不可说的苦衷。“程某的牟利行为……当受处罚……且并非不能够找出法律上的依据。至‘行贿者’则不同，虽然判定‘行贿’的法律理由最充分（就受贿罪名已经成立、判决生效一事而言），追究行贿者的道德理由却不充分。”“浠水县人民有权力发展经济、追求富裕，手段虽有可议之处，但是动机纯正，目的正当。当缓解‘油荒’已成本县发展经济燃眉之急的时候，一味强调其行为的合法性，岂非苛求？”论者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前后一贯的法律遇到的不是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毋宁说，这是一个迅速变化的和混乱的世界，其中，合法目标与合宜手段往往不能一致，主观之责任与客观之压力常常难以分清，而寻找合法与非法之界限的努力每每不易奏效。这种复杂社会情态可以借社会学上的“失范”理论部分地说明。

梁文告诉我们，“失范”的概念是由迪尔凯姆引进现代社会学的，他用它来描述当社会规范不得力、不存在或互相矛盾时，在个人和社会中都会出现的混乱状态。一个高度失范的社会有解体的危险，因为它的成员不再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标准。依照这种理论，社会异常行为（包括犯罪）主要不是源于行为者的个体缺陷，而是出自文化与社会结构之中。

论者接着说，今天在我们这里，正流行着一种压倒一切的价值观，在社会叫做发展，在个人叫做发财，然而实际上，社会为汹涌潮流提供的宣泄渠道十分有限，同时，迅速的社会变迁以及新旧交替中许多旧事物抑制新事物的情势，更造成种种混乱，为各种异常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以致失范状态渐成社会常态，遵守规范者反被视为无能而遭人轻蔑。以本案来说，浠水县领导若不愿“通融”、“破例”，必被视为呆板、迂腐；而该县有关人士面对“油荒”束手无策，又一定令一县人民失望，遭人耻笑。事实上，

本案中浠水县之境遇及其所做所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此也具有相应之正当性？），涉身其中的各当事人也一定不认为（甚至是不曾想到）自己的行为与刑法上的“行贿”罪有何关联。即使是身被极刑的程某，她在向浠水县提出每吨石油返利 140 元的时候，也未必明白意识到自己是在“索贿”。难道在她身边不是每天都能听到和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处在这种境地中的法律不但可能迷失方向，而且就在它能够明白无误地确认其方向的时候，也可能难以保全其逻辑。本案就是这样一种典型。”

梁治平在文章最后说：“在这一案件中，法律只完成了一半，另一半则消失在它的‘现实感’里面。公道地说，法律采取的这种实用主义策略未尝不含有积极的成份，但是它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法律在作出自我牺牲的同时，不但丢弃了自己的尊严，而且认可了社会的失范状态，而消除失范状态、实现有效的社会控制原本是法律的生命。”

梁治平先生是法学家，当他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他的笔和他的心必定都是沉重的，我想。因为我仅仅作为一个读者，读到终篇，也不能自己地陷入沉重的思绪中。先是被他对程某案例鞭辟入里的解剖与透视所吸引，当话题转入社会失范的探讨时，值得深思的就远远不限于个别案例，甚至不仅仅限于法律问题了。

读后略作摘记，更应请读者阅读原作。

1994 年 3 月 17 日

卡廷纪念碑

1943年纳粹德国宣布在苏联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卡廷森林发现大批波兰军官的尸体。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则指控对波兰军官的屠杀是德军所为。纳粹无恶不作，单是犹太人就杀了几百万；而苏联是反法西斯的盟国，斯大林又是和罗斯福、邱吉尔并列的三巨头之一，世界舆论自然更倾向于相信苏联。只是具体证据不足，这成了纽伦堡审判后还需继续调查的一项“纳粹罪行”。时过境迁，几十年间只有波兰的死难者家属还没有淡忘这个历史之“谜”。其间波兰政府似向苏联办过交涉，但只要知道一点苏波——上溯到俄波关系的历史，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竟可以因波兰演出19世纪大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诗剧《先人祭》而提出抗议，也就可以断定那交涉是不会有结果的了。

于是，好像一切真应了斯大林说的一句话：“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然而，事实是顽强的，历史不会迁就任何人歪曲和篡改它的意愿。1990年，苏联发表声明，承认卡廷惨案中1.5万名波兰军官被杀是苏联警察干的。历史没有永远解不开的“谜”。

报载，今年2月波兰和俄罗斯两国政府签署了有关协议，俄国将承担为卡廷惨案被害者修建墓地及纪念碑的大部分费用。

我想，一切都会按协议进行吧，只是想不出将来纪念碑上镌刻些什么？

纪念碑是为了死者的家属纪念他们的亲人，波兰人民纪念他

们的同胞。因为他们在作为战俘期间被非人道地杀害,而且是不明不白的杀害,杀害后还被推诿罪责的人掩盖真相近半个世纪之久。

我以为,除非立一座无字碑,否则,碑文单是表示家属和同胞对死者的哀悼和怀念是远远不够的,既不足以慰死者于地下,也不足以铭记属于全人类的深刻历史教训。

应该在碑文中郑重地写上:这一次二战中发生的大屠杀,不是什么人的率尔决定或下级官兵的盲动行为,而是经由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议实施的。然后,针对德国的宣布和世人的指责,苏联政府声明断然否认,可称理直气壮,义正辞严。战后,经过对斯大林在国内肃反扩大化等问题的揭发批判,无论是赫鲁晓夫或勃列日涅夫或契尔年科或安德罗波夫主政的时候,在卡廷惨案问题上都没有松口,没有吐露真情,没有替他们承袭的苏联党和政府承担相应的历史责任。制造惨案和掩盖惨案真相,责任有大小,各有各的账,但都应该笔之于书,因为这不仅涉及苏联史,苏共史,苏波关系史,苏德关系史以至二战史,并且是整个国际共运史和整个人类文明史都应该永志不忘的。

在卡廷惨案的前因后果如实地写在纪念碑上,使当代人和后代人从而思考前此后此的类似事件,思考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怎样使之从此不再发生。这就是这个纪念碑之为纪念碑的意义。

斯大林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那恐怕指的是用笔和铅写印的书本,如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要读本》。但历史已经证明,真相终将大白,历史的每一个当事人,都以自己的作为或遭遇书写了自己的历史,无论胜利者或失败者,屠杀者或受害者,在历史面前人人平等。

纪念碑是后人树立的,只有反映了历史本来面目的纪念碑,才是真正的对历史的纪念。

1994年7月17日

中国人全都堕落了么？

如果说中国人全都堕落了，我不同意。我经常接触不少中国人，有知识分子圈里的朋友，编辑、记者、作家、学者，教育界和科技界的，已到高年阅尽沧桑历经坎坷而忧国忧民壮怀依旧的，春秋鼎盛后来居上粪土当年而思维敏捷目光如电的，他们没有堕落；日常生活中几乎每天碰面的，幼儿园老师、商店小吃店的售货员服务员、农贸市场上的卖主和顾客、早出晚归辛辛苦苦挣钱过日子的街坊邻里路上行人，也都没有堕落……自然我闻见所及的范围很小，但我也相信我没有接触的人就都堕落了。

然而我们听到的，是整个社会精神大崩溃，道德大滑坡——是整个社会啊！那怎么能排除我和我所熟悉、且敢为他们的精神没有崩溃、道德没有滑坡作证的朋友们呢？

再一个然而，社会是由各式各样的人组成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总不会一刀切，有堕落的，就有没堕落的，堕落的也有程度不同、陷入深浅，还有介于堕落与没有堕落之间的……他们各占多大比例呢？没有认真的调查和确凿的数据，没有定量分析，断言大家都堕落了，不嫌太轻率吗？不是叫没堕落的给堕落的陪绑，造成“彼此彼此”的印象，“错误人人有份”，真正堕落的倒好金蝉脱壳，或者反过来数落以至审判没有堕落的？

第三个然而，究竟什么叫堕落？宏观上整个社会的精神崩溃和道德滑坡，微观上每一个人精神、道德的堕落，都有哪些表现？以什么作为衡量的标准？

把当前中国人“一锅烩”地指为堕落的，也并不能一锅烩，要作具体分析。大家看看他们各自一贯的言行，就可以去粗取精，由表及里；这样，至少先把本人清白，但是恨铁不成钢，而对某些现象不能容忍斥为堕落的人，同某些把全中国和全体中国人说得一无是处，以便“万人如海一身藏”的人，清清楚楚区别开来。

甚至同样的话，语气不同，语境不同，意蕴也大不相同，更不用说还有不同的潜台词。

有人讲堕落，指的是文明礼貌、职业道德这个层面，这多是被磕头碰脑的一些恼人的事激发出来的。

有人讲堕落，指的是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如贩毒走私，包娼包赌，拐卖人口，这些在“文革”前或已敛迹，或只在小范围变相存在，近年半公开甚至公然面世。

有人讲堕落，指的是贪污贿赂和吏治腐败现象，少量公开报道的已结之案，以及未获立案处理的公开的秘密。

有些已经不仅是道德问题，因为不但违反党纪政纪，而且违犯现行法律了。而有些属于社会公德或私德的问题，尽管也叫人生气，可没犯法。这两类统统用“堕落”一言以蔽之，就显得过于笼统了。

在我们的语词里，这样的模糊用语实在不少，更多的是在模糊中又有需要细细品味的酸咸之辨。如“党内的不正之风”和“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便是；认为党内出现“不正之风”，是受了“社会上的歪风邪气”的侵袭、污染、影响所致。工农出身的党员干部与非劳动家庭出身的女子结婚，一旦男的出了什么纰漏，或是遇到政治运动，都要说是受了“资产阶级腐蚀”；甚至被恃权侮辱以至奸污的女子，还难免担一个“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恶名。

这种由来已久的思维定势，忽略了中国1949年以来的基本现实，即共产党已处于执政地位，不仅对国家实行绝对领导，对社

会生活直至其日常方面，也起着主导作用。不能低估党的政治运动和运动前后、运动中间的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低估党在改造社会结构的同时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人的巨大威力。所谓“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村干部”，一级看一级，“社会上”的人们不少是从党员干部的实际行动或言行差距中寻找自己的行为规范，寻找自己遵纪守法的界限的。此外有两极，都是我行我素：一种自持作人的准则，不随波逐流，难免不被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还有一种，则向违纪犯法而不受追究的人攀比，超标过线的固然伸手被抓，“比上不足”的有时也成“垫背”。这些是人人都有见识，不消细说。

无论老传统还是新传统，我们谈教育，都是讲言传身教。那么如果说社会风气出了问题，人们的精神文明、道德面貌出了问题，溯源于教育，怕不是言传不足，而是身教坏事。言传与身教脱节，这现象本身就是一种无言之教，教人弄虚作假，说谎骗人。比起言行不一，倘不说危害更大，至少也不小的，是为坏事和恶行辩护。我记起“走后门”之成风，大概在“文革”期间，特别是军队“支左”以后更厉害了，走后门参军呀，走后门上大学呀，……人们啧有烦言，偏在这关键时刻从什么地方传出一句话：“走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走后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坏人。”好家伙！过来人都知道“文革”中“好、坏人”之辨的厉害，江青口出“坏人”两字就能置人于死地；于是众人息喙，天下太平。后来有些反对走后门的还得到一项虚拟的罪状日：他反对走后门是因为他无后门可走，有得走也早就走上了。广而言之，你没有贪污没有奸淫妇女，也是因为你没得到机会罢了。原来如此！中国人果然早就全都堕落了。

但在同样抱有堕落以至犯罪愿望的中国人中间，谁拥有最多、最优先的堕落以至犯罪的机会呢？

像走后门这样的事，既然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在权威的

“道德法庭”上也算不上堕落，只要是“好人”则走后门仍然是好人，名誉无损，实惠照收。触类旁通，何乐而不为？

我以为，这是“文革”的一个重大遗产。当然不是说“文革”中走后门是最严重的问题，也不是说“文革”前就海晏河清，一切皆好。事实上历次政治运动已经培养或助长了尔虞我诈、告密诬陷、罗织人罪、踩着别人向上爬的恶劣风气，至文革登峰造极，搞乱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人际关系规范，诡辩术式的宣传使很多人堕入恶德而不自知。

“文革”这一课，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权力拜物教”。林彪在阐述“有了权就有了一切”的时候，已经把权力同金钱联系起来思考。他说，有了权，穷光蛋一夜之间可以变成百万富翁；丢了权，百万富翁一夜之间可以变成穷光蛋。于是又有“金钱拜物教”，两教合流，可谓双轨。权是多么好啊，钱又是多么好啊，升官可以发财，升官为了发财；从“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到“千里为官只为钱”，这是中国皇权时代老百姓对大小官僚的观察与思考，实际上也成了那些官僚们心里真正的“官箴”。一脉相传，不绝如缕。权力对人的腐蚀是无情的，金钱对人的腐蚀更是快速的，何况有人迎着“腐蚀”上；堕落的机会到了！挟权力以自重的特权得金，以金钱为后盾的用钱买权，在权力和金钱双轨上驰骋，惟这些得风气之先的人物，才有资格充当已经堕落的、正在堕落的、准备堕落的中国人的代表。但是他们有资格在中国人面前进行关于精神、道德云云的说教吗？

大约在1987年，我写过一篇短文，说要够得上称堕落也不容易，那是须先在一定的高度上，才有堕落可言的。倘是从来就在一片什么低洼阴湿肮脏腐烂的地方蝇营狗苟，怎么当得上“自由落体”呢？从那时起，几年间我真的又看到一些原来不属此类的人，落到或曰驰骋到这个所在，其中颇有一些是阅世不深但中毒不浅的年轻人，使人惋惜。

不管他们是以谁为师，反正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会以他们为师的。

1994 年 8 月 20 日

史 外 说 史

历史是任人抻、任人捏的黄土吗？历史是像当年有人说过的任人打扮、任人摆布的村姑吗？

一说历史，人们想的首先是汗牛充栋的典籍，是竹简上、帛书上、梨枣木版以至石印铅印胶印在纸上密密麻麻的一行行文字。文字自然是可以涂改、挖补、删除的，更省事的办法是书写和印刷那些无须涂改、挖补、删除的文字。这就是形诸文字的历史，也就是所谓墨写的历史。

不能不承认历史是靠文字流传，但真正的历史是在文字背后、文字以外的，是独立的存在，是一经发生就无可更易的。真心想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家，把闻见的史实和自己的见解托之于文字，怕已经难免遗憾；后来的读者想要透过文字来“通古今之变”，又怎么能不大打折扣？

我们还有一个传统，“文史不分家”：视《史记》为“无韵之《离骚》”，把历史著作当成文学作品欣赏，要求史家讲究文采，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这同时，墨写的历史不仅夹注中而且正文里就都不断混进了虚构的成分，有增必有删，有删必有增，于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累得往后多少历史学家质疑、核实、钩沉、补正。

比如说屈原吧，由于司马迁写他的列传有漏洞，有语焉不详之处，有人怀疑是否确有其人，我所尊敬的杨宪益先生就持怀疑观点。——尽管署名屈原的作品，特别是《离骚》，总归是有一位

作者，而不是由古之王洛宾记录的。——在并不怀疑屈原其人之存在的时人当中，最近对屈原生平以至死亡生出一些说法，其中有一种是在郭沫若剧本《屈原》的基础上发挥的，即谓屈原是在与郑袖的私情和政派的纷争的夹缝中，被政敌谋害；后世的划龙舟乃纪念他乘船逃亡，吃粽子则暗示他被装进麻袋捆绑沉江，这一揣测颇有民间传说的神韵。但此说不是作为影视创作的构思透露，而是作为史学上的一家之言来鼓吹的。

如果这样的想象受到鼓励，我倒想提出另一个大胆的假设。听说汨罗江发现金沙，自发淘金者已把江滩与河床弄得一塌糊涂，江心耸出沙堆，人称汨罗山，恐怕是带着苦笑。岂不可以设想发过《天问》的屈原，早就窥见金沙消息，遂下水一探，而竟不幸灭顶么？汨罗浮云变古今，以今例古，虽稍涉荒诞，比起有些《武则天》小说来，也还不算太离谱吧？不过所有这些，不能冒充历史，替代考据。有道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只是以笑谈对屈原，显得残酷了点。

60年代初期，围绕着历史剧和所谓文学真实与历史真实的问题，有过一场满够热闹的讨论。鬼使神差的，直到批判《海瑞罢官》，那些书生气的议论才忽焉沉寂了。如今是90年代了，出现了不少以重新诠释历史为名问世的历史剧和历史小说，除了叫好的以外，几乎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历史学家的声音。

人们深化了对历史的认识，就某一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重新加以诠释，或作出不同的评价，也是理所当然的。如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关系，历来爱说“三千宠爱在一身”，并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为例，鲁迅一语道破，大意说帝妃之间要靠盟誓来加固爱情，那爱情必定岌岌可危了。《新民晚报》开辟文史新谈栏目，有一篇文章剖析“霸王别姬”，大意说是项羽怕虞姬落入敌方手里，这一心理直接导致了虞姬的自刎，项羽虽未明示，只是连说“奈何”“奈若何”，聪明的女人已经会意了。后来的崇祯皇帝城破时以刀

断公主之臂，当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在这里，墨写的历史和文字外的历史没有什么出入，而慧眼穿透纸背，烛见了历史上人物关系和人物心理的深处，使人有茅塞顿开之感。

随着新的史料包括地下文物的发现，对若干史实的记载加以订正是必要的。卡廷惨案的真相已由俄国档案的公布而廓清，半世纪的悬案总算落实。然而有些围绕历史做的文章，例如日本文部省修改教科书，日本高级官员发表谈话，为日本侵华罪行辩护。则是睁眼抵赖，歪曲和篡改历史；但血写的事实，是用唾液冲不淡，用油墨也涂不掉的。明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我们中国人有责任把反法西斯东方主战场上的历史如实地张扬给世人，也给我们的国人。

据说国内这方面的出版物出了点什么问题，就是讲国民党抗战的书多过了讲共产党抗战的书，给人的印象好像只有国民党在打日本似的。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当然知道那八年里各个阶级各个战区和敌后的情况。1945 年中共“七大”朱德总司令作《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论述了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敌军兵力、消灭敌有生力量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并未否认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重大作用。只是经过后来三年内战中的对垒，此后大陆出版物中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字，从强调国民党几次反共高潮和一直不断的摩擦，到几乎完全不提国民党军队的官兵也曾经浴血奋战，保卫国土。在修史治史的指导思想上，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作为一种方法论，一种历史观，常常会对复杂的问题采取简单化的态度和方法，陷于一偏，矫枉过正，于认识于实践都是不利的。

大约 10 年前，因有彻底否定“文革”之说，不少人呼吁写“文革”史。其实我们历史著作的缺项岂止于“文革”10 年！每当国外某些人想要改写历史，比方日本有人翻侵华一案的时候，我们就想起应该加强对我国青少年的历史教育；然而 150 年的近代

史，或 20 世纪以来的现代史，所能提供的历史经验，显然远不限于外敌入侵和“毋忘国耻”。比方我们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本像样的经济史？其中不仅有几代为中国之富强探索新路者的心血，而且有千百万工人和亿万农民的血泪、血汗、血肉！

没有信史——即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的，比较可靠的历史记述，我们就会在现实中迷路，我们以至下一代甚至可能重蹈覆辙。“文革”中的青少年上当受骗，有诸多原因，不知历史是原因之一，岂止青少年，但青少年受害最苦。“文革”当中很厉害的一手，就是“复课闹革命”以后，连小学的历史课也取消了；按照当时政治课的口径灌输一点所谓历史知识，然则历史这个“村姑”已经不止被任意打扮，而是被任意强奸了。

不久以前，见李辉文章转引《金光大道》小说作者的两句话：“用笔反映真实历史的人不应该受到责怪；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应该有活下去的权利。”这话倘在“文革”中说出来，足可令人钦佩发言者出于公心、仗义执言的勇气，因为那时候“用笔反映真实历史的人”们岂仅受到“责怪”，而且受到迫害甚至活不下去，而“真实地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只有被焚被禁的命运，哪里谈得上“活下去的权利”呢？斩尽杀绝是不可能的，死者已矣，但仍有幸存者，大家清楚那时候不受责怪而受“鼓励”的是什么样的人 and 什么样的笔墨。对那一段记忆犹新的历史，不妨有别样的“诠释”，但以无数死者伤者的鲜血和生命所写的事实，难道能那么容易地为墨写的谎言所掩盖，如同“文革”中用一张大字报覆盖另一张大字报吗？

1979 年过长沙，曾见到前辈作家康濯，从“文革”说到“文革”前，不记得怎么提起他 60 年代写的《东方红》，他表示了一种歉疚和不安，我理解：他正视了自己的历史。我与他并不熟稔，也听过一些人对 他这样那样的议论，但我相信他毕竟在主要的问

题上接受了教训。后来读到他逝世前不久关于胡风案件的回忆录，我就不再怀疑它的可信性。是的，如果一个人不能如实地认识和表述自己的历史，又焉能指望他“用笔反映真实历史”呢？

历史啊历史，存真而崇实。我们希望文字记录的历史都说真话，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在历史问题上说谎的人必定有其现实的目的，在现实生活中说谎的人，在历史面前也不会有多老实。不过，在有人以谎言篡改历史的同时，真实的历史也会记录下一些——至少是历史性的谎言。1958年全国广修厂史村史，后来不见续修。困难时期的情况因此少见著录。以我住过5年的河南省为例，曾以最早“放卫星”（小麦亩产7000斤吧？）和最早成立人民公社（ 崂山“人民公社好”！）名噪一时，浮夸风加上共产风，成了重灾区以后怎么样呢？从豫剧《谎祸》和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可以略窥一斑；多年未去河南了，那里朴实憨厚的乡亲们该在中原大地上书写新的历史，不再惑于陈旧的谎言了吧？

我们当然也还希望能“反映真实历史”的文艺作品，使我们从而接近历史的真实，然而在正常情况下文艺创作不应该代替历史著作；尤其鉴于当前有些所谓历史题材的影视、小说作品，往往不过是借古人的几个名字，古事的一点因由，大骋才情，匪夷所思，那就还是宁可彻底地“文史分家”，免得人们把虚构误认为纪实。

以上云云，史外说史，无非表达一个多少关心现实因而也关心历史的读者对历史的尊重，对历史的真实的尊重，对作为历史的主人的人民的尊重。我们几代人在历史的迷途上走了长长的之字路。但愿新一代的青少年，能够带着清醒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感跨入下一个世纪。

1994年10月6日

评“红”长简

——读《残缺的窗栏板》后与李辉书

李辉老弟：

谈说红卫兵，必然要连带着谈说造反派，谈说文化大革命。我大概做不到像你那样从容。可以抑制自己的感情，但我是不是能够使认识尽量地接近实际，我完全没有把握，除了掌握资料的限制以外，还因为我在方法论上仍属于马克思主义有时且是经毛泽东解释的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影响甚深，难免“身在此山中”也。

回忆我在 1966 年，从 8 月下旬至 12 月下旬，处于被隔离状态。这正是红卫兵运动的高潮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组诗词，歌颂毛泽东、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包括“九州神俊，号令风霆迅”的大串连，以及为保护红卫兵殉职的蔡永祥烈士；写的时候没有任何具体的功利目的，悉由自发，十分投入，就像 50 年代初期歌颂五年计划建设时一样。这不能仅仅归因于只有《人民日报》一条信息来源，而是多年的训练所形成的思维、感情和行为定势。我想绝大多数红卫兵以及因年龄特别是因出身关系未能加入红卫兵的青少年，怕也都是这种状态；他们比我更加少不更事，更缺少社会政治经验，也更情绪化，更容易轻信和盲从。

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我要避开个人经历以及个人感情好恶，力求冷静地回溯一下那段无疑必须直面的历史。

毛泽东面对 60 年代中期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社会矛盾，他认为如果这些矛盾不能按照他的意愿加以解决，就将导致苏联那样

的修正主义上台，那末中国的赫鲁晓夫就会把他当作中国的斯大林端出来；他又认为社会矛盾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只有抓路线斗争才是抓住了牛鼻子，他要回到第一线来炮打意欲排挤、排斥、排除他并已见端倪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为此他首先要一反自己一向主张的对党内实行“小民主”的方式，而以狂风暴雨式的“大民主”，即发动一切可能发动的群众，借用一切可能借用的力量，以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冲击上层，其间不惜突破自有共产党以来的惯例，让党外的红卫兵“革命小将”跻入党的中央全会，给刘少奇以至周恩来和几乎所有老干部弄了个措手不及，瞠目结舌。为了稳定大局，借重林彪，所谓以“解放军这尊神”压住阵脚。以上云云，是文革发动者、统帅者在运动初期的战略部署，一切确是如所预期地大体实现了的。论者把这时表现为席卷全国的狂潮的“群众运动”叫作“运动群众”，毛有从 40 至 50 年代从解放区到全国、从党内到党外积累起来的权威资源（这一资源从 50 年代后期有所折损，随后则由军内辐射全国的个人崇拜所补充），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得心应手尽在意中。中外历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自下而上的，他却独出心裁地发起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真是史无前例了；然而也还不是没有前例，中国古典的“汤武革命”，商汤伐桀，武王伐纣，不都是从上而下地号令军队，去从下而上地推翻另一上层人物或集团吗？直到后来若干年间，这也符合中国农民“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引申为跟着这个好皇帝去反那个坏皇帝）的心理。

毛泽东在运动初起时就打定主意，甘当打鬼的钟馗。他是要打鬼的，他心目中所要借助和要借助于他的人们也要打鬼。那鬼是谁？有上了文件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是走资派，是遍地开花的一切牛鬼蛇神；居于打鬼地位而不是挨打地位的，还各有一本帐，各有花名册。响应“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号召起来的，在小范围里容或自命钟馗，在全国范围则多半是真心诚意地跟定

一个钟馗，别的全不算数。林彪这个副统帅，尽管战功卓著，一时又哄抬了身价，但在当时中国的格局里，他也只是个陪驾人物，并无可以享受衷心崇拜和拥戴的资格。一个文件下来，说他反对毛主席，广大群众说转弯子就转弯子，立刻议论他的眉眼，似乎生就一副奸佞之相。在他能施加影响的一部分军队里，纷纷表态划清界限，有不服气的也不敢吭声。原先在人民中享有比林彪大得多的威望、影响直追毛泽东的周恩来，不用自己韬光养晦，已经被放在陪衬以至靠边的位置上。在所谓两派群众组织之间，周以他国际知名的外交手腕和辩才折冲樽俎，失利的一方竟在会外口头上甚至非正式的书面上呼为“周老三”。毛就这样以第一和惟一的权威的姿态君临中国，将昔日的战友、部下玩于股掌之上，甚焉者置之死地，遑论千百万芸芸众生哉！

千百万芸芸众生只是大人物心目中的驯服或不那么驯服的工具；那些积极卷入“革命”的则成了这部政治运动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然而在这里，作为工具、齿轮和螺丝钉的毕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即使是宗教徒，在朗读圣经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心里也默诵着各自的祈愿。他们投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想革谁的命，“打”什么“鬼”，又想保存什么、得到什么呢？

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进行民意测验，不然你可能看到各种各样的答案。

不知你注意没有，过来人都会记得，按照“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老规矩，一般党员和党外群众，最初只能从报纸上透露的，以黑体字印的毛泽东语录，以及言论版面来揣摩“中央精神”。真正体现了有关文革的“中央精神”的“五一六通知”、《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都是在一年以后的1967年才正式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在1966年8月12日发布中央全会公报和“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之前，人们只是看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对邓拓《燕山夜话》和“三

家村”的批判，对30年代以来的“文艺黑线”的批判，如不了解背景，就会以为主要在文艺界或扩大到整个思想文化界搞革命，革文化和文化人的命。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后的第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既称一切，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打过、打倒过的死老虎（地主资本家，“地富反坏”或“地富反坏右”），然而要打的“活老虎”又是谁呢？一切似还是扑朔迷离的。接着《人民日报》转发了北京大学那张得风气之先的大字报，加上大有来头的按语，至少大学生们立刻领悟，在校园里该怎么干，一半年来大讲特讲的教育革命，首先落实到革教师的命。大学生带头，中学生紧跟。从这时起，“两报一刊”就是这样发挥着“导向”作用；斯大林说过党报要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组织者”的。

关于红卫兵在那个“红八月”的诞生，大概已有亲历者的记述。我以为有三件事应该着重提到。

一是虽在一般青少年主要指大中学生里，茫然面对着革命的号召的是多数，因为他们是平生第一次遇到要他们参加一个“大革命”的机遇，不像刘少奇所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只是一种遁词（以他多年的党内外斗争经验，他对矛头所向尽管震惊，却必定是了然的，用不着《炮打司令部》点穿才明白）；而在“革干”子弟当中，早已从父辈议论小道消息和种种蛛丝马迹当中有所察觉有所领会有所发现有所倾向，他们知道这一场斗争“关系着党和国家的命运”，首先意味着关系到他们的父母和自己的政治命运，社会地位。最早把“炮打司令部”首先是要打击刘少奇的信息传出来，并且点了名的就是他们。在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他们义无反顾地扮演打先锋的角色，因坚信自己的父母不是走资派而理直气壮，毫不留情；只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自己的父母也在反走资派的斗争中受到冲击，才显出尴尬，其中有的坚决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像小说《伤痕》的主角那样，有

的因此而对文革不满，成了反对文革的“反革命”。

二是有关出身问题的辩论。这是在阶级路线的总题目下做的文章；早在1963年中苏论战中“九评”就按毛泽东的意见写进了须防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作革命接班人——即党政大权继承者的严重教训。对于上述“革干”子弟来说，所谓“党和国家”变不变色的问题，既然系于“接班人”，他们继承父业坐江山是当仁不让的。基于这种心理，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并就此发起一场辩论，几乎可以视为这批“青年近卫军”为捍卫父辈“打江山者坐江山”的神圣执政权，也捍卫自己作为接班人的神圣继承权而投身文革的舆论准备和资格审查。出身于工农劳动者家庭的孩子们，在这场辩论中以同盟军的身份，与“革干”子弟共同组成“红五类”。对立面是“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并扩大到一般知识分子——被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在历次运动中受过冲击、受过审查的，或有一些这样那样所谓问题的人的子弟。他们许多在“十六条”公布前，已经跟老师一起挨了批斗，功课好的就是“修正主义苗子”，挨斗师生共同的罪名是在教育领域“复辟资本主义”，目的是为了来日在全国搞“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换句话说就是只配当“革命的对象”，当不了“革命的动力”。“不准革命！”只准“革自己的命”，就是检查自己，揭发家庭，往脑袋上扣屎盆子。有些人认命了，做了所谓“逍遥派”；有些人不甘心，后来也拉起了戴红卫兵袖章的战斗队。可见同样叫红卫兵，其群众基础和构成颇有不同，利益动机以至内心情感趋向也自不可能全无二致，然而在实际运动中，“出身不好”的红卫兵，为了取得表现革命性从而获得平起平坐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性，必须同“出身好”的红卫兵比赛谁更“忠于毛主席”，他们做了差不多同样的过火行动。这就使当时一般的成年人和后来的局外人都很少对数以亿万计的红卫兵作哪怕稍稍细致一点的区别和分析。

应该说到，当时主张“老子英雄儿好汉”的代表人物叫谭力夫，据报道现在心气也平和多了。而另一个为反驳唯（阶级）成份论而写了著名的《出身论》参与辩论的遇罗克，则已在当时所谓公审判判后被处极刑。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中，《出身论》和另外几篇论文，如《中国向何处去》等等，是仅见的几份带纲领性的文件，体现了执笔者的宏观思考和理论才气。

三是“十六条”公布后兴起的“破四旧”运动，这是以当时初露锋芒的红卫兵为主体，裹挟了大批大、中、小学学生干的，按之中国的法律，这绝大多数不足十八岁的未成年者，是可以免于追究的，且时至今日，追诉期也已过了。这恐怕就是你在“残缺的窗栏板”前听人“说古”的语气那么淡淡的，略无激动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人们对无可奈何的事情，对无力扭转的命运，都是采取这一态度：有谁对水灾、旱灾或地震激昂慷慨地控诉过吗？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十六条”说要破除“一切”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无异于发出了号令：是“一切”啊，无须界定，放眼所见，触手所及，几乎无不是“四旧”的载体，理合破除之，砸烂之。似是杭州市的学生带头干起来，似是胡乔木写了一封信加以肯定，推波助澜，此之谓也。不能见物不见人，在“破四旧”的同时，把“封资修”的代表人物和社会基础加以扫荡，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北京城里大街小巷兴起一股抄家风，所谓“黑五类”死于非命者，至今未见正式的数字。从京郊到数千里外的湖南道县，都发生过一村一乡集体屠杀“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的惨案，老弱妇孺，皆难幸免。这不能全记在红卫兵的账上，但这场由“破四旧”引发的红色恐怖，开始主要是红卫兵煽起和实施的。

红卫兵又是被什么煽起的呢？这些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什么政治运动，无论是看似文明的开会围攻，还是大打出手的私设公堂；更没有见识过北洋军阀、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军警宪特和江湖

帮会。后来知道他们对所谓“阶级敌人”例如他们的老师们采取的残害虐杀的手段，却原来是从革命小说《红岩》里的国民党特务那儿学来的。他们一直接受的是革命教育；他们坚信雷锋的话，对阶级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更坚信《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说的，革命要不得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不暴烈还算什么革命？而当实施暴力时，比方用皮带扣抽打老师的额头鬓角，由于意识到这是代表革命的阶级施之于反动的阶级的革命行动，赋有天然的正义性，心理和行为仿佛都有了后盾，故能不皱眉头不眨眼地干出正常年月正常人不可想象的事情。

在任何世代，青年都是孔夫子所谓“血气方刚”，不安于现状——个人的现状和社会的现状——的一股力量。毛泽东成为共产党人以前，放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书生意气，在文革初期的广泛流传，变成红卫兵的口头禅；其实这句豪言壮语的实质，与其挂靠到现代的民主意识、公民意识，毋宁说还是渊源于儒家的“舍我其谁”和“以天下为己任”。它在不同处境的年轻人里都唤起了共鸣。对于“根红苗正”的子弟，他们感到“我们”已经不止是“未来的主人翁”，而进入现在进行式。对于以出身为憾的那部分青少年，他们在入队入团或其他场合已感到或隐或显的歧视，他们努力让自己相信“有成份论，不唯成伦论，重在表现”的诺言，他们要以现实政治表现争得“革命”的权利，争得社会公正原则在自己身上的实现。这种想法无疑是天真的，但在当时是合乎他们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的。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模式中，革命的领导者认为革命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的手段，其他一些不安于现状的人也会把革命看作可能改变自己处境的一个机缘。争当革命者在这个革命的国度里是永不过时的风尚。即使是已被打翻在地的革命对象，也还是声言要以革命者的标准自律，“革自己的命”，为的是以后仍有可能继续干革命——亦即革别人

的命运。

不知你注意没有，任何称得上革命的暴力行动，都是跟无政府主义分不开的。也许因为革命者的性格总是“非圣无法”、“大逆不道”，而革命行为又总是离不开对现存秩序的“打倒”、“砸烂”……我们熟悉的一些近代革命家，早年都有过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历史。60年代不安于现状的，血气方刚，要求革命的年轻人，当他们投身于伟大统帅发动的革命时，自认是按照伟大战略部署，“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理直气壮，有恃无恐，一路杀伐过去，不可能既“随心所欲”又“不逾矩”，难免带上无政府主义色彩。而从领导角度看来，认为只有“过正”才能“矫枉”，运动初期要防止右倾即缩手缩脚，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放而不收，全在最高的掌握之间；若没有因此造成的声势，是不足以慑服对手的。殆即“领导艺术”之谓歟？

不过，世事不能尽如人意。瓶里的魔鬼一放出来，可就不容易收回去了。所以原先打算的文革“三个月见眉目，五个月见成果”成了泡影。到后来，有领导的和自发的力量打派仗，互相消长，不仅危及社会秩序，而且危及由周恩来支撑着、维持着的生产秩序，动摇着政权的物质经济基础，这时候就自上而下地提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任务：“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就是“现在轮到小将犯错误了”，紧紧缰绳，岂能长久失控？这是后话，不提。不过，连在什么时候“犯错误”，也尽在别人的算中，岂不可悲也夫？

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前，毛泽东在滴水洞隐居，在长江上游泳，静观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公布后的连锁反应，各种人怎样“表演”。文艺界从前几年“整风”以来人人自危，多不知闷棍什么时候打到自己头上，此刻动作赶不上教育界。中共在全国执政前28年中是发动青年学生、掀起学潮学运的老手，何况这一回是以毛泽东的名义，于是首先在大学校园一片鼎沸。面对

这一非常情势，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企图采取派工作组的方式加以平息。工作组和党委在自己经验的范围里，无疑是按照1957年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调子，视学生的行为属于“群众闹事”性质，然后按照反右派斗争的实践经验，依靠左派，孤立右派，分化瓦解，以期达到团结大多数，平息事端的目的。不料这一套不灵了。特别是毛回到北京，批评了派工作组的做法，说出“镇压学生运动的绝没有好下场”的十分严厉的话，对热浪滚滚中的学生真是莫大的鼓舞和鞭策。“十六条”更把所谓划定右派的问题推到运动后期去处理，夺去了党委政工部门现时现刻抓右派的撒手铜。这时候毛认为群众还远未发动到预期的程度——直到八九月他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才满意地说，全国人民真正发动起来了。

一般地说，运动初期，群众初起，都是把矛头指向基层党政组织，理由是它们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时候有些聪明的政工干部，便“因势利导”地把群众运动的火引到业务技术人员和主管业务技术的干部身上去，自己躲到一边；但也有躲不开的，比如学校或其他科教文卫单位有些出身工农兵和干部家庭的人，与一些出身非工农家庭的人相比，觉得怀才不遇、提拔不够等等，指责人事干部组织路线不对头，重用坏人，以至招降纳叛，政工部门也逃不脱干系。且不说机关团体，就是人事关系应较单纯的学校里，既强调了阶级的分野，那末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以至群众斗干部、干部斗群众也就在所难免。而出身非工农家庭但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一旦被当作修正主义路线的活靶子，又怎么能心服口服，难免唤起平时因出身问题形成的积郁，他们自然有“受压”的感觉，即使他们限于人文的视野，还不能提高到自由、平等、人权的层面上来作理性的思考，而切肤之痛则使他们产生本能的情绪反应，最后不免化为情绪性的行动。

革命，当它停留在理论上时，是理想主义的。当它一旦付诸

操作，便不能不受利益的驱动，成为功利主义的。投机文化大革命的林彪和江青，比他们口口声声讲的“小将”更清楚这一点，并要加以利用。他们用毛选未收的语录如“压力愈大，反抗愈强，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号召“受压”的起来造反，江青不是说她也是“受压”的吗？林彪更狡猾，他以模糊语言，什么“好人斗好人，误会；好人斗坏人，应该；坏人斗好人，反动；坏人斗坏人，活该”，蛊惑青少年不计后果地斗斗斗，以便浑水摸鱼，从中渔利。

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场景：除了理所当然在中国城乡各个角落接受着“压迫”即无产阶级专政，“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的“黑五类”以外，这时候所有投身文革要当“革命的动力”的人，无不说自己是“受压”的，而且都能倒出自自的一腔苦水来。这不是故做姿态，矫情表演，我相信大多数发自内心，只是苦水的成份不同罢了。我认为，这是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未得到合理调节，长久积累的形形色色社会问题未得到合理解决的结果：因迷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所谓抓住主要矛盾，一切“迎刃而解”，贻误了实事求是地认真解决问题的许多机会。问题堆成了山，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刀阔斧一举彻底解决之吧。

围绕着“接班人”问题，在中央一级，毛泽东无疑是要大规模或较大规模地换班，而在基层，为发动群众，须让群众出气，他也不惜让党政干部们“经”一下大“风雨”，“见”一下大“世面”，然后像整风抢救运动后期那样搞一次甄别平反就完事大吉了。这是在政治局会上当周恩来提出冲击面过大时毛的打算，而周所指的扩大化，显然不是指基层，而至少是指省军级以上的干部。在毛实际上支持“踢开党委闹革命”时，周恩来和叶剑英等元老实际是抵制的，他们主张基层党委继续发挥作用；这一点军队因有特殊性，终于做到了，军外的基层党组织则在1967年“一月风暴”即全面夺权斗争以后，全面陷于瘫痪状态。在此之前，一

些基层党组织或工作组扶植个别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拉起战斗队，在此之后，一些基层党团组织的领导成员也公然亮相参加，他们以维护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派自命，指对立面为“右派翻天”，而他们却被对立面讥为“官办”的、“御用”的“保皇派”。

毛泽东 1966 年 8 月中旬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明确支持红卫兵的“造反”，前此两个多月，在支持北京大学那一张大字报时就已经首肯了“造”党委的“反”，而在 8 月初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则干脆把向学校派工作组等叫作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了。文革初期江青等人到处高呼“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看来多少得到过毛的默许，然则革命等于造反，造反等于革命。革命和造反，似乎是同义词。与此相对，“保皇派”是个不光彩的称号。然而，据说有一次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回中南海见毛泽东，江青嘲笑她：“小保皇，打听消息来啦？”毛泽东就说：“小保皇有什么不好？”可见毛泽东重实而不重名。造反：是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造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反；保皇：保“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皇，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皇；是文化大革命中一而二、二而一的不可分割的任务。所以，毛泽东总是强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云云。

先是红卫兵，后来加上成年人的群众组织，在谁是造反派、谁是保皇派的问题上纠缠不清，其实是忽略了彼此的共同之点。就上述的意义而言，除了个别的例外，大家都既是造反派，又都是保皇派，无分轩轻，也无分高下。大家都是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的嘛。重要的是看谁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跟得最紧，就是最忠诚最得力的；跟得不紧，打得不准不狠的，自然是不得力，甚至形成对“伟大战略部署”的干扰，那就有不忠之嫌，就是“犯错误”了。

在这里，请你务必注意 1966 年 10 月出版的《红旗》杂志 13 期社论。接着是到处印发的林彪、陈伯达在 10 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前一阶段运动的总结）的讲话。一下子就点起一把大火，使《炮打司令部》中对所谓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批评，化为“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这时候，那从 6 月至今几个月间工作组和基层党委及其控制下的文革小组（委员会）治下被当作右派打击，剥夺了“革命”权利的学生，当作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艺路线首当其冲的第一批替罪羊，受到冲击以至“处理”的专业人员和基层干部，以及其他涉嫌与“黑五类”社会关系或有海外关系等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痛感受压的人们，纷纷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这是运动初期工作组和党委（文革）沿用反右派斗争的老经验打击一大片造成的“物极必反”。加之这样一来，就把猛烈的火集中到所谓资反路线上来，而这条路线冠以刘（少奇）、邓（小平）之名，自然实际上把斗争的矛头引向“资产阶级司令部”，也就是“端正革命大方向”了。这一场大张旗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为全面夺权作了思想组织准备。原先忠心耿耿抓右派的工作组、党务工作者以及积极分子们一下被抛给群众，包括他们批斗过的群众，可以想象他们多么想不通，他们多半宁肯被称为“保皇派”而把“造反派”的桂冠让给了造“资反路线”的反的人们。前后两部分人的对立几乎持续到文革结束，犹有余绪。

事情有时看似复杂，剥到葱心其实很简单，但当你以为实质上很简单的时候，它却表现得目迷五色，复杂难辨。文革中各派群众组织包括红卫兵，并不是像共产党吸收党员那样通过个别发展的方式接纳新成员的，何况严格如共产党也有大量与党纲党章要求不相干的人混迹其间；你如果简单化到指认这个组织是造反派，那个组织是保皇派，就会大谬而不然。且不说当时不止于两派，“造反”和“保皇”也不能截然划分，前者在声明造反的同时，

同样声明自己“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还要“保”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某些人，而后者更不是一味地“保”，他们也要“造反”，其对象诸如“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切牛鬼蛇神”以至他们认为是“右派翻天”的对立面和他们认为犯了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干部等等；即使从思想上、组织上作简单的归纳也是说不清的。比如说，一部分人要造反要革命，是基于改变现状的要求，但他要改变的是个人的现状呢，还是社会的现状，对于社会现状他的不满在哪方面，他希望现状怎么样发展，他这个向往具有多少现实性，符合文革的方向吗？或者他以为是符合的，但在当时他所处的条件下，他可能真的领会毛泽东的心理指向吗？再比如说，当时在最高统帅毛泽东之下构成全国最高领导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套班子，名单变化无常，出入甚大，对于基层来说，想确认谁属于哪个司令部，有时是很费猜详的；至少省以下的情形，一些群众组织在打谁、保谁的问题上简直有如押宝，一旦“跟”的人忽然打倒了，这个组织也就不打自倒了。各派力量、各种势力都要插手群众组织，想要“跟‘（路）线’不跟人”谈何容易。尽管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小将”，特别是所谓“派头头”们，摸爬滚打了一阵后，已经不那么天真，甚焉者据说已懂得了“政治无诚实可言”，但他们又怎么能像吃政治饭的人那样应付波谲云诡的政局险情？命定只有翻船牺牲的份。他们当中少数人，肯定也曾“利用”文革提供的机会，一时达到过个人或小圈子的某些具体目的，然而多半很快就被巨浪淹没，一切如昙花一现，甚至鸡飞蛋打。当时参加“三结合”（由军代表、干部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的领导班子）的群众代表，特别是以红卫兵身份“入阁”，而能安然通过1976年后的“揭批查”，且能在位蝉联至今者，似未之闻，即或有之，也是凤毛麟角了。

社会上各种力量的合力决定历史进程。由于受到抵制，文革

期间的历史也没有完全为毛泽东所左右。红卫兵以至其他成年人的群众组织，从总体说都是不具备主体意志而主要是为执行长官意志应运而生，曾作为一盘棋上的棋子发生作用，时过境迁，鸟尽弓藏，其组织力量早如历史烟云过眼散尽，惟每一成员浸透荣辱悲欢的记忆或尚沉淀心底。沧桑看云客看过了，那通过红卫兵个体折射的历史光辉和历史阴影，还待有心人的探询和观照。

感谢你提起的话头，使我对记忆中的红卫兵——跟造反派一样，这几乎是今天人人随时可以唾骂而听不到还口的一个四散了群体——重作一番回顾；既不为作历史的评价，也不为作道德的评价。红卫兵是那一段历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浩浩荡荡“红海洋”中翻腾再三的浪涌。

红卫兵运动，这是它的旧日成员不能不痛苦地承认的，以革命信仰为名的迷信和盲从，以革命理想为名的偏执和虚妄，以革命激情为名的非理性热狂。

作为一个运动，作为一个组织，红卫兵没有自己独立的纲领，不用说最高纲领，连最低纲领也没有。它只是以“中央文革”传达的“战略部署”为指令，“指向哪里，打向哪里”；有时政出多门，没有“通天”渠道的地方或基层红卫兵，便要靠传抄的（文件、讲话）材料，靠道听途说，靠揣摩臆测，来决定自己的行止，目的却只在于表明“三忠于”，“四无限”，证明本组织是真正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

除了上述的《出身论》等外，当时也确还出现过一些陈述颇有见地的政治主张，对复杂纷纭的政治形势作出犀利分析的文字，以至有些被认定为反动宣传加以追查的，然而这只能说是红卫兵个别组织、个别成员针对目前形势（运动初期）或总结经验教训（中后期）的思考成果。作为整体的红卫兵，绝不低下的智商和生动活泼的思维，不幸淹没在八亿人口一个大脑的图腾崇拜之中；项多在具体的地方、部门、基层单位作那么一点点补充。不管哪一

派“受压”时唱的都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无限凄沧；不管哪一派，在“反‘十七年黑线’或“只反几十天的‘资反路线’”的辩论中，都陷入不能自圆其说的悖论。“革命小将”们有的抱着“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雄心壮志，有的抱着“十六条”许诺的“巴黎公社原则”的乌托邦平均主义，总之是被允许的一些无损于现体制的想法，投入这一有领导的体制内“造反”——以诉诸党外、诉诸“街头政治”的“大民主”的形式进行的党内路线斗争，也就纳入了“伟大战略部署”，在毛泽东所提供的舞台上驰驱一番，通过有节制的暴力（加上“无产阶级专政下”这一限制词的“大民主”），有限即局部战争（“要文斗不要武斗”口号下的大规模武斗），把“关心国家大事”的最高指示激发的政治参与热情，青春期躁动，以及全部心理上、体质上、智力上的能量通通释放出来，结果只是把一切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包括社会公正悬而未决的罪责推到“走资派”身上去（就如后来有一段时期把一切归咎于“林彪、四人帮”一样）。

人的能量的释放，是可以引向建设，也可能引向破坏的。不幸的是，从“破四旧”到规模式武斗，都重演了历史上反复多次的农民暴动式的，毁灭文明、毁灭生命的愚昧。为争温饱铤而走险的农民把精神文明连带物质文明的成果，都视为剥削者压迫者的物化形态，跟剥削压迫自己的人一道加以摧毁。“官逼民反”的农民暴动，无疑具有历史正义性和不可避免性。然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假手于红卫兵造成的物质性破坏和精神性破坏，难道是不可避免的吗？难道有什么历史必然性吗？

想到那个年代曾有虔诚的红卫兵，把像章直接别在胸脯上，我仿佛还能感到穿心的疼痛。当然，只记得疼痛并不意味着上升到理性的思考。但如果连感性的疼痛都已消失，那就是有形的悲剧后又一无形的悲剧了。

拉杂写来，已是黑糊糊一大片。随笔于小品合适，于“大

品”则不宜，以其不讲章法，没有结构，任其意识流也。好在不是会上发言，此类漫谈，而又长篇，乃是任何会上最最令人生厌的。想起张春桥讲话及其记录稿，就是这样黑糊糊一片不分段落的文风或话风，不禁哑然失笑。

1994 年 12 月 4 日

闲话孔夫子效益

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历史总是嘲弄人，被当作鬼打过以后，在一些自称要“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又认为其中只有儒家传统值得“弘扬”的人那里，孔子再度被捧为神，不但是神圣之神——偶像，而且成了神通之神——法宝，除了经济效益，还有社会政治效益了，“神”得很。

学者对孔子的研究和权力者的尊孔是不同的。今之学者也有尊孔的，我相信是经过研究而后尊之，不是先尊为神再来研究或不研究的。权力者是不是真的在心里尊孔，别人很难说，像袁世凯祭天祭孔，行礼如仪，但他是没有工夫研究孔子和儒学的，大约只能让御用文人去研究，从里面找对他有用的论据。陈力夫看来是真的尊孔，有他写的《四书道贯》可证，他在四书上的确下过功夫。另外一些起劲呼喊尊孔的官员，其对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传统文化——缩小到对儒家儒学的了解，恐怕顶多是《三字经》水平，有的也许连《三字经》都还没读过，耳食而已。

不要小看《三字经》，它和《百家姓》、《千字文》，直到《龙文鞭影》、《名贤集》这些旧时启蒙课本，是影响广泛深远的“通俗儒学”。

1980年4月7日上午10时，长途客车停在昆明以西84里程碑旁，忽见旅客们拥向一个地摊，不是买禄丰剪刀或鸡蛋、冷饮，有一位老奶奶卖书，白报纸油印，薄薄一本两毛钱，几十份霎时

抢购一空。那时刚下发七号、九号文件，严令取缔非法组织和非法印刷品。车开，颠簸中一片读书气氛，夹杂着品评、赞许：“有意思！”“带劲！”我好奇一看，原来不是什么时髦的异端邪说，封面上仿宋体字：“处世格言，古为今用”，双钩的书名：《增广贤文》。我当时写过几句诗，“在三家村冬烘先生的私塾里，它曾教导过我们的祖父和父亲；多么宝贵的言论自由啊它享受着，在 80 年代中国大地上争春。”

到 80 年代中后期，就有了“蒙学丛书”之类的出版，“通俗儒学”远在专家学者的视野之外，起着没有人认真调查过的可疑的作用。

近来有《新三字经》出，也许是“旧瓶装新酒”吧，没有研究，姑置不论。

在五四运动以前，特别是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以前，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中“实行专政”的，我以为并不是孔孟程朱的原著，经学大师的注疏，而是适于在识字不多、文化水平不高的平民中传播的“通俗儒学”。

孔分为八，墨离为三，除了学者，谁去管他？两千多年，才有几个皓首穷经的纯儒？圣经贤传，你以为是思想库，在权力者看来，不过是“王将军之武库”，十三经只是工具书，可以从中抽绎出为我所用的货色。子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到林彪那里就成了“小节无害论”。

现行宪法规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然而拿阶级斗争理论来说，一般群众以至干部有几个能说得清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这个学说是怎样发展下来的？还不都是笼统地包容在一个“体系”里吗？

从孔子肇始，经荀孟以至董仲舒，逐渐膨胀为宋明理学，到清代又一度大盛的今文经学，也是这样一个可称“博大”的儒学

的“体系”，也是除了专家学者以外都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认知的。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语出程颐，与孔子无关，如此辩白只有考据上的意义；况且这是由“三从”派生出来的，“未嫁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语出《仪礼》，不管是周公制作还是孔子订定的，总是公认的儒家经典，程颐之言算不上对儒学、对礼教的发展，不过是具体的阐释罢了。

孔子“爱人”，不欲杀人，但“以礼杀人”用的恰是儒学的名义；被礼教“吃”掉的众多男女老少，他们迫不得已或心悦诚服地作了牺牲时，也只知道是服膺了孔夫子的教诲不得不尔的。夫子重生，也会叹“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吧？

以今例古，想想文革时期学“语录”，用“语录”，打“语录”仗，则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也不过是格言治天下。子曰诗云，无非一条条格言熟语。干什么学什么，权力者最关心“政治文化”，得势时相信“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失势时默念“潜龙在渊”，“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下呢，却永远要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

为了让平头百姓都懂规矩，知方圆，后来就有了“通俗儒学”：不用读《诗》《书》，不用读《论》《孟》，有了一条一条更通俗易懂的格言。“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不是比“非礼勿言”更委婉体贴地“劝”人规规矩矩，不要乱说乱动吗，真就以文化的手段达到专政的目的了。

儒学，要研究；“通俗儒学”却不需研究，照办就行。

因为它是用来规范群众思想行为的。而在儒家看来，“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儒家代表人物也是认为氓之蚩蚩，多属下愚，只能由“牧民”者来“牧”，那末，实行愚民政策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因此，“通俗儒学”是一种“实用儒学”，服务于牧民者的实用。所以其中有关“治国”“平天下”的少，关于“正心”“修身”的多，庶民一个个都正其心，修其身，各安其位了，自然至少是暂时的天下太平。

被“牧”之民，如果把“通俗儒学”全盘接受下来，当作自己安身立命的处世哲学，那就正中“上怀”了。

到 20 世纪中期，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在解放区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党课教材的。其中用“人皆可以为尧舜”激励共产党员学习马恩列斯进行个人修养，用“吾日三省吾身”作为修养方法，用“谁人背后无人说，那个人前不说人？”“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作为对待党内斗争中不正确的批评和打击以至某些委屈和冤枉时应持的态度；由此不难窥见“实用儒学”、“通俗儒学”（体现为所谓处世哲学）的影响。

然而刘少奇本人的命运已经为他这一“修养”的理论和实践划了个大大的问号。

现在听说有人主张“用儒家的主体道德思想来培养‘四有’新人”了。

“四有”者何？有道德，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

儒家的政治思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境界，是个遥远的憧憬，可望而不可即，不去说它。涉及“治国”的，君臣之义，治乱之道，除去不具可操作性的以外，主要都适用于宗法制的农业社会中调节王朝与诸侯国的关系，至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抑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只是如何进行统治更有效的不同路线之争，王道云云，则是从来只见于宣传，没有实施过的。这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何干呢？

而儒家的道德理想，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有哪些是具有可操作性的？我说不清，留待提倡者去说。如果只是向各级干部

“倡廉”，要他们“慎独”即“自律”不要贪污腐败，或是标举孝顺，把“孝心”列入少年儿童“五心”活动的内容，就算是体现了“儒家的主体道德思想”，以为能就此在青少年中培养出“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来（那些正在“自律”着的干部想来早已是“四有新人”），我却总觉得是把一个严肃的问题庸俗化了。

可敬的孔夫子，在礼崩乐坏的当年，仆仆风尘，周游列国，兜售治国良方，可惜没人识货。老先生的方策，是有点“道德治国论”的味道。然而“道不行”也，奈何？他没有“乘桴浮于海”，而是留在故土了。

今天的中国，经济领域有经济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政治领域有政治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生活纷纭万状，于是有人惊呼国民的文化素质、道德素质降低了，“滑坡”了，继道德谴责之后，不知怎么想起乞灵于“儒家的主体道德思想”，或许是认为道德万能，可使各样矛盾“迎刃而解”。是不是有点“乱投医”呢？

不过，我不想给任何寻找药方的努力泼冷水。

我想有所建议。

我们办经济特区，是解放思想、大胆试验的创举，十几年来卓有成效，它所取得的经验已经辐射全国。

我们何妨办一个“用儒家的主体道德思想来培养‘四有’新人”的特区，取得经验，向全国推广呢？在哪里，我们可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一切照既定格局办；我们“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安安定定地过“太平”穷日子；大家守住宅边地，“父母在，不远游”，安其贫而乐其道，不过，主持特区的官员的子女，在官员活着的时候，依圣训也不好出国了。

1995年4月25日

疑是“语言奴役的创伤”

关于传统的文学，文学的传统，文学与传统，传统与文学，这是一个大题目，但是我只能“戏说”一下。《戏说乾隆》，《戏说慈禧》，不拘史实，六经注我，煞是天马行空，泛若不系之舟。我虽写点文字，发点议论，而对文学的理论，文学的流变，以至文学的现状，都只是略知一二，不甚了了，若是故作正经，反倒成为更大的“戏说”了。

为什么会沦入这样的窘境呢？原因不少，其一就是我有一个朴素的因而也是简单化的看法：文学上总是先有作品，后有理论，管他什么主义，只看作品好不好，这主义那主义说得再好再深刻再完备，没有好作品也是白搭；这就使我纵不算“抽象地继承”也是“抽象”地接受了胡适在不同场合所提的一句口号：“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往年主义少，如今主义多，文学上的各种主义总是叫我困惑。

初学写作的时候，不知道世界上有那些主义，信笔写来，倒也还是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心，50年代以后有所“自律”就多踌躇了：怎样才能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标准？不是现实主义就是反现实主义，如同哲学领域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二者必居其一”；而依照恩格斯的定义，现实主义要求“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和“细节的真实”，写抒情诗怎么办呢？看来只有特瓦尔多夫斯基的《瓦西里·焦尔金》和伊萨柯夫斯基的《喀秋莎》是样板，难怪吉洪诺夫、西蒙诺夫也都写

了那么多有“人物”的带情节性的小诗。

现实主义云云，过去也有译作写实主义的，跟浪漫主义、古典主义等等，都是“五四”以后从西方引进的概念，这种引进和借用十分必要。借把中国从先秦到清末的文学现象，广义的狭义的，雅的俗的，全都一股脑儿纳入这几个有限的范畴，是不是会有削足适履之处，我是有怀疑的。不过，新编的文学史毕竟承认中国古代诗歌里，除了所谓现实主义以外，还有所谓浪漫主义一脉了。然而，单是用“现实主义”来规范诗歌固然有点划地为牢的意味，后来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也不一定能算是进步，拿这个口号下产生的作品可以检验出个中得失；不是随便什么两样东西一说“结合”就能结出好果实来的。

50年代“以俄为师”，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也等于我们的法规，这是无疑的了，“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已经很不容易；而更可怕的是说“典型问题经常是政治问题”，此语出自马林科夫在苏共19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他作报告的时候斯大林就坐在主席台上。

那是1952年秋，到了1955年夏秋批判胡风的时候，连他从斯大林那儿引来的“写真实”也当作他反对社会主义文学的罪状。并不是批判者有意先行一步反斯大林，只是表明他们欲加之罪而不择手段。——于是，从此文学问题更加经常成为政治问题了。

说起中国文学的“传统”资源是不算少的。古代文学的传统不说，“五四”文学的传统不说，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传统，以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为界，就分成前后两个阶段。我们这一代文学工作者，许多曾被认为背离至少是没有紧跟这一传统而受到批判以至处分，然而今天我们身上一一般都留有这一传统的烙印，有的甚至被认作这个传统的代表，这也是一种历史规定性，或者叫作宿命吧。

回忆早年读的俄、英、法 19 世纪小说，在 50 年代上半叶，除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因在苏联遭贬斥故亦被排除外，其他多数仍然是列入名著必读书目的。包括雨果这样的浪漫派，都还是在总体上得到首肯的，“批判现实主义”云云，取其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现实有所批判也。海涅这位浪漫派也是批判现实的，他写过《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何况他又是马克思的朋友！……后来不行了，1958 年就开始批判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久文革要与“封资修”“名洋古”实行“彻底决裂”，进一步明确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先天地属于资产阶级。——我们无产阶级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对社会主义现实是不作批判的！在前苏联大约从 1954~1956 年，在中国大约从 1957~1958 年开始的有关现实主义的争论，至此有了结论。

中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由一般地标举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何一步步“自觉”地走向伪现实主义，走向“瞒和骗”的文学，终于亵渎了现实，亵渎了现实主义，又亵渎了文学，只剩下瞒和骗而没有了文学的这一轨迹，是值得总结的，也是无可回避的。

80 年代起形成的文学格局，是以对六七十年代主流文学的反拨为起点的。相对于瞒和骗，崛起了强调写真实、说真话的文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学向现实主义的回归；相对于以文学为政治的工具，出现了远离政治并且有的是进一步远离现实、远离社会的倾向；相对于灌输式的说教性宣传，又有了突出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以至“玩世而不恭”的倾向。各种文学倾向的并存和消长，在一个日趋开放的社会是必然的。就以这几种倾向来说，在不同的层面上都有重合的可能，比如远离政治的文学不等于不写真实不说真话，强调写真实说真话特别是直面现实之作，也未必一定要排除娱乐消遣功能。不同创作思想、风格的文学流派和从事文学创作与活动的不同群落、集团，难免具有某种排他性，但也还

是会有渗透与整合。而除非有非文学的力量的干预，你吃掉我、我吃掉你，或你压倒我、我压倒你的情况都不会发生。

然后，主要是拿出作品来的问题。作为诗作者，我在 90 年代初写定组诗《五十弦》以后，1992 年写了《拉萨三首》，而对我藏北之行中一些独特的感受却只能掷笔三叹，这是不能勉强的。于是只有间或“说三道四”之一途了。不过，作为一个由衷热爱文学的读者，我渴望着健康的文学，即健康的作者写的，哪怕是写了不健康的人性和社会现象，也将有助于读者人格和精神的健康，我想这不是过分的要求。

在文学界，于正常地进行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同时，有这样那样的议论，甚至议论纷纷，也是正常的，总比万马齐喑好。只是我觉得有两个话题使人腻味，一个是诺贝尔奖金问题，反复陈说，已乏新意；还有一个，则是对“大家”的频频呼唤，情辞不可谓不恳切，但是我想，大作家固然不是“抓”出来的，恐怕单是呼唤也“呼唤”不出来的。

屈原、陶潜、李杜、关汉卿、曹雪芹、普希金、托尔斯泰、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这些数不尽的中外大诗人、大作家，大文豪，都很不幸生在“前社会主义”社会，他们的创作没人“抓”，有人“抓”就是抓将官里去，他们的众多大作也不是在什么“呼唤”声下应声而出，应运而生的；官方没有呼唤他们，民间也没有呼唤他们（也许关汉卿、莎士比亚像荷马一样听到过听众观众的呼唤，但不是要他们成为什么大家），如有呼唤，倒是更多来自内心的良知吧。

文学中的大家和大作几乎都是在无人巴望中诞生，也许作家本人有生之年都没有得到时流的承认，钟嵘的《诗品》就不列陶渊明、杜甫的诗也是身后才“走红”的。中外历史上许多大思想家也往往如此。这与大政治家略有不同：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会有一些大政治家受命于危难，或挽狂澜，或开新局，不是仅凭暴

力，而能造福人民。他们是在人们的呼声中登上历史舞台，又以大政治家的身份接受人们的欢呼的。在中外历史上，真正的大文学家、大思想家则鲜有这样“呼之即来”的。何以故？读鲁迅《文学与政治的歧途》一文可知。

批判总是与追求相伴而生。世界上有“无追求的批判”，却没有“无批判的追求”。任何理性的追求都是精神对现实的超越，因而健康的理性必然对现实持批判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对现实的批判产生对理想的追求。如果承认文学上有现实主义，现实主义精神就是批判精神。取消了批判精神，不仅取消了现实主义，并且也就取消了文学；无批判则无文学，又哪里来的文学大家呢？

罗飞《悼路翎》一文（《散文与人》第4集），提到路翎1989年写的回忆录（我没有看过），说他提出“精神奴役的创伤也有语言奴役的创伤”一说，我忽然想，如果不是就事论事地解释这句话，那末“语言奴役的创伤”是不是可以有更广泛的涵盖呢？回想这些年来在传统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典型问题、流派问题以至更根本的文学功能等问题的争论中，我们思想上、心灵上留下的，是不是就有许多可以叫作“语言奴役的创伤”呢？

1995年5月3日

只因他的思想变成铅字

——《顾准文集》读后断想

1

读了《顾准文集》，忽然想起毕朔望 1979 年为张志新写的《只因》：

只因你牺牲于日出之际，监斩官佩带的勋章上显出了斑斑血迹

只因你胸前那朵血色的纸花，几千年御赐的红珊瑚顶子登时变得像坏猪肚一般可鄙可笑。

只因夜莺的珠喉戛然断了，她的同伴再也不忍在白昼作清闲的饶舌。

只因你的一曲《谁之罪》，使一切有良知的诗人夜半重行审看自己的集子。

只因你恬静的夜读图，孩子们认识了勇气的来历。

只因你的大苦大难，中华民族其将大彻大悟？

不知道别人的感受怎样，这些诗行贴近我此刻面对顾准遗篇的心情。

1972 年到 1974 年，顾准正以他孤独病弱之躯拿起笔来，就“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写下这些通信和笔记的时候，我却苟安于干校一角，后来又回京处在长期待分配中，因而自得于投闲置散，无所事事以为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从来没想过休息之后该干什么，更没想到同在一城中，有像顾准这样的人不知疲倦地作

着严峻的思考。我这种庸人心态，很像我后来嘲笑过的，口口声声说要保存阵地，但在保存着的阵地上始终不放一枪一弹的那种情形。

我有什么资格来谈顾准呢？

满城争说顾准未必是好事。几乎所有满城争说的人和事，到头来都成过眼云烟，因为赶时髦的人一来随梆唱影，难免热闹一番完事。

而沉思的顾准，需要习于沉思、甘于沉思的人的理解，也只有好学深思并勇于探索的人能够接近他，同他对话。

2

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精神历程，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他的思想经过身心痛苦的磨炼和淬砺。

人们赞许他的胆识。一般地说，人可能有胆而无识，也可能有识而无胆。而在顾准，他的胆离不开他的识，他的识离不开他的胆；胆是先导，识是基础。古人以才、学、识并提。顾准的“识”，是把他的“才”和“学”相乘以“胆”，即绝不自囿于权威之见的理论勇气，敢于怀疑、敢于否定的科学批判精神。

顾准这样说明他对哲学问题和现实问题进行探索的心路：

我还发现，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要的勇气，说得再少，也不亚于我年轻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

只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才谈得到通过对经验的总结去升华理论。假如连经验最表层的事实都不敢去揭示甚至不敢去接触，还侈谈什么对真理的探求呢？当然，我在这里还并不是说那些竭力阻挠人们面向残酷的真实的人，因为

虚伪和欺骗本来就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所。

对于历史和现实中的问题，我们应该自省的是我们究竟有几分勇气面对事实？二千多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普遍奴隶制”的阴影是不是还笼罩着我们：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长者讳，以至为流氓打手讳；不得罪于巨室，不得罪于上级，不得罪于朋友，以至不得罪于“群众”……一个时期我们听到不少对于“媚俗”的批评，而对源远流长的“媚上”现象（其尤甚者则是古所谓的逢君之恶），却似乎久久听不到什么批评了，莫非这种多年的老毛病已经根治了吗？

3

不是任何一种识见都堪称智慧的。机智诡巧不等于智慧，小聪明则更等而下之。我说顾准达到了智慧的境界，是因为他有关中国的命运、人类的未来的深沉思考，在当代属于先知先觉之列。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们久久不用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这个系列概念，也不引用“以先知知后知，以先觉觉后觉”的话了。然而在当代中国确还有先知先觉在，顾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几乎有着同样经历的人中间，走出理想主义的围城；他从马克思主义的营垒中来，“冒天下之大不韪”（？），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下了绝对是“笨功夫”。

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或者可以叫作皇权专制主义的特点，在顾准这里得到确认。我读到有关章节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总在心里浮现蚂蚁、蜜蜂和猕猴的形象：在蚂蚁王国和蜜蜂王国，蚁王和蜂王是“受命于天”的，那蚁群和蜂群奔波觅食，而蚁王和蜂王凌驾于群落之上的秩序也似乎与生俱来，亘古不变。比蚂蚁和蜜蜂在生物学上进化程度更高一些的猕猴，每一群落的猴王，都是其中最强悍的公猴，经过一两年至多三四年的任期，就要发生

争夺王位的厮斗，一只成年公猴要战胜群落内的全部公猴和群落外企图入群夺取王位的散猴，才能“成者为王”，获得在猴群里一切优先包括以强凌弱的统治权，乃至优先占有发情母猴交配的特权（只有同时发情母猴超过四只以上，才允许副王染指）。一个猕猴群落不过几十只大小猴子，蚁群和蜂群则是成千上万，尽管这样，比起人类的群体来都是具体而微了；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则是不存在理性的选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在多大的程度上摆脱了上述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说也正是从动物到人的进化和人类进一步文明化的重要标志呢？

顾准论证了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产生不了科学和民主，要确立科学和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即以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来说，口头上的儒家本来就是牧民之学，而实际政治行为更多循着申韩之道，此所以权术以至阴谋诡计充斥着自古以来的政治史，这些都能在韩非的书里找到源流，韩非是最早对截至战国时代为止的君主专制统驭术作总结的一人。顾准在“评法批儒”的高潮里认为韩非在中国的历史上没起一点积极作用，个人道义也毫无可取，此论同样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可惜限于当时的条件，如同其它一些论点一样，未能充分地展开。不过，在今天的“国学”热里，在听到什么“用儒家的主体道德思想来培养‘四有’新人”等调调的时候，顾准的字里行间仿佛吹出清新的风，荡涤着犹如地下宫殿里霉湿污浊的空气。

我是顾准的晚辈，然而也是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从诗走向散文的。我缺少他那样的理论功力，对他所提出的涉及那么广泛的诸多命题，不是一下子都能消化并参与深入探讨的。但是我以为我能够理解顾准，对他的精神历程感同身受，我发现我的心和他相通，尽管在思想上我是远远迟到的。

顾准执著于他的执著，他执著的追求和探索是为了接近真理，但他从来没有以掌握了真理自居。真理一旦被认为已经为人所掌握，尤其是为权威者所掌握，就有被绝对化的危险。

似乎是莎士比亚留下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一个金科玉律，就是没有金科玉律。”是不是同样可以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绝对真理，就是没有绝对真理。”

顾准曾慨叹“马克思的学生中未必有几个人能够懂得这一点”。而他，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没有把马克思视为教主，把自己视为教徒，而是作为马克思的同道和诤友，“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以马克思生前不断修正自己观点的风度看来，他是不会把顾准看成异己的。因此，我以为，倘若是一个与马克思有同样追求的人，或由这样的人形成的群体，有什么理由不能容纳顾准的思想以至顾准这个人呢？

1995年10月23日

同情高检

我同情高检。高检是谁？最高人民检察院也。

有人写文章说，希望报上的批评性读者来信能有下文。殊不知连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一个省里也竟能拖延两年多顶着不办。

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最高法律监督机关，遭遇尚且如此，那末作为一般新闻监督的报刊批评，更不用说身陷冤案的普通公民，何足道哉！

岁尾年头，翻阅旧报，重温了石家庄的一件未了积案，即1990年出版的《中越战争秘录》一书在石家庄以“投机倒把罪”立案侦查一事。公安机关经过两年多调查取证，最后得出此案不构成刑事犯罪、当事人阎少卿无罪的结论。石家庄市和河北省两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也对此案作出相同的认定。

然而，尽管石家庄市公安局长安分局、石家庄市公安局、河北省公安厅先后三次提出“撤销对此案的侦查”的意见，并报经公安部批准；河北省和石家庄市的检察机关也同意上述结论；但都遭到河北省“有关部门”的强烈干预，迟迟不能依法结案，且自1993年初反而升级。

此案列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厅的工作日程后，认真核查的结果，经院领导批准，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3年年底将高检的意见电告河北省人民检察院，要求撤销石家庄市检察院作出的逮捕阎少卿的决定，尽快结案。

又是两年过去了，据说河北省对此根本不予理睬。

我们饱经冤假错案之祸的中国人，不是一般地同情弱者，而是对一切身陷不公正处境的当事人感同身受。而这一次，人们把期待的目光转向应该有力地主持公道，维护法律尊严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时，却发现禁不止，有令不行，高检原来也无可奈何！高检是否具有它应有的对执法机关实施监督，进行最终裁决的权威？不能不让人怀疑；而最高法律监督机关沦为实际上的弱者，还值得同情吗？

在这里受到挑战的，不仅仅是法律的尊严，高检的威信，还有国家法制的形象，以至普法教育的可信性。

在一定意义上，社会矛盾需要法律的调节，社会稳定有赖于法制的保障。而当人们发现“法律”（应该说是执法部门），只管守法的人，不管或管不了不守法的人的时候，当人们发现执法部门有时不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反而屈从于非法的干预，甚至在这种干预下明知故犯，作出违法之举的时候，当人们发现只有无权的人信守法律，某些有权的人不但不遵守法律，而且以权干法以权压法不惜践踏法律，却可以不受任何制约的时候，我们的普法教育和法制宣传是不是会落到自打耳光的尴尬境地呢？

在上述案件中，据说关键只在于“省里曾经有人对此事批（示）过”，这使人惊讶“两个凡是”的阴魂未散。犹忆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羁绊，才得以平反大量冤假错案，而“两个凡是”指的是毛泽东生前的指示；怎么在如今的河北省，个别人的不符合事实和法律的意見竟能凌驾于公检法机关之上，超乎法律之外，享有了毛泽东所不再享有的特权呢？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早有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全都法有明文。按说

高检的决定在地方上应该通行无阻,但在河北省硬是不能执行,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落实”情况也还有待检查。我们向来对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持批评态度,然而我们的执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所受的干预和掣肘,其消极影响倒有点接近我们所批评的“三权分立”的弊端了,例如从效率说,石家庄一案业已迁延五年多之久,还嫌不够长吗?

从这个案件的迁延中,我们看到俗谚中的“现官不如现管”还在起着作用。高检虽属“最高”,毕竟“天高皇帝远”;而“省里”(即使是“个别领导”)却“近在眼前”,于是什么法律呀,原则呀,全都让位于服从“顶头上司”的实际考虑了。这不仅反映出官场陋习,尤其暴露了权与法之间、上下级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结构性裂缝,这无疑是“反体制”的人们所乐见的权力体制的“解构”,而不能不引起维护体制的人们的忧心:那些置高检的决定于不顾的人,从表面看似乎只是跟某个当事人过不去,也许只不过想牺牲一个无权无势的当事人以证明所作指示的正确吧,但无论具体动机如何,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请注意:这一对高检的抵制行为已经形成对国家公检法权力及其体制的“解构”!

因此,“同情高检”云云,是从普通人的视角出发,看来也许远远不能充分表达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了。

1996年1月7日

论“真正的共产党人”

读李雅民长篇新闻报道《泰山脚下的较量》，其中说到 1996 年 1 月 17 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听取省检察院对胡建学的初查报告后，一致同意撤销胡建学的一切职务，由检察机关依法逮捕。“十几位常委义愤填膺”，说“这不是解决某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解决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领导权，能否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里的大问题”。（10 月 5 日《南方日报》）

胡建学贪污受贿达到巨案标准的事，突破重重阻力，揭发了，处理了。胡建学被证明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能像胡建学那样。离开泰山脚下，别处还有胡建学没有？

前些时候还揭发处理过山西平陆县常乐镇前村村委会主任裴安军横行乡里、打骂群众、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一案。据报道，此人在常乐镇党委眼皮下作恶，却年年评为先进党员；镇党委书记郭某在县农村工作会议上予以公开表扬，称赞他打老百姓耳光“打得好，打出了共产党的威风，打出了社会主义的威风”！群众说：“你们这些共产党员还算不算共产党员？”（9 月 18 日《中国青年报》，转引自 9 月 26 日《报刊文摘》）

群众问“算不算”也就是够不够格，则他们心目中的共产党员，大约也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之谓；鱼肉乡民的土豪恶霸不算，那个称赞坏人“打出了共产党的威风”的书记郭某自然也不算。

在湖南娄底地区，今年 4 月发生了一起青年法官伍治东在地

区公安处遭到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逼供的案件：在列入全国十大必破案件的“3·30案件”侦破过程中，新化县公安局分管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在伍治东家里找到一件某校校服，并认定是歹徒留下的，省、地、县三级联合专案组遂在其指引下，未经任何法律手续，便将伍治东传到公安局隔离审查，又未经新化县法院同意，押往娄底地区公安处收审所监狱。因伍不肯乱说，被认为不老实，升级为收监审查；整整一个月中受了13天30多种非刑折磨。伍治东受刑时抗议说：“你们这样严刑拷打是要负责任的。”打手则猖狂宣称：“在共产党手里，告状是没有用的。”“老子打了你也是白打了！……有本事，你向联合国告去！”（9月6日《湘声报》）

据10月11日《南方周末》报道，伍治东的冤案至今没有一个“说法”。试问在此案中，打手不算，究竟有几个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依法办事的“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今年10月6日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五次检察工作会议上说：“国家工作人员循私舞弊、贪赃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渎职、侵权犯罪、践踏了国家法律，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必须依法从重从严予以惩治。”

请看，这里所举的各项坏事，所有国家工作人员都不该干，岂独限于“真正的共产党人”，因为那不但违犯党纪，而且是违犯国法的！

过去总听人讲，领导权要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今又有要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手里之说。真假马克思主义者不是那么好分辨的；我头一回听说这个称号，是文革中1970年那次庐山会议之后加给陈伯达的，如果早能看出他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为什么委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的重任呢？——今天的年轻读者千万不可小看了这个“组长”，多少元戎曾闻之而丧气，多少热中者抢当“勤务员”，也因为类似“组长”什么的，实指“一把手”也。

假马克思主义者不好指认，真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轻易就能拿出证明来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则不然，组织部里有党员花名册，只要还没开除党籍的，都是名正言顺的共产党员。“假党员”有严格的界定，是指冒充党员的人，重在没有合法的党籍，并不在于实际表现。胡建学是假党员吗？不是。如果他是假党员，怎么当得上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党代会选举时的资格审查是怎么做的？胡建学的党员资格是真的。一个真的共产党员，怎么又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呢？

我想，当山东省常委们强调领导权要掌握在“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手里时，是因为他们认为买官卖官、行贿受贿的胡建学之流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那末，一个党员只要没有买官卖官、行贿受贿，或者虽有类似情节但是没到立案的标准，或者虽然受到某种处分，但是仍然留在党内，换句话说，虽已违法乱纪但只要没有法办、没有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就都可以叫做“真正的共产党人”了？果然如此，“真正的共产党人”变得多么廉价！

当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产党和一切党派团体一样，应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共产党员也和一切公民一样，应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如果所有的执政党成员都在这个意义上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在他们身上不发生张思卿检察长指出的“循私舞弊、贪赃枉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践踏国家法律的行为，反腐败斗争便可以大奏凯歌，至少社会风气会有很大的改观。因此，把“真正的共产党人”标竿定在遵纪守法的高度上，未必是降格以求，也还不算跌价（中国共产党要求其每个党员都要“模范地遵守国家法律”嘛）。不过要想让所有具有共产党党籍的人都成为遵纪守法的人，只是党章上的要求，按之实际，则是奢望。

现实在我们面前摆着：如胡建学之流，还有像山西平陆常乐镇、湖南娄底和新化一案中某些共产党员，都是“真党员”，在党

籍的意义上，谁曰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娄底打手宣称的“在共产党手里，告状是没有用的”云云，记者问道“是不是他们还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共产党’呢？”问得好。胡建学在泰安市一手遮天，拉帮结伙，把严格执法的检察长公丕汉视同仇敌，不是分明有一个与现行中国共产党党章不同的自己的“共产党”吗？然而他又分明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的市委书记。在没有更高的党政机关干预时，胡建学这个他们自己的腐败的“共产党”不是“名正言顺”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在行使一切权力吗？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员的国家工作人员、泰安市检察长公丕汉在行使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赋予的权力时，是何等艰难，他和他的同事们遭到胡建学之流在组织内外施加的多大的压力呀！

胡建学不止一个，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好在人们同时看到，公丕汉也不是孤立的一个人。

胡建学们背后是共产党内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腐败势力。而公丕汉们代表着共产党内和国家工作人员中的健康力量，也代表着我们民族的健康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前途，甚至我们民族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将决定于上述两种力量的对比。“泰山脚下的较量”所告诉我们的，就不限于泰山脚下的一桩公案了。

如果读者同意这个表述，我以为这比表述为“真正的共产党人”同“非‘真正的共产党人’”之争可能更确切些。

再赘一句，我看过有关材料以后（我知道我看到的公开发表的材料远远不能包括事态的全部），对公丕汉同志和坚决支持他的上级和同事们充满了敬意。我知道公丕汉们为了坚持原则和人格尊严冒着多大风险，准备做多大牺牲，我还知道公丕汉甚至一度濒临精神崩溃的危机；在向他们表示敬意的同时，我还不得不表示对他们今后处境包括人身安全的担忧。腐败势力经营多年，盘根错节，休戚相关，“共存共荣”，他们会凭借手中的权力，以

“合法”的乃至非法的手段加害于健康力量；此类事过去多有，今后亦难杜绝，毋宁说还将更加频繁地发生，一切关注共产党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人们，都宜加以注意。

1996 年 10 月 14 日

附记：再三体会山东同志们所谓“真正的共产党人”之说，实指胡建学之流作为共产党员属于“假冒伪劣”。歧义盖出于我们习惯上对“假冒”和“伪劣”不加区别；胡建学的表现对照党章要求确是“伪劣”，不那么“货真价实”，然而不管怎么说却并不是“假冒”的。放眼商场，名牌的没落，固然一半是受冒牌货的冲击，一半甚至更多怕也是因货色低劣而丧失信誉。打“假冒”打“伪劣”，于物已不易，于人则尤难；如在思想理论上鉴定谁是真马克思主义者、谁是假马克思主义者，就还没有一个能孚众望的质量检查机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何况鉴别“伪劣”共产党人，好在纪检监察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查处大案要案过程中正在积累这方面的经验，让我们向他们致敬！

10 月 19 日

我 读 “胡 说”

因一件诈骗案的偶然牵连，顺藤摸瓜，突破重重阻力揭发出来的贪污犯胡建学，原任东岳泰山所在地泰安市委书记。他在任内出版了《胡建学选集》，人称“胡选”，准此，他的言论也可以叫作“胡说”吧。

胡建学失风早了一点，他的书来不及在北京出版向全国发行。我们只能从《南方日报》连载李雅民所写《胡建学的“最后陈述”》一文中见到他的手笔的片断摘录。

胡建学说：“放松世界观改造，是导致我腐败的最根本的原因。”他在一审判决前作的这一陈述，应该可是他力求按照他所认为的正确的世界观“沉痛地解剖了自己走向犯罪的原因和过程”吧？

胡建学说他被提拔为山东省计委副主任后，对自己还能有所克制；到了泰安以后，“随着官职的增长，追求享受的欲望就更加强烈了。头两年，自己还能有所收敛。”按：他1987年当上计委副主任后，作为受贿的开始，接受了一架收录机。1990年到泰安任市长，1991年受贿8000元。这是属于“克制”和“收敛”阶段。1992年任泰安市委书记，受贿金额猛增到9万余元；1993年收受30万元；1994年因中纪委调查他的问题而有所收敛，仍受贿20万元。其贪污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总计61万元。

胡建学把他由一年贪污9万元增至30万元的契机上溯到1993年的香港之行，他说：“到过香港之后，就完全把世界观的问题暴露出来了……遇到一个开放的环境，一个经济发达的地方，就

抵制不了资产阶级对自己的侵袭了。大肆收受钱财，就是从那一次开始的。”

李雅民的文章对此有所叙述：1993年3月，胡在去港举行经贸洽谈会期间，收受港商王伯明1万元港币。后来，王提出想在泰山顶上修一座为自己扬名的“弘德楼”。胡建学满口答应，不顾泰山上不许无规划地添置建筑的规定，不顾专家的反对，让王与泰山管委会签订由王出资70万元的协议。动工后建楼款却只到位30万元，胡建学硬让管委会贷款40万元补足建楼资金。楼上还要署上王伯明一人的名字。

按照胡建学的说法，当然是资产阶级的王伯明用1万元港币“侵袭”了他。其实，他不但收受外商的财物，也乐于接受一起赴港的下级对他的“侵袭”。据说短短几年中，他接受了42个单位和个人共99次“侵袭”。

如果说“遇到一个开放的环境，一个经济发达的地方，就抵制不了资产阶级对自己的侵袭了”，那末，在泰安地区，1994年贫困农民的年收入平均不到400元，最低的仅278元，这样一个地方，他胡某怎么也创了接受“侵袭”的新纪录呢？莫非因为在这里的“侵袭”者不是“资产阶级”而是如他所说“受贿面也比较广，有基层干部，有中高级干部”吗？想要受贿，不择地而行，不能把一切“归功”于环境的开放和经济的发达，更不能归咎于香港吧？

即使在香港，除了包括王伯明在内的资产阶级以外，还有数百万同胞，是不是都像胡建学这样，因为“遇到一个开放的环境，一个经济发达的地方，就抵制不了资产阶级的侵袭了”呢？事实上当然不是这样，难道是因为他们没有像胡建学那样“放松世界观改造”，而已经全都改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了吗？

香港的情形我不甚了了。香港的资产阶级，我更没打过交道。据公开的报道，港商到内地做生意、办厂子时以财物“侵袭”官

员和以另外的手段“侵袭”职工、顾客的不法行为，亦时有所闻；也许如王伯明这个被牵连曝光的港商还不过是“小巫”而已。但我以为如果拿某些港商的不法行为甚至某些不法港商的形象来概括整个香港的工商界人士，就像把胡建学视为内地市委书记的代表一样，当是以偏概全的不实之词。假如据此得出一个“香港资产阶级”每时每刻准备着“侵袭”内地的结论，恐怕会上胡建学转移视线、诿过于人的当。

胡书记“追求享受的这样一种想法”，是不是提拔为省计委副主任以后才“开始产生”的，我认为未必，但也用不着去费考据功夫；姑从其说，也许证明一定的职位使他对超过一般的物质享受不仅感到“需要”同时也看到“可能”，因而“随着官职的增长，追求享受的欲望也就更加强了”，这倒是句实话。

把大肆收受贿赂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就不仅仅是胡建学“缺乏改造世界观的连续性”所能奏效。在这个关键上，胡建学卖了一个关子，不肯把诀窍告诉大家，使得同样具有“追求享受的欲望”，同样“放松世界观改造”的有志之士欲学无从。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世界观及这种世界观指导下的话语系统，竟使胡建学在“最后陈述”中，极其哀婉地把自己描写为“资产阶级侵袭”的受害者，倘说这不过是外因，那内因之所谓“放松世界观改造”，意味着他只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兴无灭资”做得不够，败给“资产阶级世界观”了；是万恶的资产阶级以其世界观使胡建学这样一个青云有望的好接班人产生了追求享受的欲望，又是资产阶级在香港这个开放的环境和经济发达的地方诱发和助长这种欲望，并通过其某一或某些成员发动“侵袭”，打中了胡建学，这个自诩有副总理之才的好干部先后身中了精神和物质并且是精神变物质的两类“糖衣炮弹”；然则胡建学不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本身的双重受害者吗？

一个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以至封建社会也为道德和法律所不

容的贪官，一个骑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头上称霸一方，结成恶势力，与正直的检察官为敌的胡建学，三说两说，竟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可怜兮兮的“受侵袭者”了。胡建学其人，据说还写过歌颂清官的电视剧本《丁宝桢》。可见是一个惯会舞文弄墨之徒，在他笔下的阶级论和阶级分析，竟能化为对贪官的辩护！

然而，所有的“胡说”到头也只是胡说而已。法律和道德永远高于胡说。

在法律面前：按照中国法律规定，受贿 5 万元以上的，就要判处 10 年以上的徒刑，胡建学受贿额超过此数 11 倍，死有余辜（现判死缓，留下活口）。

在道德面前：只要看一看同是“地、市级”干部，曾任山东聊城地委书记的孔繁森，在胡某步步高升频频受贿的日子里，孔繁森告别九十岁老母，二度入藏，为贫苦藏胞服务直至献身，身后除几个破纸箱的书籍和旧衣服外，仅剩 8 块 6 毛钱：然则在孔繁森有如皑皑雪山一样清白高峻的身影下，胡建学岂不只是一沟污泥浊水么？

1996 年 10 月 21 日

《人生败笔》序

30年过去，真的是时过境迁了。这本书里涉及的人事，来自历史的，都应返还历史了。

编这本书，既不是再为个人喋喋不休地辩诬，更无须纠缠于一个单位运动中各阶段各个组织和个人的是非功过了。

如果只是辩诬，那末在“定案材料”后面附上一份申辩材料，如本书卷首的两篇就已解决问题，足够了。但事实上，当事人彼时仅仅为了辩诬，写一份申辩材料是脱不了身而只能“引火烧身”的，后来围绕着“定案”和“翻案”，又衍生出多少口诛笔伐。在这些文字官司背后，有过多少各式各样的激情啊！

在我，无论违心的或真诚的认罪，条件反射的或处心积虑的翻案，无论揭发别人以划清界限，还是以攻为守的振振有词，今天看来，都是阿时附势、灵魂扭曲的可耻记录。

在我，这是可耻的10年。

也许可以说，直到今天面对这可耻的记录，我才真的触及了灵魂。

从1959年到1966年间，我是力求“紧跟”，以示曾为“右派”者改造的决心已经付诸行动；凡是1957、1958两年里批判我时提过的，那些触犯时讳的思想和文字，都不复见于我的笔下。

惟其“紧跟”，到了最需紧跟的时刻，在我也渴望投入的革命狂潮中，我当然不会怀疑，更不会抵制各项“最新最高指示”的

新提法，如“中国的赫鲁晓夫”乃至“刘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等等。

我读过一些人的讦告、生平和回忆录，他们都在那不平常的年代里对“林彪、四人帮”作过坚决的斗争，使我十分惭愧。当林彪、江青们在台上的时候，我想都没想过要反对他们，而是像征引《毛主席语录》那样，把“林副主席”“江青同志”的话奉为圭臬；形诸言语文字，还很有一点奴颜媚骨呢。

收入这本书时，于此等处，一仍其旧，不作改动，以彰史贵存真之信。

什么是历史？

社会地位不同，经济利益不同，意志和愿望各不相同的人群，那不同方向的合力构成平行四边形，充塞了空间和时间：这就是历史。

世界有世界的历史，国家有国家的历史，民族有民族的历史，几十个人、几个人的社会群体也各有自己的历史；一个生活在历史中的人，自然便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这一堆当代的化石，记录着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

你在这里看到，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冲击下，为了恢复已丧失的尊严，竟不惜彻底地牺牲尊严。

机会主义的生存策略，总是要造成病态人格，这并非上述特定时期所独有，只是在那十年中间更多，更常见，症状也更加严重突出。

在政治斗争中，妥协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政

治就是妥协。书生的迂气和傲气，本来是不知妥协为何物的，然而投之于实际政治，历来就是教你放下架子、或者叫做打掉架子，去掉迂气和傲气、或者叫做改造思想作风，于是不得不妥协。但政治家的妥协是以不蚀本为限度，即使小有蚀本，也要不伤元气，徐图再起；读书人的妥协，则是缴械投降，一蚀到底了。

在平时，这一切是以思想改造的方式进行的；到了日常的政治工作激化为政治运动的非常时期，无处没有阶级斗争，无处没有敌情，“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若非“革命的动力”，即成“革命的对象”，对于一般所谓知识分子说来，要“革命”，即名列于革命的序列，首先不是别的，而是求生这一层次上的问题了。

于是乃有“革命”众生相。

那一次号称史无前例的革命，虽以文化为题，文章却是做得“大”出文化人的圈子，不愧为“大革命”。

事过回首，人们先是看到了政治上的后果，便“拨乱反正”，看到了经济上的后果，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看到了文化上的后果，便“建设精神文明”：以为这就疗治了创伤，慢慢地也就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一样了。

把裹挟了上亿人众的一场龙卷风，说成是一场闹剧，当然肤浅，当然偏激。

说成是连演了十年的民族悲剧，就是深刻的、严肃的见解了么？

在悲剧中，玉碎的壮烈，使人震颤于崇高。

确有这样的人和事，但不仅仅是这样的人和事。

使人，至少使清夜扪心自问者感到羞耻的，有外来的屈辱，也有的是自取其辱。

这配称作悲剧么？

1979年，我说我从此不写检讨，从此不作“自我批评”了。

我说我写的检讨，字数远超过我写的文学作品，盈筐充篋，几乎“等身”了。

我说我的经历告诉我，号召自我批评已经沦为指供和诱供，因为有人是专司批评别人的，有人就只得专作自我批评，也就是整人与挨整之别了。

整人与挨整，平时亦有之；一到运动来时，对错误和缺点的自我批评即检讨，升级为“认罪”和“谢罪”，而操批评权以至批判权者，自然相应升级为对“犯罪者”的声讨。

声讨者拿帽子找头；检讨者拿头找帽子。声讨与检讨，都是帽子越大越好。一反不如两反，两反不如三反。要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要么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声讨者的帽子大，“上纲”高，才过瘾，才显得革命立场坚定，水平高；检讨者的帽子大，“上纲”高，才显得有认识，态度好，好过关。

声讨别人的也难免要做检讨，常做检讨的有时也声讨别人，自动或被迫揭发别人。不言而喻，都要竞相“上纲”。

在那年月，最高的境界是“无限热爱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因此最大的罪恶就是反对毛主席了。大字报和批斗会，“打蛇打七寸”，竭力要让被批斗者承认的，就是“反对毛主席”；被批斗者知道要害所在，坚守的最后防线，也就是“从未反对毛主席”。批斗者进行有罪推定，证据不足则借助于“实际上”；被批斗者不得不“顺竿爬”以求解脱时，便也只承认到“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为止。有了这个“实际上”作为过渡和缓冲，虽会带来关于动机与效果的无穷争论。但毕竟对被批斗者是网开一面，批斗者也得以“下台阶”；倘不存在一个止于推论为“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中间地带，干脆不折不扣地“真正反对毛主

席”，那就非抓起来判刑不可，否则必定成了右倾包庇，立场问题。

自我批评变成“认罪”、“谢罪”，要把人们平时已被养成的负罪感、原罪感推到极致。

这既有前苏联从对“反对派”斗争发展到莫斯科审判的轨迹，又有从中国皇朝至民国年间的臣宰、太监、阿 Q 们口称“奴才该死”，自打耳光的余绪。

一方面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名义进行诛讨，一方面是口口声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配合得多么投契啊。

冷静地面对这一页历史，我发现自己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毛泽东身上寄托了由衷的、发自天真的尊崇和信赖，甚至可以说不仅是崇拜，且达到了迷信的地步。倒是有些以捍卫毛泽东为名对我进行批判和斗争的朋友，好像早就不再有这种心态了。

比如问我《强项令》中的汉武帝是影射谁，《诽谤者和毒蛇》中的魔王是影射谁，“导向”分明，我可是想都没往那儿想过，真是匪夷所思！

对于当时曾经对我执行批判的群众和干部，付印时使用代号，或改易姓名。曾被我在申辩材料和大字报里“反击”过的干部中，两位已去世有年，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安息。走笔至此，忽然对包括他们也包括我在内的人们，生出一片悲悯之心：大家当时的枉抛心力，难道是不可避免的吗？

人们历来对一切非人力所能左右的事情，如地震，没有喊冤的，可说是听天由命。但对人祸，虽不能却之于既往，但应求避免于将来。即使其中或亦有许多变数，有历史遗留等诸多因素使然，不能完全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还应该采取“尽人事”而后“听天命”的相对积极的态度吧？

你也许奇怪：一个人写点东西，做点工作，就至于弄成这么“大”的“问题”，招来这么多的麻烦吗？

过来人重温这些，自然别是一番滋味。

今天 30 岁以下的年轻人，不知那个“遥远的年代”人们的行为逻辑和语言方式，那末答案全在这里了。

那时候，在所有公众场合，人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模式的人际关系中，以这样的模式讲话和行文：稍有出格，即属惊世骇俗之举，会招来杀身之祸。

当时这样做，人皆视为“正常”而通行，或因通行故以为“正常”；对这样做表现出稍不适应，就有“格格不入”之嫌，背离了规范就成为“非常”的特立独行，家人担忧，路人侧目了。

一个观点，一句话，或一张大字报一封信一页日记，都可能变成影响一个人荣辱安危的大事，甚至招致家破人亡！

书里保存的这些文字材料，可以视为当时的流行文体——检讨交代、大批判、大字报等的一份标本。

这里从一个案牍小吏、文字工作者、又是“摘帽右派”的角度，反映了这样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中一部分无力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挣扎，提供了正史所不可能提供的细节。

所谓检讨交代，即“自我批评”或“自我批判”，其实就是第一人称的“大批判”。分寸容有不同，口径并无两样。

大批判，说是要“摆事实，讲道理”，而它最突出的特点恰恰是不顾事实，蛮不讲理。

什么都是最最最，一切趋于极端。“攻击”必是“恶毒”，“反党”必是“猖狂”，形容词须用最高级，上纲与定罪务求置之死地。

因此，必然从否定对立面发展到否定一切。毛泽东说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于是遍地查获“反对毛主席”的人犯；好像如果不报告说发现各地各部门都有人“反对毛主席”，就对不住

他老人家似的。

而所有这些“反对毛主席”的人，全都必须顺理成章地“上挂”于一个“刘邓黑司令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尽入彀中，几无噍类矣。加上“上面有什么，下面也有什么”，就像1955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全国要打出无数“反革命小集团”；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各地也都打出若干小“章罗联盟”等等，已成一个公式：于是在这里，一个小小的县团级文艺单位，也有某某人要“搞推翻政委的反革命政变”，以及“大搞资本主义复辟”之说了。

至于自愿或被迫或“被迫自愿”检讨的人，会像本书中某份“思想汇报”那样，推导出前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是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张目的政治结论来，也一点都不奇怪。这跟所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大批判一样，是在设定类似的大前提下所作的逻辑推理。而当时的人民日报社论，还一度学“革命小将”的口吻，指别人为“混蛋逻辑”！

统观全书，年轻人或许会以轻蔑的眼光，看做一场“几乎无事的悲剧”以至彻底无聊的闹剧。然而当时的人们，至少那些不得不卷入的人，生命就这样像煞有介事地，或无可奈何地白白浪费了。

不过，有时我聊以自慰地想，即使没有这场运动，有些人，例如我的生命，也未必不以另外的方式消耗掉。——如本书所显示的，邵某写了那么多篇幅，引了那么多语录，作了无数近于乞怜的表白，都是围绕着一己的沉浮，最终不过是要求“组织处理”勿为己甚罢了。——以我当时的状态，能够做出什么于历史、于人类真正有益的事情呢？

1996年11月23日

读几首当代讽刺诗

近读到一篇汪某署名的文字，批判广东诗人李汝伦，指斥他1994年主持的“李杜杯”诗词大赛评奖：“一、二、三等奖绝大多数是讽刺作品”。

文中颇有些“警句”似曾相识，例如“我们深知李汝伦先生有过一段特殊经历，锻炼了惯看阴暗面的‘诗眼’，特别酷爱并精于讽刺诗，得机就大显身手”云云（按指李汝伦曾被划为右派）。倘在二三十年前，一语可置人于死地，而今在明眼人看来，自是不值一驳耳。

汪文郑重其事地请出辉煌的毛泽东语录，曰：“刻画无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针对的就是“李杜杯”一、二、三等奖中的讽刺诗了；让“必定渺小”的诗名列前茅，那评奖岂不是发生了方向性的错误吗？

尊毛泽东语录为“最高指示”的年代，我们固亦经过矣。互以“最高指示”舌战笔战打“语录仗”的场面，我们亦有幸见过了。却看今日又重来，不妨心平气和地一欣赏之。

可惜这篇文章对他反感其获奖的讽刺诗，一句也没引用。我特找来1995年第一期的《当代诗词》，是那次大赛专辑，获奖作品一等三名，二等十名，三等20名；共有多少是我们常识之所谓讽刺诗？这些诗又是怎样“刻画无产阶级‘黑暗’”即把无产阶级的光明当作黑暗来刻画的？

二等奖的《华宴行》（北京吴柏森），三等奖的《千亿谣》（安

徽丁剑欧)、《行香子·酒宴》(辽宁于海洲),属同一题材。

《华宴行》在极写“珍饈盈席纷纍列,绝胜当年帝王家”的万千气象后说,“须知碟内与樽中,酒饌俱是民膏血。农家八口一年粮,不抵华宴金一席。君不见……边徼遥荒未脱贫,衣著悬鹑难蔽体,檀粥藜藿聊充肠,温饱无方难卒岁。”那“一席万金挥国库,分文谁肯出私囊”的饕餮者,是无产阶级吗?揭露并鞭答他们,能说是“刻画无产阶级‘黑暗’”(加引号的黑暗即不是黑暗而是光明)吗?

《行香子·酒宴》直言:“酒宴频频,海味山珍,论头衔尽是官身。掏公家款,润自家唇?吮工人血,农人汁,党人魂。”怕正是这些“社之鼠,国之蠹,体之菌”在以其腐败的实践(公费大吃大喝只是最易被人觉察激起公愤者),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剥夺着无产阶级吧?他们损害的岂止无产者半无产者(尤其是下岗职工和未得温饱的老少边穷地区居民),而且是所有纳税人的利益。

二等奖中的散曲《夏三虫》(甘肃赵宗理),咏物寄兴,抒愤懑于趣味之外。如写苍蝇:“别看它,金碧辉煌一身好披挂,别看它,趁时得势飞黄又腾达。论作风,卑鄙齷齪令人厌恶令人怕;论资历,严酷的时节何尝有过它?你看它,结伙成群,哪儿腐朽就往哪儿去,哪儿糜烂偏往哪儿爬,成天价追逐些啥?”写蚊子则是“心狭窄,嘴毒辣,寻隙觅缝入人闼。明知是来把血啗,高调儿还一个劲儿唱不罢。”作者拿它们同动物中的蜜蜂、青蛙对比,高下立见。人类中,处境尚未改善的无产者,是最能体会蚊蝇之可恶的,他们自会首肯这支刻画蚊蝇的黑暗的散曲,但他们能同意把人中的蚊蝇害人虫誉为无产阶级的高论吗?

二等奖的《劝夫曲》(四川曾道吾),《醉太平·戏作》(广东欧阳世昌),三等奖的《读信有感》(四川刘友竹),无论出诸调侃,还是直抒胸臆,都显示了基层文化教育从业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更接近我们熟知的无产者的概念。后者写某县七个月不发工资,教

师四出求援：“久已无人愧俸钱，诸衙频见小车添。有钱胥吏修公馆，无凳学生争破砖。难继饕餮悲绛帐，总多饕餮踞琼筵。索薪莫殚污尊口，乞食何尝免大贤（陶渊明有《乞食》诗）。”唐时“邑有流亡愧俸钱”的官吏，终究不过是皇家政权的一员，而今日以权谋私，厚了脸皮铁了心“不愧俸钱”的官员，倒成了理直气壮的无产阶级吗？只许他们欠发教师工资，挪用教育经费，逼得穷教师到处乞食，却不许诗人略一呻吟，这是哪家“无产阶级”的理论？

二等奖的《哀泾川》（浙江陈嘉棣），写了河流的污染：“但求万贯早缠腰，哪管四乡民死活。谁为儿孙惜溪山，倒挽天河一洗濯！”三等奖的《西江月·检查风》（湖南熊楚剑），对此不良之风更是一语中的：“平日高高在上，年终大搞检查。钦差巡按一车车，到处焚香接驾。顿顿佳肴美酒，人人既吃还拿。检收保证挂红花，管你是真是假。”《圈地叹》（福建丘幼宣）从一度地产热导致的“筑巢引凤凤不至，良田百里成荒地”，不但批评了违反土地大法，急功近利之误，而且从工农联盟的高度痛陈：“葱茏馥郁一朝凋，果农如割心头肉。断却世代生活路，痛哭呼天攥拳怒。水性似柔舟可覆，斩木揭竿史盈牖。十亿神州八亿农，天下安危系农衷。……呜呼！何时百揆谄通辩证理，公廉能勤求实治平始。”请问那些藉口毛泽东说“刻画无产阶级‘黑暗’者必定渺小”，而认为包括上述诸诗获奖就不能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论者，难道环境污染严重，弄虚作假成风，以至建设上不顾大局的盲动，不是有损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不是对我们爱国情怀的无端伤害，倒是“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行径么？

三等奖中的《打工情曲》（宁夏周毓峰），诗中主人倒是一个10年前的打工妹，应为“无产阶级”的一员。她在十年后从沿海特区还乡，与在农村苦守的旧日情人已判云泥，“情丝难续”。她的经历也平常：“初时出走情无奈，姊妹纷纷逼‘下海’。曾趋吴

市乞吹箫，也向秦楼弄粉黛。可怜浪迹与萍踪，百折千磨说打工。弱柳娇花谁惜取？凄风苦雨各飘蓬。攀龙附凤机缘别，竞羽争飞分巧拙。众里谁称幸运儿？女中亦有非常杰。十年拚搏呕心肝，一旦功成不下鞍，……朱颜镜里伤幽独，酒绿灯红竞相逐。岂无属意有情人，守身焉得真如玉。为将事业展宏图，已许心期在海隅。临归考察飘洋去，却是罗敷更有夫。”透过“情曲”，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原先或可称无产者的打工妹，成了有产者或有产者附庸的通俗故事，盖已无所谓光明还是黑暗了。

汪文认为不应获奖的获奖讽刺诗，尽在此矣。还有二等奖的《寡妇村行》（四川胡焕章），三等奖的《慰安妇吟》（北京刘孚），分别写了国民党撤退前在东山岛抓丁造成的死别生离，和日本军国主义给“慰安妇”造成身心屈辱的血腥罪行；凡是良知未泯的读者，都会为这样的正义控诉共鸣。体近乐府，虽然广义地说属于美刺之刺，通常已不归入我们所说的讽刺诗了。

通读上述各诗，对照汪文之所言，只要我们不把贪官污吏和腐败现象，以及各种坏人坏事，硬给“挂靠”在无产阶级上，则他高举毛泽东语录牌上阵，似难免“六经注我”之嫌。他处处自居为无产阶级利益的当然代表，而其观点和感情与无产阶级并不相干，这样的“无产阶级”身份也是颇可怀疑的了。

讽刺诗在得奖作品中占多大比例，已如上述，似乎不像汪某等说的“绝大多数”。但我不准备跟他讨论这“控制数字”。即使专门办一个讽刺诗大赛，又有什么大逆不道呢？

1997年6月26日

总结一百年

12月26日快到了，今年是毛泽东诞生104周年，不逢五，不逢十，按例不作大纪念。我却在这时想起他说的话：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加以总结。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是2400年的历史。加以总结，是根据史料，辨伪存真，对其中的经验教训，作出理性的判断。这却不是作为诗人，一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么“举重若轻”的。

毛泽东1941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说，“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动手去研究”；他建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从那时到现在，50多年过去了。对于从1840到1940这百年中国史的研究，到底怎么样了呢？对于在这之后从4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又怎么样了呢？

后者至今还是一大缺口。而前者，我们半世纪来有了一些著作，但是或者已被时间淘汰，或者难免历经不断的改写，其中由于这样那样的政治需要而改写的，越改离历史真实越远，由于政周趋向开放和档案逐步开放而改写的，则可能逐渐接近历史本来面目。总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数量质量都不能满足客观地认识

历史的需要。

摆在中国人面前，特别是摆在中国历史学者面前的，不但有古代史研究的任务，而且有近代和现代史研究的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该继续加以总结，为研究其后的百年史提供背景，然而时不我待，不能“循序渐进”，只能“齐头并进”了：因为从孙中山（中经毛泽东等）到邓小平加以总结，也已刻不容缓了。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历史总结，主要是以典籍为依据；更古老的历史，则还要参之以地下出土的文物。而对从孙中山到邓小平的总结，则有一个极大的优势，不但有文献可考，更有亲历目击的见证。百年来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军事活动，文化活动，多数情况下是席卷全国的、全民规模的，是主动或被动的群众动员和群众参与。对于许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除了决策层面的情况以外，连普通人（即决策层以外的干部和群众）也有发言权。我以为我们的历史学者，要重视微观和实证，而各个方面处于“无组织状态”的，即在有组织的历史学者之外的人士，也可以并且应该从各自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提供有关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的证词。这将对历史教科书和历史文件的旁证和补充；事实上，社会的群体记忆和群体思考应该是专业历史书写的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1945年七大之前《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20多年的历史问题，不但为七大，也为尔后取得全国执政权作了准备；80年代初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记录了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的初步成果，总结了30多年的历史问题，为切实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创设了较好的思想条件。与上述时段衔接，又已经20年了。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从孙中山到邓小平加以总结的大题目下，对邓小平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加以总结，对80年代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再作一个

决议，窃以为此其时矣，不知然否？

从孙中山到邓小平，做出百年中国的历史总结，它的意义正在于继往开来。它不限于研究领导的决策，而涉及全国人民历史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因此仅仅靠专业的“克服”了“无组织状态”的历史学者，靠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专门家是不够的，它的完成，离不开普通人在不同层面上的不同形式的参与。也许，在一个一个具体专题上，多搜集民间的史料，多听听普通人的意见，有利于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有利于切实地厘清是非。

我们注意到海外境外的出版物，这个题目已经有人在做。例如刘再复、李泽厚关于“告别革命”的对话录，就是从回顾中国百年风云着眼的。尽管不同意其观点的人，也不能不看到，旅外的学者先行的一步，无疑是对中国国内所有历史学者和历史见证人的挑战。

面向新的世纪，回首过去百年，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真正地加以总结，这恐怕是对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的最好的纪念，也是献给后来者最好的礼物。

1997年12月7日

夜 读 抄

——读《陈伯达传》

一

叶永烈著《陈伯达传》296页：“（1966年）6月5日，根据陈伯达两次去北大后的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陈伯达给那些支持彭真为首的原北京市委和陆平为首的原北大党委的人，送了一顶‘保皇派’的帽子。从此，‘保皇派’一词在文革中广泛应用，一大批坚持革命真理，反对‘文革’的同志被斥为‘保皇派’，‘保’字号。”

所谓“保皇派”之说，在文革期间是盛行的。在以毛泽东早年语录“造反有理”论相号召的文革中，特别是文革初期，“保皇派”或蔑称之为“保”字号的帽子加在谁的头上，都是不光彩的，避之惟恐不及的。对被称为“保皇派”的同志们，当时如果推崇他们是“一大批坚持革命真理，反对‘文革’的同志”，他们却是绝对不会接受的，而且会认为你是在诬蔑他们，陷害他们。

此无他，因为彼一时也，此一时也，那时候谁“反对文革”，就是反动派，就是反革命；一个“坚持革命真理”的人怎么能反对文化大革命呢？

当时确有反对文革的人，凡公开阐明这一观点的，都已经关

起来了。因各种不同理由而在内心反对文革的人，可能在所谓“逍遥派”里就有，在所谓“保皇派”和“造反派”当中也未必没有。

当时的革命对象，亦即造反对象，是由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首先是中央文革出面宣布的，有时候今天宣布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是要保的，明天又宣布原来是“坏人”，是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要打倒，要鼓动“革命小将”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去揪斗，去造他的反，革他的命。此即所谓文化大革命是“由上而下与由下而上的革命相结合”的“由上而下”的方面。

下面的这派那派，出于响应号召也出于各种切身利益，而决定接受对这个那个领导干部是“打”是“保”的态度，这里有紧跟的成分，有不得不尔的成分，也难免夹杂某些投机的成分。然而在当时以中央名义要打倒的人，首先是刘少奇，邓小平，然后是所谓“最大的保皇派”陶铸（据说他对打倒刘邓态度暧昧），然后是各地各部门的第一号“走资派”，几乎毫无疑问的都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造反派”固然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造他们的反，连所谓“保皇派”也无一例外地惟恐落后，在这个意义上，“造皇派”也是切实履行“造反有理”论的造反派，我不怀疑其中会有人在内心里并不坚决造反的，甚至对被打倒者怀抱同情的，然而，在行动上，他们无疑是公开表态加入了文革主流，成为构成文革主流的一份政治力量了。任何人事后表示，当时形格势禁，只好说了些违心的话，其实是不同意打倒刘邓等等的，这都无法改变社会实践的既成事实。

而当时的革命是以保卫毛泽东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权威和统帅地位的名义相号召的，下面的这派那派在对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的干部或造反或“保皇”容有争议（最后也还听命于上面），而在最根本的对待毛泽东的态度，则也是无一

例外地只保而不反的，我相信这是出于真诚：爱屋及乌，对于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都没有二话，因稍有不满意，就是反文革、反革命、“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对于似乎同属“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周恩来，中央文革的某些人似有纵容以至怂恿下面加以反对的表现，但又不落言筌，有时出尔反尔，十分微妙。

《毛泽东家世》一书透露，文革初期，毛泽东前妻生的女儿李敏经过一番周折，来到毛泽东住处，正巧碰上江青，江青挖苦说：“小保皇回来了呀！现在正在搞运动，回来干什么？想摸底呀？”还是毛泽东反驳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可见毛泽东虽主张造反，却不反对保皇，是造反和保皇的辩证统一论者，毋宁说，在文化大革命的语境里，保皇恰是造反的前提：在保卫毛泽东的大前提下，“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毛主席叫打倒谁就打倒谁，这样去造刘邓陶的反，造各级“走资派”的反，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然而从上引江青的挖苦话来看，“保皇”在当时是不吃香的（这个“保皇”当然不是指的“保卫”毛泽东）。因此，各地那些在“保”毛泽东的同时还要“保”本部门本单位的领导干部，因而被称为“保皇派”的人，未能免俗，没有毛泽东那样认为“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的气魄，他们也腻味“保皇”两个字，于是多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以区别于同样自命在干“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派。

文革发动已31年，结束已21年。好像没有听说当时有过哪个群众组织是标榜反对毛泽东的。这派那派在拥护毛泽东、拥护文革这一点上并无二致，打来打去，实在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他们之间的分歧，多半只是认为这个干部“是走资派”该打倒，“有错误但不是走资派”不该打倒，或“犯了走资派性质的错误但不是走资派”不该打倒，或不仅不该打倒，还

该推出来主持某一级的党务政务，为这些干部的“你死我活”引发你死我活的文斗和武斗，看来只能归咎“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所说的“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了。

从文革开始的打倒（干部和群众）两个“一大片”，到主要是围绕着干部问题展开毛泽东所说的“全面内战”，不可收拾，于是妥协，大幅度“落实干部政策”，曾被“打倒”的都又“站出来”或“站起来”了，于是各派群众中那些曾经以打倒过多少干部当作自己“立新功”的，都不免有一种失落感，好在都不须承担什么责任，运动初期的账，记在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头上，早就上山的上山，下乡的下乡，该“清查”的也“清查”过了。

这些往事，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具体进程，容有不同的表现，大路数没有什么出入。叶永烈先生关于“保皇派”的定性，稍嫌简单了一点儿。盖文革初起，以造反为荣，以保皇为耻，“保皇派”是贬义的，大家敬谢不敏；到了后期，一度被打倒的“走资派”复出，文革动乱归咎于造反派，特别是文革结束后，褒贬易位，以造反为追随林彪、四人帮，以“保皇”为“坚持革命真理”，叶永烈回叙云云，也就“顺理成章”了。

1998年1月7日

二

《陈伯达传》374页：“据陶铸夫人曾志说，那是陶铸‘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把刘邓做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新华社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有毛主席和刘主席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志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

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的，被“四人帮”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而主席与少奇的那张，江青也子虚乌有的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这里说的是 1966 年文革初期的事。当年 8 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刘少奇已经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原来第七位的邓小平就更靠后了。但是刘的国家主席和邓的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仍在，国庆宣传中陶铸照老规矩办事，自然要发他们的照片。倒是新华社记者比陶铸跟得紧，早得风气之先，压根儿就没像往常那么抢拍他们两人的镜头，于是才不得不使出“技术处理”这个招儿来。这让江青、陈伯达抓住了，1967 年 1 月 7 日他们去新华社讲话，就拿这件事坐实陶铸“最大的保皇派”的罪名。自然，即使没有这件事，想打倒陶铸也还有的是藉口，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嘛，这小菜一碟，信手拈来罢了。

时过境迁，我们可以说，这种对新闻照片的“技术处理”是不足取的，因为这样做违反了新闻要求绝对真实的基本原则；当下新闻做伪，与异日伪造历史是一回事。陶铸这样做，符合当时一切工作包括新闻服从政治需要的原则，且新闻照片的各种程度的“技术处理”既是新华社现成的“补救办法”，则早在陶铸主管新闻宣传口之前已有先例，因此对陶铸本人不足深责。

然而，大概不会有人以为江青、陈伯达是坚持新闻不得做伪的先锋吧？

后来我们知道，这样的做法固不限于新华社。单是与鲁迅有关的照片里，剪掉什么人，抹去什么人的事，就不止一桩两桩，好像比在文学稿上删除什么，也不多费什么事。我们不能不为“技术处理”的技术之高明和先进而赞叹了。

社会进入了电子信息时代，我们的新闻图片、历史图片、在

“处理技术”方面，是不是更上一层楼了？

1998年1月8日

三

《陈伯达传》266～267页，转引档案中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上午在杭州对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五人谈话记录，有一段说：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是‘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按：“天赋人权”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在英文里是 **natural rights**，意思为“自然权利”，也就是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头说的“人是生而自由的”那样，与生俱来的权利。不知最初的汉译者把这个可以译为“自然”、“天然”的字眼译为“天赋”，出于什么考虑，是不是有意同中国皇权专制主义几千年标榜的“君权神授”唱对台？

其实“权利”也是从西方引进的概念。查《辞海》，从中国汗牛充栋的古籍中也找出了“权利”这个词，但那只是“权势和货利”的合称，并不带有我们现代作为法律用语的内涵；而我们今天在 **natural rights** 的意义上使用“权利”一词，则是与“义务”对举，专指公民依法享有的权力和利益。

所以，这里所说的，如人的天性（人性）一样与生俱来的，自然（天然）具有的，作为每一公民个人所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力和

利益，即“天赋人权”中的“人权”，就与毛泽东自称“人赋人权”中所指的，在政治即阶级斗争中的领导权、执政权、统治权、镇压权，不是一回事。毛泽东在这里说的，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的基础，在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授权，同后来在 1968 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传达的，他有关“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一段语录的精神是一致的。

毛泽东之所谓“人赋人权”，跟学术界所说的“人赋人权论”也全不相干，后者是指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论》的作者柏克和十九世纪历史学派的观点；对于“我们的权利是谁给的”这个问题，“柏克的答案是人赋的，是人类历代智慧的结晶所赋予的。人权的观念就是在这个传统之中滋育的和成长的。”（见《读书》1994 年第 8 期何兆武文）

已在中国流行近百年的“天赋人权”，说的是 right，毛泽东说的“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指的则是 power。这个误会，也许要怪第一代启蒙者翻译家用了“天赋”二字？唯物论者的毛泽东是相信“人定胜天”的吧。

1998 年 1 月 8 日

《党内有个李锐》序

李锐：这个名字今天广为人知，总是与他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记述相联系，与他对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研究相联系，与他对左的倾向（已经从“左派幼稚病”恶化为左倾顽症）及其各种表现的探讨相联系。

人们读过他写的书，现在要来读写他的书了。

李锐生于1917年，正是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开始把社会主义从理论形态转付实践的一年。1997年，李锐在《八十自寿》诗中写道：

曾探骊珠沦厄运，仍骑虎背进谏言。

早知世事多波折，堪慰平生未左偏。

他走过的80年人生旅途，大体上可分为前后两个40年。他在《六十自寿》诗中说过，“生涯岂料虚前席，逆境常因好妄言”，第一句说的是在水电建设和三峡问题上接受毛泽东的咨询，第二句说的是在庐山会议上因言贾祸。其后的20年间，他经历了从撤职查办、开除党籍、离婚破家到流放坐牢一系列的打击，“抛掷华年如废纸”，乾坤只剩一头颅。可贵的是，这颗头颅没有停止思考，这样，到了80年代新时期中，我们就从他笔下陆续读到围绕中国革命的正剧和悲剧所作的反思。

李锐是中国共产党内的高级知识分子；在30年代中后期从学校进入社会生活，他既与同一代的共产党人走过几乎同样的道路，又与同一代的知识分子有相近似的心路历程。如果说所有的人的

幸福都是相似的，那人们的不幸，却因各人的经历、资质而有同有不同。少年时就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向往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李锐们，成长于三十年代，启蒙和救亡的声音同时呼唤着他们，追求真理和献身革命统一在他们的行动中；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面临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他们别无选择地投身于共产党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锐们到达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正好在1939年12月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当时党中央机关领导层（其中多数是知识分子），懂得“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一道理。新来者一时受到了重视以至重用。随后，包括李锐在内的一些在中央青委工作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办了“轻骑队”壁报，对边区的现实作出某种批评性的反应，锋芒毕露，招致了不满之声，接着而来的整风运动，自然有清算王明路线乃至抵制共产国际的更大背景，然而对干部的审查，则把怀疑对象首先集中于来自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有陕甘宁边区（后来扩大到敌后根据地）“特务如毛”之说，遂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弄得人人自危，这可能受到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模式的影响，而与当时革命队伍中农民成份占压倒优势，自发形成的反智倾向，恐怕也不能说全无关系。这是李锐进入延安这一“革命圣地”后最初受到的挫折。这也许正是李锐此后几十年从未以左的一套待人处世的原由之一。

当时在边区的革命者包括“抢救运动”中被伤害的人，几乎都没有把它如实地视为一次政治迫害，流行的看法则是当作革命进程中难免的失误，而据说革命队伍内部的阴暗面，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不宜暴露在敌人面前，于是轻轻掩盖过去，谈不到从中汲取教训。可能李锐当时也停留在这一认识上，他是受过传统的和革命的两重影响的人，儒家正统中所谓不计个人毁誉得失，委曲求全，以德报怨，和共产党人誓为革命的集体的组织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直至鲜血和生命……加上战争形势逼人，这

使他一经平反，不及抚摸身上的伤痕，就如人们常说的，“轻装上阵”，义无反顾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了。

大约在1949年进入长沙后，李锐便有机会看到国民党领导特工的高级官员唐纵的日记，从那里知道，在延安惊呼“特务如毛”自相惊扰、大搞“抢救”自相残杀、闹得一片混乱乌烟瘴气的时候，国民党则正为在延安“没有一个内线”而遗憾。但这时李锐还没能进入对党史和革命史的回顾。他忙于大量的实际工作。在个人处理上下左右人际关系时，也一仍其旧，毫无城府，“直道事人”，直言不讳，即使在毛泽东面前，也坦陈己见，无多顾忌，可谓“书生气十足”了。

我想是1959年反右倾后，把他推入“六不怕惟头尚在”的深渊边缘，继之以文革中长年的单人监禁，这才最终促使李锐在回首平生的同时，在重新咀嚼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同时，清理了自己的思路，从而清点几十年中国革命实践留下的“遗产”。

当李锐走出秦城监狱的时候，他给人们带来狱中用棉花签蘸龙胆紫写成的诗稿。不久，我们更看到他一系列史实准确、观点鲜明的著作，他属于最早一批走出个人迷信、闯入“左”的禁区的共产党人。

在历史反思中，李锐早年接受的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五四精神的熏陶起了主导作用。李锐在过去的半生，一直属于思想活跃之列，其中就有自由主义的潜在影响；如果说苏东坡自由出入格律之间，是“曲子词缚不住者”，那末李锐喜作独立思考，则是教条主义所缚不住者。本来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不是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文中说的那个自由主义），其实是人类埋葬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的条件，当然也是在中国实现民主和法治的精神条件。它与马克思要对一切现存的社会秩序、现存的学说理念都给以批判性的审视和重评是相通的：它同政治上的独裁、思想上的专断不相容；它的宽容表现于承认多元，保护个性，它的革命性则表

现于不断地探索，由怀疑始，通过证实和辨伪，使认识不断地接近实际，接近真理。

也许事实将会证明或已经表明，李锐年轻时已形成的性格，天真、热情和浪漫的一面，使他适于成为一个直抒胸臆的诗人，务实、求是和执著、穷究的一面，使他适于成为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家和思想者；而他晚年仍有精力伏案，也许是他的幸运，又是我们这些读者的幸运。

从这本传记里，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李锐之为李锐。李锐成为今天的李锐，是时势使然，这里有历史的必然，也有历史的偶然在。我们通过李锐的一生，可以看到半个多世纪中国历史风云的翻卷，我们从中国以至世界历史的背景来看既是共产党员又是知识分子的李锐，也才更能看清他“这一个”的意义。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一百年后，**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现在到了**1998**年，在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之际，我们要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0**年的经验，更要总结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尤其是执政近**50**年的历史经验。这是一个大的工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让我们感谢李锐同志，他已经为此献出不可磨灭的劳绩。

1998年5月26日

说“神化”

——纪念真理标准讨论和 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

神在天上，鬼在地下，人在天地之间。说一个人“人不人，鬼不鬼”，是贬义，那样的生存状态不足羨，那样的人格不足道。但是从没听说对于“人不人，神不神”发出警议；半人半神，竟是把人“神化”的理想境界。所谓君权神授，就是说真龙天子受命于天，于是奉天承运的君王、皇帝也就有了“神性”。无法无天的“人治”，便成了“神治”。

近读潘旭澜教授《太平杂说》，洪秀全就是这样一个自我“神化”的“天王”。他在禁绝一切“妖书”“妖言”的同时，还要著书立说，并且删订古书。他其实不懂基督教，只是借用基督教的招牌。他的启蒙牧师罗孝全（I. J. Roberts）说，洪秀全“不是要我来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要我来做官，传布他的教义，并且叫外国人来皈依他自己”。洪秀全的教义中，比如“自古君师无异任，只将正道觉斯民”，“只有臣错没有君错，只有子错没有父错，只有妻错没有夫错”，“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无责之人只娶一妻”等等洪式教义，披基督教外衣假传“上帝圣旨”，贩卖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渣滓。洪秀全吹嘘自己是万国“独一真主”，他要同时握有君权和神权，同时做国王和教主，对臣民实行从物质到心灵的绝对统治。

洪秀全把自己塑造为“人不人，神不神”的偶像（能动的偶像就是实体了），其实，这也不是他的创造。中国在结束了古史的

传说时代以后，历代君王、皇帝都是这样，他们手中的君权、皇权不过是神权的人间化。本来是先有神权崇拜后有皇帝崇拜的，可到后来，你从传世的塑像、壁画看，一切神的形象以至服饰玺舆仪仗侍从，几乎无不套用皇帝家的规矩了。神权反过来成为皇权的影子。

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标榜“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把这里体现的君权、族权、夫权，加上神权，通俗化为捆在农民身上的四条绳索。

关于神权，毛泽东当时是支持农民起来砸庙打菩萨的。这符合五四运动时破除迷信或曰打倒迷信的口号。当时对于神权下的迷信和宗教两个层次没有明确的划分。按照西方哲人的见解，“迷信存在于对上帝的毫无意义的敬畏之中，而宗教存在于对上帝的虔诚崇拜之中”。（西塞罗）在中国一般缺乏严格意义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精神，知其所以然而然的虔诚崇拜，少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毫无意义的敬畏”；对中国的“上帝”即各种各样的神，还有神在人间的代表即皇帝的敬畏，进而变为诚惶诚恐的恐惧。中国人从来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古老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恍兮惚兮，神人不分，如说后稷是他母亲踏在一个巨大的脚印上受孕的；无论中土或边疆的皇家，无不给自己的祖先涂抹上浓厚的神话色彩。皇帝们自称是神人杂交的龙种，造神的目的端在于拥戴皇帝。

神和“神化”的统治者所以使臣民产生“毫无意义的敬畏”以至恐惧，盖因他们的“神性”规定了他们要以至高至大至圣威权君临天下，以能操生死休咎荣辱震慑百姓；如果说在原始社会“神性”还只是不可抗拒的自然力的化身，后来则成为统治者意志和社会暴力的体现。

被赋予“神性”的宗教式偶像，不管是作为虔诚信仰或虚妄

迷信的对象，总有成文或半成文的大体定稿的教义和戒律，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

被赋予“神性”的人格化的偶像，则往往不仅作为教条而存在；由于本身及其阐释者因时而异因地而异的需要，会生出种种随意性的、情绪化的异想、谬论、主张和指令。其危害性有时近于或超过邪教。因为“神性”排斥人性和理性，可能导致具有极大破坏力的集体迷狂和施暴。

这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其例。直到四十年代国民党把蒋介石奉为中华民族“道统”的传人，鼓吹对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可见把蒋介石“神化”的努力。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无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度，居然一度掀起席卷全国的“造神”运动，岂非咄咄怪事！被毛泽东在反右派运动中特别看中、据说曾想用以取代周恩来职务的柯庆施其人，竟拾国民党的余唾，说对毛泽东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信仰到迷信的程度”云云，更是怪事之最！

毛泽东“打鬼”，对江青说“借重钟馗”，江青则说“请来解放军尊神”，也就是林彪，相与支持。林彪从反右倾运动中取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后，走到前台，步步为营，一呼百诺地搞起“造神”运动。他不愧是“蒋校长”的学生，在新的条件下贩卖蒋介石国民党“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旧货；他又不愧为“毛泽东的好学生”，格外重视意识形态和舆论准备的工作：他首先把毛泽东思想尊为“顶峰”，为后来的“第三个里程碑”论奠定基础，从他提倡的读马列要取“捷径”，可知他已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靠边让路，独尊毛泽东“一句顶一万句”，“光焰无际”，比圣经还圣经，不但把不同意称“顶峰”这种绝对化论调（也是马屁论调）的人打成现行反革命，而且谁背诵毛泽东语录脱漏一个字也难免要遭批斗！

此之谓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也就是树立毛泽东

在全党全国（从意向上并及于国际共运和世界革命）的“绝对领导地位”。说打倒谁就打倒谁，于是刘少奇整死了，邓小平发配了，等等等等；说用谁就用谁，于是林彪定为接班人写进宪法、党章，等等等等；说干什么就干什么，口含天宪，言出法随，一句话半句话也奉为“最高指示”、“最新最高指示”，一个“八亿人口，不斗行吗”，雷厉风行，全国一片斗斗斗，那后果远非五十年代轻率将麻雀列入“四害”加以围剿可比，因为此时围剿的已是万千活生生的干部和群众了。功念甘棠，泽及身后，所谓“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两个凡是”说，自1977年2月7日提出后，曾经顽固地抵制对冤假错案的平反，阻挠对诸多历史性错误的纠正，以及改革开放的初步尝试。

林彪之流，口口声声马列，口口声声革命，其实他所想所为，远远倒退到辛亥革命之前，甚至返回到“神道设教”的古代。他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联系到他提倡的全国军事化和“极端政治化”，这一套不能不让人想到“君要臣死，不死不忠；父要子亡，不亡不孝”的愚忠。毛泽东本人固然对斯诺说过个人崇拜也要搞一点的话，但对于类似宗教仪式的“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活动，据说也表示厌烦了。走笔至此，耳边轰然响起“忠字舞”的乐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声，仿佛看到香烛高烧，人们在跪拜“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不过虽以天地喻党，而实际上毛泽东已凌驾于党之上。天地之间，独以毛泽东为大，“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中央“一班人”，“班长”说了算，“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都是上了“书”的章程。多年来一言九鼎，一时间唤雨呼风，天昏地暗，万马齐喑，听不见街谈巷议，听不到面折廷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变成了“孤家寡人”，是被造神者造成了神，还是被拥君者拥戴成当代一帝，

这样的议论已没有实际意义；如果追问在多大程度上领袖本人也参与了把自己“神化”和“皇帝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无意识与潜意识的比重，除了传记学的意义以外，也只能换得历史的嗟叹而已。

记得毛泽东曾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确是千古不刊之论。把文革直到文革前逐步制造了“现代神”和“现代皇帝”（没有君主称号的君主）的历史，同几千年来神权与君权交相为用的专制主义历史对比观照，从中找出政治体制的和思想文化的渊源，找出消除极权主义专制独裁温床的出路，让“神化”归于遥远的神话，我们才对得起在“神话年代”中的死者，才对得起一代一代的后人，也才对得起历劫幸存的我们自己。

1998年7月30日

附：

续谈“神化”

上面的文字，限于篇幅，意犹未尽。

说到当之“造神”，点名举出林彪、江青，那是因为特别军事法庭起诉并审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革期间以至文革以前，从事“神化”毛泽东最力的还有康生等人。他们善于“拉大旗做虎皮”，为了张大这一“虎皮”，披裹着狐假虎威，好更加肆无忌惮地干坏事；他们力图使“大旗”赋有“神性”，他们身上也便沾上“神气”，就如古代的巫以天神的代言人身份出现，说能沟通神人关系，一旦他们所代表者成了神，他们自称得到神的授权，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了。

而“造神”者自己并不迷信。搞“个人崇拜”时，他们是“做戏的崇拜者”；搞个人迷信时，他们是“做戏的迷信者”。他们

利用对毛泽东的“神化”以愚民，又使被他们愚弄的群众为其所用。他们之间的互相吹捧，也都是利用毛泽东“神化”的影响来抬高自己。林彪至死也没说一句真话；江青则是身陷囹圄，才说出了“我是主席的一条狗，叫我咬谁我咬谁”这样朴素的言语，已经不带多少“神化”的“神气”了。

毛泽东本人绝不迷信，不但不迷信神鬼（这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证），而且不迷信一切人世间的权威（这可参看其早年文稿如《民众的大联合》等）。不然他就没有造反的锐气了。到晚年表示个人崇拜要有一点，完全出于政治需要，出于加强领导权的需要。对毛泽东说来，“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都不过是对权力的崇拜和对权力的迷信，而毛泽东乃是最高权力的化身。

古代的皇权迷信是权力迷信，集中于皇帝一人；现代的个人迷信也是权力迷信，最后归结到最有权、权力最大最集中的一人身上。

1954年到1956年，在涉及斯大林的表述中，从称个人崇拜到改称个人迷信，似乎不止是一个译文统一的问题。其后的事实表明，中国人中对党的领袖毛泽东的态度，也有一个崇拜和迷信的区别，既是纵向不同阶段的，又是横向不同群体的；借用西塞罗分析崇拜和迷信的定义，崇拜的虔诚还有类似宗教信仰的理性成份，迷信则只是敬畏以至恐惧，纯属非理性的了。在一些个人身上也可能出现崇拜和迷信的交错和演变。

在前社会主义阵营，由于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以斯大林为典型的代表，存在着毛泽东所命名的“一言堂”现象，如果是在野党搞“一言堂”，危害仅及于党内（当然问题也会闹得很严重），而更严重的问题是执政党搞“一言堂”，党内缺少民主，党外民主也多不了，“一言堂”手中有权，言出即法，或以“一言堂”长官意志指导立法，干预司法，结果会是无法无天。维辛斯基作为总检察官主持莫斯科审判，其实只是执行斯大林诛杀异己的行刑吏。

斯大林式的“一言堂”，是连前于共和政体的“君主立宪”制还不如的。斯大林高高在上，没有任何个人或集体能对他实行监督，哪怕退而求其次叫做对君主、皇帝的“进谏”。他高唱“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在他那里“批评”只是上对下的专利，是他入人以罪而不容申辩的特权。任何被他敏感地“猜中”或认定反对他的言行，都会立即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肉体的消灭。而这些言行，可能少数属于正常批评，一部分属于不同意见，多数不过是某些对个人处境、具体事象和人际关系的牢骚不满，或者完全出于“隔膜”的误解，故意的曲解和栽诬，告密和陷害。至于“神化”了的斯大林，连日常起居都毫无透明度可言，围绕他是一重重由神话构成的神秘纱幕和铁幕，除了他的政治局成员和身边侍卫以外，谁又有对他进行监督的起码条件呢？斯大林在这样的环境里，得以全无阻力地施展他的权术，犯下这样那样的历史性罪行。

关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有关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揭发已有**42**年，对这一现象的体制根源有较多的研究，对其文化根源似也有了一些探讨。

相形之下，我们对至文革而登峰造极的“造神”运动，**1978**年的三中全会倡导了实践标准与之对抗，**1981**年的六中全会决议予以否定。然而除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其中所起的恶劣作用以外，对其他方面因素的关注，还是历史研究的弱项。例如党政军民（指社会团体）的各级干部，工农兵学的广大群众，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为什么都不自觉地接受并汇入了“神化”毛泽东的潮流？这有政治体制、社会环境和人文气氛各方的原因，而在国民性即普遍文化心理上为之提供了什么样的土壤，**20**年来有所触及，但探索远不深入。我以为，众多精神因素中，长期皇权专制造成的“臣性”即“奴性”应居首位。“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朝廷百官对皇帝固然俯首称臣，黎民百姓也概称臣民，

而臣仆、仆从、奴隶、奴才，虽在语源和语义上有若干细微的差别，而被动、愚昧、驯顺、效忠则是一致的基本要求。农民们只盼有个好皇帝，士大夫“一日无君则惶惶然”，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在四五十年代间，特别是1958年兴起所谓“做驯服工具是共产党人的最高志愿”一说，把这种病态的性格改装成“无产阶级党性”，等于用革命油彩美化、强化了皇权思想。这为文革中最大限度地“神化”毛泽东提供了“理论”。

观察中外历史，都有所谓臣性，也并非中国所独有。在前社会主义阵营之外，不但日本即大和民族有忠君尚武的传统，而且希特勒的纳粹，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都以他们影响下群众的盲目拥护为巩固其统治的基石。

“臣性”这个东西，可以使愚民驯顺地忍受欺压，成为顺民，也会驱使愚民以暴力欺压别人，成为暴民。顺民和暴民，都是以臣性为精神支柱的愚民，是皇权和神权结合起来实行愚民政策的可悲结果，也是它赖以维持统治的社会基础。

什么时候，一方国土上绝大多数人告别了“臣性”，也就最后剥夺了某些掌权者身上的“神性”，使对人的“神化”最终归于神话。

1998年8月3日补写

莎翁／福斯，福斯？
朱學勤／歷史上被忽視者
的記憶／與一種虛假
的認同／康神生
劉賓雁／被冠以絕詩的生存之舟
卷一／附子、中興及其它

思想者文庫

第一輯

ISBN 7-309-03949-4
CIP 數據
2006012001
I. ①朱...
II. 朱學勤
III. 文學—評論—文集
IV. I267.6



定價：25.00元